



陈云

和他的事业

——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云和他的事业（上）

在《陈云文选》（1—3卷）、《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
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
会上的讲话（代序）
（1995年6月13日）

江泽民

同志们：

今天是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新出版的《陈云文选》1至3卷及《陈云》画册，也自即日起在全国发行。中共中央为此举行座谈会，缅怀陈云同志的光辉业绩和不朽风范，表达我们对陈云同志衷心的爱戴和尊敬。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70多年，功勋卓著，永载史册。新版《陈云文选》3卷本。集中了他的思想和观点，是他长期从事领导工作丰富经验的理论概括，对于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陈云》画册生动地再现了他的经历、工作和生活。这两部书同时出版发行，是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对陈云同志最好的纪念。

曾经以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卓越才智，投身于现代中国伟大历史创造活动的杰出人物的逝世，留给历史和人民的不会仅仅是悲痛。他们的精神永在。陈云同志的业绩和著作，他的思想、品德和风格，属于我们伟大的党，属于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陈云同志的一生是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对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无限忠诚，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历过民族解放斗争与人民革命斗争、地下斗争与公开斗争、武装斗争与和平建设的长期考验，无论是领导工农群众工作、党的建设工作、军队工作或是经济建设工作，无论斗争怎样艰巨，情况怎样复杂，也不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他始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瞻远瞩和脚踏实地的作风，始终表现出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信念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陈云同志在任何时候总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他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却从来都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他十分关心培养选拔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并大力推进这项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工作，同时严格要求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把好政治关。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等著名论断，应该成为全党同志的座右铭。

陈云同志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来自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来自实践和群众。从我国国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清醒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情况，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踏实细致地开展工作，并下大的决心一干到底、干出成果，这是陈云同志鲜明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他一生注重调查研究，认为领导机关讨论决定重大问题要事先拿出90%以上的时间搞调查研究，准备几个方案，反复权衡，慎重决策，同时要求领导干部广交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认真倾听不同意见。

他多次回忆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下学习哲学的情形，认为在干部中特别在领导干部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思想上才能真正提高，工作上才能不犯大的错误。他从实践的切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贡献。在陈云同志的身上，我们看到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的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无产阶级勇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的有机统一。

陈云同志是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他对党、对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特别是他为中国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所建立的功勋尤为卓著。新中国建立以后，他长期主持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建国初期，他在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迅速稳定金融物价、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 and 促进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实行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我国工业化基础等各项开创性工作中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强调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并为有效地克服当时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困难做出过突出贡献。从 50 年代起，陈云同志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过许多重要观点和主张。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他根据历史发展的新情况，主张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应占的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率先批评过去计划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指出计划工作制度中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些观点，当时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关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的观点，关于“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观点，关于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观点，关于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的观点，关于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的观点，关于要十分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定要一起抓的观点，等等，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长期的重要指导意义。

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丰富经验和崇高品德，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的巨大力量。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陈云同志的著作，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克己奉公，扎实工作，努力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坚决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带头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出更大成绩。

在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
上的讲话
(1995年6月12日)

倪志福

同志们：

首先，我对这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也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25年他参加“五卅”运动，同年8月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全馆职工大罢工，并取得胜利。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参加上海工人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曾受上海总工会的派遣，与驻扎在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军谈判。1932年3月，他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第二年年初，他离开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继续参加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全总中央苏区执行局副委员长、党团书记。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同年10月，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记得在党的十大之后我参加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单独把我留下同我讲党的历史，其中谈到：党的六大和六大以后，党中央领导层陆续充实了一些工人出身的同志，工人对马列主义容易接受。后来，他们中有许多人为革命牺牲了，现在还健在的只剩下陈云等几位同志。当时，我和陈云同志还没有接触过，但周总理的这一席话给我印象很深。

在我进入中央领导岗位工作后，和陈云同志接触机会多了，对他的思想、作风、为人有了亲身感受。他不轻易讲话，而且每次讲话都不长，但他的话总是很严谨、很深刻，特别是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能够在关键的时候讲关键性的话。例如，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郑重提出应当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坚决支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陈云同志旗帜鲜明地为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做了大量工作。那时我正在国外访问，根据中央的指示，于5月26日提前回国。我刚到北京，陈云同志就派秘书来看我。当时，中顾委已经对时局有了明确的表态。我从这位秘书那儿知道，中顾委的表态实际上反映了陈云同志的态度。我从中了解到陈云同志坚决反对动乱的坚定立场。

陈云同志作为老一辈领导人，十分关心我们这些年轻一点的干部。有一次，我受地方工会同志委托请他题词，他同时也送给我一个条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勉励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一些功过是非问题上，他和中央其他一些老同志出面主持公道，给予我关心和爱护。他是我所敬重的老前辈。在他逝世的当天，我出访回国，刚从机场回到家里，得到消息后，就马上赶到医院，两次向他的遗体告别。我为我们党和国家失去他这位德高望重、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而深深感到痛心和惋惜。他虽然逝世了，但是，他把他的思想、品德和作风留给了我们，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很好地学习、研究、宣传他的思想和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

生，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最后，预祝这次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

给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
组织委员会的信
(1995年6月6日)

钱伟长

得请柬及通知，承邀约参加陈云同志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至深感荷。但我于12日赴沪处理上海大学校务，不能莅会，为憾。想大会发言，必多卓见，如有文稿望能惠赠一二，俾能对陈云老之思想深入学习。谢谢。敬祝研讨会成功！

给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
组织委员会的信
(1995年6月8日)

耿飚

欣闻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召开，我因患病住院不能参加，甚感遗憾。

陈云同志长期以来一直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对我党和国家的建设做出过无可比拟的贡献，他的思想在今天对我们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理论界、学术界加强研究，大力宣传。谨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在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1995年6月12日)

薛暮桥

组织委员会负责同志：

收到你们举行陈云同志生平与思想研讨会的通知，非常高兴。举行这样的会议，对于发扬光大陈云同志的思想，教育后人，确实非常必要。

我过去写了有关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及杰出的领导才能的文章有三篇。第一篇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发表在《红旗》杂志 1984 年第 15 期，第二篇是《在曲折征途中拨正航向》，发表在《红旗》杂志 1986 年第 13 期，第三篇是《杰出的经济工作者》，发表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陈云与中国经济建设》一书上。这三篇文章可以代表我的认识。

近三年我一直在病中，说话说不清楚，故作此书面发言，请谅解。

纪念陈云同志
——在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1995年6月12日)

逢先知

今天，我们怀着无限崇敬和思念的心情，在这里召开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对陈云同志的思想和历史功绩进行深入的研讨。我认为，对陈云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研究、继承和发展他的事业和思想。

陈云同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在20年代，刚满20岁的陈云同志，就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和领导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陈云同志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上海；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进行了特殊而复杂的斗争，同时继续参加领导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从30年代初他进入中央领导机构，担任中央委员长达50多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是极少的。在遵义会议这个中国革命重要转折的历史关头，陈云同志积极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投了重要的一票。在长征途中，陈云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进行战略转移和召开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7年4月，陈云同志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接应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帮助党保存和培养了这一部分经过千难万险，浴血奋战锻炼出来的精华力量。

在抗日战争期间，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近7年之久，对党的建设，不论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有重大建树。以后，他改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克服由于国民党军和敌人的封锁而造成的财政经济困难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毛主席说过，延安时期我们党培养了一批搞经济工作的干部。陈云同志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同志参加领导东北解放战争，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方针，并提出了若干关系全局的正确意见，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东北全境的解放，为东北经济的复苏和大部队顺利进关作战，作出了突出贡献。

建国前后，我们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严重任务。当时经济凋敝，物价飞涨，财经混乱，这对于新政权的巩固和解放战争的推进极端不利。在这重要时刻，毛主席起用陈云同志，由他主持解决这个关系全局的大难题，陈云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时，勇敢地担负起这一重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迅速稳定了物价、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陈云同志在领导这一被称为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的经济斗争中，所显示的非凡才能，为毛主席所称赞，为全党所钦佩，为全国人民所景仰，不久，他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成为书记。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在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中，特别是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继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发动，这10年，是我国开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也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苦探索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陈云同志提出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和独到的见解，其中有些主张，不但在当时是领先的、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后来对于开辟改革开放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起过重要作用。

70年代末，我们党的历史实现了一个新的伟大转折。陈云同志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道，带领全党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陈云同志在这关键时刻又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直到今天还深刻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有这样一些大事：提出和坚决支持让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率先提出平反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积极支持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坚决抵制怀疑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巨大努力。

陈云同志非常关注新时期党的建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近九年。在思想建设方面，他突出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组织建设方面，他突出地强调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在作风建设方面，他突出地强调端正党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对以往党的建设经验的总结，又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遇到的突出问题。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抓住这三个问题，也就抓住了新时期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

陈云同志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早在1979年3月就指出，过去我们计划工作制度中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要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一理论观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高度赞扬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好作用。他特别指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好现象，同时又指出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他高度重视农业问题和粮食生产，提醒大家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个历史经验。他一贯主张，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重要方针。他反复强调，从全局的利益出发，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陈云同志的这些观点，不仅为解决当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对今天的经济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党的十三大以后，陈云同志退出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中顾委主任。在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中，陈云同志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殷切希望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

陈云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和他的精神是永存的。在他身上凝聚着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陈云同志是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模范。他根据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读了哲学书以后，所总结出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

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诀，早已成为我们的座右铭。陈云同志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1958年“大跃进”中，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头脑发热，陈云同志的头脑是冷静的。在1958年八届六中全会上，对公布四大指标，只有他提出不同意见，陈云同志在作出重要决策之前，总要作大量的实际调查，听取多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因而他的认识比较全面，他的决策比较正确。他在领导工作中，既有英明的宏观决策，又有细致入微的工作。陈云同志坚持真理，不讲违心的话，即使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也是如此，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陈云同志是顾全大局，遵守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的模范。50年代高岗搞阴谋活动，是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首先识破，向毛主席报告，维护了党的团结。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央要他出来主持经济工作。他对自己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毫不介意，而一心一意地为恢复国民经济竭尽全力地工作着，表现出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开阔的政治胸怀。

陈云同志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模范。陈云同志为中国人民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劳，但他始终反对宣传自己，明确指出：功劳不能记在自己的帐上，第一是人民的，第二是党的，最后才是个人的，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陈云同志在逆境中，特别是在党内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从不消沉，而在顺利的环境，作出重大成绩的时候，又从不居功自傲。

陈云同志是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模范，他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从陈云同志身上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以上只是举出一些主要方面。

我们研究陈云同志的生平与思想，就是要通过缅怀他的功绩，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继承和发展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竭尽全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实现团结奋进，强国济世的宏伟目标。

陈云同志的一生，是同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融为一体的，研究陈云同志的生平与思想，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为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大政方针提供历史借鉴有着重要的意义。

陈云同志的思想不是孤立的，是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陈云同志的生平与思想，有助于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特别是有助于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过程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推动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陈云同志是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他的业绩和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陈云同志生平与思想的研究，我们要长期进行下去。我相信，这次研讨会对于进一步了解陈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状况，交流研究成果，组织研究队伍，推动研究深入发展，一定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
开幕时的致辞
(1995年6月12日)

田夫

同志们：

为了推进和交流对陈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在陈云同志诞辰 90 周年之际，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研究组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了这个第一次全国性的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

研讨会于去年 11 月开始筹备，曾向全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各级党校和有关部门发出 1500 封征文信函，得到理论界、经济学界、党史学界以及党的工作部门和经济工作部门广大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热烈响应，共收到论文近 500 篇，经过初评和二评两步评选，有 84 篇论文入选，这些论文选题范围广泛，内容丰富，质量较高，基本上涵盖了陈云生平和思想研究的主要方面，反映了学术界、理论界在陈云研究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另外，还有十余位老同志为研讨会写了特约论文。

正当研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传来了陈云同志不幸病逝的噩耗。他的逝世使党和国家蒙受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也使我们这些筹备和参加研讨会的人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为了表达我们的怀念之情，我提议全体与会者起立，为陈云同志的逝世默哀 1 分钟。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在 70 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他关于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和其他方面的思想、观点，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这次研讨会就是要围绕陈云同志的杰出贡献、丰富思想和优良作风等问题，交流研究成果，推动研究开展，组织研究队伍，为继承好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作出自己的努力。

这次研讨会的会期共 3 天。研讨会期间，全体代表将参加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举办的《陈云文选》（1—3 卷）、《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陈云同志诞辰 90 周年纪念座谈会，聆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与会代表分为 4 个组，即经济 1 组、经济 2 组、党建组和文史哲组。大会发言包括今天上午共安排 4 次，另外安排一次小组讨论会，请代表结合各自的研究心得，讨论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

研讨会组织委员会聘请了 15 位老一辈革命家、长期跟随陈云同志工作过的老同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担任顾问，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指导；还聘请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社和中国人民大学 19 名专家，组成论文评选委员会，他们为保证这次研讨会论文的质量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半年多来，研讨会的筹备工作还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与帮助。中组部万

寿路招待所为研讨会提供了会议地点，中国人民银行印钞造币总公司及上海造币厂为研讨会赶制了陈云同志纪念铜章，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天津经济协作办公室和广州穗丰信用社为研讨会提供了必要的经费。在此，我们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同志们，陈云同志是我们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他现在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伟大光辉的一生和崇高品格，是耸立在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我们要把这次研讨会开好，以实际行动纪念他。让我们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闭幕
时的总结发言**
(1995年6月14日)

朱佳木

同志们：

我代表研讨会组委会作总结发言。

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经过了3天紧张的工作，听取了33位代表和特邀代表的大会发言，交流了彼此的研究成果，完成了各项议程，现在胜利结束了。

在研讨会的第2天，全体与会代表出席了由中共中央举行的《陈云文选》（1—3卷）、《陈云》画册出版暨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听取了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并在当天下午分组进行了学习讨论。在研讨会开始和结束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倪志福、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等，就陈云同志的杰出贡献、宝贵思想、优良作风和研究陈云生平与思想的意义、方法等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老一辈革命家宋平、李德生、伍修权、邓力群、王鹤寿、韩光、陈琼英、曾志、刘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和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同志，曾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的老同志袁宝华、吕东、薛暮桥、赵毅敏，杨波、郑拓彬，柴树藩、高扬、李琦、郁文、宋承志、曾克林、唐凯、沈鸿、钟子云、武衡、裴丽生，林佳楣等，以及中组部、中宣部、党史研究室、人民日报社、广播影视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领导同志共100多人，亲临大会表示祝贺。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和原副委员长耿飚向会议发来了贺信。所有这些，都给与会代表以极大的鼓舞。

代表们反映，这次研讨会时间虽短，但收获很大，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加强陈云研究的意义，认清了深入开展陈云研究的方向；做到了解放思想，积极思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起到了了解研究现状，交流研究成果，推动研究发展，组织研究队伍的作用。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我们认为，这次研讨会会有以下7个特点。

一 社会反响比较大

研讨会自去年11月份向全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各级党校、大专院校、党史研究部门和有关机关及个人发出1500封征文信函后，很快就有人给组委会打来电话，对筹备这次研讨会表示支持，认为举办这个活动很有必要。不到半个月，便收到了第一批报名回执（其中包括报来的论文题目和提纲）。之后，几乎每天都有回执寄来，高峰时一天可收到40份左右。由于我们寄出去的信中只装有一两份回执表格，有的同志为了报名，将表格复印下来填写，有的表格甚至是笔画出的。有的同志虽然年老体弱或工作繁忙，也表示一定要挤时间为研讨会写出论文，情景十分感人。截至3月初，寄来回执的有470多人，约占发出信函的1/3。即使按实际收到的论文数统计，回收率也在30%。据了解，这样高的回收率，在近年学术讨论会的征文工作中是不多见的。这反映出理论界、学术界的同志，对陈云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之情和对研究他的生平与思想的浓厚兴趣。

二作者面比较广

从征文回执看,报名者中有高级职称的占 57%(其中博士生导师 13 人)。来自党校系统的最多,占 50%;其次是来自高等院校的,占 30%;其他人分别来自社科研究机构、中央和地方的政策研究部门、党史部门。这些报名者中,年纪最大的 94 岁,最小的仅 21 岁。60 岁以上的有近 70 人,他们之中既有著名的老专家老学者,如胡代光、高鸿业、陈其人、汪海波、闻潜、钟契夫、李贤沛、夏兴园、王正萍、陈辽等,也有跟随陈云同志工作过战斗过的老同志,如袁宝华、吕东、周太和、梅行、刘家栋、余建亭、周光春、朱劲天、詹武、吕黎平等。40 岁到 59 岁的人是报名者的主体,约占总人数的一半,最可喜的是,在报名者中有一批朝气蓬勃、勤于思考的青年理论和学术工作者,其中 40 岁以下的约占总人数的 1/3。报名者除西藏外,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从入选论文作者看,有高级职称的占 68%(其中博士生导师 9 人);年纪最大的 75 岁,最小的 27 岁,40 岁以下的占 20%;女同志占 14%;作者所在单位中,党校和高校的最多,各占 29%;作者所在地区中,北京的最多,占 30%,其余分别来自江苏、湖北、广西、四川、上海、浙江、湖南、河南、陕西、甘肃、吉林、山东、江西、福建、海南、黑龙江、宁夏、云南和广东。

三论文评选比较严

为了保证研讨会的质量,组委会从一开始就决定聘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为主任,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共 18 位专家学者为委员,组成论文评选委员会,以后,由于收到的论文总数超出了原来的预想,有近 500 篇之多,而计划邀请出席研讨会的论文作者名额只有 80 名,组委会又决定评选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先请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进行初评,第二步再由评委会评选。经过初评,选出了 200 篇质量较高的论文。根据这个情况,在二评中,评委会分成了两个经济组、一个党建组和一个文史哲组,分别由全国知名学者何建章、卫兴华,许征帆、盖军出任组长。大家严把质量关,不搞照顾,每篇论文都经过两人审阅,还进行了分组评议和跨组平衡。由于大家反映初评选出的论文质量普遍比较好,经协商,组委会决定将入选数额由 80 篇放宽到 84 篇,最后,召开全体评委会会议,进行了无记名投票。尽管名额放宽了,但毕竟有限,有许多好论文未能入选。对于老同志递交的论文,凡是质量合乎要求的,我们都列为特约论文,前后共有 15 篇。

四论文选题比较宽

这次研讨会,无论是从报来的选题还是从入选的论文来看,经济、党建和文史哲三类大约都分别占 1/2、1/4 和 1/4,几乎涵盖了陈云生平与思想研究的各个主要方面。有的从宏观上总体论述陈云经济思想、党建思想、思想方法论和文艺思想,也有很多从微观上选择某一个专题加以具体论述。如在经济方面,关于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工业、农

业、财政、金融、商业、物价等；在党建方面，关于党员标准、干部教育、选拔中青年干部、党风建设、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支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子弟教育等；在哲学思想方面，关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唯物论思想、“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法思想、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调查研究等；在生平方面，关于早期革命活动、长征、延安时期、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一五”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等，全都涉及到了。其中，还出现了一些过去在陈云研究论文中没有过的选题，如专门论述陈云关于企业管理、工业布局、战争经济动员、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思想等。还有的论文第一次专门论述了关于陈云经济思想体系的起源、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在大跃进后对恢复农业的思考与对策、“文革”后期在对外经济工作的思想与实践、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比较、对古籍整理工作的贡献，以及第一次专门介绍了陈云同志幼年在家乡和“文革”中在江西的情况。有的论文，虽然选题不是新出现的，但其中比较详尽地论述了过去没有专门论述过的问题，如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这次虽然没有出现专题论述的论文，但有的论文中，对陈云关于纪检工作的任务、职能、方针、指导思想，纪检部门的体制，对纪检干部的要求等论述作了系统的归纳。

五 研究力度比较强

这主要表现在研究的系统性、综合性和理论分析方面比过去有了进一步增强。有的作者把陈云同志不同时期的思想或关于不同问题的思想联系起来考察，从中研究其内在的关系。如有的作者对陈云在不同时期关于稳定中国经济的思想进行历史考察，概括出 10 条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适用的一般原则；有的作者对陈云关于平衡发展的观点与关于宏观调控的观点联系起来研究，从而得出要平衡发展就离不开宏观调控的结论。有的论文不再停留在只是对陈云的思想作一般性的介绍，或者只是一般地论述陈云的理论贡献这样的水平上，而是注意从更高层次上论述陈云某个思想的理论性、体系的构架和现实意义等等；有的论文注意从宏观上把握陈云的某一方面的思想，如论述陈云的用人观、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思路等等。还有的论文对一些边缘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如论述陈云的经济哲学思想，或把陈云的经济思想和党建思想、党建思想和文艺思想联系起来研究，从而使研究向前深入了一步。还有一些论文在对历史事实的考证上下了功夫，取得了进展，如有的作者对《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写作背景、发表情况、主要影响和存在的局限作了较深入的考证，对弄清这一时期陈云的活动和思想发展很有裨益。

六 结合现实比较紧

对陈云的研究与现实的结合从来都是比较紧的，这里所以把这一点作为本次研讨会的特点着重提出来，是因为很多入选论文所结合的是近几年来发展变化了的一些新的实际情况。首先，是与中央的一些新的精神结合比较紧，比如，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有的论文便专

门阐述了陈云同志农村经济思想对于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有的论文便专门阐述了陈云同志的国力论与这一观点之间一致性，或者着重从发展的角度论述陈云的经济思想；去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用3年时间开展一次学习运动，于是，出现了20多篇关于陈云《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的论文。其次，是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结合比较紧。比如，最近几年，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宏观调控整体约束力减弱，基本建设规模难以控制；农业基础地位削弱，粮食生产徘徊不前；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物价指数居高不下，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有的论文专门阐述了陈云关于宏观经济管理和稳定中国经济的思想，有的论文专门阐述了陈云关于农业经济、特别是“无粮则乱”的思想，有的论文专门阐述了陈云关于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思想。再比如，最近几年在党风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关注，研讨会上有关党风的论文，“大都能针对这些问题，阐述陈云关于党风建设的思想，第三，是与新的材料结合比较紧，比如，经济方面的论文，很多都引用了1994年的最新数据。

七研究视角和方法比较新

在研究视角方面，有的论文通过分析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说明陈云同志关于“鸟”与“笼子”的比喻所揭示的计划与市场手段的相互关系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的论文从反通货膨胀的角度，对陈云关于按比例发展的思想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有的论文从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上，阐述了陈云关于处理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份、少数人先富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计划与市场等关系的思想及其作用。有的论文通过研究陈云的党风思想在党的建设的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它对党群关系的作用、它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等，来论述陈云党风思想的特点。有的论文从群众观点的角度来论述陈云提出的文艺工作者要“懂得观众心理”的原则，指出这是一个独到的见解，关系到文艺的民族化和群众化问题。在研究方法方面，有的论文用数学模型的方法研究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的思想，说明这一思想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有的论文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陈云的决策思想，说明这一思想所具有的科学性。还有的论文认为陈云不仅是经济学家，而且是独具特色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性格是他的实践性；他的哲学本质论、哲学价值论、哲学发展论构成了他对哲学的总体看法；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事实与政策的关系、“实”与“上”和“书”的关系不断加以转换，从而把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决策理论融为一体。这样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在过去的有关文章中是少有的。

当然，由于缺乏经验，研讨会在组织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小组讨论会安排得少了，有些工作做得不细，入选的论文，在总体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在如何把陈云同志的思想与他提出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方面；在如何把陈云同志放到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研究他的思想和实践在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在对陈云同志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的思想更好地进行综合概括和

抽象论证，从而体现出它的完整性、理论性，使之在今天乃至今后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掌握方面，还有待于我们会后进一步探索 and 解决。

自从 1980 年以来，对陈云同志生平与思想已有过 4 次比较集中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陈云文选》的再版，《陈云》画册、《陈云论党的建设》的出版和江泽民同志在陈云诞辰 90 周年纪念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发表，对陈云实践活动、品德作风和思想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必将得到进一步推动。陈云同志的一生同党和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他的思想丰富而深刻，是取之不尽的宝库；他的作风凝聚着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值得大力倡导和学习。让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努力钻研，加强联系和交流，为继承陈云的思想和作风这份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力加强对党史、国史、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向前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人民日报》关于陈云生平与 思想研讨会召开的报道

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召开 与会者高度评价陈云同志的 光辉业绩和不朽风范

本报北京6月14日讯新华社记者陈雁、本报记者陈维伟报道：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今天在京结束。与会代表认为，陈云同志的一生同党和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他的思想丰富而深刻，是取之不尽的宝库；他的作风凝聚着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值得大力倡导和学习。

研讨会于6月12日在京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代表们从陈云同志的光辉一生及其经济思想、党建思想和思想方法论等方面，畅谈和交流了研究心得，代表们认为，推进和加强对陈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对我们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党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代表出席了中共中央举行的《陈云文选》（1—3卷）、《陈云》画册出版暨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听取了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并进行了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讲话高度概括和准确评价了陈云同志对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对今后开展陈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研究组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共同举办的，共收到论文近500篇。另外，还有一些曾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提交了特约论文。这些论文选题范围广泛，内容丰富，质量较高，基本上涵盖了陈云生平和思想研究的主要方面，反映了学术界。理论界在陈云生平与思想研究上取得的最新成果。

在研讨会开始时，宋平、倪志福、陈慕华、李德生、伍修权、邓力群、王鹤寿、韩光，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及其亲属，曾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100多人到会表示祝贺。

特约论文

牢记陈云同志的殷切教诲

袁宝华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革命生涯长达 70 年。

自 1941 年起，我便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至今已有 50 多年了，1941 年，我从中央党校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陈云同志是部长。1945 年我从延安到东北，发动群众支援战争，陈云同志是东北局副书记。1949 年进沈阳，我到东北工业部工作，陈云同志是沈阳军管会主任和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后来，陈云同志到北京任中财委主任，1952 年我跟随周总理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到苏联，谈判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助项目。1953 年我回国，先后到重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国家经委、计委工作，陈云同志一直主管全国财经工作。正是因为有以上的经历，所以我和陈云同志接触机会比较多，尤其在延安，在一个机关，见面多，时间又长。陈云给我的教育很多，留下的印象也深刻。

下面，我讲几件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时，陈云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

第一，陈云同志非常重视学习，自己刻苦学习，对干部的学习抓得很紧。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对我的影响也最大。1941 年春我到中央组织部后，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学习会。陈云同志亲自主持全体干部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念一段，讨论一段，有争论，有质疑，陈云同志也亲自向辅导员提问题。接着学习《反杜林论》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部分，也是读一段，议一段，从头到尾学了一遍。这年下半年，中央机关精简，中组部只留下 16 人（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 2 人），陈云同志仍然是先抓学习，每星期至少学习一个上午，有时学习两个上午，一直未间断，不仅学政治理论、学重要文件，也学自然科学。这几年来学习，是我一生中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受益最大、感受最深的一次。1944 年，陈云同志离开中组部去做经济工作，也是抓学习。每星期他都把当时在延安经济部门和理论部门工作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学习理论，讨论问题，听取大家的意见。

第二，陈云同志贯彻党的干部路线非常认真，在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上有卓越的见解。我到中组部后，听到陈云同志一次谈话，他要求我们善于发现每个干部的长处，说只有发现干部的长处，才能更好地使用干部和发挥干部所长，人总是有长处。有短处的，只有善于发现他的长处，才能发现更多的人才。这一点对我印象很深。在中组部工作期间，按照陈云同志这一指导思想 and 干部政策，我们对各地来延安的大批干部，都根据他们的长处和优点，向领导提出了使用意见。

第三，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提出去用 90% 的时间作调查研究，用不到 10% 的时间作决策。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领导机关的责任是出主意和用干部，这两条都需要首先了解情况，所以必须重视调查研究。陈云同志研究根据地党的建设，亲自我从前方来延安的同志谈话；研究非党干部问题，亲自找一些知名的党外人士谈话。做经济工作时，他也常找基层同志调查，并多方听取不同的意见。陈云同志常说，中央机关的任务第一条就是了解情况，第二条是掌握政策，第三条才是本部门的业务工作。

第四，陈云同志的工作方法是亲自抓大事，而放手让干部大胆地去

工作。对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制定干部政策、重要干部的调配等大事，他都亲自抓。譬如抗■ ■后期，东北地区的工作需要加强，需派一批得力干部去东北做地下工作，这些干部的选调都由他亲自审查，并向毛主席汇报。对一般干部的调配工作，他就放手让干部科去处理，由于部科长代他签字盖章。当时，他讲了一句笑话，我看也是一句有道理的话。他说，中组部精简后人少了，要进行分工，有些人要忙一些，如干部接待调配工作，就象做生意一样，这是门脸，是站柜台的，这一部分人忙些，就可以使另外一部分做调查研究的人不被日常事务所干扰，集中精力去考察和解决一些大的问题。

第五，陈云同志非常注意抓思想工作，经常找时间与干部谈心。整风学习时，每个人都写学习心得。一天晚上，陈云同志亲自提着马灯，从上面一层窑洞下来，到我住的窑洞与我长谈。因为日常工作中我往往坚持自己的意见，陈云同志一方面鼓励我，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是好的，另一方面又批评我，说你还年轻，虽然入党好几年了，但经验和锻炼少，对社会了解不多，严格说还处于幼年状态，不成熟。后来，他在我的学习心得后面批了一段话，其中有“自以为是，自恃聪敏”8个字。这一批示我终生难忘。

第六，陈云同志当时虽然是做干部工作的，但对经济工作十分重视。陈云同志对李富春同志做经济工作很赞赏，他说，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人都应有一段做经济工作的经历，这样，才不至于空、不至于虚，他还介绍，林枫同志从晋西北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说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吃饭穿衣上，毛主席听了很高兴。陈云同志当时曾说，抗战胜利后，我们共产党能得天下，而要坐稳这个天下，就一定要使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有一个饭碗，使人人都有饭吃，就一定要发展经济，把经济工作搞好。后来，陈云同志专门去做经济工作，力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立下了丰功伟绩。

（作者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实事求是的模范 ——深切怀念陈云同志

吕东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为我国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陈云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力倡导并率先实践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导方法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1946年，我党面临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严重斗争。东北不仅是国内而且是国际革命和反革命争夺的一个焦点。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国民党为实现他们先南后北、尔后独占东北的图谋，在强占沈阳，本溪之后，于10月中旬调集10余万兵力向辽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如何看待东北形势和能否坚持南满斗争，当时存在着不同意见，正是在这种危难时刻，陈云同志到达辽东，出任南满分局书记并兼任财委书记，经过陈云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和反复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最后确定了对南满根据地必须坚持的正确方针。其后，在辽东地区党政军民的艰苦奋斗下，我们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图谋，恢复并扩大了南满解放区。对这一段历史，许多同志都深有感触，认为要是没有陈云同志的英明决策，南满差一点就给放弃了。

当时我在辽东任财委副书记兼秘书长，直接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深感他具有高度的革命坚定性、原则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临危不惧，遇险不惊，多谋善断，能够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开创出新的局面。现在大家熟知的陈云同志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其基本思想就是陈云同志在辽东分局一次干部会议上系统地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千：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交换是为了更全面的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做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跟随陈云同志工作，总感到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富于创造性。善于生动地把党的正确方针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记得当时陈云同志把东北干部的特点，概括为：“山南海北，先来后到。空手带兵”。所谓“山南海北”，就是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所谓“先来后到”，就是干部有先来的，有后到的；所谓“空手带兵”。就是干部有带兵来的，有不带兵“空手”来的。陈云同志就是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耐心地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使他们了解当时的形势。任务和前途，提倡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指出“大广播比小广播好”，以严肃的原则性去对付容易发生的无原则纠纷。这样就把广大干部团结起来，使大家心情舒畅地投身于当时艰苦的斗争。

陈云同志对于辽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是很关心的。一次，当他听说军区后勤部门采取套裁的办法，用一匹布可以制成11套军装，很高兴，特意要下面把样子送给他亲自看。他常对我们说，对经济工作他只管大政方针和重大事情，比如钞票印多少要经过他，至于方针确定以后的具体工作，放手让我

们大胆去做。他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和物资交流，强调在与兄弟解放区之间开展经济协作时，要讲信誉，做到“先小人后君子”，所谓“先小人后君子”，即洽谈协商时，交换什么、何时交换。交换多少，要一一记入合同，并严格履行，说怎样就怎样，不能违约；最后，如有可能，要尽量照顾兄弟地区，甚至可以是无偿支持。不要开始时客客气气，最后吵得不可开交。

全国解放以后，陈云同志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在几个关键时期担负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任，他的经济思想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同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具体体现，是我们的宝贵理论财富。《陈云文选》收录了他这方面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不少同志也写过许多有关这方面的回忆文章。这里，我仅补充两件事：

1974年，我在华北协作组任副组长。7月的一天，陈云同志找我汇报钢铁工业的情况。陈云同志听取汇报后对我说：要抓矿石，钢铁工业的发展要坐在矿山上；要抓质量，一吨钢要顶一吨钢用；要抓品种，品种齐全才能适应各方面的需要；要抓配套，各个环节的设备要相互衔接和配套；要抓规划，有了切实可行的远景规划，各方面的工作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时，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陈云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未能得到贯彻。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指示至今对发展钢铁工业还是完全适用的。

1985年7月，我到上海、浙江调查后向国务院反映，一些地方放松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其直接原因是讲“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建议要加强对农业生产的宏观指导。陈云同志看了国务院批转的这份调查报告以后，给予了肯定，并在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陈云同志的话不仅在当时对全党重视农业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乃至今后，都具有深远意义。

陈云同志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学习、宣传、实践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风，脚踏实地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我们对陈云同志最好的怀念！

（作者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注释

《陈云文选》第1卷，第343、346页。

《陈云文选》第3卷，第350页。

学习陈云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和实践

周太和

陈云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我作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多年的同志，更深感悲痛。今年6月13日是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经他生前审定的《陈云文选》第2版也将正式出版发行，我因参加编辑工作，仔细阅读了他的三卷文选的新版本，再一次受到很大教益。其中感受最深的是陈云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和实践。

陈云同志在1987年《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一文中说：“要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要使领导干部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陈云同志在延安的时候。按照毛主席的建议，组织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同志一起学习哲学，而且坚持学了几年。同时，他认真研读毛主席写的文章、文件和电报，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陈云同志总结了15个字，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认为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陈云同志根据自己的体会用明白易懂的语言，表述了如何理解和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以帮助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掌握这个思想武器，这是陈云同志在哲学上的一个重大贡献。

陈云同志在工作中是如何运用这15个字的。我有以下深刻体会：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陈云同志同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十分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建国初期，陈云同志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任务极为繁重，但他每周总要抽出三个半天时间到北京市王府井百货大楼、天桥集贸市场、东单菜市场等地作基层调查，深入了解城市居民的需求和供应问题，以及城乡交流的基本情况。他认为，市场对经济情况的反应是最直接、最灵敏的，因此，要十分注意市场的动向。他曾经亲自设计过一张数字表格，请有关主管部门每天填写上报，主要的内容是财政收支、税收上缴、货币发行以及物价指数等情况。掌握了全国经济动态，再加上他现场观察到的实际情况，使他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预测今后的发展动向。建国初期的经济情况极力混乱、复杂，且瞬息万变。陈云同志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有效地加以调控，迅速地理顺了各种财经关系，使中外为之震惊。

陈云同志搞调查研究要求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同基层群众见面。他一贯提倡要用90%以上的时间摸清情况，然后制定政策。他把作调查研究概括为两种：一种是亲自率领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另一种是同熟悉情况、敢讲真话的人交知心朋友，从他们那里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特别是及时发现和解决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他认为，这两种调查研究缺一不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更为重要些。

1961年夏，陈云同志亲自率工作组到青浦县小蒸乡搞调查，这里是他过去搞过农民运动的地方。他轻车简从，布衣素食，住在简陋的农舍里，一蹲就是15天。他多次深入田间，猪圈，与干部群众共同研究种双季稻和小麦还是种单季稻和蚕豆、母猪公养还是下放给农民私养以及要不要给农民多分一

些自留地等问题。由于群众认为他是知心人，不会整人，因此敢于讲实话，敢于反映真实情况，使他弄清了当前农村急需解决以及今后如何进一步发挥农民积极性等许多重大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陈云同志搞调查研究，是为了弄清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是决不允许走过场的。

面对现实，实事求是。陈三同志提的 9 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关键是唯实，求实、落实。也就是说，从了解情况到落实政策，都要贯彻一个“实”字，他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陈云同志曾经引用过黑格尔讲的一句话：“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他认为，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即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是合理的，但并不一定是客观规律，首先要敢于面对现实、承认现实，1973 年夏，陈云同志受周总理委托，研究外贸工作等一些国际经济问题，人民银行向他汇报，说我们可以在一年内搞到 10 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资金，但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即这样做，符合下符合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方针；二是方法问题，即这样做，需要把国内现行的规矩变动一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好办。陈云同志回答说，我看，首先要弄清楚这样做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就可以找出一个变通办法来解决。他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把这个大道理讲清楚，规章制度可以变动一下。

陈云同志讲不唯上，并不是说上面的话不要听，上面的指示不执行，而是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问题，才是最靠得住的。记得 1962 年夏，面对广大农村在天灾人祸之后饿死很多人的情况，陈云同志提出必须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肯定了安徽等省部分地区采取的包产到户的做法。但此事关系重大，必须由他亲自向毛主席提出建议。当时，我们考虑到毛主席对这一重大建议可能不会接受，劝他不要急于提出。陈云同志义正词严地说：“不能患得患失。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对人民负责。遇到大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就要尽快提。这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他提出后，果然，受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陈云同志听后态度深沉，久不表态，此后，在中央北戴河会议上，陈云同志又受到不点名的批判。当时他经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一直保留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在某个历史阶段，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并不是分田单干），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一种有效办法，确实可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应当向中央提出建议。事实证明，陈云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陈云同志指出，要唯实，就不要顾面子。主观、片面，往往会犯错误，犯了错误不要充好汉。爱面子，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承认错误，可能不会丢脸。他说，从根本上讲，要做到唯实，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有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方法就对头了，事情就好办了。

若要唯实，必须辩证。唯实不是容易做到的，要运用辩证方法，陈云同志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首先要带着追求真理的态度，虚心平等地与人交谈，听取对方意见，尤其是听取不同意见。他说，如果有不同意见，就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取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意见更加全面。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使问题经过辩论，得到深刻的了解。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是 1953 年秋他向中央提出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决策建议。当时，他认真听取了各种意见，权衡它们的利弊得失，先提出两个方案：只在农村实行征购，不实行城市配

给；或者只在城市实行配给，不在农村实行征购，但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都解决不了当时严重的粮食问题，继而他又提出另外几个方案，并要身边工作人员和有关部门找出理由同他辩论，鼓励大家提不同意见。经过归纳，可供选择的一共有 8 种方案，每种方案都有利有害。最后，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选择了一种方案：在农村实行征购，同时在城市实行配给，即“统购统销”方案。这个方案，虽然还存在一定风险，但毕竟是可行的。能够解决问题，因而很快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陈云同志说：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在反复比较中，他能果断地提出正确方案，这需要有远见卓识。在决定政策中，他反对无原则的妥协和彻底的解决问题。他认为，“和稀泥”，拖泥带水，心然事倍功半，他也反对考虑不周，朝令夕改，反复无常。

要唯实，不能唯书。陈云同志历来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在他的讲话和写的文件，电报中，既充分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又很难见到对马列和毛泽东原著的直截引用。他自己动手起草的向上的汇报和向下发的指示，都是明白易懂、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辩证地分析问题，并把办法措施交待得十分清楚。他发表的讲话，生动活泼，不讲套话，不发虚言。他从不主张照搬照抄外国的一套东西，即使在 50 年代向苏联一边倒时，也是这样。尽管当时我们对于基本建化工业管理的程序缺乏经验，采用过苏联的一些办法，但他反对完全套用苏联的繁琐的表格和统计方法。至于在农业、金融、贸易方面，他更是明确提出，苏联的一套不适合中国的实际。

善观变化，心中有数。陈云同志在调查研究和决策过程中，总是冷静观察事物的变化，始终保持求实的态度，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也绝不迫赶浪潮。他在工作中总是冷静思考，不急不躁地处理问题。他休息时，踱方步，打台球，听评弹，仍常思考重大的战略问题。在过去几次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中，他冷静对待，提出切中时弊的意见。1956 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合营企业的业主和群众敲锣打鼓到天安门游行，他在院内踱方步，派专人调查研究公私合营中的问题。研究结果认为，每个商业行业都有大、中、小商店，应该分别改组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三类；小商小贩应该各自经营，长期保留。1958 年大跃进时，他参观小高炉，分析生铁质量，认为要吹点冷风。他不赞成把 1959 年钢铁指标订为 3000 万吨，后来降到 1800 万吨，他也认为不可能实现。经过研究，他提出订为 1300 万吨，得到中央同意。执行结果为 1387 万吨，证明了他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在 60 年代初国民经济遇到重大困难时，干部思想压力很大，他不回避困难，主张把困难估计足，然后提出鼓实劲的有效办法，扭转了干部的精神状态，从而团结一致，克服了困难。大家认为，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心中有数，而且“稳、准、狠”，言必信，行必果。表达了广大干部对陈云同志的信任和崇敬。

陈云同志在调查研究中，非常重视数量的含意和数量的变化。在弄清事物性质以后，他精于计算，往往用数字帮助他说明问题。这也是陈云同志观察事物，表达观点最显著的一个特长。陈云同志的数字观念很强，加上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所以，一连串的数字他运用得非常熟练。他对数字与数字之间的变化极为重视，每当提出一个经济方案，都有准确的调控数字，以便实施和检查。建国初期，在他领导下，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国民党 10 多年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全国物价，被称为历史上的奇迹。当时，他对货币、税收、物资的流通数量进行了大量精心的计算。仔细地研究了全国

和重点地区、大城市的市场供求关系，提出了每周每月调进调出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等重要物资的调控数字，进行了大规模的调动，做到产供销基本平衡，使市场物价很快稳定下来。

1962 年经济困难时期，物价波动，难以控制。当时货币流通量已达到 130 亿元，陈云同志经过研究，认为社会必要流通量只需要 70 亿元。多出的 60 亿元怎么办？他提出了搞几种高价商品以回笼货币的办法，结果，只此一举，就回收 60 亿元，市场物价很快就稳定了。

在农业生产中，工农产品的比价大小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体现，既要发展工业，又不能伤害农民。陈云同志经过研究，指导有关部门规定了适当的工农产品交易比价。50 年代的一段时间，国家收购棉花总是完不成任务，陈云同志提出以 8 斤小麦价格收购 1 斤棉花，结果棉农大力高兴，纷纷售棉，完成了国家任务。这个比价，不是主观规定的，是通过研究各方面关系，兼顾各方面利益，精确计算，准确定量得出的。在制定生产和建设计划时，产量指标高一点还是低一点，经济发展速度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要定得恰到好处，即所谓“适”度，也是很不容易的。陈云同志对待这类复杂问题，经常是反复思考，瞻前顾后。他曾风趣地说过，有人批评他是算帐派，他说，算帐派不一定是政治家，而政治家不能不算帐。

重视发展，总结经验。陈云同志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总是十分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从现实情况出发，提出带有战略性的意见和主张，同时，总结新的经验，以推动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

1956 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面临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为了适应这种形势，陈云同志指出，需要改变过去几年中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并有效地纠正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而发生的一些错误。当时，陈云同志提出的新办法主要内容是：对日用百货停止统购统销而改用选购；工业、手工业、农业、农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对于部分农产品，应该允许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社自行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使货畅其流；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是不对的，价格政策必须有利于生产；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也要适应这些而改变，等等。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第一次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即三个主体（国家和集体、计划生产、国家市场）和三个补充（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的构想。到 70 年代末，他进一步把这一构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而突破了计划经济传统模式，使市场调节发挥了作用。

1957 年夏，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陈云同志分赴几个大行政区。与地方同志一起，研究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他深感到，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不一样，中央集权不能过多，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大权集中、小权分散，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随后，他亲自主持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这是党和政府在 50 年代经济发展时期，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所进行的最早的一次改革。

六七十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原先，我国对苏联东欧的贸易比重占贸易总额的 3/4，这时，这个比重已颠倒为对西序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比重占 3/4。陈云同志非常

关注这个演变，提出了一系列调查研究的课题。他要求有关部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冲预测国际贸易、金融等方面在近期和远期的发展前景，以利于整我国对外经贸政策，适应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占领我们应得的地位。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名义，他提出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是很有远见，也是很有勇气的。

80年代以后，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陈云同志高度赞扬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成绩和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好作用。他明确主张改革开放要从实际出发，学习新东西，边实践，边探索，随时总结经验，以便少走弯路，使其不断地健康发展。

陈云同志晚年虽然体力日益衰弱，但依然倾注极大的精力，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他鼓励大家要努力学习和运用辩证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注释

《陈云文选》第3卷，第362、360、371—372、372、219、377、6—12113、217—218页。

《陈云文选》第1卷，第346页。

遗荣崇实，峙于中天 ——略述陈云同志思想和作风的特点

梅行

我从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向陈云同志学做经济工作，以后亦未间断；十多年前，我又参与三卷《陈云文选》的编辑工作，受益不可谓少。我始终认为，陈云同志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品德节操，足为个人和后来者之楷模。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崇高精神，如同真理无人能推倒一样，将长留人间。所以我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抄来两句话，作为本文的标题。

这里只简要他讲几点我对陈云同志的粗浅的理解。

第一点。陈云同志的建党思想及其从实践中总结出的许多观点，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使毛泽东思想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完全的典型的一个因素。

陈云同志的建党思想，最主要的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共产党人不仅要组织上入党，严守党章党纪，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完全入党，就是说，要坚决地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丑恶思想扫除干净，才能实现入党誓言所说的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才能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

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要决心“俯首甘为孺子牛”，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的方法，先得为群众谋福利，才能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然后依靠群众的伟大力量完成党的任务。而我们取得的任何成就，应该“头一条是人民，第二条是党，第三才是个人。”这是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历史观。

三是在干部政策上要紧紧掌握育人之道、用人之道、交接之道。育人之道的要点是使干部实践、学习、再实践、再学习。当然，实践中也要学习新事物，学习中也要总结实践经验。用人之道的要点是德才兼备，以德力主，即党性第一。交接之道的要点是先当“后排议员”，再当“前排议员”，还得“先扶上马，再送一程”，使之逐步成熟。

现在我们重新学习陈云同志的建党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谁都看到，目前在一部分党员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泛滥，党风不正、党纪松弛已引起群众很大疑虑，腐败问题中央虽三令五申，大力惩治，但效果难以令人满意，这都是必须解决的建党问题。有人认为生产力发展了党风将自然好转，腐败将自行绝迹，这是骗人的鬼话。恰恰相反，只有把党整顿好了，使党成为名副其实的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得到最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才能保证经济建设沿着正确方向迈步前进，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

再讲第二点。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及有关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发展。

中国是在国大、人多、贫穷、落后、农村人口占80%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当然与马恩当时的设想不同，苏联经验也不完全适用，陈云同志在建国初期出色地完成了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应付抗美援朝、实行粮食等农产品统购统销等许多重大任务以后，精心研究在中国建设社会主

义的具体道路和方案。

陈云同志在经济建设上具有创造性的发展主要有四：

一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陈云同志根据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赎买的策略，在主持改造工作的过程中，采取了形式多种、进退有序、稳步完成的办法。这即符合对民族资本既利用又改造的方针，又在方式方法上有不少足为后人借鉴的创新。

二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以后，城市的生产资料已基本公有化，农村的私有成分也所剩无几，这种状况，有利的一面是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不利的一面是由于地区不平衡、市场发育。城乡交流难等原因而使经济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影响工业化建设。针对此种情况，陈云同志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公有经济、计划生产、国家市场）和三个补充（个体经济、自由生产、自由市场）相结合的论点。这个办法，科学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开始建设阶段所有制结构和生产经营上单一化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从未有过的。

三是 60 年代初，我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陈云同志经过调查研究，赞成并坚持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方式，以利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四是陈云同志于 1979 年作专文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主要批评了过去经济活动只讲计划调节而否定市场调节的片面观点，主张恢复了部分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起辅助作用，即以灵活的方式实行马克思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理。这是先前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相结合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上述论点，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必须相互协调的活的应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目前，有些人借口学习现代化企业管理而企图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化为私有，借口要搞市场经济而完全排斥采用计划手段实行宏观调控等等有害社会主义建设的荒谬行为。对此，很需要按照陈云同志的观点，给以分析和纠正。

陈云同志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也有许多众所周知的精辟论述，诸如：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掌握财政、信贷、物资及外汇四项供求平衡是按比例发展的主要手段，建设和生活兼顾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即基建规模不得超过财力物力，人民消费水平不得超过生产发展速度，亦即国民收入不能超额分配，且应保持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农业的生产建设（不被一时的增产冲昏头脑，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教训），如此等等。上述论点已为多数干部所熟知，不再赘述。这些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同样具有规律性，符合社会主义中国实际，时刻记取，对防止和克服经济工作中屡犯的急于求成，“闻风起舞”的常见病，仍然大有益处。陈云同志多次说，谁不想快一点呢？问题在有无条件，单凭主观愿望，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最后再讲第三点。陈云同志在 70 年的革命生涯中，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任，经历过无数次艰苦严峻的斗争，没有犯过大错误，小的错误也屈指可数，主要原因，在于他自始至终，时时处处，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且一贯谦虚谨慎。凡是没有确实把握的事，决不随心所欲，冒失从事。这不仅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最坚强的党性和最优良的工作作风，而且也表现了对人民事业绝对负责的高尚品德。

陈云同志常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字诀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方法既具体化又通俗化

了，因为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并将实际调查清楚，才能掌握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只有由表及里地具体分析事物的本质、矛盾运动的趋向及其主次，才能掌握辩证法的方法论：从而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情况及其运动规律，在工作中不出大的毛病，大家知道，陈云同志在决策时，要用9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作调查研究，征求意见，设想多种方案进行反复考虑，复杂的事情还得先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他从不自以为高明，听不得不同意见，草率决定问题。他多次告诉我们，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到比较难，这是他严以自律的话，但对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来说，也是一种诚恳的劝导。

陈云同志的崇高品德，除了上述的一贯谦虚谨慎，对人民事业极端负责以外，突出的还有，他在工作取得很大成功时从不居功，在受到很不公正批评时从不消极，并能严守党纪。他在1958年受到不公正批评，并基本上被取消了领导经济工作的发言权，但他并没有停上工作，而是做大范围的调查研究，1961年他重新出来工作，对克服当时经济困难提出了符合实际和卓有成效的意见，以及若干具体方案，但一年多以后他受到更不公正的批判，直到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先后共计20年。这使党的事业受到很大损失，并且严重影响到他的健康。对此，他从不议论，并对共产主义理想充满乐观精神，不为个人的得失而有丝毫烦恼，他就是一心一意，无私无畏，把个人的一切都奉献给共产主义理想，奉献给社会主义祖国，奉献给劳动人民。他一生廉洁，一身清白，直到最后一刻。在这样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形象面前，象我们这些参加革命也已五六十年的后辈，越来越觉得自己异常渺小，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贡献太少太少了。革命者的人生是无悔的，但往往是有愧的。

陈云同志的躯体已化为灰烬，但他的思想观点，工作作风、品德节操是不会消失的，只要不丢掉党性的人，或者想为祖国和人民作出奉献的革命志士，必将继续向陈云同志学习，再学习。

（作者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

认真学习陈云同志的 建党思想

刘家栋

1937年11月至1945年3月，陈云同志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领导了全党的组织工作。他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创的见解和观点，做出了不少科学的决策，在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使我们党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时，我作为陈云同志的秘书，耳闻目睹了这一切。至今，我对他所做出的艰辛努力还记忆犹新，对那七年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更是历历在目。

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期的建党思想和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组成部分，与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它也是陈云同志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陈云同志永不磨灭的功勋中占有很重的分量。认真研讨陈云同志的建党思想，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小平同志丰富的建党理论，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曾经说过，把党建设好是个伟大的工程。那么，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期为这一伟大工程做出了哪些重大建树，有着什么样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呢？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在党的思想建设上，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培养教育了一代人

陈云同志视实事求是为建党工作的灵魂，首先自己时刻坚持实事求是，为我们做出了榜样，1938年9月，他在抗大讲党的建设时说：“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1940年8月，他所起草的中央组织部审查干部的总结中，有着这样一句名言：“实事求是的审查才是真正的严格。”1940年11月，他说：“审查干部心须实事求是。”就我今天看到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时期的全部文稿，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提出“实事求是”这一概念的，当1942年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后，陈云同志觉得有必要引起全党的重视，更加重了对实事求是的宣传。他曾把实事求是称为是可抵百万军队的无穷力量，要求我们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估计我们的缺点错误。陈云同志认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关键在于弄清事实。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是以调查细致、深入、广泛而著称的，他曾采用请人上来和派人下去相结合的方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调查了解华北敌后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群众团体、社会动态等情况，写出了指导各解放区地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陈云同志在十分强调实事求是的同时，还很注重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党员干部。他到了延安后，看到毛泽东同志利用当时相对安定的时机和环境看了很多书，写了很多不朽著作，从中受到启发。他要求我们要珍惜这个安定环境多读一些书，“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否则将来就悔之晚矣。”

在陈云同志看来，学习是党员的责任，是建党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干部是党的建设的前提和出发点。他多次谈到，只有自觉学习马克思主

义理论、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提高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能力，使自己成为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所以，他要求“ 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

他除了重视自己的学习，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原著和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外，还积极在中央组织部进行试验，探索在职干部学理论的路子，组织了机关领导干部学习理论小组，以自学为主，一本一本地读原著，并请人辅导，进行讨论，共同提高。这次学习坚持了近5年，陈云同志想了很多方法帮助我们学习，如采用启发的方式来引导大家，解决学习与工作、劳动的矛盾，保证学习时间，做到了几不误，这一成功的经验，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中央为此制定了《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要求全党高级干部都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学习。参加过那段学习的人，都很怀念那可贵的学习，都说收获极大，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看问题更全面了，进一步解决了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世界观问题，为自己的一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事实雄辩地证明，陈云同志狠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培养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

二在党的组织建设上，为壮大党的组织、建设党员队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陈云同志接手中央组织部工作时，我们全党只有3万党员，同当时形势的需要很不适应。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埋头苦干了7年，为壮大党的组织、建设党员队伍竭尽了全力，为使我们党完成由3万到121万的飞跃，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上任不久，就提出要面向全国理顺组织机构。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党终于建立了一套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体系，由中央局、分局、省市委构成，根据地推到什么地方，组织建设、组织机构就跟到什么地方。他还协助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不同地区采取的不同的壮大党组织的方针。他针对我军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情况，提出要开展群众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党，在建军建政中建设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他说要警惕国民党“反水”，要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任务和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并主张打破“中上层分子都不好”的旧传统观念，把统一战线工作重点放在中上层人士身上。在日军占领区，他要求除本身精干外，领导机关要放在外头，放在离我们根据地近一点的地方，以避免领导机关一被破坏就导致白区工作的瘫痪。这些方针，保存了革命力量，扩大了统一战线。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方针的创造者之一，主张既抓党员的数量，又抓党员的质量。他在1938年领导并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和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全国党组织抓好党员发展工作，特别是抓好青年和知识分子入党工作，在国统区和敌占区，要认识到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要与敌人抢夺知识分子，在抢夺知识分子中扩大党员队伍。经过了两年大发展后，他又向中央及时建议进行巩固，主张不要光追求数量，着重提高质量，搞好党员教育，并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以此作为组织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思想。在大量吸收青年和知识分子到革命队伍中来的过程中，陈云同志还抓了“热炒热卖”，训练了20万名干部，为我们党组织了一支40万人的干部队伍。

三在党的纪律建设上，为维护铁的纪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党的建设中，陈云同志是很重视纪律建设的。他曾严肃地指出，我们党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如果不要纪律，“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他强调，执行纪律必须是无条件的，自觉的，谁违反了就一定要严肃处理。1939年，新党员刘力功不服从党组织分配的工作，提出了种种条件，声称不接受就退党。陈云同志抓住这个典型，将其开除出党。

陈云同志在维护党的铁的纪律时，还特别强调在党纪面前的平等性，认为领导干部更不能特殊，要一视同仁。他曾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更应该带头遵守纪律，成为严守纪律的模范。1941年，王明自恃自己的地位，拒不执行中央关于毕业生分配的决定，陈云同志予以坚决的抵制和批评。他规劝王明要“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这件事后来成为中组部敢于监督中央领导人不执行中央决定的一个范例。

四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精心培育我们党的三大作风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三大作风，一直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在这三大作风的建立和培育上，陈云同志付出了许多心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陈云同志不仅自己做到结合实际读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原著，先后发表了30余篇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性论文，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句话6个字，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在领导中组部学习时，也是十分强调联系实际的，这是我们那段学习取得成功，顺利与整风运动接轨的重要保证。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陈云同志强调为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宗旨，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要求每个党支部要经常研究讨论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向群众学习，依靠群众解决问题。在延安时，陈云同志就已经认识到了为群众工作与我们党的生死存亡之间的关系。他针对那时我们党已在陕甘宁执政的事实，强调执政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⑪他还特别强调党执政以后带来的某种危险性，严格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要经常倾听群众意见，处理那些违背群众利益的人和事。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陈云同志提出了许多独创的见解，如要遵守“三原则”即“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要坚持原则，要实事求是”和“三要”即“要采取客观态度，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本质不要只看局部只看现象”^⑫；必须讲真理，不讲面子，反对自由主义；坚持“从领导做起”，“从自己做起。”^⑬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这就是：执政党的“自我批评更加重要”^⑭。这一切都证明，陈云同志为我们党培育三大作风做出了可贵的贡献。80年代初期，我们党重提了陈云同志在延安的主张，要求领导干部在检查自己、自我批评上做表率。这一举措，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这也充分说明陈云同志当时的倡导是正确的，正在得到继承发扬，陈云同志在勤奋学习、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爱护干部、遵守纪律、言行一致等方面是模范，也是胸怀大志，顾全大局，平易近人，坚持原则，坚决贯彻执行总路线的模范，他身体力行、精心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他的建党思想和他光彩照人的形象必将水放光芒。

总之，陈云同志建党思想的内容是生动充实的，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消化，掌握其精神实质，这样才能运用到新时期的

建党实践中去。我愿同与会同志共同来探讨，更愿与全党同志一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陈云同志的遗志，为建设好我们的党而继续奋斗。

（作者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

注释

⑪⑫⑬⑭ 《陈云文选》第1卷，第122、213、162、188、188、234、229、275、224、171、183、183、183页。
《六大以来》下卷，第230页。

陈云同志与东北的解放

余建亭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为了争取人民革命的成功，实现人民的解放，中共中央作出重要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明确指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历史业已证明，党中央这一英明决策是正确的，及时的。

鉴于东北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开辟工作，先后从关内各解放区调入的干部2万多名、军队10万多人；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共77名中有21名在东北（包括热河，下同），中央政治局委员13名中在东北工作的有4名，他们在党中央领导下，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七大路线，与广大干部和人民在一起，对东北的解放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这里谈谈陈云同志对建立东北解放区和实现东北全境解放所作的杰出贡献。

一为制定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正确的建议并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

1945年9月14日，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派遣一名苏军大校由八路军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陪同，乘飞机专程来延安与我党中央及军委总部建立联系。当日，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曾克林介绍的情况后，决定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等6位同志于9月15日乘坐这架飞机赶赴东北。9月18日，他们从山海关抵达沈阳。

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5年9月在沈阳开始工作，当时只有5名委员，即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彭真任书记。东北局建立后，为加强北满广大地区党政与军队工作，中央又决定成立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11月16日，中共北满分局在哈尔滨成立。分局委员有5人，即陈云、高岗、张闻天、张秀山、李兆麟，陈云任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高岗任副书记兼北满军区司令员。北满分局领导5个省委和一个市委，即松江省委、黑龙江省委、嫩江省委、合江省委、牡丹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

11月下旬，陈云同志召集高岗、张闻天等，在哈尔滨经过三天讨论，起草了关于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的建议，即《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这份打给东北局并转中央的电报是1945年11月30日发出的，中央迅速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要点是：我党我军独占三大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东北的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就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必须严重注

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乐、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干部中可能发生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

中央在电复东北局同意北满分局上述意见之后，于1945年12月28日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干部中一切下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实践证明，中央12月指示是符合东北当时实际情况的，它确定了党在东北的正确战略方针，为夺取东北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二为建立巩固的北满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还提出了党在北满的工作中心，指出“由于北满是处于南满的后方，因此，我们认为，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加以珠河、牡丹江为中心，以佳木斯、依兰为中心，以绥化、北安为中心，以洮南、三肇为中心，以讷河、龙江为中心，建立若干根据地。我们的兵力，干部、资材，必须主动地向那些地区转移，以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

日军投降后，各级日伪政权虽已瓦解，但除少数地区为苏联红军和我军控制外，大部地区包括县政权被土豪劣绅、官僚政客把持，他们与被国民党收编或委任的光复军、挺进军相勾结，与共产党争夺地方政权。据松江军区一个团政委张应反映，陈云同志在1945年底接见了他们，对他说，那时北满已查明番号的土匪有13万人之多，而我们部队只有2万人。但土匪包括光复军、挺进军是乌合之众，我们部队是在老基础上有新发展，是能够将这些政治土匪消灭的。这话被以后的实践证明。

当时，土匪控制了北满2/3的县城，他们采取“先（当）八路，后（当）中央”的策略，混入我军，一遇时机便发动武装叛变。在建立北满根据地过程中，各地新部队先后叛变人数多达3.3万人，被杀害的老干部有150多人。因此，我军一进入北满，就开始了剿匪工作，方针是“建军、剿匪与发动群众”三位一体，首先是摧垮敌伪势力，建立人民政权，在初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酝酿召开民主参议会和人民代表会，成立各级政府，选举省长、市长及县长。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北满五省的各级政权省军区和各级武装力量相继建立，部队迅速发展到10万多人。与此同时，各地相继开展了反奸清算，在清算斗争的基础上，结合春耕生产，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各省民主政府先后公布了减租法令和办法。到1946年6月，北满地区的敌伪土地基本分配完毕。

1946年4月20日，陈云同志为北满分局起草了一份给东北局并转中央的报告，标题为《北满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报告说北满五省中除龙江省漠河等五个县，合江省同江、宝清二县尚被敌占领，我正进剿外，所有县城都在我手。“北满六十五个县，我已占的五十八个县中，农民已经发动者十六个县，其余仅在开始。农民斗争目前是清算运动，同时分配开拓地、满拓地、汉奸地、减租增资”。“我们的政策是发动经济斗争后，迅速武装农

民，搜缴地主土匪武装以加强之”。 “武装农民，应成为农民已经起来的标准”。 “到二月底止，北满军队和地方的新党员只有一千人左右，军队占十分之六，我们吸收党员取谨慎政策。……估计三月以后的发展将迅速一些”。 “二月至三月中旬，我军主力到达，北满全面展开剿匪战争，克复了二十二个县城。”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为贯彻这一指示，1946年5月下旬，北满分局在哈尔滨召开了省委书记联席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工作队下乡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

经过剿匪、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建军和初步的民主改革，打击了敌伪残余势力，壮大了党的力量，增强了基本群众的斗志，为建立巩固的北满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到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北满五省和哈尔滨市，直接动员新兵补充主力部队共41万人（还不包括参加地方部队与地方部队升入主力的人数），参加战勤民工累计130万人次，仅1947年就交纳公粮130万吨。

显而易见，北满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实现东北全境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促进了东北全党的思想统一

1946年上半年，经过与国民党军的激烈争夺后，我军退出沈阳、四平、长春、本溪、抚顺、鞍山等大中城市。东北局机关从沈阳经本溪、抚顺、梅河口、长春于1946年5月21日撤到哈尔滨。1946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的指示，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局迁哈后不久，北满分局并入东北局。黑龙江、嫩江两省划归西满分局领导（已从郑家屯迁到齐齐哈尔），松江、合江、牡丹江三省及哈尔滨市由东北局直接领导。

为在全东北普遍落实中央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解决干部中的思想问题，统一东北党内的认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于1946年7月3日至11日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简称“七七决议”）。会前，东北局委托陈云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因当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陈云同志亲自与东、西、南、北满的领导同志谈话，倾听对形势任务和建设根据地问题的看法，亲笔写出了文件的草稿，并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作了修改。会议通过这一决议后，陈云同志又根据讨论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上报中央后，经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党中央于7月11日批准了这个决议。

东北局“七七决议”指出：东北当前任务是“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 “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必须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必须认识，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

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必须吸收在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加入我党，并在农村中建立党的堡垒——支部。”要求“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号召他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力求在半年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同时还指明：“东北是处在长期艰苦斗争的环境中，但东北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在东北已占先机之利”。

“七七决议”体现了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的精神，符合东北的实际情况，解决了许多重要的亟待解决的思想问题，制定了正确的工作方针与作战方针，指明了斗争前途。

扩大会议后，东北局根据《决议》的精神，从3个方面迅速采取了重大措施。这就是，（一）东北局与各省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亲自传达了“七七决议”。例如，陈云同志迅速前往齐齐哈尔，于1946年7月13日即中央批准《决议》后的第3天，就在中共西满分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的传达报告，强调“总方针是发动群众，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有了群众，一切好办，可以有军队，清除上匪，经费供给也有来源，没有群众，一定失败，死无葬身之地”。（二）动员了1.2万干部下乡，到农村中去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剿匪、建党建政、动员参军、推动生产等等。陈云同志在传达报告中说：“军队每个团都要抽三分之一指战员下乡。要当参谋，参群众之谋，城市、机关、学校工作都可放松一点，受些损失都可以，乡村工作的比重应占全部工作的百分之八十，”他明确指出，“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三）动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工作队，进一步开展了剿匪、搜山斗争，大大小小的“座山雕”，散匪与地主武装很快被歼灭了。

在传达与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月指示”和东北局“七七决议”以后，东北斗争形势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根据地日益发展和巩固，我军实力迅速壮大，形势日益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为后来辽沈决战的胜利，实现东北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坚持南满斗争，巩固与扩大了南满根据地

1946年5月18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四平后，接着又占领长春、吉林，气焰十分嚣张，10月中旬，蒋介石亲自到沈阳，确定了在东北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企图集中兵力，先歼灭南满我军，摧毁我根据地，然后用全部兵力进攻北满，占领全东北。南满战场我军处于最困难时期，一度成为东北战场的焦点。中央与东北局十分重视南满的斗争，曾发出多次电报、指示，告诉南满军民准备迎接艰苦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自告奋勇前往南满工作。经东北局同意，报请中央批准，由陈云兼任中共辽东分局（亦称南满分局）书记、辽东军区（亦称南满军区）政委，由肖劲光同志任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已先在南满主持工作的肖华同志任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1946年10月27日，陈云与肖劲光同志等从哈尔滨坐火车起程，途经牡丹江、图们，取道朝鲜，于11月27日抵达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

中共辽东分局领导辽宁、安东、辽南 3 个省委，3 省除敌占区外，多属游击区。当时，南满我军主力只有第三、第四两个纵队，不足 4 万人，我南满主要根据地只剩下临江、长白、蒙江、抚松 4 个小的山区贫困县和两道大沟，分局和军区机关及主力部队被压缩在长白山脚下的狭长地带，这一地区，满打满算只有 23 万人口，老百姓生活贫穷，要负担三、四万部队的支前工作，实有困难。加上土匪、地主武装四处骚扰，不少干部被杀害，一些地方武装哗变，广大群众尚未发动，部队经常露宿，靠烤火过夜，我军处于困境。干部与群众中对南满的前途与命运，议论很多。在领导干部中，对于能否坚持南满的对敌斗争认识上也不够一致。在陈云、肖劲光到来之前，我主力部队三纵、四纵已做了在必要时向北开过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合的准备。

12 月中旬，辽东军区在前线指挥所七道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在坚持南满斗争的问题上有过激烈争论。少数同志同意军区领导的报告，主张作长期打算，坚持南满斗争。多数同志认为长白山区地形狭窄，我大兵团作战没有回旋余地，同时，兵员、武器装备不足，寡不敌众，主张主力撤往松花江北，以保存力量，准备日后反攻。会议连续讨论几天，各抒己见，相持不下。肖劲光同志回忆：“敌人进攻迫在眉睫，时不待我，必须从速决断。这样，我就不得不向陈云请示求援，请他做最后决定。13 日晚，陈云顶着大风雪赶到七道江，同大家亲切交谈，了解情况，直到深夜。次日，陈云在会上讲话。他循循善诱，形象地说：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会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陈云全面分析了形势，对‘留下’和‘撤走’的利害得失，算了细账，经过反复比较，说明留下坚持的重要意义和可能性。最后，他加重语气说：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陈云同志话下多，但掷地有声，分量很重，中心意思是南满一定要坚持，三、四纵队全部留下，一个人都不走，坚持就是胜利，这是关键时刻决定性的一板，这是陈云同志对坚持南满斗争的一大贡献”。

七道江会议的意义在于统一了大多数同志的思想，确定了坚持南满斗争的基本方针，并决定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作战方针，为挽救南满的危局迈出了第一步。会后，南满形势虽然严重，但由于有一个坚强的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党政军民各方面干部齐心协力，奋力工作，实行土地改革，贯彻“七七决议”，群众逐步发动起来，形势日趋好转。

从 1946 年 12 月 17 日敌人以 6 个师的兵力，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起至 1947 年 4 月 3 日，经 3 个多月连续作战，在北满部队三下江南配合下，粉碎敌人四次进攻，共歼敌 3 万余人，这就是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四保临江”。这一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扭转了战局，迫使东北敌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我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在 1947 年东北夏季攻势中，辽东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第二次解放了通化、安东，使辽宁、辽南、安东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总人口有 930 多万。到 1948 年 1 月，辽东大部分地区已按人口平分了土地，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了，1948 年 4 月，东北局决定撤销辽东分局，将辽宁、安东、辽南三十省委及旅大地委改归东北局直属，陈云同志回到哈尔滨。

五成功地接管了沈阳，为接管大城市提供了经验，为大军进关南下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1948年10月锦州解放后，党中央电告东北局，准备接收沈阳，由陈云同志担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0月27日，东北局决定由陈云、伍修权、陶铸、张学思、王首道、陈郁、朱其文、刘居英、朱理治、张维帧、陈尤等11人组成沈阳市军管会，伍修权为副主任，陶铸为副主任、市委书记，朱其文为市长；同时，决定抽调新老干部4000人，由陈云率领乘专列火车前往沈阳。列车于12月29日从哈尔滨出发，途经吉林市、梅河口，绕道四平市到达开原。

由于时间仓促，军管会第一次会议是在火车上召开的，确定并宣布了军管会机构与分工等，决定沈阳卫戍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分别由伍修权、陶铸担任。10月31日，在开原召开了军管会第二次会议。经讨论，陈云宣布了接管沈阳的方针、方法、意义及注意事项等。接管方针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他指出：沈阳是东北最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把沈阳接管好，使巨大的生产力不受破坏，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可以有力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可以为接管关内各大城市提供经验，对建设东北和支援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会后列车转移到铁岭。

11月2日，沈阳获得解放。军管会从铁岭乘卡车于黄昏进入市区，并立即开始工作，迅速贴出了事先印好的军管会布告，安定民心，还发行了入城前就印好的第一张报纸，宣传党的政策。布告要求职工上班，限三天内按级向上呈报人员名单及简要现状，办理移交手续。执行结果，接收工作进展顺利，工厂、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房屋、设备器材、仓库物资一般没有遭受破坏。

当时，许多仓库中贮存着大量弹药、武器及其它军用物资，估计可装600个火车皮，另有几十个车皮弹药在车站未及运走。解放后头几天，敌机轰炸的目标主要是这些地方，如命中会引起连环爆炸，沈阳可能半座城市被炸毁。军管会文通处、后勤处连夜组织员工在敌机轰炸及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把大批弹药军火迅速运往各地，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当军管会委员、交通处处长刘居英向陈云同志汇报此事时，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也在座，刘说部队工缺少各种炮弹，陈云同志听后非常高兴，事后以军管会名义嘉奖了在抢运工作中立功的宋力刚等6位同志。后来，听说这些弹药在平津战役中发挥了作用。

军管会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依靠群从，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陈云同志指出：工厂和企业迅速复工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职工生活问题的最好办法，恢复生产越快，工厂保护会越好，职工生活问题就越容易解决，社会治安也会越好。到11月25日，每天有96列客货车进出沈阳，绝大部分工厂已经恢复生产。

陈云同志很重视总结经验，在入城后不到一个月，他写了《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电告东北局并转报中央。沈阳的经验，解决了接管大城市工作中的两大难点，即怎样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简报总结了5条具体经验，（1）入城后首先要恢复电力生产与供应。（2）要迅速解决市场及金融物价问题。（3）对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4）迅速出版报纸，稳

定人心，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5）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他还根据沈阳经验，在简报中建议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准备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后，移交给市委、市政府等机关，这样，接收班子可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暂成专职，依此接收各大城市。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作为成功的经验转发给了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前委。稍后，中央要求东北局将接管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并从沈阳接管人员中抽出二三十个得力骨干调给任天津军管会主任的黄克诚同志，前往天津参加接管工作。

军管会在入城后两个月，召开了接收经验总结会。与会同志认为接收沈阳是成功的、完整的，在战争及政权转变过程中，保护了巨大的生产力，迅速恢复并发展了生产，城市社会治安良好，市场物价稳定，在我军胜利的形势下，正确的接管方针和城市政策及地下党的工作配合，迎来了人心大变的新局面，市民从过去的“正统观念”变为心向共产党。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有关部门迅速查获了敌特秘密电台80余部、曾受到中央的赞扬。陈云同志认为接管沈阳有一条重要教训，即入城后不应立即将所有监狱犯人释放。正确的作法应该是将政治犯迅速释放，老盗窃犯、土匪等应继续拘留，分别处理，这样社会治安会更好（沈阳当时有1/3到1/2的盗窃案是入城后释放出狱的犯人所为）。

1949年初，沈阳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1月5日，陈云出席了会议并讲话。他赞扬了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号召职工团结一致，搞好生产，忍受暂时困难，支援前线，彻底消灭反动派，建设幸福的将来。这篇《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1949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过。因那时陈云已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这篇讲话同时也是对全国各解放区工人阶级的鼓励和号召。

在沈阳，当谈到前线胜利时，陈云同志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当四野主力从北满即将开赴锦州前线时，东北局曾经议论过，认为锦州之战将决定东北的命运，沈阳之战将决定平津的命运。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早已解放，现在几十万大军压过去，当然可以决定平津的命运。为了保证大军南下，支援平津及全国解放战争，陈云同志一再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财经、生产部门，要把发展经济、增加生产、保证部队供给、支援前线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上。平津战役前后，大量军需民用物资进关，每天使用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火车皮。因部队没有仓库且驻地常变，有的暂把车皮作仓库，故进关车多，车皮返回东北少，使运输难以为继。为此，东北局多次致电林、罗、刘（亚楼），列举每天进关与返回车皮的数字，写明差额，呼吁及时将车辆放回。有一段时间，林、罗、刘亲自敦促与检查卸车。

为商谈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后勤保障问题，陈云同志乘坐由毛泽东号机车牵引的列车于1949年2月4日到达北京。这是毛泽东号机车第一次进山海关。陈云在京住了两天，与林、罗直接商谈，然后与罗荣桓同志等一道乘吉普车经保定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党中央当面汇报工作。这是陈云自1945年9月后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两天后，他同罗荣桓等同志一起上吉普车到保定，住了一夜，会见了华北七纵的领导同志，然后退京。在京、津参观访问几天，于2月中旬回到沈阳。

六领导东北财政经济工作，积极支援前线，制定东北经济发展计划

陈云同志无论在何地，任何职务，一直注视着经济情况与经济工作，1946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东北政权领导机关——东北各言行政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10月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为林枫。行政委员会党委由陈云任书记，陈云、李富春、林枫为常委。1948年6月，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并入东北行政委员会。10月，明确东北财经委员会亦党亦政，党政双方均设，但为一个机构，主任为陈云，副主任为丰富春。

1948年6、7两个月，陈云集中精力研究了财经工作并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后来收入《陈云文选》时，题目为《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份报告分析了东北当时的经济形势，特别是物价及金融形势，指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1948年2、3月间，东北在财经方面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东北解放区的重点煤矿在发动工人中产生了不适当地打击职员的“左”的错误；另一件是3月物价暴涨，群众不安。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的作用估计不足，因而政策上“左”的错误，是当时东北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为妥善处理这一发展经济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陈云同志代东北局起草了《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报经中央批准并在1948年8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决定》指出，“对于职员的改造，是一种思想和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的处理，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也需要工人与职员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个决定实施以后，东北通过各种讨论会、座谈会、研究班、训练班等方式，比较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这在当时对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支援前线是很重要的。

陈云同志对当时经济工作作过许多具体指示，例如对接管沈阳后的粮食政策和金融物价政策在入城前就指出：沈阳粮食价格应该比铁岭、开原高一些，应根据成本加运费及合理利润制定价格。入城后如粮食的市价低，贸易局可用适当价格收购农民运进来的粮食；加上国营贸易公司调运一部分以及接收敌人的存粮，就可以保证沈阳市的粮食供应。同时又指出：沈阳市的物价不宜低于老解放区，否则市场上的大量物资会隐藏起来。对我们不利。贸易公司定价必须恰当，高到什么程度或者低到什么程度，都要很好研究。银行对信贷政策的掌握也是这样。由于贯彻执行了这些具体方针，沈阳解放后粮食供应充足，物价稳定。

东北铁路比较发达，陈云同志到东北后很重视铁路工作，深知铁路对现代战争、支援前线及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曾兼任过东北铁路管理局局长。在沈阳军管会期间，他经常询问与督促铁路修复与运行情况，并亲自起草给党中央的电报，除说明铁路对东北解放战争及工农业生产所起作用外，建议中央设立铁道部，筹划与管理铁路事宜。很快，中央决定建立铁道部，由军委副总参谋长滕代远任部长，隶属于中央军委。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这是各部中建立最早的一个部门。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为了掌握各地实际情况，他在沈阳市接管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后，即抽空到辽宁及吉林各地作调查。那时，我在陈云处任秘书，一路随行。从1949年1月到4月，他先后到鞍山、大连、普兰店、瓦房店、本溪、丹东、长春、吉林市、四平市及盘石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抚顺市因距离较近，去过好几次。每到一地，除参观工厂、矿山、电站、商场。

科研等单位外，总要了解当地政治经济综合情况和党的建设、工业发展前景、市场供应、交通运输、职工工资、人民生活、民族关系、民情风俗等情况，并对地方及企业同志提出的问题及时给以指示。为了解铜矿的生产及发展，解决制造子弹。炮弹及民用对铜的需要问题，从吉林市专程乘火车去盘石铜矿——当时东北最大的铜矿。从铁路干线的车站到铜矿有轻便铁路，但当时没有轻型机车，于是，我们坐在轻型敞篷车上，用两匹马在路轨两旁牵引着前进。三四月份的东北还相当冷，陈云却很高兴，饶有风趣地大声笑着说：“坐上马火车了！”那时陈云同志 44 岁。

陈云同志生活简朴，谦虚谨慎。军管会入城后不久，他就从沈阳宾馆搬到伪辽宁省政府旧址办公，自己和家属及警卫人员、秘书住在两幢背靠背的解放前交通银行职员住宅里。工作中感到有缺点或失误，他主动作自我批评。稍有空闲他就学习，对《列宁选集》中的一些重要论文如《论粮食税》等，仔细阅读，反复思考。

沈阳军管会的工作到 1949 年 5 月实际上已结束了（根据中央的指示没有宣布）。7 个月里，前一个时期陈云同志主要抓沈阳市的接管工作及党群工作，后期主要抓东北区的财经工作，制定 1949 年东北区经济发展计划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这时，关内大部分地区还未解放，战争仍在继续，东北已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建设。因此，1949 年东北区经济发展计划是全国第一个大区性的经济发展计划，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到来作了准备。1949 年 5 月，他遵照党中央决定离开东北到中央领导全国财经工作。

回顾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全体东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得到全国各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与国际支援，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取得的。陈云同志从 1945 年 9 月至 1949 年 5 月参与领导了东北解放斗争的全过程，在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陈云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在东北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不朽业绩必将永载史册。

（作者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注释

《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301、308—312 页。

肖劲光：《四保临江的战斗岁月》，载《辽沈决战》（上）。

学习陈云同志经济思想 的几点体会

周光春

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三卷文选，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通过学习他的著作和他在工作中的指示，深感他的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范围广阔，内容丰富，我仅就五个方面，谈一点学习体会。

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

陈云同志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他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的问题。”

“弄清‘事实’并不容易。为了弄清‘事实’，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陈云同志这样讲，也是这样做的。我在中南局工作的时候，陶铸同志也提醒我们，向陈云同志汇报、请示，必须把情况摸清，数字搞准，才能解决问题。早在建国前夕，陈云同志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当时解放战争还在华南、西南等广大地区进行，支援前线的任务繁重，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很大，西北地区困难更大，敌人在海上封锁，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等地轮番轰炸，国内外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对能否解决经济问题，还抱怀疑态度。面对国民党撒下的烂摊子，有人在看共产党怎么办。

陈云同志通过调查研究，抓主要矛盾，首先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以此带动全国。1949年8月，陈云同志在上海主持有五个地区参加的财经会议。当时上海粮食、棉花等物资缺乏，地区之间粮食封锁，运输也很困难。不少工厂停产、工人失业，留用人员很多。南京市仅跟班的、老妈子就有10万人。投机商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有人主张工厂搬家，有人主张华南、西南另发钞票。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有人主张发票子，有人主张发公债……众说纷坛，莫衷一是。陈云同志经过详细研究，计算上海的粮食、棉花需要多少？库存多少？尚缺多少？由那些地方调来？各调多少？粮、棉、煤运到上海，纱布、卷烟、百货等运出上海，需要多少运力？陈云同志又研究铁路和水上运输的各个环节，计算运量，设法提高效率，解决疏运问题。在此基础上，安排上海市的工业生产、金融、物价等工作。他提出必须有全局观点，打破地区封锁，对留用人员要采取慎重态度，除少数劣迹昭彰、为群众所痛恨的，以及靠裙带关系拿干薪的以外，对留用人员要训练、改造和使用。

为了贯彻执行上海财经会议决定，中财委又先后召开了工业、金融、贸易、物价等专业会议，要求将各大区财委组成一个司令部，结合发展经济，增收节支，把金融、财贸、计划、工业等方面的工作都管起来。

在解决上海经济问题的基础上，中财委安排了当年全国的财政、金融、物价等工作，要求发展生产，增加税收，解决财政困难。陈云同志还提出：“我们不但要注意克服目前的困难，而且要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的解决。否则，就要影响到国计民生。”陈云同志从全局看上海，又从上海看全国。1949年12月，陈云同志就提出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1950年3月，政务院通过了陈云同志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有必要在农业、国有企业、特区建设、利用外资，分配不公等方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这样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减少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使各项事业更正常、健康地发展。

二宏观着眼，微观着手

陈云同志研究经济问题，既统观全局，又具体入微，把措施研究到可操作的程度。以发展氮肥工业为例，陈云同志下仅从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着眼，提出农业要继续增产，最快、最重要的一条，要靠加快发展化学肥料，而且具体解决有关发展化肥的一系列问题。

要发展氮肥，值得研究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氮肥厂的规模是搞小型的，还是搞大型的？第二个问题，氮肥厂建设的部署，是把现在已经铺开的十几个点全部列入年度计划齐头并进，还是集中力量分批进行，每年建成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1959年和1960年，各地兴建了30多个小氮肥厂（年产合成氨800至2000吨）。后来，有些省提出一个县办一个小氮肥厂。陈云同志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指定同志到小氮肥厂蹲点，现场观测一段时间。由造气、变换、合成、铜碱洗到成品车间，了解生产过程的流量、温度、压力、尾气分析、煤炭消耗、产品质量等指标。结果发现在30多个小氮肥厂中，能够比较正常生产的只有8个。由于设备材质和加工工艺等原因，有些设备跑、冒、滴、漏严重，技术操作很难掌握，以致事故频繁，生产波动，煤、电消耗较高，不少工厂生产硫酸铵，还要另建硫酸车间，氨气挥发较大，硫酸根容易使土壤变质。

当时的6个年产2.5万吨和5万吨合成氨的氮肥厂，生产比较正常，产品是硝酸铵，质量好，氨气挥发量少，产品成本较低，不需要另建硫酸车间，建厂周期和小氮肥厂差不多。

经过对比研究，陈云同志说：“小型氮肥厂有它的优点。但是，由于小型厂技术上没有完全过关，还要继续试验，不断改进。在没有完全过关以前，不应该大量地、普遍地建设……。今后三年内，发展氮肥工业的计划安排，应该是分年分批建设年产五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按照这样的规模来进行建设，应该怎样布点呢？我们认为，应该尽先在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和粮食的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在工业问题上，陈云同志还说：“煤、电、运输等先行工业部分，已经暴露出过去投资不够的问题，先行成为落后，这种状况要很快加以改变。”“我认为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型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国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陈云同志的论述，很有现实意义。目前国有

工业正面临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的问题，加速技术改造，是当务之急。若干重大项目上马，似应从全局考虑，避免重复建设、结构不合理、加工工业过长、决策不当等弊端。

三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发展 农业是头等大事

陈云同志指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早在1951年5月，他就提出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那时，土改大大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尽一切力量投资生产。要增加农业生产，必须兴修水利，蓄泄并举，以蓄为主。这是治本工作，百年大计。山区要种树种草，保持水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农业布局，要修西南、西北铁路，把各种庄稼的分类调整一下，因地制宜，宜粮种粮，宜棉种棉，还有其他经济作物，如海南岛等地的橡胶。还要储粮备荒，应付自然灾害。

陈云同志1962年就说过，“我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

大跃进以后，浮夸风较严重，要了解真实情况很不容易。陈云同志亲自到家乡（青浦县小蒸乡）作典型调查。他通过调查，了解到以下问题：（一）小蒸乡农民对比了双季稻可以增产，但由于那里的无霜期较短，全面算帐，包括秧田、种子、夏熟作物（豆、麦在内），双季稻是明增实减，此外还多用肥料和劳力，稻草也少，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二）自留地问题，小蒸乡在高级社时期自留地占耕地总面积3%，人民公社化时都归公了。农业“六十条”下达后，分给农民的自留地占耕地总面积0.5%，农民要求扩大到6%。理由是，自留地可以补充口粮；便于养猪积肥；可以种菜；可以种东西卖，养鸡、养鸭有零花钱；可以恢复和发展竹园。（三）私养猪比公养好。私养饲料比较充足；猪吃得香睡得好，长肉多；用大量青草垫圈，积肥多；可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而公养，煮饲料、垫圈，一头猪一天至少二斤稻草，私养猪做饭时带煮猪食，割青草垫圈，很少用稻草。所以，公养猪亏本，私养赚钱。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段时间为暂时的卖粮难所误导，放松了对农业的领导，对农业问题研究少了，统计数字有水分。目前农业情况如何？似很有必要切实解剖几个典型，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农业问题。我曾问过一些粮产区的基层干部，除灾区外，为什么各村都增产，没有一个减产的？答：有达标任务，国家又不调粮食，乐得增产了。

四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考虑经济问题

陈云同志1979年3月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

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不同的比例。”过去计划工作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解放初期，陈云同志就非常关心市场和物价，几乎每天掌握市场和物价动态；同时，关心中间市场——仓储运输等。1952年，沿海各大城市货物堆积如山，到处叫装不下，有的放在露天。货物总的和1951年差不多，为什么装不下呢？他经过了解，发现原因是那时的资本家等着“五反”，不进货了，私人仓库空着，公家仓库装不下。

1956年公私合营，把小商店、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陈云同志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利的。他举例说：他家“对门的一个小铺子，只能站两个顾客，但是他卖的东西适合那个地方群众的需要，有文房四宝，牙刷牙膏，针头线脑，直至邮票，样样都有。这种小铺子看居民需要什么就卖什么，对群众很方便。他们卖的方法也跟百货公司不同。……信封……一个也卖。售货时间也不一样，……晚上十二点敲门也卖东西。”对于“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长期让他们单独经营。”^⑪“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应该在一个时期之内，照旧维持下变，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也改掉了。”^⑫他举例说，东来顺的羊肉、全聚德的鸭子不如从前了。

陈云同志指出：“粮食工作是一项关系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⑬“无粮则乱。”^⑭“我们的方针是：必须抓住机会，保证正常的粮食收购和实行少销，以便以丰补歉。……这是因为，如果明年来个灾荒年景，国家就会处于危险的地位。”^⑮

陈云同志对城市蔬菜的指示：“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购买力愈低的人，对这个问题就愈关心。……大中城市郊区要有足够数量的蔬菜种植面积。……要以郊区生产为主，外地调剂为辅。”^⑯陈云同志还提出种植蔬菜面积，要有“安全系数”，同时要解决蔬菜储存问题。

陈云同志对猪肉、副食品的供应也抓得很紧，认为要解决饲料、价格问题，并增加鸡、鸭、鹅、兔、鱼等不用或少用粮食的养殖。

陈云同志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考虑经济问题，宏观上有计划地安排主要方面；微观上密切监视市场和物价变化。这和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有关全局的指标要有计划，他形象地说基本建设要有“笼子”。在工业产品中，钢、铁、煤、电、石油等需要有综合平衡，农业生产中的粮、棉、猪、食用油料等也不能放任自流，货币发行和物价等也要有计划。现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量的生产经营要由市场调节，但上述一些主要的方面，我认为仍然需要有计划，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宏观调控。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五切实搞好综合平衡

陈云同志说：“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⑰“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总之，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⑮

综合平衡的内容，诸如：农业与工业，农业内部，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内部，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还有财政收支，外汇收支，人民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生产、建设与物资供应等方面的平衡。上述几种比例关系和几个平衡，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从宏观来看，要搞好综合平衡，如果破坏了综合平衡，心然导致国民经济失调，到了严重程度就要大调整。

1959 年讨论钢铁生产计划时，陈云同志从铁矿石、煤炭、洗煤、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一杆子研究到底。同时，抓质量、品种，以适应生产的需要。他指出，既要保证钢铁这个重点，也要照顾一般。

陈云同志对基本建设有几句名言：“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先生产，后建设”，“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陈云同志认为基本建设投资要通过财政平衡，看能拿出多少钱，以此制定基本建设计划，不能靠搞赤字、发票子。在基本建设中，“任何一个项目，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必须是一项规定。从公社起直到中央常委，一律照此办理。”^⑯

1979 年，陈云、先念同志给中央写信，提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⑰

温故而知新。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外债务沉重，加工工业重复建设，通货膨胀，物价居高不下等问题，有必要统筹全局，继续总结经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使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快速地发展。

（作者曾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

注释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陈云文选₂》第₃卷，第 235、235、146、148—151、56、267、246、205、245、72、350、69、64—65、211、211—212、280、248 页。

^⑪^⑫《陈云文选》第 2 卷，第 1、294—295、295—296 页。

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群众 ——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学习心得

乔培新

陈云同志是实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人物之一。实事求是陈云同志的思想行动中贯穿一切的主线。他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出很多重要的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实践证明，按这些规律办事，就胜利，违背了这些规律，就失败，就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以至重大损失。

1945年，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发言的一部分《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中指出：“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错误就是把客观看错了，结果也错了。”对功劳和错误的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半个世纪以来，陈云同志就是按照这一思想来领导经济工作的。

早在抗战后期，在日军和国民党部队围困陕甘宁边区的1944年，党中央决定调陈云同志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边区的经济工作。他经常召集财办副主任贾拓夫、秘书长曹菊如、财政厅长南汉宸、贸易部长叶季壮、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等同志开会，解决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有时也让我列席会议。他亲自抓银行工作，多次到边区银行了解情况，组织座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同志主管全面的财经工作，更是为人民为党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建国之初，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地方遇到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扭转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极端混乱状况。我们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加之为了胜利结束战争，给国民党军政人员找出路，我们采取了把它们都包下来的政策，更加重了通货膨胀。当时，国家的支出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而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省、市、区、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收支脱节和财政上的不统一如果继续下去，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全国人民经过了12年的战争和通货膨胀之后，生活已极困难，需要努力制止通货膨胀。于是，陈云同志亲自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经第22次政务会议通过，于1950年3月3日公布实行。他还提醒财经工作的干部，必须提高自觉性，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来看，认识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我们胜利了，我们的各项工作是否搞得好，不仅关系到4.75亿人的命运，而且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不看清楚这些，便不可能认识我们的责任。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财力物力加以统一使用。

在贯彻执行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过程中，1950年3、4月份物价即由上涨趋于平稳，5月涨势基本上停止，货币流速大减，银行存款大力增加（银行存款对财政贸易周转起了大作用）。到1950年6月15日，陈云同志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

问题的报告，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即财经工作业已实行统一，财政收支业已接近平衡，通货和物价业已趋于稳定，这是我们国家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的表现，最广大的人民已经看到并开始得到通货稳定和物价稳定的利益。

自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仅仅过了8个多月的时间，就取得这样一些成果，国际上下少国家的人们认为是奇迹，也实在是稳定经济、稳定国家大局极其宝贵的经验。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罪恶统治造成的通货膨胀，为什么仅仅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就根本改变了面貌，使我们国家健康起来，顺利前进了呢？这是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陈云同志的深谋远虑，统筹规划。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深知中国的国情，一动手治理，就如药到病除。就我自己直接的体会会有三点：

（1）陈云同志平时很注意调查研究，摸规律，在延安一次会议后，他对我讲，遇到问题，一是收集论点，二是收集证据，三是三番四复，四是确认现实。《陈云文选》中《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概括的“交换”、“比较”、“反复”6个字，和他对我讲的精神是一致的。

（2）陈云同志十分注意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一次，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作报告，说：保卫党中央，这是全局。晋西北或哪个解放区损失了，可以救起来，党中央不能遭受损失。

（3）陈云同志1935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在巴黎和莫斯科出版发行。为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他署名廉臣，并在文内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我于1936年秋冬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看到这本书，对我参加革命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书中对共产党、国民党，讲入讲事、深刻对比，述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状况、思想情绪，使读者如身临其境。

和《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脉相连，1956年12月和1957年1月，陈云同志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商业工作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他说：我们是从事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不能没有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6亿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要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学习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结经验，二是重大的时事和政治问题的学习，三是学习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此外，还要解决依靠群众的问题。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没有这一条，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陈云同志提出的三大观点，不只是商业系统学习、执行了，银行系统也积极地学习和执行了，其他许多部门都学习和执行了。

陈云同志在财政经济工作中还提出了三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现金收付平衡和物资调拨平衡。以后，又提出了外汇收支平衡，在这些平衡中间，以我体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收支平衡。建国以来，经济一遇到困难，有些人就想打赤字财政的主意。越搞赤字，财政越困难，国家只好被迫要银行发票子，弥补财政赤字。实践证明，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是难兄难弟，不但不能相互解救，而且越闹越厉害，由经济问题闹成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系问题。通货膨胀实际是向老百姓要钱，但它不同于征税征税有一定的限度，该谁交什么税，交多少有政策规定。赤字财政、通货膨胀搞起来，很难有个

限度，不是“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就怎样办”，而是专向老实人要钱，搞投机的人不是交钱，而是利用物价上涨，发通货膨胀的财。赤字财政、通货膨胀使老百姓看到党和政府与老百姓是两条心了，是搞两极分化。邓力群同志写的《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说：“陈云同志坚决反对用列赤字、发票子的办法来搞基本建设。他说，你们不怕通货膨胀，我给你们讲，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一连说三个害怕”。陈云同志在《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中说，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不可能，而且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建设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早在1957年1月，陈云同志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须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应该看到，基本建设搞多少，不决定于钞票有多少，而决定于原料有多少。

陈云同志非常关心人民生活，关心农业，关心回笼货币。大跃进中，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了。在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花尽心血，开动脑筋，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发言。其中，头一条就是说的进口粮食，他说：“现在有进口二百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来一些，我们也要。”他指出：要说服同志们把有出口市场的零零碎碎吃的东西如核桃、瓜子、红枣等都集中起来出口，换粮食进来。如果有400万吨粮食进来，那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过好一些了。明年、后年如果再多进一点，那我们就能稍微有点存粮了。就是为了这件事，人民银行把存的首饰银器等等交到冶炼厂炼成银块出口，还拿了相当大量的黄金出口，抽调了副行长江东平同志到上海口岸接运粮食将近半年。国家把进口的粮食和从古巴进口的糖集中使用，制作高级糖果和高级糕点，把进口的麦子的麸皮用于养猪。卖高价糕点、糖果、炒肉片和养肥猪这些办法联系在一起，解决了不少问题。陈云同志说：“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能吃到一些东西，增加一点热量，又可以多收回一点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个大主意。”结果，几年就把在市场上膨胀的货币基本收回来了，共回笼五六十亿元。

早在1957年9月，陈云同志就提出了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他说：农业对我们的重要性，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今后，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下在开荒。”“发展化肥比起开荒来，既便宜、又快，年产一百万吨化肥只要十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三百万吨即六十亿斤。”“今后解决穿衣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于发展化学纤维。”“其中，‘卡普隆’是很可以发展的一种。它的原料是煤炼成焦炭的副产品。‘卡普隆’比棉纱坚牢，照理论计算，牢度比棉纱强五至十一倍。从使用寿命来说，如果生产三十万吨‘卡普隆’，即相当于一百五十万吨棉纱，也就是三千万担棉花。”“为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搞化肥，搞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都要花很多钱，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只能紧吃紧穿。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

近些年，国际上和平演变劲头不小，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了颜色。但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定不移，使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制裁不得不逐步松劲。我们现在应当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一次深刻的经验总结，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顺利前进。在总结中，要系统地吸收陈云同志总结起来的经验，特别是要明确那些被实践证明了的规律，在全党全国上下推广运用，千万避免再发生折腾。

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应由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轨道，转上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轨道，争取用 30 年至 40 年时间，把我国变为社会主义的富国强盛。我建议采取的措施，核心是两条：

（一）把卡紧科学技术和教育、放松基本建设铺摊子的局面。

改为卡紧基本建设铺摊子、政活科学技术和教育，让科教加快发展和提高。

（二）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银行改力停止通货膨胀的银行，转为力科学技术和教育开路的银行。我国的钱少，要用在刀刃上，不能用在刀背上。

（作者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注释

《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293—297 页。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141、142—143、80—86 页。

陈云同志与西北财经办事处

朱劭天

陕甘宁地区是中国西北荒凉贫困的地方，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红色区域，自“双十二”事变前后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那里经过10年内战，封建地主经济大部分被摧毁，农民分得了土地，但农村经济已经破产，势必只能采取依靠外援、休养生息的方针。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3万脱产人员只靠国民政府发给“抗日军饷”和国内外捐款维持，每年共约1000万元，公粮仅向中农以上征收，每年约300万斤，另外还要拨款买粮。公务用品、被服鞋袜等均从外面采购，近至西安，远至汉口、香港。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进行严密封锁，断绝了一切外援。从那时至1942年，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边区政府开始独立发行边币，直接支持财政开支，各单位分散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边区军民面对国际国内险恶形势，经受严峻考验，磨练了斗志，认识到必须坚持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力更生”道路。

1943年，贯彻中央提出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军民大生产运动。机关、部队、学校开荒办厂，生产粮食、蔬菜及一些生活必需品，并组织人民群众生产粮棉，运输盐碱、药材等土特产品出口，使经济状况有了初步的好转。但由于大量生产资金的投放，及备战费用的加大，造成边币发行过猛，物价猛涨，一年发行量增加13倍，物价涨幅20倍。财政金融贸易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整顿，为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的财经工作，便于对外金融贸易斗争，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西北联防司令部贺龙司令员兼任主任。贺司令员多次召开两个地区党政军的财经工作会议和各旅团供给部长会议，为坚决推行朱德总司令倡导的“屯田政策”进行具体部署，为克服边区严重经济困难，保卫解放区的总后方，调拨物资和款项，照顾大局维护财经纪律，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4年春，陈云同志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工作，继续贯彻“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全面深入开展大生产运动。他要求粮食耕三余一两年完成，工业必需品生产基本自给，节约储蓄，稳定金融，积蓄力量，备战备荒，迎接反攻形势的到来。陈云同志作出的部署和措施十分成功，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进出口达到基本平衡，财政下再从银行透支，发行得到控制（银行发行准备金达到90%以上），物价相对稳定（一年上涨二、三倍，与西安大体持平），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10万多人同边区150万人民一起，达到丰衣足食水平。抗战胜利时，延安大小家当都已建立起来，解决了广大干部出发开辟新解放区的路费、服装、马匹等装备，并给边区留了足够一年用的家底。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解放区总后方，能以地方性财政收入解决带全国性的财政支出，确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我于1943年由中央财经部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作为陈云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深深感到他的经济思想、领导艺术、工作作风包含着许多宝贵内容。

一注重调查研究，倡导实事求是作风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他总是全面地了解情况，集思广益，对情况作出准确中肯的判断，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常亲自到延安甫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找群众和干部谈话，直接了解情况和意见，取得第一手材料。我跟随他在新市场向运盐农民调查运盐线路时，他让我绘制了一幅《陕甘宁边区交通干线图》（我仍留有复印件），以便于外出调查时使用。他调查询问的内容非常细致、具体，如 1943 年由盐池运出食盐 5000 万斤（33 万驮），除内销公私用盐 700 万斤外，盐业公司只收进 3500 万斤，还有 700 万斤没有下落，相当盐业公司收进数的 20%。原来，这些盐都走私出口了。陈三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仔细研究分析这个问题，找出了食盐走私出口的几个主要原因：一是口岸盐业公司收购价格低，盐农成本高，运盐赔钱；二是公家沿途开的某些骡马店为完成一定生产任务，强迫运盐脚户投宿，并提高住宿费用或收取法币；三是一些盐业公司采取不公平的手法与盐农交易，对脚户的盐低价进高价出，有意低估盐的质量，大秤进小秤出，每驮盐要挖两碗，不公平过秤（只是抬一抬，随便论重量），再加盐业公司的风耗费、出口税及附加等，增加了运盐群众的负担和麻烦，引起对食盐统销政策及盐业公司的不满与对立；四是有的地方党政干部听到群众上述意见，也非难盐业机关和埋怨统销政策，造成互不合作的现象；五是国民党统治区西北几个省都靠我们的盐，国民党分子利用我方的一些缺点，从中挑拨离间，采取阻塞大路，开放小路，抑制官盐，高价收购私盐等手法，以刺激走私。找出存在问题的原因后，陈云同志指示有关部门积极改善盐业机关与广大运盐农民的关系，克服对立情绪，互相配合，整顿草料店，减低运盐费用，改善运盐途中条件；提高口岸收购价（较规定的外销价只差 20%），保证运盐户有钱可赚。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堵住了食盐走私出口，盐农自觉自愿地把食盐卖给盐业公司统一外销。

当时，围困边区的国民党正规军有 50 万人，设有三道军事封锁线，更有地方税收机关和便衣队派出许多巡查人员活动在大小道口和许多壕沟、堡垒、据点、哨所之间。他们遇到贩货客户，轻则敲诈勒索，扣留没收，重则杀害人员。临近边界的市镇，国民党对百货运销贩卖都进行严密统制。陈云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听到商贩们提的意见，如进口货物通过封锁线风险大，贿买国民党税务缉私人员花费多，必须一有厚利，二保证兑给法币，于是，经与贸易部门及银行慎重研究，决定为打破经济封锁，要灵活商定收购价，并满足商贩兑换法币的要求，保证必需品继续进口。1945 年春，外面花纱布价涨得快，边区内涨得慢。陈云同志为争取花纱布继续进来，且防止倒流危险，决定高价刺激入口。

陈云同志非常注意从各方面研究和了解市场发展情况，他曾亲自带领我去枣园党中央图书馆，查阅国民党地区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中有关西北盐业及花纱布的产、供、销资料，指导编印《西北盐业资料汇编》及《西北花纱布资料汇编》二书，送解放社印刷厂各印 300 册，分发有关于部学习参考，使大家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陈云同志指导编印的《经济消息》半月刊，是革命根据地铅印出版最早的经济报刊，主要是从订阅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报刊上摘选财经资料和行情变化讯息，提供业务部门干部参阅，并送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创刊前，陈云同志亲到解放社印刷厂，商定为保证出版及时，每期稿一到即交排印。平时，他看到有用的材料，便立刻交代采用。从

1945年1月23日至9月29日，共出版了30期，开始仅印100份，后增至200份。所有铅印书刊，都用陕甘宁边区生产的马兰草纸和自产油墨。

西北财经办事处由陈云同志主持，每周在边区银行召开一次例会，召集各主要财经部门领导人参加，经常参加的有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定、贸易总局局长叶季壮、西北财经办事处秘书长曹菊如、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土产总公司经理喻杰、贸易总局副局长范子文、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业组长陈郁，留美经济学家王思华、经济学家丁冬放、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苏子仁，晋绥白如冰等也曾参加。会上，大家对当前财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交流资讯，研究决策。陈云同志作过许多精辟独到的发言，如对边区内外经济特点、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又如，对他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观点以及“交换、比较、反复”的认识方法进行阐述，等等。他说，1941年他住在枣园养病时，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有条红线贯穿着，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要合乎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要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发挥创造精神，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多同别人交换意见，不管什么意见都耐心听，甚至有人同你抬杠也要欢迎，以集思广益，全面了解和分析实际情况；要弄清有什一根据，过去有否例证，并且一定要经过三番四复地考虑，然后才作出决定，概括说就是“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同志经常在晚上召曹菊如等同志和我去他房间，围绕当前一个问题、一事情交谈，边拨算盘，边酝酿考虑。如谈到边区需要棉花的数量，除军民穿衣部分外，对还需用多少不很准确时，就立刻打电话询问有关同志（对制硝酸棉需要多少棉花，便询问军工局李强同志），以尽可能核算出接近数字。这种“聊天”是很劳累的，以至几次交谈到深夜，曹菊如同志因年纪大，打瞌睡睡着了，陈云同志才笑着停下来。他认为，搞经济工作对数字必须十分认真，不要含糊出差错。

二强调用经济手段，按经济规律办事

陈云同志一向强调处理经济问题，要尽量用经济手段，避免采取行政手段。如农户运盐，运往哪个口岸，他要求不再由政府摊派任务，不用动员督运，而是根据出口要求，用规定口岸收购盐价的办法来指挥。农户摆脱了行政任务压力，有近一倍的价钱可赚，自然提高了运盐主动性。再如，鼓励植棉，他便指示有关部门规定免税及合理收购价，以刺激植棉积极性。

1944年，关中平原新花上市时，我进口口岸先提高收购价一倍多，较我东三县棉价还高。高价招远客，封锁我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连排长亲自带整连整排士兵背花进来，有的一夜背三趟，使我们在两个月争取到进口优质新花百余万斤。而国民党政府的采购陕棉60万担计划，由于开始收购价低，以后见收购不到，虽连续提价4倍多，且好坏花均收，计划仍未完成。六七月间，国民党地区海盐来源受阻，库存空虚，我们则大量囤盐提价，僵持两个多月，终于不得不依从我方价格。待我方存盐高价售出，外面盐库饱和后，我们又及时落价，外面只好随同我们降价。外面金融市场波动时，我方利用有利时机吞吐黄金、法币。如外面金价、物价上涨时，法币贬值，我方提高出口货物价格，出口黄金，买进法币，物资暂时少进。法币紧缩价值提高时，我方再将低值进口的法币抛出，买进物资和黄金。1944年夏，一次短时间收进黄

金万两，赚取了他们金价波动的差价，银行准备金充实了，必需物资也进来了。

上述许多次对外金融贸易斗争，都是在陈云同志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他除通过业务部门下达任务外，还派我去口岸传达他的具体设想方案，并电报督导进行。

对边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也有过争论，如边币发行量，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法币流通与兑换比价，稳定比价与稳定物价，扩大剪刀差等等。对这些问题，陈云同志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战争时期物资缺乏，各国莫不采取通货膨胀的手段，我们也不应放弃运用这一工具。边币在边区内流通市场上是独立的，但不能到边区境外使用，不如法币腿长。边区流通市场中实际有边币又有法币，法币约占65%左右。我们承认法币的优势，并且加以利用，手中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法币，保证兑换给进口必需品的外商，但又不能过多，以免边区人民承担法币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有美国支持，而边币只靠自己的力量，因而边币要求稳定在物价上是不现实的。但是、争取边币和法币的比价稳定是可能的，就是说，争取边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和法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大体持平。在国民党统治区黄金市场价格波动时，我们可从收进、抛出当中赚取差价，但国民党政府规定黄金不准在市场上作货币流通，因此，不能抵作外汇，积存多了会影响周转，有时还要推到敌后换货。这些问题都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如不正确处理，就会带来盲目性，甚至带来损失。陈云同志这些精辟的分析和论证，促进了争论各方认识上的统一，推动了边区经济工作的发展。

三重视对财经工作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随着革命政权建设的发展，财经工作越来越显得重要。陈云同志在领导西北财经工作时期，就十分重视对财经工作干部的培养和教育。1944年夏，陈云同志召开了一次粮食工作会议，朱总司令前来参加并讲话，特别向陈云同志提到，预见未来形势的发展，要认真培养一批财经工作干部。西北财经办事处设有政治部，由陈云同志兼任主任。在各财经部门，均分级设了政治部门。当时，基层财经部门接触的工作环境较复杂，用人多，水平也不整齐，由于严格了党员的管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全体人员中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使财经干部的政治素质明显提高。陈云同志多次教育财经干部“要同钞票作斗争”，他说：“接触财钱物的机会越多，越要廉洁奉公，同每一元钱作斗争，个人不动用公家一无钱！”召开党的七大时。陈云同志提出共产党人要努力做到，“诚恳，坦白，谨慎，谦虚，不骄，不躁，不屈，不谄，不吹，不装，不偷，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说：这也是每一个革命干部努力的方向。陈云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真正这样做的。

陈云同志同时要求干部认真学习业务，精通业务，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他十分重视管理知识和技术知识，注意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他结交了很多科技人员、经济理论学者，经常向他们请教，如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副院长陈康白、留德化学家刘咸一、延安军工厂厂长沈鸿、化学家钱志道、经济学家丁冬放等。在技术人员座谈会上，他发起归队运动，号召一切有工业技术和学习过工业的同志回到工业部门来，以提高技术，发展边区工业生产。

1945年抗日胜利后，陈云同志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室接连召开了几次

例会。他向与会的财经干部历数了一年多来西北财经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告诫大家说：我们只是小康之家，用上各种力量才能过活，并不是财政贸易都平衡，已经好到中国外国少有的情况。从表面看，我们财政贸易都平衡了，但要了解，这种平衡是在垫入发行收益之后才达到的，有货币贬值部分。这一年多不像前几年那样紧急，只因发行不直接用于财政，能先投入生产和贸易，然后增加财政税收和积累。战争时期，我们不放弃通货膨胀这个解决问题的工具，但我们与国民党不同，我们不借此发特殊困难财，也不摧残工商业，我们是以发行调剂财政，扶助生产和贸易向上发展。西北人民力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又担负了财政金融方面的负担。我们许多同志就要离开西北，分赴各新解放区，我们为西北人民尽可能留下的只有这大体够一年用的家当。陈云同志这番话，使我们财经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使大家清醒地认识到，在成绩面前也不要沾沾自喜，必须奋发努力，为发展和壮大边区的经济而积极工作。

会议还讨论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边区内外的经济变化。陈云同志展望未来新中国成立之日，将是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展之时，那时财经工作将被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许多有战功的将军们将会来领导财经工作。他说，现在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应认识到，随着我们陆续解放一些大城市，财经工作愈来愈繁重，要始终保持革命传统、优良作风，兢兢业业，不断学习，克服前进中一切困难，努力工作。西北这些财经干部，以后在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中，在全国解放后，都会到新的岗位，担负起一定任务，应虚心向各解放区同志们学习，向其他战线工作的同志们学习。

1945年9月15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陈云同志与彭真、叶季壮、伍修权、段于俊、莫春和等同志一起，乘飞机赴东北。他行前嘱咐我们，由西北财经办事处迅速组织十多名财经工作干部，轻装快马，赶去东北。至此，陈云同志结束了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

（作者曾任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学习陈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综合 平衡的思想

詹武

坚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陈云同志成功地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宝贵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在同中国实际结合中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

一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和综合平衡 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的重要优势

马克思说：“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工厂内部是有计划的，但从整个社会来说，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不可能有统一的计划来指导生产，社会生产所要求的比例性，是通过比例不断遭到破坏而实现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只有经过一系列的波动方能达到。”资本主义世界不断出现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每次都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就是上述比例不断遭到破坏出现波动的典型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纷纷进行“修补”，企图阻止生产过剩危机的继续出现。但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1989年首先从美国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是“二战”以后50年中的第9次，而且西方国家舆论承认这次是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恐慌”以来危机持续时间最长、烈度最严重的一次。转入“复苏”后，又表现出“复苏”进程缓慢而又乏力，未能出现“繁荣”阶段。一些西方专家越来越担心另一次经济危机可能正在开始。

同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计划和综合平衡自觉地来安排比例关系，从而能够正确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基本规律，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快速地发展。在党中央领导下，在陈云同志具体主持或参与下，我国“一五”计划、1963年—1965年调整 and 改革头6年这三个时期，就做到了宏观经济综合平衡而微观经济又比较活，使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优越性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

陈云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有两类客观规律：即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市场规律。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只注意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基本规律，忽视市场规律。陈云同志在1979年说：过去计划工作制度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二是只讲市场规律，忽视有计划、按比例的基本规律。陈云同志在50年代多次讲过：“按比例发展的法则必须遵守的”。“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他在1988年10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又说：“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

套。”

二坚持综合平衡是达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基本手段

50年代初，斯大林曾提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使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把编制的五年计划、年度计划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混为一谈。然而，斯大林没有提出如何才能使计划工作能正确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具体方法。而从50年代初起，陈云同志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并进行成功的实践，具体地解决了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达到使国民经济计划能比较充分地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经济规律和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快速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一，用综合平衡来验证是否按比例。陈云同志说：“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电会是合比例的。”又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

第二，用按比例和综合平衡来检验速度是否适当，并使速度与效益统一起来。过去，我们订计划时往往不是先研究客观条件和实际的可能。而是主观地先订出几个远景指标，然后根据这个指标来安排整个经济计划。这种不从实际出发的计划方法和高指标，陈云同志一向不赞成。他主张把计划指标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他认为速度必须建立在几大平衡的基础上，才是适当的速度，才能实现，也才能持久。他也认为，只有按比例发展，才能取得最快的速度 and 最好的效益。

用综合平衡来体现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规律这一论点，列宁早在本世纪20年代就已经原则地提出来了。他说：“经常的、自觉地保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可以说，陈云同志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与实践，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条件下，对列宁这一论点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

三实现综合平衡的主要原则

陈三同志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几条必须遵守的原则：

（一）全面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尤其要重视作为基础的财政平衡以及基本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

陈云同志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要实现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三大平衡。1950年3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仅仅半年时间，就能够把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延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一举停上，实现了全国物价稳定，创造出震惊中外的奇绩，就是靠的从宏观经济上实现了这三大平衡。后来，陈云同志又提出外汇收支平衡，就是现在所说的四大平衡。

在四大平衡中，财政平衡是基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国力相适应又是关键。陈云同志说：“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

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五年财政收支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的状况，从正面证明了这点。一九五六年，由于财政上有了赤字，物资供应就不平衡，又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在80年代中期，李先念同志说过：过去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就是财政挤银行，财政有赤字了，就向银行透支。一透支，就增发票子，这就会引起物价上涨。这段话更加证明了陈云同志重视财政平衡基础作用的正确性。

在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中，保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国力相适应又具有关键性作用。陈云同志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反复强调基本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改革以后的1979年他又说：“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所以，根据三十年来的经验，找出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这一条杠杠，是必要的，这样才是实事求是。”他还说，“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不可能，……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⑪

（二）要按短线平衡。

陈云同志说：“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即把最高产量的某种产品作为标准，其他的都要向这个标准看齐——作者注）。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⑫

陈云同志创造性地提出要按短线搞综合平衡。实践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

（三）要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要瞻前顾后。

陈云同志主张搞综合平衡时，从横的方面看，要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全面考虑各个部门的内部平衡和相互平衡。以钢铁生产为例，不仅要计算钢铁内部的综合生产能力，而且要计算煤炭、电力、运输等部门的生产能力，这样才能定出可靠的计划指标。以往的教训是，既不认真考虑钢铁内部的综合平衡，更不认真考虑外部的综合平衡，这就不能不产生很大的盲目性。所以，陈云同志对钢铁工业部门的同志说，以后再也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内外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

陈云同志还从纵的方面看，主张瞻前顾后。他说：“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⑬

（四）不仅注意数量，还要注意质量和品种。

陈云同志说，他总是不主张单纯追求数量的高指标、重要的是品种和质量。这个论点的正确性，不仅被我国的历史所证明，而且也被外国的历史所证明。过去，冶金部门曾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搞综合平衡，只能先把数量搞上去，有了数量之后，再来搞质量，搞品种，搞平衡。陈云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开步走时就应该搞综合平衡，就应该把品种质量搞齐全。

（五）保证重点，照顾一般。

陈云同志主张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要突出重点。他常说，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突出重点，才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建设上可以缩短工期，经济上见效快，效益高。在此前提下，他还强调要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他

说：搞好综合平衡“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否则，“不仅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而且重点本身的发展也难以得到可靠的保证。”^⑭

四坚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的重要意义

第一，坚持综合平衡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快速发展的保证，是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环境的前提。否则，就会如陈云同志所指出的，将出现种种紧张和失控，出现反复和折腾，甚至出现“爆炸”。

第二，坚持综合平衡，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经验的结晶。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那样成功，主要就因为真正实事求是，从国情国力出发，特别注意了综合平衡。“大跃进”所以出了问题，毛主席也指出：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周总理60年代在陈云同志讲经济调整时，口述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改革以来特别是头6年，所以能成力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期，速度较高，效益又较好，物价总水平又较稳定，主要是因为改革中注意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又注意了宏观经济综合平衡。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初期就说过：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离开综合平衡，争速度、讲效益、谈改革，都会是事与愿违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和以后多次中央全会文件中都反复强调“必须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做到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各自平衡和相互之间的基本平衡”，都肯定了综合平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比之过去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重要性。

第三，坚持综合平衡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经济建设中的体现。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坚持综合平衡，就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是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出发，是使经济建设的规模与国力相适应。是使人们的经济活动基本符合了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总之，是使主观经济活动基本符合了客观实际。

第四，坚持综合平衡是经济工作指挥员的高度指挥艺术。综合平衡是一项伟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党以陈云同志为代表。在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又很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在更无先例完全没有经验的条件下，根据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不仅创造了一套综合平衡理论，而且指挥广大干部群众在建国以来较长的几段历史时期内，成功地实现和保持了综合平衡，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实现了高速度和高效益的统一，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高速发展的良好局面，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度的指挥艺术。是值得全党同志认真学习和继承的一份宝贵财富。

（作者曾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

注释

《马恩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368页。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5页。

《陈云文选》第2卷，第241、242页。

⑪⑫⑬⑭《陈云文选》第3卷，第56、367、211、52—53、264、265、211、54、137页。

《列宁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66 页。

远见与运筹 ——陈云在新疆培育红军 技术人才纪实

吕黎平

193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按照党中央指示，偕同滕代远、冯铨、段子俊和李春田，从苏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来到星星峡，同驻该地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主任王效典商定了接应在甘肃北部英勇奋战而失败的西路军余部的有关事宜。

星星峡，是新疆与甘肃省交界处连绵起伏的群山中间的一个峡口，是新疆联接内地的驿站与要道。从4月28日起，西路军左支队的幸存者就由红柳园沿着兰新公路陆续来到星星峡。白天，陈云、滕代远同志在村口迎接大家，晚上，就逐户看望慰问大家。我是随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黄火青、郭天民等于29日下午抵达星星峡的。陈云同志在村口同这批同志一一握手、热情欢迎。与陈云同志握手时，陈云同志仿佛若有所思，我急忙说：“陈云同志，我叫吕继熙，从瑞金出发时我是军委一局的作战参谋，黎平会议就认识您，并在您的领导下工作。”“啊！好像见过，瘦成这样皮包骨，能到这里真是不容易呀，好好休息，年青人容易恢复。”陈云同志关切地对我说。

随后，他来到我们住地看望大家，见同志们个个蓬头垢面，两颊塌陷，无精打采，疲劳已极，便心痛地说：“同志们，我现在要求你们做两件事。一是吃好饭，二是睡好觉，有什么话以后再说。”为了让大家改善伙食，陈云同志又让王效典就近购买了一批新鲜羊肉，还请盛世才派飞机空投食物和其他一些急需用品。

5月1日，陈云等同志在星星峡空场上召开了庆祝“5.1”国际劳动节大会。当全体人员集合，清点人数时，发现总人数不足400人。大家坐在地上面面相觑，一种不可名状的悲痛笼罩在每个幸存者的心头。

会场布置很简单，除了一张小桌、几条小板凳外，什么也没有。陈云、滕代远和军以上干部坐在凳子上。滕代远宣布开会后，陈云同志用庄严浓重的上海口音对我们说：同志们，中国革命战争经历了十年从南到北漫长而又曲折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也有失败的时候，你们在甘肃北部，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战斗了几个月，在祁连山极端困难的自然条件下，英勇奋战到了这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天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我们应该为此而高兴呀，我向你们致以节日的慰问！今天到会的都是保存下来的革命人种，将来一定能在神州大地上再次燃烧起来，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我还要告诉大家，下一步要到省城迪化去。我们同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已初步建立了友好关系，在那里可以保存我们的力量，盛世才先生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但他是国民党委任的新疆边防督办，上将军阶，我们同他打交道，要有礼有节，保持清醒的头脑，谨慎从事。

到会同志听了陈云同志这番激励的话，奋发乐观的革命精神重新振奋起来，消沉悲观的低落情绪一扫而光。

在离开星星峡之前，陈云同志委托王效典继续收容零散人员，另外，又派人化装成商人乘汽车到安西至张掖，沿途寻找失散人员。

5月3日清晨，在新疆茫茫沙漠之畔的星星峡公路上，整齐排放着十几

辆由盛世才汽车兵驾驶的苏式大卡车，车箱里横放着几条可坐人的木板。西路军全体人员列队按顺序登车坐在木板上。坐汽车行军，对我们这批人来说，除了李卓然、黄火青等几位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以外，上自军长下至战士，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那股高兴劲就别提了。陈云同志站在一个车箱顶上，向坐在车箱里的人员宣布乘坐汽车长途行军应该遵守和注意事项之后，车队便出发了。汽车途经哈密、七角井、鄯善、吐鲁番、达板城，于7日傍晚抵达迪化。我们就驻在西河坝一个有围墙尚未开工的纺织厂院子里。

适应统战形势，稳定思想情绪

盛世才是个有很大野心的军阀。他于1933年夺取并掌握了新疆的军政大权，当上了新疆边防督办，成为“土皇帝”，为了保持在面积占全国1/6（160万平方公里）、人口400多万的省份的统治地位，而且不被国民党吞并，盛世才向毗邻的苏联送去秋波，请求援助。苏联政府为了有一个比较安全友好的漫长边界，在人力物力特别在武器装备上支援盛世才，在迪化建立了领事馆，同时派出顾问与教官为其组建了一个机械化旅，一个航空队，帮助培训飞行员和技术人才。盛世才为了报答苏联的支援，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由于这种关系，陈云同志由苏联抵迪化后，立即通过苏联领事馆与盛世才沟通联系，经过双方面谈，盛表示他的六大政策中的“亲苏”亦包括对中国共产党友善友好，同意西路军进驻新疆迪化，并派汽车接运，在人力物力上予以帮助。这样便有了开头说的我们比较顺利抵达迪化的情形。

我们在纺织厂院内住了四五天。陈云同志与盛世才商谈驻地、番号、服装和其他问题。我们则大搞清洁卫生，维修武器，恢复体力，了解民情风俗。迪化是省会城市，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较多。当时全市有5万多人口，对我们这批红军战士来说，还是头一次进驻这么多人口的省会。为了不公开显露红军的身份，盛世才提出部队须改换同他部队一样的服装，对外称“新兵营”。经商议，陈云等同意了盛的意见，并下达了改换服装的指示。我们一听思想就不通，有的甚至怒发冲冠地说：“我们在长征路上，在河西走廊，不正是同头戴青大白日徽章帽子的国民党军队殊死拼杀过来的吗？现在要我们同敌人穿一样的服装，岂不变成了国民党军队，这怎么行呢？”抵触情绪很大，执意不换。陈云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耐心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军队的性质不在于穿戴什么样的衣帽，而在于组成这支军队的人树立什么样的思想，信仰什么主义，受何种性质的政党、政府领导和指挥。现在我们住在迪化，同陕北苏区不能一样，如果仍穿红军衣服外出上街，不仅老百姓看了奇怪，盛督办也不好解释和向其上级交待呀！现在改换成国民党军队的着装，从表面上看似乎成了白军，但我们的信仰和奋斗目标没有变，仍然是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消灭剥削阶级，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民主革命。我们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过去一样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一句话，红军的本质与宗旨完全同过去一样，没有变！经过陈云同志这番说服教育之后，我们敞开心扉进行了认真讨论，一致认为陈云同志说的在理，表示愿意改换服装。大家很快就把红丰衣服脱下保存起来，改穿新的国民党军装。

5月中旬，西路军左支队抵迪化的全体人员移驻东门外比较宽敞的平房营院里，这时从甘北又收容了近100人来到迪化，共计达480多人，这些人分别来自二十军、总指挥部机关和五军3个部分，其中一方面军的约70余人，干部有100多人，但都没有成建制的单位了，针对这种情况，陈云、滕代远与西路军原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商讨之后，确定首先进行组织整顿，重新建立行政与党的组织，混合编队，名称：西路军总队，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大队。以大队为单位成立党支部，总队成立党总支，总队设总队长、政委各一名，由师职干部担任。大队下面设大队长、教导员各一，由正营职干部担任，接三三制编排、班，每班10人左右。余下60多名连营团干部编成干部队（我被编在于部队），设队长、政委各一；10多名师职以上干部单独成立一个党支部，归中央代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行政、党的组织建立之后，开始了正常的党组织生活，由于大家出身经历、职务、文化程度、认识问题的水平与方法不同，因此暴露出不少思想问题。特别在师以上高级干部和干部队支部中，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问题：一是普遍急于去陕北苏区，再同敌人干，只要没倒下，就要继续战斗，以报在甘北惨败之仇；二是对张国焘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陈云同志参加了这两个支部的支委会，听取了汇报，又抓紧时间找30多位团以上干部个别谈话，了解每个人的思想脉搏。在摸清底细，心中有了谱之后，有针对性的进行个别疏导。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党中央于3月下旬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陈云同志也没有与党中央直接建立无线电联络，而是经过迪化领事馆—苏联政府—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电报往返很慢。因此，他只是向中央报告了接应西路军到迪化的情况，请求指示。中央回电说，因没有与国民党当局谈妥，暂时不能返回延安。对批判张国焘这样的党内问题，没有也不便在电报中涉及。对同张国焘的路线斗争问题，陈云虽然明确站在党中央的立场上（对黄火青和干部队个别同志表示过），但因尚未接到中央的指示，故采取了很慎重的态度。为了避免发生对立，引起思想混乱，陈云同志没有展开争论，而是从正面进行引导，稳定思想情绪，强调：要坚信党中央在适当时机正确处理这一党内问题的，当前在迪化这个环境里，要讲团结，不搞内哄，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以大局为重。陈云同志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说：现在国内形势很好，三大主力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后，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数量扩大了，苏区发展了，打了10年的内战也基本停止了，国共两党正在谈判第二次合作的问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向华北继续侵犯，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人民抗日救国的情绪一天比一天高涨，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要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枪口应该一致对外，国共两党的军队应化于戈为玉帛，以抵抗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至于在甘北西路军失败的那段往事就不要老惦上心头了，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古今中外的军队都没有百战百胜的，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你们用两条腿同数倍于己的马家军四条腿的骑兵浴血奋战了近半年，不屈不挠，克服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高寒山区气候，40多天没有吃一粒粮食咸盐，尚能跋涉千里冰山、百折不挠的战斗到了新疆。这在世界军队战史上是罕见的悲壮奇迹！同志们不仅不应灰心丧气，而且应该为之自豪！

通过陈云等同志个别谈话和支部解释说明、会议鼓励等一系列思想政治

工作之后，大家的情绪逐步稳定下来。

抓住机遇向文化大进军

根据党中央暂不能回陕北的指示，陈云、滕代远与西路军的军以上同志商定，应利用这一难得的和平环境，抓紧时间学习文化、政治和军事课程。

5月下旬，在组织健全、思想稳定之后，陈云同志不失时机地向全体指战员作了向文化大进军的动员报告，他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短朗内我们还不能回陕北去，为了不浪费宝贵时间，全体同志应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进行学习。学习什么呢？在座的400多位同志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的青年，在家读不起书，参加红军以后又接连打仗、行军，没有机会学习，至今绝大多数同志的文化程度很低，还有相当一部分文盲，将来的红军为了战胜敌人、打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必须装备先进的武器，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就需要有文化知识。文化课好比是一把开门的钥匙，没有起码的数学物理知识，就进不了军事技术这一科学大门，不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就好比瞎子走路，会迷失方向。所以，大家要安下心来、下苦功夫学习文化知识，掀起学习高潮，每天用半天时间学文化，半天时间学政治，军事课程。

大家听了陈云同志的动员和课程安排之后，虽然都表示拥护，愿意学习，可是一进教室，每天听讲、写作业七八个小时，就静不下来了，一大堆难题涌上心头。原来，我们这些十几岁参加红军的青年人，自从背上钢枪之日起，几乎不是打仗就是行军，不停顿的战斗生活过惯了，短的4—5年，长的7—8年，用刀枪同敌人拼杀成了家常便饭，翻雪山、过草地经历了三次，长征行程短的万里，长的三万多里。总之，我们几乎天天都同敌人厮杀，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与死神打交道，对于“死”，习以为常，蛮不在乎，可是一坐在安静的学习室里就很不习惯，转不过弯来，觉得拿笔杆子比拿枪杆子还重，宁愿与死神打交道也不想用笔杆子学文化。

陈云同志发现上述思想情况后，没有直接批评大家，而是出了几道题目让大家讨论：暂时不能回延安我们在这里该干什么？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靠枪杆子就够了吗？笔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克服轻视笔杆子（文化、理论）的思想？怎样摆正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关系？对这些问题以支部为单位进行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经过两三天专题讨论，大家基本上统一了思想，求得了共识。

向文化进军的“拦路虎”解决之后，各大队学习热潮才真正掀起来。文化学习以大队为单位，按照每人的文化程度编成高小、初小、文盲班。教员是能者为师，全总队统一挑选配备。黄火青、郭天民、冯铨、段子俊和干部队几位无线电老手王子刚、刘寅、荆振昌、汪铭震、刘琦、王玉衡等同志都分别担任高小班的语文、数学和物理课，我这个仅读过两年半私塾的还担任三大队初小语文课呢！从6月到10月，我们从不愿进教室到要赶出才离开，学习上确实有了很大收获。文盲班可识3000字左右，能看懂报纸了。

军事课，主要是在早上进行操练，从单兵到连的攻防战斗。有时集中1—2天搞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凡在红军学校学过的都担任教员，郭天民是最高级教员，因为他是黄埔军校毕业。

政治课，主要学习《共产党宣言》、《论列宁主义几个问题》等经典著作，以及从鸦片战争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帝国主义侵华史。滕代远、

黄火青、冯铨等都担任过各大队的政治教员。干部队和师以上干部的政治学习由陈云同志亲自抓，他要求有阅读能力的同志要认真读几本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我们每周要向陈云同志汇报学习情况，谈心得。他通常不用讲课方式，而是让我们提问题，他联系实际给以回答，加以引导。例如，对于列宁为什么说“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斯大林为什么说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陈云同志是这样给我们解释的。他说：列宁 1917 年领导俄国无产阶级 10 月革命，首先是在彼得堡用武装暴动推翻沙皇政府，然后夺取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在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暴动都失败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们在南昌、广州搞的武装暴动也失败了。这证明照搬俄国城市暴动的道路行不通。但毛泽东同志在湘赣边境乡村发动农民搞秋收起义，朱德同志带领南昌暴动失败的 800 多人转入农村打游击，发动湘南农民暴动，然后带领这支队伍与毛泽东的秋收暴动部队会合上了井冈山，发展农村武装力量，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创建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以后，临叫中央来中央苏区，博古、李德犯了“左”的路线错误，导致反五次“围剿”失败，我们才被迫放弃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中央红军主力实行大转移。行至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反五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纠正了“左”倾路线错误，在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扭转了局势，长征到达陕北苏区，站稳了脚根。这证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发展的道路才能取得胜利，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同时，党必须领导与发展武装力量才能夺取政权，这是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共同规律，枪杆子是革命的命根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放弃武装斗争，使成千成万共产党员人头落地的教训，千万不可忘记呀！

在陈云同志言传身教下，西路军总队通过军、政、文学习，队开始的溃不成军，变成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部队。这支军队身经百战，纪律严明，礼貌待人，作风优良，树立了深得人心的形象。迪化城乡人民都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新兵营”已成为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佳话。

远见卓识培育技术人才

在我们的学习走上正轨以后，陈云同志自己亦抓紧学习，为了解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具有贪婪无厌的侵略野心，他每周抽出二三个半天到迪化图书馆阅读日本自 19 世纪 60 年代明治皇帝开始维新变革到 1931 年 9 月 18 日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发展与侵华史书资料，前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陈云同志根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实际情况，结合他看的日本发展史书上的体会，在干部队作了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他说：1867 年日本明治皇帝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农村仍保留封建生产关系，形成地主与资产阶级上层联盟的天皇统治，不象法、美等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彻底。因此，日本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加上它是岛国，资源缺乏，更具有侵略性，胃口很大，妄图侵吞全中国。它与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结成同盟，成为法西斯主义。季米特洛夫说过：“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现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各族人民下愿做亡国奴、坚持抗战到底，直至把日寇驱逐出去的决心是

坚定不移的。因此，抗日战争是一场残酷、长期的战争。我们必须从困难着想，作长期打算，不应有短期求胜和侥幸心理。陈云同志谈到“七七”事变后日军为什么进展那么快，国土大片丧失时说：除了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腐败外，日军仗着其飞机、装甲车、大炮、汽车等机械化装备的优势和武士道精神是一重大原因。我们要战胜侵略者，除了发挥政治思想的优势，光靠现在的轻武器是不够的，也需要有飞机、大炮、装甲车等技术兵种，“以牙还牙”。我们现在就应考虑着手培训这种人才，因为训练一名飞行员、一个装甲车驾驶员、一个熟练的火炮手，不像训练一个步兵几天十几天就能打仗，而是需要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如果这里400多人每人学会摆弄一两件机械化武器，将来回到八路军，每人再带会十个八个人，如此传带下去，就会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我们的技术兵种下就建立起来了么？我们过去在反五次“围剿”和长征途中，在蒋介石的大炮、飞机轰炸下，牺牲了多少同志啊！王稼祥、叶剑英、贺子珍身上下就有飞机炸弹片么？从长远的观点看，像我们这样幅员广大，边界、海岸线长达数千里的国家，一定要建立空军和海军，陆军也不只是步兵，还应有其他技术兵种，这样才能战胜侵略者，保卫国家的领土、领空、领海的安全。

听了陈云同志的讲解、漫谈，我们深为他远见卓识的建军思想所折服。

陈云同志在同我们谈建设技术兵种的同时，利用与盛世才的定期会晤，以及从苏联顾问那里摸底，知道盛的机械化旅有装甲车、汽车、火炮各一个营的装备。旅长虽是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骥，但他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思想比较进步，对苏联和我党均友好，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培训。我们拟定培训技术人才的方案，首先得到苏联总顾问巴宁中将的支持，随后再与盛世才协商。盛基于对我党亲善方针和已宁将军的促进，也就表示同意。通过一番细微的疏通说服工作，陈云同志的设想成为现实。当即决定一、二、三大队共200多人学开汽车，先在课堂上学发动机原理，后学驾驶技术。第三大队在学会开汽车后再学开装甲车。第四大队学习火炮。装甲车、火炮技术的培训均由苏联教官担任，汽车技术培训则由盛世才的教官担任。

针对大家不懂发动机传动运转原理的情况，陈云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他确定先从学会骑脚踏自行车开始，并买了几辆自行车，要各大队每天到操场轮流学习。陈云到现场指导说：从骑两个轮子的自行车（当时用苏联造的自行车，全是脚闸，没有现在的灵巧）开始，再到驾驶四个轮子的汽车，从慢到快，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大家先在平坦的操场上由教员指导上下车练习，稍会以后，又到有坡度的道路上，快的二三个小时就学会了，慢的四五个小时也能单独骑了。经过半个多月，再学习汽车构造原理，10月份便开始实际驾驶。学火炮的第四大队亦分炮的构造、射击原理、实弹射击等几个阶段，逐步学习。大家都称赞陈云同志由简到繁的学习方法好。

为了发挥干部队中五六名搞过无线电工作的同志和两位医生的才能和积极性，陈云同志又抽调出20多人组成无线电训练班和近10人的军医班，还选派了几名同志到盛世才的兽医站学习，以适应发展我军骑兵的需要。

向技术进军以后，学军、政、文的时间比例就倒过来了，半天学军事技术，半天学政治、文化。致此，在陈云同志的精心组织下，西路军总队成了中国红军第一所多兵种的军事技术学校。

创建第一支航空队

各大队的技术学习进入正常后，陈云的精力就转到筹建航空队的问题上来了。

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陈云同志把我叫去，我刚踏进他的办公室，他第一句话就问：“吕继熙，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呀？”因为陈云同志在长征途中任军委纵队政委时，对我这个小作战参谋就有印象，到了迪化，我被指定任干部队支部书记，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又个别谈过话，他对我的思想和经历均一清二楚，所以，我同陈云同志说话毫无拘束。看着陈云同志亲切的面容，我直截了当地说：“一是不愿到盛世才那里工作，因为我从农村参军，没有在城市做统战工作的经验；二是愿意回延安，要求到抗日前线打仗，不愿继续做参谋工作。”

陈云同志听后，面带笑容地说：“把你留在迪化学飞行怎么样。”这个安排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经过短暂的思考后，我说：“自己的文化程度很低，能行吗？”“你不是学习了半年吗，现在中文没有问题了，数学、物理虽未达初中毕业程度，但可以一边学习一边继续补习嘛，‘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两万五千里长征和祁连山那样险恶的环境都战胜了，难道数学、物理水平稍低的困难都没有勇气克服吗？”在陈三同志的激励下，我明确表态：“服从组织决定，不负党的期望。”

陈云同志听了我的表态后，继续说：“我从苏联顾问那里了解到，盛世才航空队现在共有15架飞机，其中6架是初级教练机，另9架侦察轰炸机亦可作教练机。苏联教官已帮其训练了两批飞行员和一期地面维修人员，准备明年开春再培训一期飞行、机械人员。现有苏联飞行教官2人，机械、领航教官各1人，下期能训练飞行、机械各30人左右。据此，我同盛督办多次商谈交涉，请他的航空队下期为我军培训50名空地勤干部。他最后总算答应了，但名额要略少一点，飞行25名，机械20名，基本满足了要求。我考虑培育我党第一批航空种子，除了文化程度外，政治条件要高一些，要清一色的共产党员，连到团职、经过战争考验的红军干部，年龄20岁左右。我正开始从这400多人中物色人选，今天找你来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你要有带领一部分同志留在这里学航空的思想准备，而且要有比较长期在新疆的打算。盛世才在答应我的上述要求时，向我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他的飞机不多，要求我们出面请苏联再援助几架比较先进的飞机，用于代培共产党的飞行人员；二是，这批飞行机械人员毕业后，不要马上回延安，要他们帮助航空队把军成建立起来，因为他训练的头两批飞行员都是学生出身，怕死不愿意打仗；三是，要求我们派一批得力干部在新疆工作，帮助发展文化教育，整理财政经济，卫戍边防。盛世才的算盘还是打得蛮精的，不过，这三条我看都可以答应。第一条，苏联现在的航空工业比较发达，再支援几架飞机和器材设备，估计不会有很大困难，我已答应联系，设法解决。第二条，你们学两年毕业了，预料我们也还不具备建立自己空军的条件，在他这里既可继续提高技能，又满足了他的要求，也做了人情，一举两得。第三条，我已找了几个同志谈话征求意见，但需要报请中央批准才行。在目前形势下，这三条有利于发展同盛世才的合作关系，又不丧失原则。经过新疆到苏联建立一条国际通道，这对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和加强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都极为有利。若把航空队也在这里建立起来，那么，西路军到这里的400多人就都能利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机械化装备和聘请来的教官，学到一门军事技术，这比去

苏联学习更加便利。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现在不可能力我党培训成批的军事技术人才，尤其象训练飞行人员这样的人才。我们利用与盛督办的统一战线关系，用“借鸡生蛋”的办法而培训航空技术干部，何乐而不为之？”陈云同志这番深谋远虑的话，使我深感折服。

末了，陈三同志对我说：选派一批红军干部在新疆学习航空的问题，是件大事情，还要请示党中央批准之后才能组织实施。今天先和你打个招呼，回去还要继续抓紧补习文化，特别是数学、物理，等候通知吧。

陈云同志同我谈话之后，又找各大队的干部调查摸底，物色学航空的对象。经过逐个了解，在全总队内定了30多人。

陈云同志于11月27日奉党中央指示，同玉明、康生一道乘飞机去延安。他临走前，又找我交待：有关学航空的问题，待我回延安请示党中央、毛主席之后才能定下来，这里的400多人绝大多数是红四方面军的，考虑这是我党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队，应有各个方面军的同志组成比较合适，准备再从延安挑选20多人来这里学航空。这项工作，今后由接任的党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直接领导，以后你听从他安排。

陈云同志回到延安以后。很快把同盛世才谈妥的在迪化为我党培训飞行、机械人才的方案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当即得到批准。接着，陈云同志亲自到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挑选20余名红军干部，对他们进行面试：用读报纸的方法测验其文化程度，用听怀表音响和下象棋的方法考查其听力和智力，然后，进行体格检查，选定18人，名单电告邓发。

这18位同志于1938年1月8日动身，出发前，陈云把他们集中到中央组织部，勉励大家要刻苦学习航空技术，圆满完成学习任务，并指定曾任过骑兵团政委的严振刚带队。这批人途经西安、兰州，于2月28日抵达迪化，3月10日，进入航空队，与先前入该队的25名同志合编为飞行、机械班，由我和严振刚分任飞行、机械班长。其中，飞行班25人，机械班18人。两个班台编为一个党支部，我为第一任支部书记。在这43人中，有一方面军的16人，二方面军的2人，四方面军的24人，二十五军的1人。参加长征的4支红军都有入学航空，体现了五湖四海。因为这一期飞行班只有一名盛世才的人，机械班也是我党的人占绝大多数，所以，这可以说是我党建立的第一支航空队。

陈云同志倡导创建的这支航空队于1938年3月在迪化开学，本来有两年即可毕业。但由于盛世才1939年在苏联晋见斯大林时提出的一个庞大的武器援助清单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从此开始与苏联、我党的关系冷淡；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形势吃紧，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处在艰难阶段，鼠目寸光的盛世才认为苏联与中共均靠不住，要垮台了，就更加疏远我党，经常对我们进行刁难，借故停飞，致使机械班于1939年冬毕业，飞行班在中央第三任代表陈潭秋的积极交涉与斗争下，克服重重困难，延至1942年4月才毕业。飞行班每人飞行300小时，1000多个起落，飞过四种飞机，成为我党第一代飞行员。同年夏，盛世才背信弃义，公开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把我党在新疆的全体人员打入囹圄。1946年6月，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的营救，张治中将军答应无条件释放我们，并护送回延安。以后，这支航空队成员在东北老航校和建国后的空军建设中，均成为骨干力量。

回顾58年前陈云同志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在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积极倡导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总政策的启示下，同新

疆盛世才首先建立了一个省范围内的统一战线，利用苏联援助的有利条件，卓有成效地培育红军技术人才，深感其决策的英明和正确。这是对我军技术兵种建设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对我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深远意义。当今天下并不太平，剥削压迫还存在，霸权主义还存在，战争根源还存在，战争的因素还存在。我们要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居安思危，把提高军队素质，装备高精尖端技术武器，摆到战略地位。陈云同志在红军时期关于加强培养技术兵种人才，提高干部素质的思想，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作者曹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记“文革”中陈云同志 在江西的日子

肖华光

写在前面的话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很多人蒙受了莫须有的罪名。陈云同志被戴上了“老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受批判，被罢官，还被以战备为名，疏散到江西去“蹲点调查”。这次“蹲点调查”，不像过去党中央号召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剖麻雀，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是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为了改正自己的所谓“错误”。因此，进行起来特别困难，许多想调查的问题不能调查，想问的问题不能问，想去的地方不能去，调查也就不可能是系统、全面的。而且，整个“蹲点调查”过程中没有任何文字记录、没有一张照片。但是，我们仍可以从陈云在江西的近三年“蹲点调查”活动中，看到他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那种高度的党性原则，那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那种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127

限期离京

1969年10月，处于“接班人”地位的林彪，以战备为名，发布了所谓一号战备令，把在北京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王震等疏散到外地，并且限定在三日内离京。陈云被通知疏散到江西。为了尽快使这些人离京，通知说可以乘飞机走。

由于陈云有心脏病，不能乘飞机（过去出差到外地视察工作，都是坐铁路公务车），因此，我们即与中央办公厅联系坐公务车的问题。中央办公厅接电话的人答复说：如果坐火车去，就自己买火车票，没有公务车。我们问，如果自己买车票走，路上安全出了问题怎么办？接电话的人未置可否，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们只有如实把与中央办公厅联系坐公务车的情况，向陈云作了汇报。陈云听后要我们给他接通中央办公厅的电话，由他自己向中央办公厅说。我们给他接通中央办公厅电话后，就离开了办公室。过了一会，陈云要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们，他已与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说好，我们和王震同坐一节公务车去江西（王震也被疏散到江西），要我们赶快和王震处联系一下。我们与王震处联系后，商定10月18日动身。

火车经过两夫两夜的运行，于10月20日上午到达南昌。一位省革委副主任和省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到火车站，把陈云和王震接到省委滨江招待所住下。王震吃了一顿中饭，下午就坐车到江西抚州专区的一个农场去了（据说他是被下放到农场锻炼）。陈云则因长期住处还未确定，暂住在招待所。

程世清一席谈

当天下午4点多钟，招待所的一个工作人员急急忙忙来通知说，省委书记程世清来招待所看陈云。话音刚落，程世清就到了。我们对于程世清这种事先不打招呼，突然来访的作法，心里有些不快。看到他要和陈云说话，我们就离开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程世清走了。

第二天上午，陈云在院内散步时对我们说：昨天程世清来批评了我，他说我过去管经济没有管好，发展太慢。他说江西准备年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把国家现在每年进口的100亿斤粮食包下来（即国家不进口，由江西每年多向国家上缴100亿斤粮食）。我问他江西有那么多钢板吗？如果江西每年多向国家上缴100亿斤粮食，剩下的粮食还够江西老百姓吃的吗？他说江西有办法解决。我没有问他用什么办法解决，因为我知道这是根本做不到的。真是军管经济，胆干好大啊！以后的事实果然验证了陈云同志的话。

南昌郊区青云谱干休所

1968年8月，中央办公厅曾安排中央一批老同志到8341部队支左的工厂蹲点调查，陈云当时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陈云到江西后，周总理亲自给江西省委打电话，说了两点：一是陈云身体不好，住的房子，一定要有暖气；二是陈云在北京时已在工厂蹲点，到江西后还可以继续到工厂蹲点调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江西省委曾考虑让陈云住在南昌市，找一个工厂蹲点调查。但请示中央办公厅后，据说中央办公厅主任指示说，为了保密和安全，陈云要尽量少接触群众，所以，省委才又研究决定陈云到南昌郊区育云谱干休所居住，并就近到离干休所约二华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由于干休所的房子没有暖气，省委行政部门又临时在干休所的房子里安装了暖气。

在准备搬到干休所住以前，我们去看了一下。当时，干休所已在每个房间准备了木床，木椅和桌子，还在陈云的房里放了两个旧的单人沙发，厨房有一个泥做的灶台，还有一张旧的小木桌和一个小木条凳，但别的东西就没有了。我们把看到的情况向陈云作了汇报，并说，今后要在那里长期单独生活，还要购置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如：锅、碗、盘、勺、刀等等，这些东西按制度规定是可以报销的。陈云听后说，“不必到机关报销了，我看买这些东西也用不了多少钱，我还出得起，就由我出好了。”他又说：“现在情况不同了，我是被疏散到江西来的，你们是随我来的，再说我们何时能回北京还很难说，买东西的钱就由我出，就这样定了，不必再说什么了。”说完就从提包内取出一百元钱交给我们，又问我们钱够不够，不够再到他那里拿。我们拿了钱，从省委机关借了一辆三轮车，到南昌街上跑了好几家商店，总算买齐了这些了西，一共用了80多元。这笔钱我们按照陈云的指示，一直都没有报销。11月初，我们随陈云同志从南昌省委滨江招待所搬到了青云谱干休所。

第一次去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

1969年11月12日上午，陈云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厂里的几个领导干部已等候在厂办公楼门口，陈云与他们一一握手，并笑着说：“我是

到你们这里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然后，来到楼上会议室，陈云首先自我介绍。他讲完后，由厂里的领导干部介绍化工厂的情况，说化工厂现在是属江西省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28团，厂里实行连（车间）、排、班（组）建制，全厂有1600余名职工，10个连队（车间），100多个班（组），主要生产化工炼油设备。陈云听完后说，我要逐个连队、逐个班（组）蹲点，参加班（组）的生产会议和政治学习会。随后，陈云同志由厂领导干部陪同参观了厂的各个科、室。

严守制度，深入调查

化工厂是每天上午8点上班，陈云同志说他绝不能迟到。因为住地离化工厂还有两华里，所以，每天早上6点多钟就要起床做准备。冬季天亮的晚，6点多钟天还没有完全亮，所以，只能摸黑起床。穿衣、洗漱、吃饭，8点刚好赶到工厂。这样的快节奏，连工作人员都感到紧张，但陈云从1969年的第一个冬季，到1972年的第四个冬季，都是这样摸黑起床去化工厂，一直坚持下来了。

本来，陈云同志给自己规定的时间安排是，每天上午在化工厂调查，下午在家休息和看书。而实际上，在化工厂的时间大大超过了这个规定。例如，他经常下午到厂里各车间看看，和工人谈心。有的班搞技术革新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他晚上也经常去参加。熔化炉炼铁的开炉时间都是在晚上，陈云在熔化班蹲点时，就经常晚上到熔化班看炼出的铁的质量，并在炉旁和工人探讨如何提高炼铁的质量问题。

陈云在化工厂蹲点两年7个月；参加的班（组）会达数百次之多。其间因事因病不能去工厂时，都事先请假，严格执行厂里规定的制度。

“北京来的客人”和“老首长”

当时，省里为了保密，不让外人知道陈云同志在江西，对外称陈云为“北京来的客人”。对于休所说，有一位“北京来的客人”要到干休所住。对化工厂说，有一位北京来的客人要到化工厂蹲点调查（有少数领导干部知道这个“北京来的客人”是谁）。化工厂对车间、班里的交待也是这样：“有一位北京来的客人要到化工厂蹲点调查。”还说：“北京的客人有右倾错误，但还是中央委员，你们要注意他的安全，平时要向他宣传毛泽东思想。”

陈云同志为了和家人通信方便，也给自己另外起了一个名字，叫陈元方。元、方两字是从他两个儿子的名字中各取的一个字。

但是，当陈云到班（组）后，有的工人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所谓的“北京来的客人”，原来就是以前的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怎么称呼呢？称呼“陈副主席”、“陈副总理”不行了，可也总不能叫“客人”吧！所以，开始几天，工人见了他只是点点头，不说什么。有一天，工人听到警卫人员叫陈云同志为“首长”，受到启发，就在“首长”前面加了一个“老”字，称呼陈云同志为“老首长”，以表示更加尊重的意思。于是，“老首长”这个称呼就在整个化工厂中传开了，职工见到陈云就说“老首长好”。

签字风波

1969年12月，厂里给每个职工都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在陈云同志蹲点的木模班的政治学习会上，有的工人拿着语录本请陈三签字。陈云说：“我可是犯错误的干部。”工人说，签字留念没有关系。在工人的一致要求下，陈云用铅笔在他们的语录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签字日期。工人们很高兴，当学习会结束时，都自动站在门口欢送陈云。

1970年1月，厂里年终总结评比时，发现木模班的工人请陈云在毛主席语录本上签字的事，认为是违犯规定，错误严重。不过，经过了解，厂里要求陈云签字是自发的，没有人组织，所以决定每个人只要检讨，承认错误，把签字的语录本上交就算了，可免于处分。但是，有一个工人偷偷的保存了一本有陈云签字的《毛泽东选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厂里把这本《毛泽东选集》照了相，保存了起来。

谈笑风生，平易近人

陈云在化工厂蹲点时，没有一点架子。在铸工车间蹲点时，有一个老工人见到陈云来了，马上弯腰，一手按着膝盖，向陈云行旧时的大礼，陈云也连忙弯腰与老工人握手，并头碰头。这样平等待人的场面，工人看了都很感动。还有一个老工人师傅，身体胖而结实，陈云握着他的手说：“老师傅，你满脸红光，见人总是笑呵呵的，可以活到100岁。”说得一旁的工人哈哈大笑！陈云有时坐汽车去南昌市，在路上，只要遇见化工厂的人，他都要司机把汽车停下，让他们上车。在锻工车间蹲点时，陈云看到一个老工人突然不说话了，每天只顾埋头干活，就走到他身边问他：“老师傅，最近有什么事吗？”老工人看到“老首长”这么关心他，就说：最近，厂里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有人诬告是我写的，我说不是，可别人不相信，厂里要我反省，还有人说我是现行反革命，我很害怕，不知该怎么办。陈云听后对他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最后问题总会弄清楚的。老工人听后，心里感到踏实多了。不久，厂里查明反动标语不是这个老工人写的，是厂里一个小孩子写着玩的。当这个老工人再次见到陈云时，满含热泪地向“老首长”表示感谢。

陈云同志每换一个蹲点的班（组），一开始时总要逐个问工人的姓名、年龄、籍贯、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等，下次见面，他就能叫出每个工人的名字。陈云曾在锻工班蹲过点，三个多月后又到锻工班去，发现少了一个工人，并马上说出了那个工人的名字。大家都感到惊奇，有的工人就问陈云，你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陈云说，这大概是由于过去长期在自区做地下工作，为了保密，很多事，特别是人名都只能用脑子记的关系。另外，要做群众工作，带领队伍，叫不出人家的名字，怎么行呢？他说，他在延安当中央组织部长时，能记1000多个干部的名字。

身陷逆境，不忘工作

陈云同志在化工厂“蹲点”，按上面的意思，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因此，他很少说话。但只要有可能，还是发表意见，向工人宣传正确的道理。例如，他在容器车间蹲点时，一次在班（组）会上说，我参加你们的生产会，感到你们的会开的比较好。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工厂只闹革命不搞生产，

经济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

在金工车间中车班蹲点时，他发现金工技术要求比较高，如果技术不过硬，容易出废品，但班里的学习计划表上却没有安排生产技术课。于是，他向班长建议，每周至少要安排两次生产技术课，让工人自学规定的技术课本，请厂里技术人员来讲课。班长接受了陈云的建议，每周安排了两次生产技术课。

陈云在容器车间蹲点时，看到地上有许多烧过的电焊条头，就和班长说，这太可惜了，应当收起来加工成铁链条用。我们国家还很穷，处处都需要注意节约，节约是我们国家建设的法宝。

对于工人们提出的一些思想上的问题，陈云同志也总是尽可能地给予解答。例如，在金工车间班（组）政治学习会上，有一个工人问，36元5角的工资我已拿了十几年了，何时能加工资呢？陈云说，现在各个行业都是低工资，这是根据我们国家的财力物力情况决定的。我们国家还很穷，有很多人要就业，如果生产没有发展，加了工资，物价就要上涨，加的钱也不能抵销。所以，现在还不能增加工资。

工人爱戴陈云

陈云在木模班蹲点时，曾给班长写过一张便条，说明自己最近要到南昌郊区农村去一段时间，了解农业生产情况。班里知道后，不顾风险，专门为陈云同志做了一个帆布小折椅，送给他用。以后，陈云在车间蹲点时也随身带着这个小折椅，走累了，就坐在小折椅上休息一会。有时，他坐在这个小折椅上与工人谈心，或者给工人讲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陈云说：“我要把这个小折椅带回北京去，告诉毛主席，这是工人师傅给我做的。”

和陈云同志相处了一段时间，工人们很自然地产生了对他的爱戴之情，处处照顾他。陈云每次到班里参加班（组）会，工人都自动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冬天下雪，工人就自动把车间门外的雪扫干净，等候陈云的到来，有的还在门口迎接。陈云在机电班蹲点时，政治学习会有时在职工宿舍开。冬天很冷，职工宿舍没有人烤，工人就请陈云坐到太阳晒得着的地方。太阳移动了，工人就请陈云也随着移动。

关心群众生活

陈云同志在化工厂蹲点期间，几次到工人家中访问。在金工车间中车班蹲点时，他到一个工人家访问。他用手抓一把米缸里的米，看看米的质量，又看看油瓶里的油有多少，还问工人有几个孩子，家里粮食定量够不够吃，说如果粮食不够，他可以叫人把自己的粮食送些来。工人当然没有要陈云的粮食，但对陈云这样关心工人，很受感动。临走时，陈云对这个工人说，你已有两个孩子了，不要再生了。工人听了连连答应。

陈三同志非常重视食堂的工作，经常到食堂看看工人吃得怎么样，饭菜花样多少，价钱是否适宜。冬天里，他有时还用手去摸一下工人的碗，看热不热。他亲自用勺子打菜，看到菜里的肉多，价钱也不贵时，就连声说：“很好，很好！”

1970年5月，他在食堂蹲点时，向厂里建议召开一次炊事员座谈会，并

经厂里同意，在厂办公楼会议室里召开了这个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说：炊事工作很重要，如果食堂伙食搞不好，工人吃不好，身体不好，就会影响生产。革命战争年代，部队的炊事员克服许多困难，把伙食搞好，使战士吃得好，身体好，才能打胜仗。革命战争的胜利，有炊事员的一份功劳。陈云那慈祥的目光，殷切的希望，深深地感动了炊事员，大家提出了许多搞好伙食的意见。

陈云同志在化工厂蹲点期间还先后召开过老工人、复退军人、青工、女工、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座谈会，征求他们对搞好各项工作的意见。动员大家同心协力，把厂里的生产搞上去。参加座谈会的人都反映，心里话有地方说了，感到心情很舒畅。

调查江西工农业生产情况

1970年5月5日，陈去同志给程世情写信，提出想了解江西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并提出了想了解的具体内容：

1. 1970年工业生产指标。

2. 1970年农业生产计划。上缴粮食计划。矮秆良种水稻的播种计划。糖化饲料的推广程度。生猪存栏数。

3. 南昌及附近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工厂，哪些工厂可以去参观。

4. 看看南昌附近的人民公社。

陈云的信发出后不久，省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打来电话，说省委办公厅已联系了一些工厂，陈云可以去参观。于是，陈云先后参观了南昌市的江西氨厂、南昌钢铁厂、井冈山汽车制造厂、南昌电缆厂、洪都机械厂（飞机制造厂）。此外；他还参观了南昌市百货公司，南昌菜市场。

在南昌市参观完以后，经省委同意，陈云同志又到江西新余县和萍乡市参观了新余钢铁厂、萍乡钢铁厂、安源煤矿总平巷。在安源煤矿，陈云戴上安全帽，坐笼罐（电梯）下到地下数百米深的采煤区参观，还参观了安源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安源地委旧址八十间房等革命遗址。

在萍乡市参观后，陈云同志又到山区参观了一个三线工厂——冷轧钢厂。回到青云谱于休所休息了数日，他又到南昌郊区的南昌县“八一”公社的淡溪大队淡溪村和大昌村参观，了解那里的农业生产情况。

陈云每到一个地方参观，总要详细了解生产情况，存在问题、如何解决、今后计划等，不但听干部汇报，还要到车间参观，和工人交谈，在农村则到田边地头 and 农民交谈，看庄稼长势如何，到农民家中了解生活情况。在南昌市百货公司参观时，他爬楼梯，逐个柜台看商品的花色、品种、质量、了解价格情况，还向个别顾客询问对商品有什么要求。参观南昌菜市场时，他详细了解蔬菜的运输情况、损耗情况，储存情况等。陈云说，看了百货公司和菜市场，就可以知道南昌的市场供应情况了。

在对江西的工农业生产情况进行调查后，陈云曾说过，江西工业基础差，中央是知道的，但是程世情对江西工业生产水平估计过高。江西农业生产情况比较好，原因是江西人均耕地面积多，雨量比较充足，气温比较适宜。

关于中学教育的一次座谈会

1971年6月20日，陈云同志到南昌市第十九中学了解教学改革情况，在该校召开了一个有教员参加的座谈会。在校长汇报该校教师队伍状况时，陈云说：“我们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学校要提高教学质量，教师的业务和政治水平都要提高。”在校长汇报到现在学校实行的是军事建制（连、排、班）时，陈云说：“今后还是会以班的建制上课的。”并说：“要使学生在德智体三个方面全面发展。要建设，就要培养有本领的人才。”在谈到教材的改革时，陈云说本本（教材）是个大问题，并马上要来一套课本翻看。看了一会，他说：“这个教材还要不断修正，现在看内容是浅了点，要加深。编教材不是你们学校的事，不过，教师在讲课时可以发挥，补充一些知识进去。”在座谈如何关心青少年成长时，陈云说：“关键有三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教师队伍，三是课本。”

参加庐山会议和江西省委扩大会议

1970年8月，中央通知陈云同志到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由于他有心脏病，不能住到山上，就住在山下的九江南湖宾馆。他被编入华东组，每天的小组会不参加，只在开全体大会和大组会时才上山参加。9月3日，他在华东组的大组会上发言揭发批判了陈伯达，说：陈伯达谦虚是假，其实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个人是伪君子，在延安时他说诸葛亮在他这个年龄已做大事了，而他现在还一事无成。他和王明差不多，就是靠那几本书招摇撞骗、吓人。

林彪自我“爆炸”后，江西省委于1971年10月五六两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请陈云同志参加。他在政治部小组会上发言，揭发批判了林彪历史上的错误。1972年1月29日，他再一次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在省直机关小组会上发言，批判了林彪抢班夺权和林彪一伙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在江西读书情况

从北京动身前，陈云同志就和工作人员说，走的时候一定要把马列的书和《毛选》、《鲁迅全集》带上，说他到江西后要抽空看书。于是，工作人员就把他的《马恩选集》、《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都装在两个大铁皮箱内，带到了江西。

到南昌青云谱干休所住下后，陈云除了去化工厂蹲点和参观工厂、农村外，其他的时间就是在家看书。他看书可以说是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经常是警卫员叫他吃饭时，他虽然答应了，但还在看，要等到叫了几次后才放下书，去洗手吃饭；晚上看书经常看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也是要警卫员催他多次，才能休息。据陈云说，他在江西看完了《马恩选集》、《资本论》和《毛泽东选集》，还看了《列宁全集》十月革命以后的部分和《斯大林文选》、《鲁迅全集》的一些文章。

陈云同志看书时，凡认为重要的地方，都用铅笔划出来。他偶而也和工作人员谈他看书的体会，如说：列宁的文章针对性很强，都是针对当时苏联革命中发生的问题写的，文章也很生动，很吸引人。毛主席的文章也有这个特点，针对性很强。他还说：《资本论》在延安时看过一遍，全国解放后很想再看一遍，但是由于工作实在大忙，一直没有时间看，这次到江西来才又

看了一遍。

告别江西，回到北京

1972年，由于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一些过去被疏散到外地的老同志陆续回到北京。经中央批准，陈云同志也决定于4月22日动身回京。

4月20日、21日，陈云接连两天到化工厂向厂里领导干部和科、室工作人员、各车间工人告别。由于相处近三年时间，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化工厂的职工对陈云都依依不舍，希望他以后再来江西看看。4月22日上午，他向干休所的职工告别，说：“几年来，干休所对我生活上照顾很好，我向你们表示感谢！”干休所的职工也期望陈三以后再来江西看看。

4月22日下午，陈云同志到南昌火车站乘火车。前去送行的有化工厂和青云谱干休所的几位领导干部，还有一位省革委会副主任。干休所派原政委护送陈云回北京。4月24日，陈云同志顺利回到北京。

“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国务院安排陈云同志到中山公园参加游园联欢活动。

6月，周总理请陈云同志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

（作者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人员）

陈云同志与上海财经会议

李海

1949年8月由陈云同志主持召开的上海财经会议，是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财经会议。这个会议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从这时起，中财委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展开了全面的财政经济工作。

早在1949年3月，党中央就决定委派陈云同志着手组建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陈云同志于5月从东北来到北平（今北京），按照刘少奇同志起草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迅速组成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筹备班子。6月4日，周恩来同志召集各党派民主人士和在北平的党政机关负责同志开会，通报了这个决定并征求意见，并由陈云同志作了《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说明》。7月初，中财委筹备机构正式搬入朝阳门内九爷府办公。

就在中财委搬进九爷府办公的一周后，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各大解放区财经会议。陈云同志立即率领宋劭文、钱之光、曹菊如和秘书周太和同志乘专列前去上海，主持这个会议。当时，上海解放不到两个月，形势还比较乱，专列驶进上海郊区时，甚至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袭击。

为什么要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召开上海财经会议呢？原因有二个：一个是由于上海解放后，由于外有帝国主义军舰封锁，内有城乡交流未通，物资进出不畅，困难很大，请求中央帮助解决；二是解放军渡江部队即将进军华南、西南，军需民用均感困难，华中建议中央召集华东、华北、华中三区财经负责人开会，共商解决办法。于是，中央指示中财委在上海召开会议，除华东、华北、华中三区外，还邀请了西北、东北两区的财经负责人和即将进军两广、西南的野战军代表参加。

会议从7月22日开始，于8月15日结束，历时24天。会议的第一周，主要由各解放区和上海汇报情况；从8月1日起，分金融、贸易、财政、综合4个组进行讨论，并形成了一个《关于若干问题的共同意见》草稿，提交大会；会议的最后一周，先由陈云同志就初步形成的《共同意见》向大会讲话（即《陈云文选》中的《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并组织大家讨论，然后由陈云同志于8月15日作总结报告（即《陈云文选》中的《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陈云同志回到北京后，将会议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并向中财委的同志们作了传达。这个报告实际上成了中财委以后工作的纲领，全国的财经工作从此逐步展开。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财委改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人们由于习惯仍称它为中财委），全国财经工作在陈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正式展开，但上海财经会议的精神和要求仍继续实行。1950年3月，中财委又召开了一次全国财经会议，决定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并经党中央、政务院批准。不久，在全国范围内稳定了市场物价，制止了通货膨胀。上海财政经济会议的历史功绩明显地显示出来。

上海财经会议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陈云同志在会议期间所作的讲话和

总结中，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一、解决了上海的困难。

上海的困难，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军舰封锁，进出口受阻；加上城乡物资交流未畅，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运不进来，物资供应不足，生产无法恢复，生活难以维持。这些问题如不能很快解决，不但影响上海几百万居民的生产与生活，而且对于全国的财政经

济，对于向华南、西南的胜利进军，都是不利的。面对紧迫的形势，陈云同志商得大家的同意，果断地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统一大家思想认识，顶住封锁。陈云同志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长期封锁我们，阻断我们的进出口贸易。但是，也应当看到，他们不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我们要千方百计设法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可以从广州、天津、大连、满洲里等地开辟进出口贸易通道，可以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你不和我们做生意，有人和我们做生意，准备赔点钱打开进出口的路子。关键是要树立自力更生思想，面向国内，恢复和发展城乡物资交流，把农产品工业原料从全国各地运进上海来，把工业产品从上海运到全国各地，搞活这个重要的工业城市。要看到，上海的恢复与发展是有希望的。

第二，调进“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据上海同志反映，进上海之前准备了两个月的粮食，到七月已经基本用光，外地一时调不进来，难以维持。陈云同志同各地区和上海同志商议后，作了具体计算和安排：上海附近地区早稻上市晚40天，有两个月的粮食接不上，故要求常州以西早稻已经上中地区紧急调进1.2亿斤大米。如果还有困难，则从华北、东北再调进一批粮食。总的原则是，各地必须解除地区封锁，让粮食自由流通，活跃市场。其次，上海的同志反映缺少生产原料，主要是纱厂缺少棉花，需要各地帮助调进。陈云同志也和大家共同研究，作了具体计算和安排：估计新棉上市之前的4个月，上海（包括青岛）生产需棉79万担。各地现有存棉48万担，加上向华东、华北、西北购棉31万担，可以够用。预计到1950年，华东、华中、华北、西北可收购棉花480万担，也基本够用。关键是各地区必须齐心协力，按照中财委所摊派的数字完成收购任务，大力支持华东（主要是上海）纺织工业的生产。另外，生产和生活离不开煤炭，对于各产煤地区调进一定数量煤炭的问题，会议也作了具体安排。

第三，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需要运进上海的粮、棉、煤和其他物资很多，而江南地区刚刚解放，交通特别是铁路正在恢复，一时难以承担这么大的运输任务。为此，会议要求各地加快恢复交通的速度，组织好车船运输，保证完成物资进出上海的任务，使上海真正活起来。

第四，解决工厂搬家问题，会议之前，曾经预计上海的困难很大，需要将部分工厂搬迁到外地，疏散一些工人和居民，以缓和上海的困难，同时还可以支援各地的生产发展。但经过会议研究，感到搬迁工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牵涉到很多问题，下好解决；而且从长远看，上海的经济也需要发展，骨干工厂不宜外迁；另外，调进物资计划实现以后，上海的生产、生活困难可以解决，经济可以恢复和维持。所以，陈云同志商得大家同意后，决定上海绝大部分工厂不搬了，力争维持生产，以稳定上海的局势，进一步促使各种生产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把旧上海改造成成为新上海，为全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作用。

二、制定了8至12月份全国的财经计划安排。

关于全国的财经问题，用陈云同志的话说，是在全国范围内如何克服秋季的财经困难，力争明年（1950年）财经状况好转的问题，他曾在一次小会上明确指出：第一，全国财经困难确实很大，但是胜利中的困难，是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和战争的胜利结束，可以克服的困难，对此要有信心。第二，我们不但要克服目前的困难，而且要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那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要有全局观点、长远观点。要掌握全国的财经情况，做出8至12月的计划安排和1950年的估计，控制整个财经形势（主要是市场物价），使之逐步走向稳定。会议在陈云同志主持下，对这5个月的全国财经（主要是财政、金融、物资平衡）情况作了预测和初步计划，并对全国的物价趋势作了估计。

1.关于财政收支。根据各解放区（东北除外）提供的数字，预计这5个月全国财政赤字7130亿元（旧人民币，下同）。用物资调拨和公粮附征货币收入可抵补1330亿元，会议打算建议发行公债2100亿元，如能实现，财政赤字可减少为3700亿元。赤字巨大的原因是：第一，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军费开支很大；第二，接收国民党军政机构人员很多，要养起来给饭吃，加上解放区的军政事业人员，需要由财政供给的总人数有650万；第三，城市大都是新近解放，工商税尚待整顿，财政收入主要靠公粮，而老解放区公粮负担已经很重，难以增加，新解放区又刚刚开征，数量有限；第四，交通需要尽快恢复，铁路正在加紧赶修，需要增加财政支出；第五，某些地方已经发生水灾，也要财政出钱救济。为了战争的彻底胜利，这些财政支出是必要的，也是最低的必需的支出，即使因此而发行货币，也只好如此。

2.关于物资收购。为了保证生产，国营贸易机构必需收购必要数量的物资。首先是棉花，8至12月计划收购新棉125万担；其次是生丝、桐油、茶叶、烟叶、生油、猪鬃等出口物资；还有粮食，准备在公粮征购之后，有可能时再向市场收购一部分。会议根据各大区的情况，计划安排物资收购总数为4700亿元，其中用现钞收购的为3400亿元。

3.关于货币发行。主要是两项：一为弥补财政赤字发行5800亿元，二为收购物资发行3400亿元，两项合计发行9200亿元。这同7月底的货币流通量2400亿元相比，增加3.8倍。如果发公债2100亿元，货币发行总量可以减少为7100亿元，比7月底增加2.9倍。事实上1949年公债没有出台，改在1950年发行，货币发行总量仍是按9200亿元安排的。

4.关于物价。根据货币发行的情况，会议对8至12月的物价趋势作了估计。陈云同志在8月8日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证今年秋季的支出，八至十月每月需发行一千六百三十三亿元人民币，以七月底二千八百亿元为基数，每月发行指数增加百分之五十八。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则物价也将上涨百分之五十八。”“十一、十二月除军费外，要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两项合计每月需发行一千六百九十二亿元，还须另外筹划，物价上涨指数是否可能降低？到冬季，由于解放地区扩大，农产品上市，工业生产的恢复和纱布的推销等等因素，物价上涨率有可能降低。”会议综合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估计每月物价上涨享有能力50%。应当看到，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但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预测。尽管后来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实际发行和物价都比预测增涨了很多，但并没有因此而稍减上海财经会议的巨大意义。

三、作出了对1950年财政经济情况的估计。

在陈云同志的指导下，会议对 1950 年的财政经济情况作了轮廓的测算。首先，预计那时全国形势将会有以下变化：一是战争基本结束，全国解放地区的人口将达 4.45 亿。二是财政供给脱产人员将增加到 900 万人。三是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将开始全面恢复和发展。

根据这些变化情况，各解放区估计了 1950 年财政收支状况。全国总的情况是：公粮收入 193 亿斤，公粮支出 90 亿斤，收支相抵结余 103 亿斤，折合人民币 10230 亿元。货币收入，工商税收 17502 亿元，加上公粮结余 10230 亿元，合计收入 27732 亿元；货币支出 30620 亿元；收支相抵，赤字 2887 亿元。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结束的有利情况下有这么多的赤字，应当说还是有问题的。陈云同志要求大家努一把力，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财政赤字的办法，最好是整顿税收，增加税收；其次才是发行货币。对此，陈云同志指出：过去大城市多数不在我们手里，农业税占总收入的 3/4，工商税收比重小；现在我们有了大城市，工商税收比重将会增加。东北地区税收以及公营企业和对外贸易收入已达总收入的 3/4，公粮收入仅占 1/4。华北地区，税收也占总收入的 38%，今后要争取达到 50%。1950 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将解放，大城市都在我们手中，增加税收是大有希望的。同增加税收减少赤字相比，发票子弥补赤字并不是个好办法。1950 年与 1949 年有所不同，1949 年是战争需要，不能不发，也不能少发；1950 年战争结束，工作做的好，财政收支平衡了，有可能少发，或者不发。原则是，应该发行的就发，而且要早发。

货币发行不仅有弥补财政赤字的发行，也有为经济发民需要的发行。陈云同志举东北地区的例子说明：物价稳定了，商业投资转向生产领域，居民储藏货币多了，货币周转减缓了，市场货币不足，为此增发了票子，物价并未上涨。陈云同志还对全国货币流通量作了估量，他说：“抗战前，全国的货币流通量（包括地方币）为二十多亿银元，经过了十二年战争之后，生产与货币流通不正常，发行量应该少一些，假定打两个对折，还应有五亿多银元。可是，现在我们发行的人民币，只相当于一亿至一亿二千万银元，数目还是很小的。” 1950 年，如果用增加税收的办法减少财政赤字，或者收支大体平衡，使经济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那时，多发了票子物价也不上涨，情况就和 1949 年大不相同了，“文章”就好做了。

此外，上海财经会议还要求，为了适应商品在全国范围市场流通的需要，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支援战争和经济建设，各地区必须打破封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特别是粮食等主要的物资，必须保证在国内的自由流通，各地区支援上海的物资，也要按计划实施，保证畅通无阻。为此，会议还要求银行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的发行库，及时供应货币资金，支持各地区大量的商品物资交换；同时决定，组织统一的花纱布公司，在中财委的领导下，组织棉花、纱布的供应和销售；组织统一的土产公司，把桐油、生丝、茶叶等重要土特产品的出口，由中财委管起来，做到及时供应资金，支持土特产品的生产；统一组织出口，集中使用外汇，换回需要的物资，支持经济的发展。

上海财经会议在新中国财政经济史上，是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会议，对后来的全国财经工作有深远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之后，陈云同志领导了平稳物价、制止通货膨胀的严重斗争和统一全国财经的工作，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恢复了国民经济，实现了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接着，他又领导了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使我国从 1953 年开始，走上了有计划发展经济建设

的道路。特别是在由于“左”的急于求成思想影响使国民经济遭到挫折的时候，他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几次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为广大人民群众津津乐道。陈云同志留给我们的财经工作的理论和经验是丰富的、宝贵的，这些宝贵的理论和经验，在上海财经会议中已经初步显露出来，这里仅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善于抓住事物的重点和形势的特点，有层次有次序地安排财经工作。对上海财经会议要解决的困难问题，人们想得更多的是财政赤字、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问题。而陈云同志在8月8日的报告中，一开始就说，“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尤其是南线更困难。这是胜利中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在安排财政、金融、贸易工作时，他一再指出：现在决定一切的是部队打胜仗，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支援战争取得胜利，必要的财政赤字，必需的货币发行是不可少的，即使因此而引起物价上涨，也要这样做。这是抓住了当时形势的重点——战争胜利而做出的重大决策，令人信服。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他也曾提出过“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即首先支持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然后才是稳定物价，有余力再搞其他。上海财经会议为解决上海的困难，提出的第一条措施是调进粮食，让400多万上海居民有饭吃，安顿好他们的生活；调进棉花和煤炭，使工厂开工生产，最终也是为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在谈到接收国民党军政人员时，陈云同志说：“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这个包袱不能不背，不能光从财政上着眼。”把人民生活放在首要地位，陈云同志的这一思想在以后的经济建设中始终如一，他曾鲜明地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当然，饭不能吃得太好，吃光喝光，国家没有希望，要省出钱来搞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的财经工作方法，是我们应当永远遵守的原则。

第二，从一开始就抓住财政、金融、市场物资这些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环节的综合平衡关系。上海财经会议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此。这也就是陈云同志的财政、金融、物资综合平衡的“三大平衡”理论（后来加上外汇平衡，变为“四大平衡”）。这一理论在上海财经会议时初露端倪，然后在统一财经、三年恢复、四年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最后在1956至1957年由陈云同志正式提了出来，成为全国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不论是上海的困难还是全国的困难，陈云同志一到上海就亲自调查研究，倾听各地区、各方面的汇报和意见，汇集情况和数据，和大家反复研究，综合概括，找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困难的办法，然后向大会报告（8月8日的报告），让大家充分议论，最后才作出总结，并报告中央批准实施。这正是陈云同志反复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这种良好的思想和作风，在全国财经工作干部中广为流传，起了很好的作用。

（作者现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注释
《陈云文选》第2卷，第6、9、1、15页。

陈云同志与评弹艺术

周良

每个人都会有文艺欣赏的要求和兴趣，而且爱好各有不同，这是百花齐放的客观依据。作为个人的文艺欣赏，即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有充分选择欣赏对象的自由。有广泛的兴趣和爱好的人不是很多，只熟悉和经常接触某一些艺术门类的人比较多。陈云同志从小喜欢听评弹，到 50 年代末期，由于健康状况和其它原因，使他有较多的时间听书，对评弹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但如果说陈云同志喜欢评弹，关心爱护评弹，仅仅是出于个人爱好，那就远远不够了。他把评弹作为文艺工作的一部分，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评弹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形成陈云同志的文艺思想，对整个文艺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就像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的通知中说的，陈云同志在关于评弹的论述中，“不仅对我国评弹艺术在建国后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总结，而且对党和国家的整个文艺工作，对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下面谈谈我对这一点的认识。

—

我们的文艺方针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陈云同志说：“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说书是教育人的，艺人要有责任心。”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这些话是否还适用？前一个时期，曾经讨论文艺是不是商品，作为学术讨论，应该充分展开。但是有一些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强调文艺的商品性和文化工作的商品意识，离开了文化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盲目崇拜商品经济的自发性，让文艺在市场上自流发展，还讲什么“自生自灭”、“听之任之”等等，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像社会主义思想下会自发产生一样，社会主义文艺也是不能自流发展的。拜金主义的思想对文艺工作的侵蚀，后果严重。最近，中央指出，文艺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1981 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陈云同志就说过：“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假如有一天，因为没有钱，评弹艺术被市场淘汰，能说是钱的问题，要钱来负责吗？由于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市场价值不等于艺术价值和社会效果。“群众喜欢听的书，不一定就是好的。”“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陈云同志 1961 年说的这段话，正说明文艺作品的这一特性。有些优秀作品，票房价值和市场价格很高；也有些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虽高，但接受的群众面不大，因此票房价值、市场价格不高。还有些作品思想性、艺术性都不高，甚至内容不好，格调低下，但票房价值、市场价格却很高。因此，不能听任市场选择，放任自流，否则，会有害社会，无益于人民。陈云同志针对“在书目和表演上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的倾向，提出要加强管理，“要提高艺人的思想，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责任感。演出的书目要对群众起积极作用。”他说：“评弹艺人是宣传工作者”，“评弹艺人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力量。”

陈云同志早在 1943 年的一次讲话中，就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党员，克服特殊和自大的毛病。他说，做文艺工作只是一个人的分工，他这门工作做得好，是尽了他份内的责任，做得不好，就是失职，就是不及格。他还说：“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做‘家’，人家恭维他们是‘家’，他们不推，人家不恭维，还要急于抢着自称为‘家’，久而久之，也就弄假成真起来，严然有了个架子。这个架子是很不妙的，这是一个‘包袱’。一个负担，背着它就不好往前进。”“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称的。”为人和为文的关系，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问题。艺术工作者的思想修养、道德水平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艺术创作和成就。对语言文学而言，包括评弹在内，这种影响是比较明显的。思想水平、道德水平不高，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如果有了一点成就，自以为了不起，忘了天高地厚，翻脸不认人，还能上进吗？目前，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受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切向钱看；一些舆论也在起哄乱“炒”，盲目吹捧，把既无艺，又无德的人捧上天去，今天一批“星”，明天一批“星”；还有些人打着搞活、“改革”之类的旗号，实为“下海”经商，置本职和责任于不顾，这样，怎么可能创作和表演出好作品来呢？

有为人民服务的理想，还要有奉献精神，有事业心。陈云同志经常讲，评弹演员要努力学习，提高思想、文化水平，要千方百计用心力去钻研艺术。在人和艺的关系上，陈云同志的这种主张，尤应为文艺界和宣传舆论界所重视。

二

文艺有教育作用，但这种教育和政治宣传、思想教育不同。文艺通过感性形象，通过艺术手段，作用于人们的审美愉悦和思想情绪。陈云同志说：“要懂得听众的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他还在 1960 年的一次谈话中，针对当时忽视文艺的娱乐作用的“左”的偏向指出：“在目前的曲艺创作和演出中，强调了政治内容的一面，忽略了文化娱乐的一面，这是偏向。曲艺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化娱乐。人们在劳动之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这不是听报告受政治教育所能代替的。”^⑪但是，陈云同志又反对因此走向另一极端，忽视文艺的教育作用。1962 年，陈云同志针对当时挖掘、开放传统书目工作中的偏向说：“开放得乱了，损失会很大的。”^⑫近几年来，对娱乐性的理解有偏颇，是文艺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只讲“娱乐”，不讲“教育”，娱乐成了唯一目的，而在“娱乐”的掩盖下，有不少庸俗、低下的情趣。娱乐不能和文艺的教育、审美作用脱离而独立存在，更不能膨胀成为心理、生理的宣泄手段。人们欣赏文艺的动因和直接目的是为了娱乐，但所得将大于娱乐，常说的“寓教于乐”就是这个意思。

评弹的娱乐作用不应忽视，能否满足群众的娱乐要求，反映评弹为群众服务的好坏，这也是文艺工作者的群众观点问题。评弹是一种群众性的艺术，听评弹希望有噱头，成为群众的一种欣赏习惯。对评弹中的噱头，陈云同志有过多次讲话，针对不敢放噱头的偏向，他说，“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目前，对评弹节目中噱头、穿插的作用注意不够，旧节目中

原有的删得大多，新节目中则比较少，夫之于过分严肃。”^⑬针对滥放噱头和放不好的噱头，他说，“要有噱头，但要防止错误地滥放。”^⑮“噱头可放，但一定要防止下流、色情。”^⑮

陈云同志讲过这样一段话：“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⑯评弹工作者和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牢记这条准则，经常用以要求自己的工作，磨练意志，提高责任心，抵制拜金主义思想的侵蚀。领导部门和宣传部门也应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教育，把握舆论导向，绝不能司空见惯，熟视无睹，否则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

三

评弹和所有的艺术门类一样，都要为人民服务，要对人民有益，这是共同的。但是，各个艺术门类各有自己的特点，不遵循艺术的特殊规律，艺术也难于繁荣发展。

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评弹的改革曾经离开了自己的特殊规律。针对这种现象，陈云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就提出：“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⑰

对评弹艺术的特点，陈云同志在1960年讲到新书的改编时就说过：“把小说改编成评弹，对原著要有所增删。唱本和看本有所不同，”^⑱这里的看本是指小说或其它阅读本，涉及到了两个艺术门类的不同。他又讲过：“因为评弹的表现方法与戏剧、小说的表现方法是不同的。戏剧、小说、评弹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不同的艺术规律。”^⑲所以，他强调：“说给人听的和写给人看的不同，王少堂说的《武松》，描写比小说细致，但记录下来给人看，恐怕人家还是喜欢看小说。评弹要保持自己的特色，新书不能根据小说照本宣读。评弹不但和小说、电影、戏剧不同，评弹的长篇和短篇也不同，各种形式的文艺，都各有质的规定性。至于如何区别，这是你们搞文艺的人的事了。我是搞穿衣吃饭的。”^⑳他很谦虚，说自己不是搞文艺的，但他对评弹的历史，评弹和群众的关系、社会的关系，都有过深刻的阐明。如他说的“弹词与戏剧不同”^㉑；评弹“应以说表为主”^㉒；“评弹的说、噱、弹、唱，是区别于话剧的”^㉓；“评弹还应是评弹，不应该是相声或其他”^㉔；等等，这些都是评弹的特点。

四

陈云同志对评弹的喜爱和关心，固然有他个人的原因，如他生长在评弹流行地区，从小喜欢，有喜欢听书的亲戚，后来又有时间和条件经常听书等等，但这同时也反映了他对革命文艺事业的关心和责任心，他对民族传统文艺、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的爱护，他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的密切联系，他热爱家乡、热爱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

陈云同志说：“曲艺这种有历史传统又有群众基础的艺术，应该好好发展。”^㉕评话“是中国说书艺术的一个方面，要重视。”^㉖“评弹是群众性的艺术。群众喜欢故事有头有尾，人物的结局要好。”这是“一般群众的普

遍心理。”^{②7}他曾常带着感情色彩地说到，他的姐姐、他的亲戚虽然不识字，但了解历史、熟悉历史故事，这都是听书听来的。在讲到如果不重视传统书目的整理，传统书目可能失传时，他认为“很可惜”。^{②8}这种态度，和前几年盛行的“消亡”论、“淘汰”论相比较，截然不同。近年来由于提倡弘扬民族艺术，这些论调有所抑制，但是，如果没有实际行动、有力的措施、明确的政策，那么，优秀的民族传统艺术仍然很难弘扬起来。

陈云同志不仅在政治上把评弹艺术视为革命文艺的一部分，把评弹艺人作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部分，而且在艺术上总结分析评弹的艺术积累和造诣，提倡推广评弹，支持评弹的理论研究工作。评弹在过去是为人看不起的，艺人的地位也很低，更少有人去研究它，资料的积累和研究工作非常落后。陈云同志在六十年代就开始提倡积累资料，七十年代后多次讲要加强研究，为研究工作出过题目，如评弹的历史、艺术特点和书目。他审阅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支持《评弹艺术》丛刊的出版，为《评弹艺术》和《评弹文化辞典》题写书名。这些，对评弹的研究工作都是有利的推动。

陈云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弘扬民族传统艺术的典范。有人说，这是评弹有幸。但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把陈云同志重视、关心、热爱、弘扬民族优秀艺术的精神变成各级、各地文化部门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精神，作为他们热爱乡土，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之一。

五

推陈出新，这是艺术诸门类的又一条共同规律，结合评弹的特点，陈云同志提出过这样一些认识和要求。一、评弹的传统书目要保存，可以把书目都记录下来，“学传统书，可以全部学下来。”^{②9}二、“传统书目都要记录下来是一回事，这我同意，但演出是另一回事。公演的要整理，去掉坏的，保留好的。”^{③0}三、整改要慎重，“传统书目中，有精华，有糟粕，还有中间的即无害的部分，应作些分析。无害的部分暂时保留，不必急于删去。”^{③1}四、传统书目要出新，还要创造新书目，陈云同志满腔热情地支持新书目的改编和创作，对二类书曾给以很高评价，尤其对现代题材的新书目，热情鼓励，努力扶持。他说：“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③2}在演出的艺术上，陈云同志说，要允许和尚吃狗肉，提倡革新的尝试，鼓励后来居上。“后来必须居上，才能发展；后来不居上，就要倒退。这是发展规律。”^{③3}

以上是陈云同志结合评弹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推陈出新的要求，这些要求可以概括力他说的“出人、出书、走正路”，这是评弹艺术兴盛发展的必由之路。

六

陈云同志对评弹的了解和研究，运用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广泛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反复比较，而后集中起来，但不急于作结论。这体现在他参与《珍珠塔》长篇书目的整理工作中。他提倡多种尝试，“大家动手，各人唱各人的《珍珠塔》，百家争鸣。出来的东西愈多，愈是容易改好，可以把好的东西都吸收进来。”^{③4}在讨论中，陈云同志也发表意见，但不做结论，希望参与者不要因为他说了意见，“使整理工作受影响”^{③5}。他还在讨论中吸收别人的意见，修正自己的意见，例如对《玉蜻蜓》的

看法。他说，“人的认识是发展的，会变化的，我们不要怕改变自己的认识。”

③⑥他和演员、干部谈话是平等的，对老艺人尤其尊重，总是用商量的口气。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珍珠塔》的讨论文章，他建议暂不发表，以利于充分发表不同的意见，使不同方法的整理工作得以顺利进展。他在座谈会发表意见之前，单独和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尽管我也是座谈会的参加者。

平等的态度，群众路线的方法，发扬民主，实事求是，这样来研究评弹，所以陈云同志对评弹的意见，总能起着指导作用，并能为从事评弹工作的同志乐于接受。

在对评弹艺术的调查研究工作中，陈云同志始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全面，反复、比较的思想方法。如他在对《珍珠塔》的调查中，强调搜集、听取容易被忽视的意见，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听这部书。在对《玉蜻蜓》的调查中，他说：我希望知道对金大娘人物性格不同看法的理由是什么？……把双方的论据告诉我，以便我也想想。在对传统书目的整理上，他指出：不要苛求前人，“不能以对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对什么是159‘封建’，要好好分析，不能过激。如果过激了，狭隘地运用阶级观点，就要脱离群众。”③⑦

陈云同志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制订党的文艺方针的依据之一。学习陈云同志指导评弹艺术的实践活动，在当前对弘扬民族优秀文艺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现任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③⑦，《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第85、108、105、69、114、108、20、87—88、51、45、65、51、64、66、69、81、30、33、40、49、22、89、90、45、6、57、2、14、70、18、2、108、38、49、72、73页。

《陈云文选》第1卷，第279页。

陈云同志幼年在练塘

朱习理 王志涛

1905年6月13日（农历乙巳年五月十一日），陈云诞生在青浦县练塘镇下塘街西首靠河的闵家小屋里。

练塘镇也称章练塘，位于青浦县城西南18公里处，镇呈长方形，东西走向，一条市河俗称三里塘，贯穿全镇，沿市河两岸有两条并行的街道，相传五代闽国高州刺史章仔钧与妻练夫人居此而得名。明末清初形成市廛，原为吴江、元和、青浦3县合辖，宣统二年（1910年）全部划归青浦县。练塘镇并不大，面积仅0.365平方公里，东濒柳河，南绕大蒸塘，东北靠拦路港，西北临叶浑荡，是个水乡。闵家小屋是一间五路头十余平方米的平房，宅门朝南，前靠街，后沿河，南面是闵龙相开的米行，西面50米处有一座元朝至正三年建的顺德桥。

陈云的父亲陈梅堂，出身练塘近乡，是个朴实的庄稼汉，他家世代务农，有一套种田本领，空闲时也捉鱼摸蟹，或帮人宰猪为生。陈云的母亲廖顺妹祖籍广东，生在练塘。1895年陈梅堂和廖顺妹结婚后，生下一女取名陈星。陈云出生时姐姐已9岁了。由于当时家境非常困难，陈梅堂又积劳成疾，无钱医治，廖顺妹只得经常以帮佣及缝衣来贴补家用。1907年，38岁的陈梅堂终于抛下妻儿去世。以后，家境越发困难，廖顺妹虽有母亲及结拜姐姐万氏给予照顾，也因贫病交加，于1909年去世。

孤苦伶仃的陈云和姐姐陈星，由外婆从闵家小屋领到下塘街家里，亲自照料。外婆廖陈氏是练塘泖东农民出身，为人勤劳，性

格开朗，处事果断。陈云的外公去世后，家中事务皆由外婆作主。陈云的外公姓廖，广东人，早年参加太平军起义，以后转战在江南一带，太平军失败，落户练塘地区，后在练塘镇下塘街买下了一个门面房子。1870年，他和廖陈氏结婚，生下廖顺妹、廖文光等子女，1898年去世，享年59岁，遗体运回广东安葬。

陈云舅舅廖文光，又称龙相、龙公子，以裁缝为生。1903年，他娶练塘东目圩村倪松村立嗣阿姐倪氏（人称大阿姐）为妻，和母亲住在一起，生活尚能过去。廖文光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爱好文艺，喜欢孩子，但结婚多年，膝下仍然无后。因此，30多岁的廖文光对两个外甥倍加爱护，有好吃的，总留给孩子们先吃；逢年过节，也让他们和近邻小朋友一样穿新衣服，打扮得干干净净，欢乐地渡过节日；空闲时给外甥讲故事，有时还带陈云去听书。

一晃两年过去，1911年，陈云的外婆又患病身亡，临终前叮嘱廖文光，要将陈云作为廖家立嗣儿子，并抚养好陈星，廖文光很孝顺母亲，遂把陈三作为自己养子，改名廖陈云。陈云仍叫廖文光为舅父。从此，陈云和陈星由舅父母抚养。

不久，廖文光家经济日趋拮据，这是因为陈云外婆患病时延医求药，逝世后丧葬费等花费甚多，加上当时农村连年歉收，裁缝铺顾客日益减少，生意清淡。廖文光夫妇再三考虑，决定不做裁缝，在铺面开个小酒店，卖卖点心，维持生活。小酒店门面里，有一只二眼灶，一只小水缸，窗踏门下摆一块阁板，店里4只桌子，9条长凳，倒也清静有序，过小天井还有雅座一小间，是镇上一些有文化者常来光顾的地方，颜安小学杜衡伯校长即其中之一。

小酒店的菜由陈云舅母亲自烹饪，烧得别有风味。如油爆鳝丝，这是练塘一碟名菜。又如敲扁豆，这是将大白蚕豆浸在水中涨胖后，用榔头慢慢敲扁，成一铜板大小，然后放在热油里永，永至豆片稍黄捞起，拌上佐料装盆，此豆片香脆可口，色味俱佳，供应顾客下酒。陈云小时候，也帮助舅母做“敲扁豆”，敲的豆片既薄又圆，深受大家赞许。姐姐陈星更是舅父母的好帮手。1915年，陈星和本镇协和昌南货店青年职工王福生结婚，新房就设在舅父家后客堂。廖文光经济虽不宽裕，但喜事办得很光彩。

廖文光对陈云的成长极为关心，先是将他送到本镇油车场大源宅基刘敏安办的私塾里受启蒙教育。私塾学生不满10人，念一些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等书，每天要写毛笔字。当时，陈云年龄虽小，却很听老师的话，认真地读书，用心地写字，毛笔字写得很端正。刘敏安老先生很器重陈云，有时还专门深入浅出地给他讲授一些处世做人的道理。陈云在私塾里念了近2年，师生之间的感情根深厚。后来，陈云常去看望刘老师，长大后和刘敏安的儿子刘国桢（人称刘聋子）结成了莫逆之交。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教育部推行初小义务教育。1914年夏，廖文光将陈云送入贻善国民学校读书，该校创办于1906年，资金由本镇金用霖每年捐金百元资助，不足部分由忙漕税补助。校址设在城隍庙。当时学生30多人，年龄有大有小，程度有高有低，教师把学生分成四个年级。根据陈云的文化程度，校方将他分在三年级。陈云在贻善小学读书时，对学校设置的语文、数学、手工、体育等课程都感到新奇，喜欢学。他求知欲强，每堂课都能认真仔细地听讲，他记性好，教师讲的课文都能牢牢记住；他勤奋认真，学校布置的作业都能一丝不苟地完成。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点了油盏火，便在店堂里读书、写字。有的孩子要和他玩，他从不迁就，坚持学习。邻居们常以陈云勤奋学习的精神教育子女，要他们以陈云为榜样，有志气，努力学习，陈云还肯帮助同学温课，常常受到教师的赞扬。陈云在贻善小学读了二年，到初小毕业。

陈云从小酷爱听评弹。练塘地区属吴语区，弹词评话素为人民喜爱，拥有大量听众。练塘最早的畅园书场建于清朝末年，就在混堂浜，离陈云舅父家仅30米左右。民国初年在畅园边上，又造了一个书场，名“长春园”。这书场有200多座位，为了招揽听众，每天上午派个伙计，掬着一块写有当天书目及艺人姓名的木牌，敲着小锣在全镇上塘街、下塘街兜一圈，一些孩子兴致勃勃地跟着伙计走，有时，陈云也兴高采烈地跟在这群孩子里。书场一般每天日夜二场，听书的人进去后，选择最佳位置坐好，跑堂来泡上一壶茶，并向听众收取茶资，书场与艺人以四、六或对半折账来分配茶资收入。书场的小台仅一尺高，台上一只书桌，两把椅子，面对书场大门。大门里两旁墙壁前有一排钩子，专力农民听书时挂篮子用。陈云小时候，有空就站在书场后面，靠在墙壁上听书，人称“靠壁书”，陈云不管是评弹（当地称小书），还是评话（当地称大书），都喜欢听。因为说书人说的尽是一些民间轶事，一场场褒忠良，贬奸恶的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使陈云幼小的心灵中受到真善美的教育，并在听书中增长了知识，开拓了视野。

陈云也喜欢欣赏江南丝竹，常到母亲结拜姐姐的儿子万秉章处，学习吹笛子，拉胡琴，弹琵琶等。万秉章比陈云大8岁，小时候卖给隐真道院当道士（后来还俗），两人相处甚笃。

幼年的陈云举止文雅。端庄，待人接物很有礼貌，见到母亲结拜的阿姐，

总是主动叫大姨。万氏很喜欢他，经常要留些东西给他吃。

1916年10月，陈云的舅母生了一个男孩，名叫廖霓云。舅母生产后，双手风湿病越来越严重，疼痛非凡，而且情绪烦躁不安，廖霓云也整天啼哭不止。为此，廖文光四处求医，花了不少钱，家庭经济更加困难，房屋也不够住。于是，陈星夫妇搬了出去，在城隍庙西弄堂里借了一间房子住下。1919年4月，陈星生下一女，取名王定金，后来搬到小白场，开一片茶馆度日。廖文光原想让陈云升学读高小，可是力不从心，只得让陈云辍学在家，帮助干活。陈云从小懂事，不贪玩，爱劳动，看到舅母、表弟病痛很同情，看到舅父忧愁很难过，在家担当了许多杂务事。陈云干起活来干净利索，无论烧火、洗菜，打扫卫生、帮舅父搓洗霓云的尿布等等，样样都干。

半年过去，陈云舅母和表弟病情稍有好转，廖文光实在舍不得陈云在家做杂事，怕耽误他的前程，便千方百计托人让他学点谋生技术。这一决定得到了陈云舅母的弟弟刘福和的赞许和资助。1917年夏，廖文光托人送陈云到青浦县立乙种商业学校（现青浦第二中学）读书，希望他将来能在商店里做做帐房等事。这商校前身是县立乙种实业学校，创建于1912年3月，初设农科，后增商科。1916年取消农科，改名为县立乙种商业学校。当时，廖文光将陈云寄住在青浦码头街8号裕丰客栈楼上职工宿舍里。陈云在乙种商校里除学习一般高小课程外，还要学习珠算、簿记等。陈云懂得舅父用心良苦，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在学校里勤奋学习，很短时间里便学到一手好珠算，还初步学会写账册，进步很快。但可惜只读了一个多月，他又因经济原因而辍学回家，继续在舅父店里做小伙计。这时，廖文光收留了一个16岁的女孩为养女，取名廖顺宝，帮助做做家务。

廖文光小酒店的常客杜衡伯，是位比较进步的教育家，家住本县小赵屯桥。民国初，新学制兴，他受聘任首届公立颜安国民小学校长。为适应时代需要，他废读经，加珠算、手工等学科，定“勤”、“诚”两字为颜安小学的校训，办学成绩卓著。有一次，杜校长看到陈云在灶前烧火，就和陈云交谈，在交谈中，杜校长发现陈云口齿伶俐，记忆力强，初小学的知识对答如流。杜校长向廖文光询问了陈云辍学的缘故，觉得让这样一个聪明孩子辍学在家烧火十分可惜，当场答应让陈云到颜安小学的高小部学习，并且免收学费，杜先生的慷慨举动，感动了廖文光全家，遂了廖文光的心愿。于是，他送陈云到颜安小学读高小。

陈云进颜安小学后，凭着他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个个学期都获得品学兼优的奖状，同学们都很敬佩他，这也使舅父感到欣慰。在学校里，陈云最爱听张老师的课。张老师名叫张子谦（又名张行恭），世居松江城内。张老师讲课不仅语言生动流畅，还常讲康有为、孙中山、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故事，激发学生的爱国思想。1919年5月11日，青浦县全县停课三天，支持北京五四爱国行动。陈云和同学们在教师的带领下，组织救国十人团，在练塘近乡的小蒸、泖口、网埭等村镇进行演讲宣传，表演短剧，激起广大群众爱国热情，声讨卖国贼曹汝霖等罪行。陈云还和同学、教师向社会募捐，组成效国储金会，声势非常浩大。颜安小学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获得了新的生命，陈云对生活更是充满信心，经常以“有志者事竟成”这句格言勉励自己，勉励别人。

在颜安小学毕业的前夕，陈云又面临着生活的选择，毕业后怎么办？学校里的教师都很关心陈云，杜校长要求老师们一起设法安置陈云。张老师是

了解陈云家境的，很同情陈云的不幸遭遇，又很欣赏他的才干，准备通过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弟弟张子宏介绍陈云进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张老师把这意见和陈云讲了，并说：你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既可解决生活问题，又有机会多看些书，多接触新事物。陈云听了张老师的后，非常高兴，回家马上告诉舅父、舅母，还和姐姐陈星商量，大家都认为很好，对张老师关心陈云，非常感激。

1919年6月初，陈云由张老师陪同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当学徒。他先在排字房工作，后来在门市部中书部当店员，名字仍是廖陈云。陈云初进店时，个子很小，与店里柜台一样高，经常垫只小凳在柜台上做生意。他在店里待人和气诚恳，对顾客热情周到，当时书店有“同仁折扣”（九折）的规定，所以青浦同乡孔繁熙、万树荣等经常到书店找陈云买九折书。

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有机会接触进步知识分子，学习科学文化。他有空就去读夜书，学外文，不断吸取新的革命思想。逢节假日回到练塘休息时，他便和刘国桢、万秉章等一起谈论社会、国家大事，十分投机，他也懂得锻炼身体的重要，常和陆志鸿“盘杠子”，“举石担”，练手劲。

陈云当学徒后，廖顺宝出嫁到叶厍村与陶书堂结婚，离开了廖家。1920年，廖文光又从柳东亲戚家领了一个5岁的女孩为养女，取名廖桂宝，陈云对舅父全家仍十分关心，领到工资后总是如数交给舅父，补贴家用，自己生活却十分俭朴，从不乱花一分钱。他见舅母、表弟身体不好，就动员他们去杭州散心，并为舅父全家四人买了去杭州的火车票，舅父、舅母从杭州回来，还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看望了陈云。这次杭州之行，对舅母、表弟恢复健康大有帮助。

在商务印书馆，陈云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成长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作者曾分别任上海青浦博物馆馆长和中共青浦县委党史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入选论文

论陈云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

袁恩桢

在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中，陈云以其出色的经济思想和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才能而闻名于世，常言道，文如其人，陈云经济思想的特点也是与其领导经济工作的风格和魄力融为一体的。

力挽狂澜的实践性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是在曲曲折折的风波中向前发展。回顾这段历史，可以说，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是能感到陈云经济思想的可贵。陈云为解决我国历次的经济困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一次是建国之初，面对被长期战争所破坏的千疮百孔的落后经济，再加上不法商人的囤集居奇、哄抬物价，以及帝国主义者的幸灾乐祸、竭力封锁，能不能迅速稳定物价、稳定经济，已成为人民革命果实能不能保持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当时，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他一度坐镇上海，运筹帷幄，调集各地的粮食，棉花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制投机资本冲击，取得了稳定物价的伟大胜利。

他在1949年11月13日写的《制止物价猛涨》一文中说：“目前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至迟三十日）完成；预定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现在读来仍有无限气势！在控制通货、稳定物价的基础上，我国取得了统一财政经济政策的伟大胜利，而其中的主要政策，如统一市场、统一财政、统一金融、统一编制以及国有企业实行分级管理等，多是陈云的观点和主张。正是这一场稳定经济的不平凡斗争，为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次是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1958、1959年的大冒进，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危机，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城乡大批人民处在挨饿之中。在这极其困难的60年代初，陈云再次主持中央财经计划工作，并于1962年出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他提出了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规模、冒进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要退够、精简职工回农业生产第一线。计划下留缺口与搞好综合平衡。开放部分高价商品以回笼货币等一系列正确主张和措施，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迅速渡过严重困难和恢复国民经济，作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次是十年动乱之后，经济上的问题很多，陈云再一次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这一次的国民经济三年调整计划又是陈云所提出。在这段时期中特别具有历史意义的，是陈云提出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观点。1979年3月8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这一份提纲中指出，六十年来苏联与中国计划工作制度中的主要缺点是只有计划调节一条，没有市场调节。他写道：“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按计划，只根据

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 ” 陈云的“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 的观点的提出，对于冲击传统的僵化的经济体制，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并是 70 年代末促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当时，邓小平和李先念等领导人也都积极赞成这一观点。今天，我们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一系列新的认识，也都是从这里开端的。此外，陈云就所有制的形式、发展农业和粮食的重要性、坚持按比例发展、积极慎重引进外资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财富。

每当经济困难的时刻，人们就想到了陈云，这说明了陈云经济思想的实践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深谙国情的客观性

陈云之所以能在我国经济困难之时多次力挽狂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深谙我国国情。他一直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明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即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国情，否则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在国情问题的分析上，陈云特别强调众多农民的这一中国国情：“ 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 ” 他认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一特点，是新加坡、南朝鲜、欧美、日本所没有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困难，“ 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 ” 。陈云对这一国情的认识相当清醒，并把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早在 1950 年 6 月，陈云就要人们注意“ 农村是很分散的，我们的国家又这样大 ” 这一“ 大国小生产 ” 的特点，并指出在此基础上私商存在的下可避免性。

在 1951 年 5 月中共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云明确提出，发展农业仍然是“ 头等大事 ” 。

1955 年 7 月，陈云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关于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发言中，也是以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广大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半自给经济，生产水平不高，商品率很低等，作为必须实行统购统销的理由的。

1956 年以后，陈云多次分析了中国农村的情况，要人们注意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生产率增长不快的现实，必然会在相当程度上制约整个经济建设的发展。

1959 年 4 月，陈云在给中央财经小组成员的信中说：“ 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

1961 年 5 月，陈云明确提出“ 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 ”，强调“ 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 ”

1978 年以后，陈云仍是多次强调农业问题的重要性，直至 1985 年 9 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仍恳切地提醒大家：“ 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 无粮则乱 ’，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 ”

陈云深深地懂得，占中国人口 80% 的农民，是我国的最基本的国情，农民问题、农业问题不处理好，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陈云对国情的了解，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我国国力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上。他认为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而正在进行建设的国家，认为“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

这一分析，实际上与在 70 年代末我们党所重申的八大所提出的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相吻合，即不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要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他认为在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绝不能忘记自己所能提供的国力。众所周知的“经济建设的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要吃饭，二要建设”等合乎国情的名句，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生发出来的。陈云思想是深深植根在中国国情的坚实大地之中的。

辩证思维的科学性

陈云能深谙国情，不断地力挽狂澜，在于他善于运用辩证方法去分析各类社会经济问题。最典型的是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的分析。

1956 年全行业公私台营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取消商品和市场关系之风。而陈云则保持清醒头脑，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明确发表自己的见解：对资改造的成功绝不会消灭市场，而只是改变市场的社会性质，即变资本主义的市场为“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从而，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内，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在当时的环境下，有如此清醒的辩证思维，是极不容易的，这该是对社会主义双重调节机制的最清晰最明快的表达了。

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又率先提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观点。他认为苏联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当时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⑪。他还认为现在的计划大死，包括的东西大多，缺少市场调节，因而计划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计划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产品不能丰富多采，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在这里，陈云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论述了市场和市场调节存在的必然性。80 年代，陈云又有大量论述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文字，其中最力引人注意的是关于“鸟”和“笼子”这个比喻。他把搞活经济或者说市场比作“鸟”，把计划比为“笼子”。认为“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需要有一个“笼子”即国家计划。“鸟”和“笼子”，这尽管是一种比喻，却是相当辩证他讲出了计划 and 市场的相互关系。对于“笼子”的比喻，以后成了国内外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其实，陈云在当时就讲得相当清楚，“笼子”大小

要适度，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下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经常需要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可以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可以说，有关计划的灵活度以及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性，在陈云的有关论述中都已经涉及到了。更何况计划和市场关系本来是现代化经济中的一大难题，需要不断地探索。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若要从总体上显示出比资本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就首先必须有自己经济运行机制上的优越性，从而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必须有自己的特色或者说特点。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既不能是单一的计划，也不是单一的市场，而是有科学的计划和灵活的市场相结合的双重运行机制，一种比资本主义社会结合得更好的双重调节机制。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确实不假，但是，社会主义计划无论从科学性到实践性来说，都必然超过资本主义。改革所否定的是传统体制那种单一的僵化的计划体制，让市场机制去调动那近乎僵化的经济机体的活力，但是，最终能使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具有特色并创造出更高运行效率的，还得是社会主义计划的更大科学性和经济的按比例发展。

宏观调控的坚定性

通读陈云的全部著作，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到，陈云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宏观调控的深刻论述。这些论述体现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宏观调控的坚定性的特征。

1949年建国之初，陈云用调集物资、控制抛售时间等办法，以打击不法商人的投机倒把而平抑物价。这次平抑物价不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而是“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堪称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的最早范例。

陈云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是他的综合平衡论，综合平衡论是陈三经济思想的一大精华。1954年6月，陈云在他写给中央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提纲中，已经充分注意到按比例和综合平衡的重要性。在提纲中不仅详细地分析了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工业和运输业、技术力量的供和需等的比例关系，并且明确指出：“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⑫在这里，陈云把按比例发展这一规律讲话了，即他认为“合比例就是平衡”，综合平衡是按比例的具体体现。

对于综合平衡，陈云有一系列精彩的观点。

首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陈云认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即认为在计划开始时就要注意综合平衡，而不只是计划的最后目标的平衡。

其次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陈云认为要“按短线搞综合平衡”^⑬。这是他对多年来按长线搞平衡却不能平衡的教训的科学总结，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陈云还认为，为了使计划切实可靠，计划必须留有余地。他认为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即使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这样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

财经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平衡，陈云关于这三大平衡的观点，已经成为我国计划和综合平衡理论中的经典性的论述。在这三大平衡关系中，陈云认为关键是财经和信贷平衡，只要财经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给之间一般也总是能平衡的。

在综合平衡问题上，陈云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的观点，而且一再告诫全国要注意这一问题。他认为，适应还是不适应是经济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界限。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造成经济混乱。两者适合，经济就稳定。陈云还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容易。保守了，物资多了，影响速度。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是那末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陈云认为，国力是指财力和物力，包括投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四个方面。把外汇也列为构成国力的要素之一，可见陈云的综合平衡论绝不是封闭式的，而是开放的观点。

陈云认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①④}这就讲清了综合平衡与速度的相互关系，即一个国家的速度或者说高速增长，只能存在于按比例或者悦综合平衡之中。

在 50 年代初的稳定通货和统一财经、60 年代初的三年调整以及 70 年代末的再一次调整中，陈云正是运用了这些综合平衡的观点，贯之于实践，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一再取得了稳定和发展经济的好成绩，并一直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历史实践反复证明，陈云经济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宝贵财富。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② 《陈云文选》第 2 卷，第 31、94、140、242 页。

①③ ①④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245、281、125、164、350、250，13，244—245、211、251 页。

论陈云经济思想的特点及其启示

王毅武

陈云经济思想的诸多观点与主张，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认识与理解陈云经济思想的基本特点，对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搞好我们的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是极为重要的。

一切从国情出发是陈云经济思想的基点

“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从中找寻规律性是陈云整个经济思想的基点。”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就根据党的中心任务，针对中央苏区党内和工会内部对工人经济斗争认识上的分歧，指出忽视工人的经济斗争和过分强调工人的经济斗争都是不对的。前者不给群众一定的物质利益，不利于发动群众；后者只看局部的和个人的经济利益，会妨碍苏区经济的发展。二者都没有注重当时苏区的实际情况，忘记了党的中心工作。

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时期，陈云亲自领导与布置的经济领域内的“三大战役”，充分体现了他注重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在稳定物价的斗争中，他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正确地找到了物价上涨的原因，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实行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建立统一的发行库，控制货币的投放；另一方面集中调运大批粮食进城，组织和加强商业流通以刺激生产和打击投机，集中收购农副产品以增加市场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由于注重实际，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以这些措施实施后，效果很好，很快就稳住了物价，从而稳住了市场，稳定了经济。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对国内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的认识上，陈云与“左”的思想不同，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生产力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工作的重心应是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与提高人民生活，建设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在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上，陈云总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国的国情。他认为中国是“大国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而不平衡。一切经济决策都不能离开这个事实，否则就会犯错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陈云在所有制结构经营方式的设计上，一向认为：应在保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与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在国民经济计划体制的设计上，认为应把计划生产和自由生产结合起来，不应忽视计划指导下的自由生产。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上，始终主张从现实的生产能力出发，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在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反对盲目引进，主张根据国内消化能力、基础设施以及配套能力而谨慎进行。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上，多次强调要重视我国人口多、农民比重大、生产力水平低的现状，认为我们是在中国式的特殊的一系列矛盾中搞四化，如果离开这个实际，就可能重犯类似“大跃进”的错误。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把强调国情、吃透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称之为

为陈云的“国情论”，那么，陈云的“国力论”则是其“国情论”的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在新中国为期不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曾多次出现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负荷水平的“膨胀”，这一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能否正确估计和认识国情的问題，因为以财力和物力为主的国力是最重要的国情，也是制约经济建设规模与速度的最基础的条件，早在 50 年代，陈云就从经济工作一定要尊重国情的思想出发，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小冒”高瞻远瞩地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还是下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这里，“国情论”进一步被具体化了，不再是一般的认识论原则或方法论原则，而是把国情具体化为国力，把“国力论”又与社会再生产理论联结了起来，上升为经济建设的规模与速度的量化原则以及判断经济发展是否稳定的界限标准，从而使“国情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极大地强化了，因此也就更具有指导意义了。

陈云还多次反复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要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但要重视我国的原有基础以及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特点与传统，而且要充分把握趋势，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照搬、照抄外国的东西都是不可取的，头脑发热，搞冒进、浮夸的做法应坚决杜绝，同时还要看到，由于各地区、部门、企业的实际也是不同的，改革也不能照搬照套。

稳妥务实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

与一切从国情出发这个特点相联系，陈云经济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脚踏实地、求实务实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特点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特别是进行重大经济决策或每当提出战略性建议时，反复强调“稳妥”、“稳扎稳打”。

在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出现了违背自愿互利原则的盲目合并的“左”的做法。陈云及时指出：“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势发展大快，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也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他提出应纠正工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片面的盲目集中生产与集中经营的状况，将其很大一部分改为分散生产、分散经营，以适应人民生活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和经常变化的需要。商业方面的合并过头现象也应加以纠正，应适当分散。“小商小贩在合作小组内的各自经营的办法，应该长期保存。”

他认为，经济工作与其它工作一样：“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

在“大跃进”年代，全党、全国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支配而头脑发热，陈云却在当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冷静地说，“总的精神是稳往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站稳的目的，是为了前进”。为此，必须“退到可靠的阵地”，“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在巩固的阵地上前进。”这些正确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于是陈云在 1962 年的一次会议上再次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

好得多。”

在建设规模的确定上，陈云一向主张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量力而行，一步一个脚印。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他指出这场失误的基本原因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有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工业也负担不了”。补救的办法是，必须把基建规模砍下来，砍到国力所能负担的水平。只有这样，才比较稳妥。陈云还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在进行工业建设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生产的各个环节，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交通运输、商业设施、城市建设、职工住宅、生活服务等方面的配合，切不可只顾一个方面，忽视其他方面。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对经济建设中的问题都要进行具体分析。”这里的核心还是一个“稳妥”，即建设不能不顾及各方面的条件而孤军冒进，必须与其它方面“成龙配套”，协同前进。

在处理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的关系上，陈云认为必须“保持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⑪。他认为保持市场稳定，使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与消费品的供应相适应，是检验经济建设方针是否妥当的基本尺度，他指出：当商品供应紧张，物价有所上升时，“我们要有计划地使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放慢，使它低于消费品增长的速度”^⑫，这也就是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保持平衡，以保证经济的稳定。

在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安排次序上，陈云主张先生产、后基建。认为只有“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⑬。这是因为基本建设的物质基础是在现行生产中生产出来的，只有正常的现行生产，才能为基本建设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如果忽视了这一基本关系，片面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了现行生产，这对基本建设来说，无疑等于釜底抽薪，结果是谁也上不去。

在制定各种经济计划指标时，陈云主张，争取快，准备慢。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他说，“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凡是有利于争取农业增产的，我们都要尽力去做。但是，也要考虑到，工作都做了，还可能不够快，所以要做慢的准备。”^⑭这就是说，要有两手准备，才能在经济工作中指挥若定，稳稳当当地解决问题，为了使计划指标订得更加切实可靠，保证国民经济在稳固的阵地上前进，陈云认为：“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⑮。这也是指导国民经济稳步前进，避免经济上的折腾、反复、大起大落的一条重要措施。

多年来，陈云一如既往地坚持稳妥这个核心思想，一再重申：“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⑯。”“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⑰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强调：“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各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要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稳扎稳打，稳中求实、稳中求快、稳中求效益、稳中求前进。

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它是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重大调整，势必影响到各个方面的经济利益。改革难免会引起经济的某些波动，况且这是一项崭新的工作，缺乏经验，因而就更要求我们必须坚定地采取稳中求改的做法，防止发生大的问题。这无论对宏观方面如计划体制、价格体制、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还是对于微观方面如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与自主权等方面的改革，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陈云认为越是在改革顺利进行的时候，我们越是应该冷静地思考，不能忽视在某些部门、地区、企业仍有可能出现新形势下的过头、冒进和浮夸。特别是关于农业和粮食问题，“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⑮

为人民谋福利是陈云经济思想的主线

陈云的经济思想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在陈云的经济论著里，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何处，总是念念不忘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把为人民谋福利当作出发点和归宿点。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担负起解救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但要坚持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并取得胜利，没有亿万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加是不可能的。所以，陈云认为，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指出：“使各方面的工作都能进步，都能发展，都能健全，基本的环子就是开展群众工作”^⑯。群众工作千头万绪，从何做起？首先“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斗争”^⑰。因为只有“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⑱。我们党如果下去关心群众的生活，不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而要开展群众工作是不可能的。“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⑲

1956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但是，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位置应如何摆，是先生活，后建设，还是先建设、后生活，这的确是一个事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陈云认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⑳经济建设要坚定不移地搞，因为不搞建设就不能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国力水不之下，建设终究不能搞得太多，摊子不能铺得太大，只能量力而行。进行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影响到人民现有的生活水平。他批评一些同志只想多盖工厂，干起来往往把人民的生活放在一边，不大注意以至根本下注意人民生活问题，指出：“只注意建工厂，不管职工吃的，那怎么行？……我看，蔬菜和其它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决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㉑

当我国的国民经济由于盲目冒进而遭到严重挫折之后，陈云一边总结以往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一边想方设法帮助群众渡过困难时期。他认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握一个根本方向，即“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㉒同时，他也总是从别人看来是“小事”的事做起，

特别重视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提出在困难时期给城市居民“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每人每天供应一两豆子”，“可不可以增加半斤肉”^{②6}，以便增加人们身体所必需的蛋白质和热量的供给，并认为，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是政治问题。

在社会主义基本建设过程中，在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的作法被当作是大经地义的时期，陈云反复指出：在增加基本建设投资时，除了增加生产资料方面的投资外，还必须相应地增加生产粮食及其它各种生活消费品方面的投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与生活并行增长，否则，人民生活改善提高不了，建设也会被拖住。不能为生产而生产，应该是为提高生活而生产。生产与基建如果离开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基本点，是不可取的，基本建设规模如果冒了，就会造成经济不稳定。这里，他把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提高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高度去认识，并把经济建设的规模与国力是否相适应看作是经济发展稳定还是下稳定的界限。

市场问题，价格问题，商业工作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是否正常，人民生活能否稳定地得到改善与提高，是联系千家万户的大事，所以，陈云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各个时期，总是设法采取一切适当的经济的或行政的手段来稳定市场，稳定价格，保证生活消费品的供应，尽量不使人民生活发生大的波动。他非常重视商业工作，这是因为商业工作天天与人民打文道，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从商业的管理体制，到商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他都极度重视，格外关心，指出：“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下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商业关于六万万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说是小事情，不重要。”“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②7}。“做商业工作的同志不能单纯注意物价、利润等商业本身的问题，还要注意国家建设规模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平衡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关系就大了。”^{②8}

民以食为天。陈云在《重视粮食工作》一文中说：“粮食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的工作”^{②9}。因为国家不仅要向几亿农民征购粮食，而且要向上亿的城市居民和缺粮农民供应粮食，所以，这项工作同全国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利益关系，如果我们的粮食工作做得不过细，要么会影响农民的生活，影响几亿农民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农业；要么会影响粮食的供应，影响到粮食市场以及职工和城镇居民的积极性，阻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可见，搞好粮食工作，不仅有利于人民的生活，而已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项工作“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③0}。

总之，陈云时时把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看成是一项重要的国策：处处从提高与改善人民的生活出发考虑与解决问题；事事以是否能为人民谋得福利为转移。陈云经济思想的这一主线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反复被新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和贯彻陈云经济思想的主线，努力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如陈云 1985 年时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③1}。在改革中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的企业，只有坚持这一点，才能使微观的经济运行与宏观的控制目标一致起来，真正做到宏观不乱、微观不死，才能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

实事求是陈云经济思想的原则

陈云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他经济思想的原则。

首先，“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③②}是这一原则的具体化。“不唯书”，并不是主张不读书，而是提倡读书时要认真领会精神实质，要理论联系实际，不搞教条主义。“不唯上”是指贯彻和落实上级文件或指示时，应该考虑如何将上级文件或指示的精神和方针与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具有灵活性和创造性。“要唯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这九个字的核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③③}所以，只要作到了实事求是，就等于实现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

“要唯实”是经济工作根本性的方法论原则。陈云历来对经济工作中的不唯实深恶痛绝。他多次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冒”与“左”。198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严肃指出，农民从事农副业致富的，有“万元户”，但只是极少数。前一时期，报纸上宣传“万元户”，说的太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宣传脱离了实际，现在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判断经济形势，一要求实，二要冷静，三要稳妥，应该从经济现象的微小变动中善于发现深层次的问题，科学地揭示各种经济现象与经济过程背后所隐含的必然性。在这方面，陈云身体力行，堪为典范。

坚持实事求是，并不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陈云特别反对把人看作是客观的奴隶，只能消极地适应客观实际。他极为提倡劳动者的创造精神，指出：“墨守陈规的人，思想和行动常常落后于客观实际，不能够随着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向前进步。乱撞乱碰的人，往往不顾客观条件，违反客观规律，把幻想当作真理，凭主观意志办事，或者把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事情，勉强地放到现时来做。这两种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精神，自由是被认识了必然，人们越是能够实事求是，思想和行动越是合乎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他们也就越能够发挥创造精神。”^{③④}

其实，陈云将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方法上具体归结为“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③⑤}关于“交换”，他说，“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如果两人把各人看到的一面‘交换，一下，那就全面了”^{③⑥}，为了使认识更全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关于“比较”，他认为：“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③⑦}要在全面的基础上，通过和现行的、过去的、国外的比较，就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更准确。因此，“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③⑧}。关于“反复”，陈云认为，决定问题时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研究考虑的时间，通过反复研究，目的在于弄清情况，使认识更全面，决策更切实际，以求行之有效。

基于这一方法，陈云强调经济工作要用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政策，都要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得出，只有弄清了实事，才有可能求是。

陈云认为，“交换、比较、反复”的客观基础与具体措施是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做到胸中有数，才会对事物产生比较全面的认识，从而避免片面性。“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③⑨}他在调查研究中，坚持了解情况要深入、具体、细致，掌握一切应有的详细资料，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情节，在此基础上采用全面分析、反复比较的方法，斟酌各方面意见，求得科学结论，进而作出正确的决策。陈云 1961 年深入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农村调查时所写的三个调查报告充分体现了“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

再次，陈云在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搞经济要有战略眼光，即搞经济工作要把握战略重点与方向，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就提出了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的思想，1956 年又说：“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爪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我们县商店的经理一天忙的要死，晚上还要算帐到十二点，要货时，再开夜车临时凑。看来，我们的县商店，也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④⑩}。后来，他又多次强调这一问题。在陈云看来，解决战略性问题，首先要抓中心环节，把握重点。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之所以是重点，就是因为它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在中国，抓农业、抓能源、抓交通，就是抓住了战略问题，因为这些经济部门既薄弱，又关键，因而对经济发展全局具有战略意义。1982 年，陈云曾批评说，“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下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④⑪}，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我们必须注重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要有自己的战略家。可见，陈云把经济工作的战略眼光当作进行经济分析和决策时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基本方面。

此外，坚持理论的一贯性是陈云经济思想的风格。陈云经济思想中的重要观点，自始至终坚持首尾一贯，既不随“风”摇摆、飘忽不定，也不今这明那，前东后西。如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的思想，关于要特别重视农业及粮食问题的思想，关于国家财政安排的思路等，除认识越来越深刻，表达越来越简洁外，本质内容并无多大的差别。无疑，经济思想应随着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有所充实、有所修正、有所完善，但是那种人云亦云。忽左忽右、自相矛盾的学风，总是不足取的。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经济学院）

注释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52、5、8、136、136、150、206、194、50、210、193、212、350、29、61、210、209、33—34、72、73、350、188、188—189、188、189、189、188、310 页。

^⑪ ^{④⑩} 《陈云文选》第 2 卷，第 152、244、334—335 页。

^⑳ ^{③④}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 年）》，第 79—80、29、84 页。

^⑮ ^⑰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 72、175 页。

^⑲ ^⑳ ^㉑ ^㉒ 《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164、164、166、173 页。

^{③②}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4 页。

陈云的主要经济理论 及其重要贡献

刘凤歧

陈云的经济思想内容丰富、系统，显示出人民性、务实性、稳妥性等特点。在丰富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方面有着重大的理论贡献，学习陈云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陈云的主要经济理论

陈云经济思想涉及领域广泛，本文仅从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出发，概括出以下九个方面的主要经济理论。

（一）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陈云是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直接领导者。在此期间，他不仅卓越地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而且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三大改造”的理论体系。在稳定物价之后出现社会经济现象一时“后仰”的情况下，他遵循生产关系变革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并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则和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策略，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对私营工商业“一面扶持、一面改造”的观点和按“公私兼顾”原则调整公私关系的意见。他一方面采取各种经济政策引导和扶持私营工商业恢复、维持和发展生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的调节造成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国营经济的态势，为国家把私营工商业夹向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

同时，他在调整过程中还及时地提出了要把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思想。在计划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理论的指导下，成功地理顺了计划安排与所有制改造的关系，既有效地展开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工作，又有效地改变了私营工商业的无政府状态，为改造奠定了基础。另外，他还提出了改造与改组相结合的思想，即在改造过程中要注重经济结构的改组，在进行经济结构改组时，一些行业的去留与否应以其是否符合社会需求为转移，而且这项工作的落实要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断增长前提下进行。需要指出的是，陈云在论述自己的上述观点时，始终把握着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必须立足于国情，必须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方便。因此他反对下顾条件地进行盲目的集中与合并。

（二）农业发展理论

这方面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方面，关于解决我国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大规模工业建设之间矛盾的理论。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统购统销”，即对粮食既征购又配给。“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这一矛盾包含着国家与消费者、国家与商人、国家与农民、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多种关系，其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主要矛盾。基于苏联的教训，只有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入手，让农民同消费者一起承担粮食不足的困难，方能有利于农民种田积极性的保持与提高。其焦点问题是粮食价格的确定。制定粮食价格的基本原则是兼顾农民、消费者和国家二方面的利益关系。

第二个方面,是陈云经常从国民经济全局来认识农业问题,总是强调“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农业问题是民生问题;“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这些思想说明陈云把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目标、重大建设项目的确定、改革方案的策划建立在国情基础上的一贯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强调经济发展必须稳妥的基本立场。

(三) 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

首先,他把毛泽东提出的国情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结合起来,提出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的观点,明确认为建设规模受国力制约,从而指明了控制经济建设过热的基本原则。其次,他提出了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关系的思路。即“先生活、后生产。再建设”。认为在组织再生产时应以人民生活的改善与提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最后,他指出在进行扩大再生产时,应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即以内含型扩大再生产力主,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为辅。这一主张对于提高经济效益,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 社会主义流通理论

社会主义流通、市场及商业工作方面的理论在陈云经济思想中占有显著地位。他认为,流通问题。市场问题以及商业工作是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在稳定、方便人民群众生活、实现为人民谋福利的革命宗旨、检验国民经济建设方针正确与否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商业工作是民生问题、政治问题,商业工作者应树立政治观点、群众观点与生产观点。他辽对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市场的结构进行过符合国情的划分,认为社会主义市场应该是一个以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的大市场,这个大市场的主要职责应是调节生产与需求、组织好供求平衡。他还在上述基本认识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商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设想。

(五) 经济效益理论

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时,有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搞经济工作不仅要算大帐,也要算小帐,宏观。微观的经济效益都要讲,坚决反对大少爷办企业的作风。从宏观方面看,早在 50 年代他就提出不论是计划的编制,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与方向,还是企业布点,项目设计,这些大的经济问题决策时,都要注重经济效果。要保证宏观效益,必须重视稳妥,要稳扎稳打。如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控制住建设速度,抓好基建质量,从短线出发搞好综合平衡,在稳中求效益;从微观方面看,要提高经济效益,就应从投入与产出、经营管理等方面入手,开展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降低产品成本,开发产品花色品种,特别应该注重企业产品与市场需求相适应问题,等等,这些观点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六) 计划理论

陈云认为,要编制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经济计划,必须从保证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与提高出发,否则就不能保证计划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还应认真研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关系,在研究过程中,切不可生搬硬套书本知识,应从实际出发并借鉴历史经验。编制计划时,应提倡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保证重点、留有余地。同时也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防止长官意志,确保计划的科学性、完整性与可行性。需要指出的是,早在 1954 年,他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计划可以有准确的和不准确的两种类型,这就是指令性

与指导性计划。这一认识为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的灵活性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七）对外开放理论

他认为，对外开放是改革以来的一个大题目，很有必要、势在必行，必须把这个题目做好。他针对刚开放时发生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方针与基本的原则。他首先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外国资本家仍然是资本家，他们的动机是赚取利润，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可大天真。应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审时度势，反复权衡，引进和利用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具体操作时的基本原则是：借到的外债只能用到最关键的项目上；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内的配套能力和还本付息能力；要认真谨慎地进行可行性研究，定案时应有专家参加，宁慢勿急；要在消化、改造、创新方面上下功夫，引进方式上以引进“软件”为王。

（八）综合平衡理论

早在1954年，陈云就提出了国民经济的平衡是包括财政、外汇、供求三方面各自的平衡以及相互制约影响的平衡的思想。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最终形成了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四个方面的平衡以及相互平衡的完整内容，与此同时，他还系统地提出了搞好综合平衡的原则与措施，他认为：综合平衡就是国民经济中各种比例关系的协调，是全局性的平衡。要保证综合平衡，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要留有余地，应该从短线出发，而下是从长线出发实施综合平衡。在进行以平衡为目标的调节时，特别应注重农业的情况，要认真研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关系，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等等。他的这些观点，不仅涉及到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也涉及到结构的平衡问题，而且属于动态平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买质上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宏观调节理论，也是他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又一重要理论贡献。

（九）经济改革理论

1956年，陈云根据我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提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模式及其运行方式的思路。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的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可见，陈云的思路是，（1）大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并不是清一色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为补充的多元结构。（2）应该建立一个以集中统一为主，分散经营管理力补充的、统分有机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3）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是，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或主体）、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市场调节以及由市场调节的自由生产的，有集中有自由、有主有次，既有统一性计划性，又有灵活性与多样性的经济格局。这一思路本身已经反映出他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改革意见。正因为有这一基点，在全党开始全新思考这一体制的得失的时候，陈云在主持起草的几个关于财

政体制、工业、商业企业体制改革的文件中，提出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80年代以来陈云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是“笼子”，搞活经济是“鸟”的论断，反映出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的新的认识。

从下面概述的陈云主要经济理论中，我们感到陈云经济理论具有鲜明的特点。认识这些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经济思想，而且对于我们研究和处理当前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经济问题也是非常有益的。

1. 为人民谋福利是陈云经济理论的基点。

陈云在分析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与经济问题时，总是把安排、改善、提高人民生活，为人民谋福利放在首位，作为考虑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点。早在战争年代，他就认为，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与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要发动群众就必须首先“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共产党如果不关心群众生活，不为群众的利益去斗争，甚至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要发动群众，使群众积极支持与参与革命战争是很困难的。战争年代如此，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当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建设与生活的位置如何摆？是先生活、后建设，还是先建设、后生活？陈云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进行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影响人民现有的生活水平。后来他将这一观点进一步表达为“要吃饭，二要建设”，“先生活，后建设”，当我国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时，他一边总结经验教训，一边想方设法考虑让群众渡过难关，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陈云的整个经济思想体系的基本点就是按照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以为人民谋福利为宗旨。他时时把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当成一项重要国策。

2. 一切从国情出发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

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贯串在陈云经济思想的所有方面。在许多重大经济问题上，陈云总是强调要注重国情。例如他特别强调指出，中国是“大国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而且不平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各项经济工作不能离开这个基本的事实，否则就会犯错误。

3. 脚踏实地而又稳扎稳打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

与前两个特点相联系，陈云经济思想的又一个特点是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地建设社会主义，强调“稳妥”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他在分析、决策经济问题时，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这就是要“稳妥”、“稳扎稳打”。在三大改造期间，特别是对农业，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的合作化过程中出现了步子过急、盲目合并的问题时，他及时指出这种倾向的盲目性，认为：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全国都大踏步地“冒进”时，他冷静地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总的精神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站稳的目的，是为了前进。”^⑪为此，必须“退到可靠的阵地。”^⑫“只有

这样，才能站稳脚跟，在巩固的阵地上前进”^⑬。这些老成持重的意见，当时未被采纳，结果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1962年，陈云怀着对人民负责的赤诚情感仍然一如既往他说：“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⑭改革开放以来，陈云继续坚持这个“稳”字，多次重申：“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⑮，“在下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⑯总之，陈云一贯注重稳中求实、稳中求速度、稳中求效益。

二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

陈云作为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和经济管理家，其理论贡献举世瞩目，这里我们仅重点提炼出几个主要方面。

（一）对国情论的深化与发展

国情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晶，陈云的国力论，即经济建设受国力制约的理论，是毛泽东首倡的国情论在经济建设中的具体化。陈云把国情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结合起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并得出了这一结论。同时把这一结论运用到经济决策的方方面面。例如，他认为，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针、确定发展目标时，要以国力为基点；在决策投资规模与方向时，要全面安排，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因为有国家财力物力的制约；在处理财政问题时要量入为出，把有限的钱花在“刀刃上”；在基本建设决策上也要视国力而行，按先生活、后生产、再基建的原则安排，“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在组织扩大再生产时要依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次序进行；在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时要考虑国内的还债能力，配套能力与消化能力……。这所有认识无一不是从国力、国情出发。

（二）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理论建树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对我国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原则。陈云在毛泽东提出理论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始终把握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把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程既看成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过程，同时又是组织、安排、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改善、提高人民生活过程，具体说来：（1）把国民经济恢复与工商业的改造视为一体，通过扶持私营工商业恢复发展生产，将其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轨道，为改造创造了条件。（2）把计划与改造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提出采用不同的计划方式将各种经济成分纳入计划调控范围，既完善了计划，增强了计划的灵活性，又使改造工作深入。（3）把改造工作与经济结构的改组结合起来，既推进了改造，又调整了原来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提出经济结构的改组要依照社会需求结构进行。（4）自始至终坚持生产关系变革要以生产力水平为转移，明确指出了改造过程中步子过急、盲目合并的错误倾向。

总之，陈云的这些思想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基本思想的合乎实际的发展，将这些思想看成是理论上的贡献并不为过。

（三）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融会贯通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高度抽象的理论概括，本质上也适合于社会主义。但是如果具体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如何去具体组织、安排、平衡其再生产活动，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陈云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突出的。他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再生产理论，后来在 60 年代的调整时期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比如，在再生产资金的分配上，考虑到资金、物资与建设目标的矛盾而提出的国力制约理论，反对不顾国力的冒进，提倡扎扎实实前进，在具体组织再生产时，提出的三先三后的原则，反映出他对生活与生产、积累与消费、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内含型扩大再生与外延型扩大再生这些再生产的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并认为现行生产是否台比例的标志就是市场供求关系是否平衡，供给紧张时说明不平衡，其原因就是建设方针冒了。并提出了调整再生产比例失调的各种措施。比较而言，我国领导人中对再生产问题探讨最多、论述最全面、深刻的，应首推陈云。

（四）对我国经济改革理论深化发展的推动

陈云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管理体制模式、经济运行方式的探索，推动了我国改革理论不断发展。他在 50 年代以来先后提出的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设想、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体制设计及运行模式。如果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具有重要作用。首先，这些思想许多方面已经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框架，开创了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之先河。其次，“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认识，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乃至“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先声。陈云在这方面的观点，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对近十几年来改革理论的形成与完善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宏观调控理论

陈云在 1954 年提出、后来逐步完善的综合平衡理论，可以认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宏观调控理论。这一理论是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依据其国力论、再生产理论、计划理论以及管理体制理论而建立起来的。综合平衡理论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从实物形式与价值形式两个方面的运动加以认识，并包括国内与国外两个领域的物流与货币流，因此它是按照一个开放的系统，从动态角度以总量与结构的平衡为目标的调控理论，同时这一理论还提出了具体实现综合平衡的调节策略与措施。许多措施与方法，如从短线出发进行平衡，“关停并转”、“伤筋动骨”式的调整方针等等曾经取得过显著效果。总的看，综合平衡理论对防止或有效地制止经济波动，避免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许多观点，在建立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体系中，仍应借鉴。

陈云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很大，远不止上述几点。即使仅从上述几点看，他的经济思想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中独放异彩的重要一页。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

注释

《陈云文选》第 2 卷，第 267、211、152 页。

⑪⑫⑬⑭⑮⑯《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55、13、29、310、130.136、136、150、206、248、268 页。

《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164、166 页。

论陈云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

甘源

陈云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方针政策，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就是陈云的经济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原理构成了陈云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

一 陈云经济思想的理论标志

陈云的经济思想，包含着一系列重要的内容，在这些内容中。什么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理论标志呢？我认为，把他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思想作为他经济思想的理论标志是适当的。

第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思想对陈云经济思想所论述的关于中国经济建设与改革的问题，在最重要的部位上作了理论概括。

陈云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陈云完全赞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他认为，从全国来看，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陈云还多次强调，反复说明按比例才能取得高速度。陈云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明确了他对我国经济体制形式、经济改革内容和经济发展基本方式的原则立场。

第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思想最集中地体现了陈云经济思想的创造性。

“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陈云在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计划经济原理，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种创造性体现在陈云经济思想的许多方面，其中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方面最力集中。例如：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陈云认为，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他主持制定的粮食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就是在农业比较落后的条件厂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重大措施。又如：陈云下赞成安排计划指标单纯突出钢，他提出计划指标要注意综合平衡、并且留有余地求得按比例发展的观点。他还提出计划工作要随时随地注意物资、财政、信贷三个平衡的观点；在物质安排上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观点；在生产和生活的安排上要首先照顾占人口80%的农民的观点；发展各项事业特别是进行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的观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的观点。他一贯主张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也不赞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陈云还形象地把国家计划比喻为“笼子”，把搞活经济和市场调节比喻为笼中飞的“鸟”。他还提出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下乱等观点。这些观点，都是

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思想突出显示了陈云经济思想的特征，表现在三方面：（一）陈云总是力求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置于现实的基础上。他主张必须根据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安排计划，确定和调整比例关系。他不赞成保守，更反对冒进。他认为纠正冒进倾向比纠正保守倾向困难得多。

（二）陈云在党内较早和较清醒地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弊端。他在八大前后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了一些探索，并在他为国务院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文件中，贯彻了中央与地方行政分权的思想。陈云还在 60 年代初提出了重视市场调节的思想，在新时期，陈云又阐述了将马克思有计划按比例原理加以发展的思想。（三）陈云又是最坚决、最始终如一地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原则的。陈云一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他认为过去计划工作制度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因此，我们要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但不能抛弃它。

第三，从有计划按比例思想本身的内容上讲，它又是陈云经济思想中理论容量最丰富并形成独立体系的部分。

在新时期，陈云丰富和发展了他有计划按比例的思想，使这一思想，既包含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经验教训的全面总结，又包含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设计；既包含对社会经济微观活动方式的搞活，又包含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加强；既包含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又包含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既包含着改革的基本内容，又关联到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说，进一步完善了的有计划按比例思想，实际反映了陈云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构想。

二陈云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理论探索阶段。这一阶段是从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时期到东北解放区经济建设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扫荡”和国民党军的包围封锁，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陕甘宁边区号召部队和机关开展生产运动，并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经过这一运动，下边区渡过了严重经济困难，陈云也在这一运动中积累了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陈云经济思想体系就是从这里起源的。主要表现在：用发展生产的办法解决财政困难；财政工作的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在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上，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了财政，这是大政方针；做好财政工作的要点是：第一既要解决问题而又不浪费；第二力量要集中，不要分散；第三思想要一致。陈云还提出要特别注意边区财政工作中存在的盲目性。

继在陕甘宁边区提出要克服财政工作中的盲目现象的意见后，陈云在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期间，又提出我们解放区要把加强工业的计划性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位，“要使一切国营、公营企业，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他还说：“军火工业，重工业，轻工业各搞多少，要有适当的比例。”他认为“从总的方面来看，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都需要互相配合，不统一管理，经济就

搞不好。”他说：“总之，没有计划就会造成浪费，按计划办事就可以提高生产，也可以为将来搞全国计划打下基础。”陈云在《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这篇报告中提出的上述论点，实际反映了陈云经济思想的雏形。

（二）理论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从1949年8月上海财经会议到1956年7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陈云在谈到这一阶段的思想活动时曾说：“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下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所谓“问题”，主要是指在这一阶段，党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即统一经济，稳定物价；统购统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期间，还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这些“碰到的问题”为陈三经济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创造了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陈云经济思想形成于这一阶段，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陈云提出了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最关重要的问题是粮食的思想。

陈云亲自指挥了统一经济、稳定物价的“战役”，他在当时和以后指出，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主要手段；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纱布以稳住农村，稳定市场、控制物价工作的重点在大城市。陈云还主持制定了粮食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陈云认为，中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粮食供需之间严重不平衡情况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他认为，要解决好粮食供销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私商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及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而最难处理的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陈云认为，如果解决好同农民的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他向中央建议一定要采取彻底的办法解决问题，即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对城镇消费者实行粮食配售。

另一方面，陈云提出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思想。

稳定市场、控制物价是同全国财政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相结合进行。陈云提出了“管理上坚持先大公后小公的原则”，以及在落后贫困的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的意见。

继在陕甘宁边区提出克服财政工作中的盲目现象、在东北解放区提出首先要加强工业的计划性的意见后，陈云在1951年《做好工商联工作》的总结讲话中，又提醒同志们注意，“我过去只说国营经济的领导，现在第一次说到国家计划的领导。”并认为“今后国家计划很可能是公私斗争中我们手里的一个重要武器”。

陈云还提出了经济建设要平衡发展、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安排计划指标的思想。他在向中央所作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指出：“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下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陈云还直接主持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把所有制的改造和经济结构的改组密切结合起来。通过各行各业分配原料、分配生产任务、计算设备能力、安排生产计划等办法，把国营、合作社经营、公私合营、私营工业都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并对全国市场实行统一领导，城乡

市场由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分工负责。

当然，陈云经济思想的形成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但方方面面都是围绕着民生问题、建设问题这两大基本问题。

（三）理论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 1956 年 9 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到 1985 年秋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从开始到完成的整个过程，是在这一阶段实现的。因此，尽管这一阶段被中断为前后互不相联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 1956 年到 1962 年；后一阶段从 1977 年至 1985 年），但按照思想发展的逻辑，我们仍应将这前后互不相连的两个阶段，视为陈云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陈云经济思想的发展和深化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陈云农业基础地位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开展而达到成熟。

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几次调整都是因为农业出了问题，又都是下决心加强和发展农业而解决的。这给了全党深刻的教训。陈云的农业基础地位思想就是在我国经济建设成功和失败的反复中得到系统总结而达到成熟的。

主要内容是：陈云提出经济发展必须建筑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他说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他认为，农业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⑪。

陈云还提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关系到国家的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他说：“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⑫他认为粮食工作不仅是一项重大的经济工作，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他号召“全党应重视粮食工作”。

陈云还提出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他先后提出过三点论据，即农业是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的原料来源；农业要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提供粮食等主要生活资料；另外，陈云在建国初期还提出农业是我国工业化的重要资金来源。只是那时他更强调工业化投资从农业上打主意，主张进口机器而不能花钱买粮自。60 年代初，他以很大的政治勇气提出进口粮食，以后又多次坚决主张进口粮食，以摆稳农民这一大头。可见，陈云的农业基础地位思想有个形成过程。

此外，陈云的农业基础地位思想，还在调动农民积极性，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合理工农产品比价，增加农业投入、确定投资重点等多方面开展。

另一方面，陈云完成了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探索，提出了要将马克思有计划按比例原理加以发展的思想。

早在 50 年代，陈云就提出了改进我国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的思想和意见，核心是下放权力，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他提出了工农商业除国家和集体经营外容许一定数量个体经营，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容许企业有一定自由等重要观点。陈云在 60 年代初还提出了重视市场调节的思想。他把市场问题和农业问题一起看作是民生问题，他提出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他说：“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⑬陈云在 1962 年的经济调整中，还提出了改进计划工作的意见。

他说，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计划指标必须留有余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陈云全面总结了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他说当时苏联和中国搞计划经济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这就导致了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即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不活。他提出市场调节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需的、有益的补充，要求大家有意识地认识到两种经济同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陈云还特别指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好现象，同时指出国家干预也是必要的。

陈云还坚决支持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他认为应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可惜些不吃亏的外债。他主张，“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⑭

当然，陈云经济思想的发展和深化还表现在其它一些方面，但方方面面都是围绕民生问题、建设问题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三陈云经济思想的理论框架

陈云经济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三十层次，最高的层次是陈云的思想方法；第二十层次是陈云经济思想的主体，它所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问题；第三十层次是这个主体在社会经济活动具体领域里面的进一步展开。

陈云的思想方法，实质就是遵循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陈云不但在实际工作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还把自己对这一原则的理解和心得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其成果即是他对这一原则独有的语言概括和表述，用陈云的话来说，就是任何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方法上，“要互相交换意见，对各种意见、设想和方案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并且一定要经过反复考虑而”后才作出决定。简言之，就是“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交换”，是从全面的而非片面的实际出发的关键；“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反复”，可以保证决定正确。陈云还进一步提出在工作方法上，我们应该用90%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下剩10%的时间来决定政策。

正如陈云所说，学习哲学，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这一点，对于任何工作岗位的同志，对于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最重要的”^⑮。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方针政策，都是他思想方法的体现。他的思想方法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陈云经济思想体系的首要的、最高的也是最基础的逻辑层次。

陈云经济思想的主体，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⑯。它的具体内容有两种表述，开始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后来是“四化”或让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主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二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对于前一个问题，陈云说，我国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

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

对于后一个问题，陈云有许多思想和论述。主要体现为三大原则：一是按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办事；二是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三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按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办事，关键是综合平衡。陈云认为：“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下会是相同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①7}他说，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安排计划指标，做到既保证重点，又照顾一般；既积极，又可靠。

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首要的是弄清楚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陈云认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民生问题，建设问题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贯穿陈云经济思想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主线。

按经济规律办事，主要是遵循价值规律。尽管陈云的这一思想及实践，受到了历史条件的限制。但“经济工作必须尊重经济规律”，确是陈云的一项重要思想原则，也是他在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些关键时期，能起重大作用的原因之一。

陈云对上述前后两个问题的回答，就成为陈云经济思想在“主题”层次上的基本内容。

第三个层次是陈云经济思想内容最丰富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陈云经济思想展开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律的探索。譬如，在农业领域，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和论述，在财政金融领域，关于平衡财政收支、平衡信贷进出、平衡物资供需、平衡外汇收支的思想和论述，关于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活跃市场、确保税收的思想和论述；在商业领域，关于商业工作要树立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思想和论述；在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上，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和论述；在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才是最快的速度、“欲速则不达”的思想和论述，关于前十年打好基础，为后十年较快发展创造条件的思想和论述；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比例的调整将占重要地位的思想和论述，关于打破“大锅饭”，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的思想和论述。此外，还有他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思想，关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关系的思想，关于再生产的思想，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等等。

总起来说，陈云经济思想第一个层次所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建设的认识方法问题；第二层次所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总体设计问题；第三层次则是具体而系统地回答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

陈云经济思想的框架结构和逻辑层次，反映的是思维从抽象到具体的路线，因此，陈云经济思想逻辑层次的发展，反映着陈云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深化和突破。

当然，陈云在微观经济领域也有一些重要的思想和论述，这在中国领导人中是很突出的，而本文没有涉及。这是因为，成为体系特征和重大内容的是他对宏观经济的论述。当然，这些论述并不全部进入我们所概括的体系结

构中。陈云经济思想的体系结构，是对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原理）内在联系的揭示。

我们学习和研究陈云的经济思想，要着重把握他的理论体系。

（作者单位：江西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⑪⑫⑬⑭⑮《陈云文选》第3卷，第245、244、310、164、210、125、210、311、46页。

《陈云文选》第1卷，第366页。

⑯⑰《陈云文选》第2卷，第150、242、308、241—242页。

学习陈云关于经济工作必须 尊重经济规律的思想

刘占昌

“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种好现象。”陈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他领导江苏农民运动、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主管陕甘宁边区和东北地区的财经工作，到领导全国经济的整个过程中，都体现了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他在经济工作中的真知的见，领导才干和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和业绩，都是与此分不开的。

学习和探讨陈云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和方法，对于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十分有益的。

—

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都有着自己特殊的经济规律。在这种特殊的经济规律中，首先是决定着整个经济活动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基本经济规律，即生产目的是截然不同的。资产阶级的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或出发点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做经济工作尤其是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必须牢记这一点，并在实际工作中具体体现这一原则。在这方面，陈云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陈云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包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苏区人民的经济斗争中，都十分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他早在1929年领导农民运动时就提出，要“根据农民的迫切要求，有计划地在农村提出斗争的口号、任务和方式，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抗债，反对征工筑路，反对军阀战争等斗争”。在领导苏区职工运动时，他认为“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改善工人生活的有的错误倾向，和妨碍苏区经济发展的‘左’的错误倾向，都是与党在苏维埃运动中正确的路线不能并立的……都是对于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莫大的危险”。在延安任组织部长期间，他提出把改善人民生活，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作为群众工作的首要问题，列入地方支部的经常议事日程。在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时，他坚决贯彻党中央“自力更生”的财经工作基本方针，用发展生产办法解决财经困难，为克服由于国民党和日伪军的封锁而造成的财政经济困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与国民党当局以加重老百姓负担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者达到丰衣足食，后者弄得民穷财尽。”抗战胜利后，在负责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和东北的财经工作时，他把全党全军当时斗争和战争的目的，在经济上明确为“为劳苦人民争得土地、房屋，以及分粮、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免除失业、发展生产的民主”。从而为东北经济的复苏，根据地的巩固和全境的解放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陈云长期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在他直接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中，更时刻注重关心群众生活，人民利益，在经济建设和各种经济活动中，处处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建国初期。为了

解决由于战争而造成的财政困难，面临着是靠发票子，还是靠发公债、增产节约，增加税收的两种方案。靠发票子解决困难，工作简单易于操作，但受损的是老百姓，尤其是人民在日寇、汉奸、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遭受了十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的痛苦之后，期盼物价稳定。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陈云在调查研究，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主要采取了后一种方案，并巨批评了那种靠“温和的”物价上涨可以刺激生产的错误说法。由于指导思想正确，方法对头，加之其他措施，使全国财政经济实现了统一，金融物价得到迅速稳定。在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等一系列的困难斗争中，在实行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上，在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工商业的复杂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在他领导下制订国民经济计划 and 经济建设规划中，他的许多思想，如“一要生活，二要建设”，“先生产后基建”，“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等思想，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

陈云认为，人民生活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过去，我们“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现在我们面临青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正因为如此，他在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中，不但在大的发展战略上体现群众的利益，而且在具体的问题上，时时处处也都在关心着群众的切身利益。他要求经济工作要有全面观点、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要把人民生活的稳定，市场、物价的稳定，经济的稳定，同政治的稳定、社会的稳定联系起来：只有人民生活稳定了，经济稳定了，政治才能稳定，社会才能稳定。他对人民生活的提高和关心，大到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小到百姓的针头线脑。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穿袜子的问题，他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提出实施方案。这些，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可笑，却真正显示出他的成功和伟大。

马克思曾经说过，“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心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陈云在领导我国的经济工作中，十分注意掌握和运用这一经济法则。他在主持领导编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下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要按比例，“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台比例的。”在编制第二十五年计划时，他又强调指出：“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下平衡和混乱状态。”1979年，他又针对“文革”十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指出：“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在谈到80年代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时，他又进一步指出：“搞经济工作，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利润概念，是不行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就是速度。最快的速度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要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就必须搞好综合平衡。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中，综合平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陈云在实践中总结出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及外汇平衡四个方面。

早在建国前夕，陈云就注意了财政、金融、物资的供求和平衡问题。上

海财经会议研究了当时全国财政、金融、物资的情况，对当年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安排，并对第二年情况作了分析和估计，紧紧抓住了这一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要实现三个方面的平衡就必须统一全国财政、统一管理物资，统一管理信贷收支和货币发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平衡。为此，陈云同志在195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领导中财委提出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方案，经过中央、政务院的批准，3月开始实行，4月就见了成效，使物价很快稳住，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由于抗美援朝取得基本胜利及三年恢复的成功，到1952年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金融、市场物价趋于稳定。但1953年一些人头脑发热，忘记了财政的收支平衡，过多地动用了头一年的财政节余搞了重工业的投资，结果引起市场紧张，物价出现波动。中央不得不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才取得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并有节余。加之我国经过“一五”时期前三年工业生产的显著成效，使我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财政经济稳定发展。然而这又促使一部分人头脑发热，在批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保守”的前提下，再次提出了“冒进”的指标计划，基本建设增长过猛，农贷发放过多，社会购买力大于市场供应，市场紧张，物价不稳。

陈云针对这种情况，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进一步明确了财政、信贷、物资必须综合平衡的思想。他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为了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⑪他还从1950—1955年财政收支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的正面说明，以及1956年财政有赤字，物资供应不平衡的反面来说明这一点。由于有力的“反冒进”措施，并及时在全国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才避免了可能引发的物价剧烈波动，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57年我国各项经济效益指标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也进一步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四大平衡”理论在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客观经济规律。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会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违背这一规律，就会受到惩罚，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和波折。关于这一点，在“大跃进”的年代及其后来的“洋跃进”中，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建设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没有按照“四大平衡”办事，指责综合平衡论是“见物不见人”、“消极平衡论”、“静止平衡论”、“机械平衡”论，以人为的高指标冲破了建设规模同国力的平衡，基建投资翻番打破了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工业产量翻番打破了银行信贷的平衡；以钢为纲，破坏了正常的合理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银行信贷取消了控制，造成严重的信用膨胀；货币超大量发行，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其结果，整个国民经济效益大大下降，社会总产值的增长也由高峰迅速跌入低谷，财政收入下降幅度更大。加之1959年、1960年农业的大幅度减产，造成城乡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我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来不得不进行调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陈云为首的

中央财经小组采取了一系列在“三大平衡”理论指导下的措施，经过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很快取得成效。在还清外债的情况下，恢复了财政、信贷、物资的平衡。1962年财政略有节余，集市贸易价格下降35%。1963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开始回升，到1965年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各项经济效益指标也是建国以来的最好年份之一，全国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文革”十年在经济领域继承和发展了“大跃进”的“左”倾思想，根本不讲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提出所谓“需要就是比例”，“打仗就是比例”，建设规模大大超过国力可能，工农业比例失调，加之削弱了党的领导和管理，搞乱了经济制度和秩序，使建设和生产效益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损失相当严重。

粉碎“四人帮”不久，又开始了“洋跃进”，举债搞建设，不但破坏了财政、信贷、物资的平衡，也打破了外汇平衡。1979年，财政赤字达170亿元，1980年达127亿元。不得不又一次进行调整。经过一系列调整措施，主要是“两平一稳”（即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稳定物价），从1982年起，财政收入由连年下降转为回升。到1985年，在财政收支都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经济建设在调整中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然而，在巨大的成就面前，一些人又头脑发热，在追求高速度、高消费的情况下，又开始否定“四大平衡”的理论，说这是“产品经济的产物”、“僵化模式的理论”。急于求成、冒进的老问题又重新出现，不但基建规模过大。积累基金膨胀，而且还伴之于消费基金的膨胀。从1984年到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7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各种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大大下降。由于经济过热发展，供求失衡和结构不合理加剧，导致了1988年几次抢购风潮，通货膨胀率上升，零售物价比上年增长18.5%，流通秩序混乱，使改革措施也无法出台。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再次确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要求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基本平衡。1991年3月25日，李鹏在七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指出：“今后十年，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避免出现大的波折，最主要的仍然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特别是保持财政、信贷，外汇收支和物资的各自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综合平衡，”然而，就在治理整顿结束不久，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过热，物价上涨指数长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1994年达到21.7%，群众反映强烈。1995年3月召开的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要采取坚决措施，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确保物价上涨幅度有明显回落。要把发展经济的重点切实转到调整结构，增加效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上来。这再一次证明了“四大平衡”是一条客观经济规律，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具体体现。

四

陈云之所以能够发现和得心应手地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济规律，并在实践中一次次取得成功，从思想方法论的角度看，主要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在实际工作中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观察、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为了在工作中做到实事求是，他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重要原则。不唯上，并不是对上级的指示不研究、不执行，而是不照搬，不当收发室，是考虑如何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不唯书不是不读书，而是要领会其精神实质、结合实际，看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陈云是学习的模范，延安时期两个读书小组坚持下来，其中一个就是他领导的。“文革”中，他把《资本论》读了三遍。后来又反复读了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著作。唯实，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弄清事实，这是关键。为了弄清事实，他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六字工作法。“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⑫他反复讲：“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⑬

情况明了是研究解决问题和制订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而情况明了则是调查研究的直接结果。陈云之所以对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熟悉、明了，完全来自于他的深入、周密的调查研究。在主持中财委工作期间，每10天左右，要去一趟北京百货大楼，亲自察看日用百货的供需情况；去一次东单菜市场，看城市副食品的供应情况；去一次天桥农贸市场，考察农民进城搞买卖的情况。他作为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直接深入青浦农村搞蹲点调查，解剖麻雀，通过具体的事例和数字得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带有明确结论的调查报告。他在1962年的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是在作了历史调查、典型调查、部门调查等国民经济全局和总体调查之后，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教训才提出来的，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

陈云在调查研究中善于走群众路线。他认为，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蹲点调查；一种是通过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曾在身边工作的人员，同他们建立固定的、长期的联系，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真实呼声。他深入联系点上与农民交朋友，讲真话，协调办事；敢于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还愿意听取各种意见，欢迎群众多提意见。

在研究情况时，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和条件，按照唯物辩证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反复研究分析，全面考虑。在制定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尤其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要拿到群众中去讨论，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在制订重大决策时，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要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我国最基本的国情，一是社会主义，二是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多。”^⑭与此同时，还要全面考虑，统筹兼顾，从全局出发。

要善于学习，虚心学习别国先进管理经验的长处，但也不能照搬别国的

做法。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中得出我们带规律性的东西，以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

陈云在领导全国经济工作中，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善于运用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因而取得了经济工作的主动权，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地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但经济生活中的这些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仍然以各种形式在起着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注释

《陈云文选》第1卷，第6、11—12、283、310页。

《陈云文选》第2卷，第194、241—242页。

⑪⑫⑬⑭《陈云文选》第3卷，第56、248、319320、52、52—53、235—236、34、281页。

论陈云经济思想对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意义

赵士刚

陈云经济思想不仅具有经济资源配置方面的意义，也具有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深入理解陈云经济思想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意义，大有助于我们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坚定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信念。

—

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其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只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其他一些所有制形式作补充。

在我们党内，陈云比较早他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必要性。早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就建议保留一些小商贩和有经营特色的小商店、夫妻店。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明确提出，要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再次提出，有一部分个体私营经济存在，并不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解放初期，只掌握了第一部分（指公有制经济部分——引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但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他的这一思想，为我们党纠正1958年以来逐步形成的所有制结构过份单一化的偏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历史条件下，要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就要在经济政策上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关系。50年代初期，陈云在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在生产领域，国有制经济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产业部门中的分布分明；在流通领域，国有制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也取得主导地位。由于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搞了加工订货、代购代销，减少了税收环节，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因而有人提议按照买卖关系的变更，给公有制经济多加一道营业税，实行“公私一律”的措施；并相应改变纳税环节，给私人批发商免税。对于这些意见，陈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陈三的依据之一，是公有制经济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承担了私有制经济所不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他指出，“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第一，国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性质不同，国有制经济全部利润要上缴国家，私有制经济只上缴所得税。第二，国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承担的责任不同，私有制经济虽然也供应市场的需要，但它只是做买卖，赚钱；国有制经济则为了维持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两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负担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国有制经济要做赔本买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既然国家赋予公有制经济这样的社会政治功

能，使它担负着许多私有制经济所不担负的社会政治任务，那就不能搞“公私一律”。因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下公平的。”

对于改变纳税环节，他同样认为不行。陈云上说：“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进价和国营商业的进价一样，但是在卖价上他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现在他不怕营业额多，营业额越多，资金周转得越快，赚钱就越多。这样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这就是说，在国有制经济因国家赋予它的社会政治任务而不具有私有制经济那样的经营灵活性时，在国家政策上对国有制经济给以适当优惠，是天公地道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迅速形成。然而，国有制经济仍然承担着庞大的社会政治功能，肩负着稳定社会经济的责任，其经营机制转换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关于对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以保护公有制经济领导地位的思想，依然是有效的。当然，这不是说，公有制经济永远都要承担许多社会政治任务，永远都要受国家政策额外保护。因为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制经济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在绝大多数产业部门是可以减少的。改革要求我们把国有制经济推向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只是国有制经济转换经营机制需要一个过程，在经营机制转换尚未完成以前，我们还应一方面为它创造转换经营机制的条件，一方面在政策上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关系，对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经济政策上加以区别对待，以避免公有制经济基础受到不应有的削弱。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除了要在政策上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关系外，还要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资产的完好性。关于这个问题，陈云也提出过许多重要意见，他在1988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现在无论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他还指出，承包工交企业的，必须确保设备完好率。他的这些话，是针对国有企业普遍推行承包制后出现的下爱护国有资产的行为讲的，这对于我们今后维护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稳固性，也有其重要指导意义。

二

社会主义本质体现在最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上。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必须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在我们党内，陈云较早地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他在197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用20年的时间，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下大，但是还有差别。”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拉开收入差距，这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时期采取的一项重大方针政策，用以破除我国曾经一度盛行过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方式。“大锅饭”是原有经济体制的一种缺陷，尽管它同资本主义剥削有

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性质，但作为个人收入的一种方式，它在实质上却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因而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陈云指出：“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在这个意义上，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这个改革的意义，不下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陈云所说的“少数可以先富起来”，主要是指劳动者个人靠诚实劳动多得一点收入，以及企业靠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在市场竞争中多得一些利润。例如他说：“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⑪他多次强调企业要有“利润”观念，并倡导企业间要展开竞争。他说，“现在一些轻纺企业在上海开花，在外地结果，反过来进入上海市场，挤上海的产品。这是好事，不要用行政措施去阻挡，上海要接受这个挑战，迎上去和它们竞争，办法就是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另外，要有若干个大企业，能灵活地搞小批量生产，增加花色品种，使产品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⑫

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时期采取“让少数人先富”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较快地实现共同富裕。陈云所说的用20年时间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大体上差别不大”，指的就是共同富裕。离开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生活的目标，也就离开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中国只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⑬

陈云不仅提出了用20年时间所要达到的人民生活水平目标他还指出了达到这个目标时必须注意的一些政策原则。

第一，他认为，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既要有一定的个人收入差别，又要维持好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未得改善、尤其农民生活艰难的现实，他指出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建国快30年了，还有要饭的，怎么行呢？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就会带队进城要饭。“我认为，这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⑭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他又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的现实着眼，指出在低工资制的情况下，为了不影响人民基本生活的安稳，国家就有必要搞一些补贴。他说，粮食收购价格高，销售价格低，国家就要补贴。从微观经济看，还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如果“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从最后的经济结果看来，现在的办法。小的方面不合理，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⑮以后他还指出。不合理的补贴可以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来逐步减少，如某些企业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⑯

第二，他认为，应鼓励企业间展开竞争。但我国人口多，因此，竞争的出发点，不应当是让好企业搞垮落后企业，相反，“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行在。否则，容纳不了

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①7}

第三，他认为，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民生活既要有一定水平的提高，又只能逐步地、有限制的提高，而不能一下子无限制地提高。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增长的幅度。工资也好，奖金也好，对农民的补贴也好，都要有一定的限度。”人民生活需要改善，可以改善，但改善的幅度要很好研究。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样国家才有希望。”因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所以他说：“饭不能吃得太差，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①8}他把这视为我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原则界限。”^{①9}

社会分配关系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主要方面。社会主义不是共同贫穷，因而必须拉开收入差距。但社会主义又要求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共同提高。我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步，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能逐步提高，只能首先解决人民的贫困问题，然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再然后才能走向富裕，而不能一下子无限制地提高。只是少数人的收入能够提高的快一点。不过，过分拉大个人收入差距，造成少数人收入水平畸高的现象，是根本不足取的。只有在保证人民衣食有着的基础上，掌握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幅度，逐渐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是最终实现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的可靠途径，才能更好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三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运行手段，在一定意义上，只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在这一意义上，陈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在资源配置上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他是我们党内率先主张进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以发挥市场作用领导人之一。

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初，陈云就多次指出统购包销的缺点。他认为除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字商品继续采取这一措施外，其他商品应改为商业部门对工厂进行选购，以及工厂委托商业部门代销或自销，商业部门取消上面的派购，实行自由选购等等。1956年党的八大上，他明确提出要以国家计划为主体、以自由市场为补充的改革思想。

改革开放初期，他在1979年3月写的提纲《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过去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的这一观点对推动我们党在新时期解放思想，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84年，他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②0}进而，他在以后的许多讲话中要求更新计划观念，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②1}。他要求计划不要太死，计划包括的东西不要太多，计划部门要从日常调度中摆脱出来，议大事，看全局，把宏观方面管住管好，以便发挥市场的作用，搞活经济。

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十分重要的是，计划这个经济运行手段在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也发挥着一定的社会政治作用。并且，不同的国家、不

同性质的政权，还可以给计划这个资源配置手段，赋予不同的社会政治作用。在这一意义上，陈云一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有计划。

建国初期，计划经济是我们党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如陈云所说，“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指计划经济部分——引者），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②②}那时，我们党主要是用计划经济手段直接参与经济生活，壮大国有制经济，巩固政权；用计划经济手段制止投机资本，稳定人民生活；用计划经济手段进行大规模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时满足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用计划经济手段实现对民族资本的和平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等。

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非常重视计划经济手段的作用，从社会政治作用上看，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之一是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只有运用国家计划手段，才能根据人民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确定哪些是大事，哪些是小事，哪些是建设重点，哪些不是重点，并在重点确定之后动员全党全民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②③}搞经济建设上的“大革命，大建设”^{②④}，他曾批评说：有几年，有些地方和部门打乱仗，乱上基本建设，乱涨价，乱摊派，乱发资金，把资金分散了。中央手里的钱，除去行政、科研、文教、国防的经常费用，剩下的可以说办不了什么大事，这样势必失去重点，因小失大，处处被动。为了避免这种被动，他一再强调：“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②⑤}

第二，经济发展速度事关社会主义的命运，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对立斗争中要能够站得住，取决于社会主义能否有更高的发展速度。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进程上，发展慢不是社会主义。但从经济运行上看，陈云认为，盲目追求快速发展，造成折腾，其“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②⑥}。而只有“在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②⑦}，才是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快速度，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快速度。为了实现这样的快速度，就必须用国家计划来制约“急于求成”的偏向。

第三，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②⑧}而在经济运行中，只有保持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才能为实现这一目的创造必要的条件。为此，就必须有国家计划的指导和控制。如果没有国家计划的指导和控制，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和经济增长波动的局面，就会使人民群众生活受到影响。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内在联系了如指掌，例如，在我国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的情况下，投资决策没有计划，就会乱上许多有缺口的建设项目，发生物资紧张；发票于的权力不集中，无人把关，就会多发票子，造成通货膨胀。凡此种种，最终都会表现为物价上涨，而“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这种涨价的形势如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②⑨}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的也就难以实现。

第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党的建设具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经济权威与中央政治权威的相互关系。陈云认为，中央的经济权威是中央的政治权威的基础，如果中央不能在经济活动中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也就是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那么中央的政治权威也是不巩固的，社会也无法稳定。^{③⑩}因为中央的经济权威是以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以及依据计划进行宏观控制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所以，陈云要

求全国上下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方针、政策和措施。^{③①}在他看来，这样做，同时也就是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政治权威。

当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日益重要，正在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增强，并不意味着国家计划所具有的资源配置作用和社会政治作用目的消失。相反，在我们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家计划不仅仍在发挥着资源配置作用，同时也仍在发挥着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和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原则的重要的社会政治作用。因此，我们仍然应当加强和完善国家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宏观计划性，克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以便使计划这个经济运行手段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从而真正实现党的十四大提出的“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的改革要求。

四

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都不能关起门来，脱离世界。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管理方法，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

陈云在指出对外开放必要性的同时，又指出，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做生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改变了。他指出：“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③②}

陈云还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有些机器看来似乎利润低，但是同另外一些机器或费用合起来的利润，绝不会低于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③③}陈云这番话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外国政府和外商之所以欢迎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完全是出于对其自身利益的打算。在我国前一时期的外资投向中，利用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之间比较利益赚钱的加工工业多，国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短线部门少；利用劳动力赚钱的初级加工、劳动密集型多，而高新技术的技术密集型少；只图眼下迅速赚钱的中小项目多，大型项目少。其中一些短期投资的拥入，是为了在国外低利率的情况下，为赚取超过国际平均储蓄率的利息收入而来的，带有相当大的投机性。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为了做到立足本国实际、维护民族利益、坚持自力更生、防止和平演变，陈云还提出了许多政策原则。例如：第一、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愿意借给我们外债的国家纷纷到来。今后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也是必要的。但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第二、借外债过多，一个主要原因是想加快发展。想加速发展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国内投资配套能力不足，

引进项目就会窝工，就会造成浪费。“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③④}第三、要纠正国际市场上出现的某些中国货降价的偏向，因为有些不是正常的必须的降价，而是各省市、各部门为了取得外汇自己降价。要研究一个既能出口又丁贱卖的方案。第四、引进外资也好，搞来料加工也好，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产品挤掉了，要保护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第五、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完全正确，但要把我国经济发展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而不能企图靠多借外债来发展国民经济，因为靠多借外债是靠不住的，第六、我国是一个大国，要建立不依附于任何国家的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而不能像有些小国或地区那样，靠美国有意扶植只发展加工工业。第七、必须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不能让外国资本家任意施展其资本主义本性，要防止消极东西。“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③⑤}例如有些人看到外国摩天大楼，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向往资本主义，对这些人要加以教育。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依然保持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本性、外国资本的旗帜上依然写着高于国际市场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的世界上，我们既要避免二战后某些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受发达国家操纵的教训，不能“美国只要打个喷嚏，就会染上肺炎”；又要避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教训，不能听由别国来干涉内政，不能让西方世界的那些错误的腐朽的东西污染社会。我们只有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性和外国资本家的本质，并遵循正确的对外开放原则，才能有效地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抵制那些错误的腐朽的东西，从而保证我们的对外开放健康地进行。

五

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因此。还只是低水平的社会主义。按照我们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到下个世纪中叶，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才可在生产力水平和国民收入总量上，与发达国家持平。

然而，陈云又指出，“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③⑥}他认为，这种优越性。已经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上体现出来。

第一，我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增长很快，年平均增长保持在20%左右。因此，陈云同志说：“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③⑦}

第二，从1953年到1989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8.7%，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6.8%。其间，虽然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冲击，使“我们的建设丧失了几乎二十年的时间”^{③⑧}，其中有几年是负增长。但

在这近 20 年中，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也还达到 6%。因此，陈云说，“从‘一五’到现在近三十六年，中间虽有曲折，但发展也下算大慢。”^{③⑨}

第三，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相辅相成。陈云特别指出：“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搞的一百五十六项、尖端科学技术，石油自给、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二套大化肥，宝钢以及铁路、电力、农田水利建设，它们的作用不能低估。”^{④⑩}我们知道，我国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这些成就，是在生产力落后、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迅速取得的。现在，我国不仅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原子弹、氢弹、系列火箭、通讯卫星、正负电子对撞机、生物工程、计算机技术均已先后问世，我国的航天技术电已经能与世界先进水平论高低了。

第四，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年平均增长 10% 以上，在国际上被公认为“超高速增长”。这期间，经济体制和经营方式的变革，技术进步的加快，使得新技术、新工艺，无论在数量还是品种上，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国民经济持续繁荣，消费品短缺现象基本消除。因此，陈云同志说：“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④⑪}

可见，计会主义优越性不是抽象的，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不实行社会上义制度，那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上述成就。在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低、地区和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相当突出、人口多造成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情制约下。如果实行私有化，则产业组织必然以高度分散的小型化的形式出现，它不但无力在基础产业、高技术产业方面进行开发，而且还会大量吸收本可以用于高度化开发的短缺资源，使本可以高速发展的机会失掉，影响发展的速度；如果实行私有化，则无法按照人民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去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无法从宏观上正确决定不同地区和部门发展上的优先次序，难以迅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更难以迅速走向现代化。如果实行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例如按美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来分配中国的国民收入，让 20% 的富有者占有国民财富的 76%，而 80% 的人只占有财富的 24%，则有些人就会饿死，就会形成严重的社会不公，诱发广泛而尖锐的社会矛盾。正是由于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使我国经济终于“走向新生，走向重建，走向繁荣。”^{④⑫}

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陈云的话：“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43）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11)(12)(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3)《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245、336、254、337、337、336—337、313、319、236、278、376、253、360、360、337、350、245、323、319、279、351、268、280、277、366、366—370、227、252、335、332、366、254、366、366、380、347、380 页。

(42)《陈云文选》第 2 卷，第 198、198、199、199、102 页。

(13)《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9 页。

论陈云经济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史上的意义

王杰

陈云经济思想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的结晶，是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经济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经济思想一直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居于主导地位。明确陈云经济思想在毛泽东经济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就可以看出陈云经济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党许多卓越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陈云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

第一，为毛泽东作出科学判断提供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很多指导原则，主要是由毛泽东在总结我们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广泛地吸收我们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及专家的正确意见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陈云经济思想则是毛泽东提出总体指导原则过程中吸收正确意见和理论观点的一个重要源泉。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的提出就是这样。陈云对于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认识非常清醒。早在1950年，他就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大，安排同国民经济首先遇到的是要解决粮食问题，粮食是农业的主要产品，所以，研究和安排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方案，首先要研究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他还用我国经济建设中多次出现农业丰收促进工业发展，农业歉收迫使工业压缩，甚至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事实，说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陈云的这些论述，对我党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1957年9月，陈云再次清醒地提出：必须在省吃省穿的基础上搞经济建设，必须先搞农业。否则，农业生产从遭受损失到恢复发展之间周期长，一耽误就是5年。而耽误了5年，对国民经济影响，就要耽误15年（“一五、十五”是第一次就农业波动对国民经济影响关系的量化概括）。但是，对陈云这样清醒明确的告诫，当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此后，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农业遭受挫折，国民经济受到全面影响后，我们党的对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吸收陈云等同志正确意见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于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二，补充毛泽东的论述，使之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纵观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可见，毛泽东思想体系中许多内容，首先由毛泽东针对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正确的理论原则或方针，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再作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只停留在一种主张或观点的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则在贯彻这些原则和方针的过程中，又作了创造性的发展和补充，使之形成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一个结构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比如，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体系中具有显著地位的国力论就是这样形成的。早在1955年，毛泽东提出了五条财政方针，其中有一条就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后来又作了补充，发展成为有多少钱和多少物资办多少事。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但是，毛泽东未能对这一理论原则作进一步的论述。陈云根据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毛泽东提出的原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57年初，陈云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原则，并作了详尽、精辟而又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建设规模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与否，这是经济稳定不稳定的界限。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负担能力，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适合，经济就稳定。他特别指出，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应当注意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他还提出了实现建设规模同国力适应的许多具体原则，使毛泽东提出的有多少钱和多少物资办多少事的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毛泽东经济思想体系中一个论点正确、论据充分、结构完整、地位又十分重要的理论命题。

第三，增加新的内容，使毛泽东经济思想得到丰富。正确的经济思想和学说是现实的经济运动中正确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两个时期的经济学说十分精辟，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由于“八大”以后，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已经开始的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未能继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对中国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在总体上也出现了曲折和反复。这在很大程度上铸成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体系不够严密、不够完整，关于中国经济运动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比较薄弱。

党的“八大”以后20多年中，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内容的矛盾暴露得比较充分，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也表现的比较清楚。陈云长期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对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相应地比较深刻、比较全面。陈云从宏观上研究和探索了在我国条件下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辩证运动，形成了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先基础、后指标思想。他认为：在整个国民经济运动体系中，首先要发展农业，并根据农业具有的负担能力确定工业的发展指标。其次，工业而要根据现在基础进行，拟定发展指标。这样，就把工业的发展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工业的稳定发展又能促农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又带动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从而形成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否则，若不把农业这个基础搞好，必然就会在国民经济中造成恶性循环。他还深入研究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在中国经济条件下发生作用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纠正了对我国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有很大影响的苏联“现行计划是根据远景计划制定”的传统观点。提出根据现有企业已经达到的综合生产能力。加上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加以确实计算，拟定远景发展指标，而决不能用倒过来的方法。陈云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我国经济的实际，提出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根本出发点的理论。他还根据现实经济运动的客观要求，提出了系统的经济改革思想。同时，陈云对社会主义经济辩证运动体系中的各个侧面也有深入的研究，

形成了丰富的财政思想、农业经济思想、商业经济思想。物价思想等。

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思想，补充了毛泽东经济思想体系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足之处，从而使毛泽东经济思想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完整了。

另外，陈云还针对毛泽东急于求成等“左”倾错误提出了正确的意见。毛泽东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经济建设决策上具体表现为盲目冒进，脱离我国财力和物力的实际，只顾一头，结果使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遭到破坏，物资供应出现紧张局面。陈云很策略地对冒进提出了批评，他提出，冒进使问题暴露得更明显了，只要我们很好地吸取教训，今后不再冒，物资供应就不会紧张了。他还指出，我国的经济情况很复杂，领导上不犯错误是很难的。1956年11月，他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讲话中说：“经济建设，1953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1953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经济建设上冒了一点，这是难免的，今后也难以保证不重犯，社会经济生活是复杂的，多变的，不会像看电影那样简单。半年来冒了一下，使我们取得了经验，也有好处。”但是，陈云等同志对于冒进的批评，毛泽东并未接受，毛泽东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早在建国前夕，陈云就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坚持以经济标准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分析解放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论证70%至90%的知识分子，是雇佣劳动者。要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安排，生活上不使他们有家庭之累。他还提出用传统师带徒和现代教育相结合的办法，培养和造就宏观大的知识分子队伍。陈云的这些观点当时未被充分重视，但对后来我们在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上拨乱反正，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又发展了他的知识分子理论，提出了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最宝贵的财富，要把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建设的基本建设，要下大决心，加快解决进度等大量的理论观点。

综上所述可见，陈云经济思想的丰富内容，不仅为毛泽东经济思想许多原则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许多理论发展、完善和形成完整的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内容，而且还直接为毛泽东经济思想增添了许多新内容。陈云经济思想还为纠正毛泽东的某些理论错误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所以，陈云经济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毛泽东经济思想新的发展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陈云经济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地位如何呢？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就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特征不仅反映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而且客观地反映了这一理论产生的过程。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陈云经济思想主要产生于探索中国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之中，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比如，他关于计

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结构的理论就是如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中，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全部是公有制。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在具体化过程中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理论上占居主导地位的是：“在苏联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呈生产资料公有制”，即“两种公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和合作集体农庄所有制与此相适应，有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国营企业和合作（集体）经济”。陈云在领导我国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中，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在成分结构上，应该在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还必须保留一定数量的私有制性质的个体经济。他说，“分散在居民区中的小商贩是我同商业中今后长期需要的一种经营服务形式。”所以。“安排这些小商贩的正确原则是：既要照顾居民消费的方便，又要保持小商贩经营的积极性，使他们获得适当的收入。”这就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上突破了苏联的模式，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和具体形式。再如，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列宁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思想变成了实践。陈云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工作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提出许多有创造性的思想。对民族资本家工作上信任。职务上安排、生活上安置，既要交往、又不腐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他对针对同国外资本家打交道所提出的欢迎中要警惕，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等一系列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同资产阶级打交道经验的结晶，形成了我党独有的完整的同资产阶级打交道的理论。

陈云的其他经济理论，如以“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格局，系统而完整的综合平衡论，著名的国力论，农业基础论。稳信阵地再前进，特别是方法论等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问题的产物，都各自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特点。都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由此可见，陈云的经济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树经济科学一代新风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一个时期，由于党内生活不正常现象的发展、深化，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理论界研究的正常气氛，经济理论界出现了无视现实，随声附和的现象。上级说：“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理论界就出现“论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性质”一类的“科学论文”；上级称道农业大放“高产卫星”，一亩山药产量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5000斤的时候，理论界就积极论证“三三制”（即毛泽东当时提出的用全国耕地的1/3种庄稼，1/3种树种草，1/3闲耕的设想）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为错误决策作“科学”的注释或提供“科学”依据，总之，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随声附和派。有的人无视现实生活的要求，一意配合政治需要，依小道消息或“暗示”，杜撰经济“规律”，建立“理论体系”。但是，就在党内生活和理论界学风严重不正的情况下，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肃认真地研究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动中的新问题，正视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的弊病和我们决策上的失误，提出有说服力的修正意见和经得起历史

检验的正确主张，树起经济科学的一代新风。

第一，研究现实，指导现实。经济科学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历来就有歧议，陈云没有从理论上去做大量抽象的论述，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民族只有首先满足了吃穿用的需要之后，才能产生精神的、理论的等更高层次的要求。陈云主持经济工作，紧紧抓住关系人民吃穿用和整个政治局面能否稳定和巩固这一基本问题，研究和探索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和整体运动的规律，并根据经济运动规律的要求，制定相应的政策，或积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成熟的建设性意见和完整的方案。陈云从研究中国经济实际出发，概括和抽象出一般理论原则，并以此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的科学方法，从实践中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经济科学的根本任务和发展方向问题，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不正常和理论界学风不正的情况下，为理论界树立了一种研究现实、指导现实的好学风。

第二，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陈云经济最明显的特点。在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正常的情况下，只要在方法论上不犯大错误，大体就能把握事实，形成正确的观点、主张和思想。但在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要客观地认识事实，特别是认识全局的事实，就有很大的难度，陈云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毫不动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不有意说脱离实际的话，办脱离实际的事。有不少人虽然明知不少事情是违背客观的，但为适应某种需要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陈云从不适应某种需要，放弃共产党人的原则，他的论著、讲话中就没有“超英赶美”一类不切实际的东西，也没有赞扬农业放高产“卫星”的溢美之词。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1956年，他对我们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提出了恰当的批评，为此，他和其他一些同志在1957年底到1958年初。先后连续多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陈云并未因此而放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59年3月，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文中。明确地批评全面铺开、齐头并进的错误作法，提出应使各个经济部门能够协调地、按比例地发展。1962年初，当有人对当时农业方面困难的估计过分乐观，说“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时，陈云在党的会议上又指出，这样的乡村是极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陈云敢于坚持“唯实”，敢于批评不实事求是的错误做法，也因此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未放弃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陈云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经济相结合的具体方法，以及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我国理论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仅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而且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从全局上进行拨乱反正，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可见，陈云经济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及毛泽东思想体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理论工作的根本方向、方法和作风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陈云经济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既是一座丰富的宝库，又是一面值得永志瞻慕的旗帜。

（作者单位，甘肃省人民政府研究中心）

注释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434页。

《陈云文选》第3卷，第28—2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陈云文选》第2卷，第312页。

从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 看陈云经济思想体系的起源

高西莲

陈云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是举世皆知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担负着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且政绩斐然，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思想，对此人们却了解甚少，本文拟从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发展的历史角度，来探索其经济思想形成的轨迹。

从1937年到1940年，是边区争取外援，休养民力，开始由依赖外援向半自给道路转变的时期。此时边区财经所处的特殊环境为陈云经济思想的形成创立了必要条件。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地瘠民贫，加之长期封建剥削和兵匪祸乱，经济十分落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仅面临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而且还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如果不致力于经济问题的解决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则将难以立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利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之后的有利形势，以及日寇虽隔河相望却尚无力入侵的相对的和平环境，提出并实行争取外援，休养民力，支持长期抗战的方针，以巨大的努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外援，以使边区人民休养生息，并根据边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内形势开始逆转，边区遭到包围和封锁，外援受阻。中共中央预感到外援之不可靠，便动员广大军民开展生产自给运动，以求逐步摆脱对外依赖。陈云此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虽未直接领导经济工作，然而却对边区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以及休养民力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他在1939年所写的《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和《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两篇报告中，从党的组织工作的角度，指示地方党组织要把“充分发动群众”视为“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要“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地方党部的经常议事日程”，并提出“改善民生”的方针，指出“不发动群众抗战就不能胜利”，“要使群众起来，必须改善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等，阐明了经济建设、发动群众和革命战争的关系。这些点滴看法虽然不是对经济工作的系统论述，但却显露出陈云坚持物质利益原则，重视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思想特点。这一特点在此后就成为陈云经济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从1941年皖南事变到1942年，是边区自力更生，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力争由半自给向完全自给转变的时期。此时边区开展的以科学技术为指导的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为陈云经济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当时边区财政经济的特点是，一方面国民党反共活动变本加厉，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更加严密，一切外援均告断绝，“边区财政被迫急剧走上自给，当时困难到提出饿死、解散与大家动手生产的三条道路，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边区经过几年的休养民力，经济各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自力更生，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方针，向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提出了“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旧墟上，在不断的战争环境中，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大批的经济工作者和从事各种科学技术工作的

人才，要搞好边区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当时党内一些人囿于长期革命战争的环境，，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经济和技术工作则抱有轻视的观点，认为做政治工作或军事工作是光荣的，做经济和技术工作是没有前途的。1941年5月1日，陈云力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应纠正某些党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要求“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和党内的专门家学习”，“并使自己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同日，边区中央局公布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以科学技术为指导的经济建设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农业战线的科技工作者们大力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指导边区人民兴修水利、改良农作、推广良种、改革农具，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战线的科技工作者们，以自己的发明创造，大大提高了边区工业的生产效率和工业品的自给水平。纺织工业中有难民工厂，研制成功了立式水轮动力机。打毛除尘机、织毛毯机、打纬机等；造纸印刷工业中有振华造纸厂，先后研制成功了以马兰草作原料和以稻草、麦秸作原料的造纸方法，大大提高了造纸生产的质、数量，基本满足了边区对纸张的需求；石油工业的科技人员经过调查研究，初步掌握了陕北石油分布、油质、地质与地层，开发建设了延川县永坪石油厂和延长石油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延安还分馏成功煤焦油，是边区化学工业的一大成就；在军事工业中，1938年初沈鸿带了10部机器和7名技术工人，从上海来到延安，使兵工厂由单纯的修理走向研究制造；医疗卫生事业的科技人员，制出新药干余种，尤其是粗制青霉素的试制成功，解决了当时贵重药品匮乏的难题等。边区科技工作者们所创造的光辉业绩，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经济由半自给向完全自给的转变，证实了陈三代表中共中央所制定的重视经济与技术工作，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以科技发展促进经济建设的政策是英明正确的。陈云起草的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从保证干部力量上，对边区经济建设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从1943年—1945年，是边区经济逐步走上健康轨道，财政经济状况大为好转的时期。此时陈云直接参与和领导边区财经工作，为其经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机遇。1943年初，为了统一陕甘宁、晋绥两根据地的财经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命贺尤为主任，1944年3月又任命陈云为副主任。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的领导下，边区财经工作健康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边区财政厅在《抗战八年财政工作检讨》中，曾对他们的工作指导给予高度评价，并说“边区人民永远不能忘掉他们的功绩。”陈云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在《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与《怎样做好财政工作》等讲话中。他的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言简意赅和深入浅出地提出与论述了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全面总结了边区财经工作的历史经验，内容丰富，论述深刻，对加强解放区财经建设，保证革命战争的物质供给，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是对毛泽东财经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一个贡献，标志着陈云经济思想体系已初步形成。现择其要点简论如下：

（一）关于财政与经济的关系

财政与经济的关系，实质上是分配与生产的关系。它是财政理论研究和财政实践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种关系，是财政工作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马克思说过：“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原理，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陈云则进一步将这一方针概括和具体化，提出了“生产第一，分配第二”，“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方针。边区财政与经济的矛盾历来十分突出。从边区的地位来说，它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不得不承担起庞大的抗战经费和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所属机关、学校等单位的财政支出；从行政上来看，它是一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尤其在皖南事变之后，一切外援断绝均靠自力更生，落后生产力与财政庞大消费力的矛盾，即“鱼大水小”的矛盾愈益尖锐，财政经济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决摒弃了企图以压缩必不可少的经费支出来渡过难关的错误主张，从1939年提出自己动手，发展公私经济，争取自给的方针，到1941年12月提出以发展国民经济来解决财政需要的方针，直到1942年12月边区高于会上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其间边区党政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自给运动，至1943年已大见成效，各部队、机关和学校建立起雄厚的家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水平，实现了财政经济从半自给向完全自给自足的转变。1944年边区财政实行的“节约储蓄，增加生产自给，备战备荒”的方针和1945年实行的“生产节约，长期打算，积蓄物资，准备反攻”的方针，都无不重视强调了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尤其在陈云负责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期间，边区综合运用财政垫支、银行贷款、税收保护等一系列手段，大力支持经济建设，使经济建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正如陈云1944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一文中总结的那样：“由于农贷政策、奖励移民政策、变工政策等的施行结果，今年边区农民增产细粮十几万石，连部队、机关和学校所生产的，共计二十余万石，约值边币一百万万元。由于奖励植棉和提倡纺织，今年我们收棉花三百万斤，可织成一百五十万匹布。又由于我们积极发展公营、私营和合营的工业，我们生产了许多日用品，如纸烟、毛巾、袜子、火柴、生铁、肥皂、纸张、食盐、瓷器。化学产品等，连棉花在内，我们今年共能减少人口货物总值达边市三百万万元。这样就使得我们边区的经济地位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大大增加了抗战的力量。”尤其是公营经济的发展，使得边区财政收入“取之于己”的成分逐年增加，截止1945年，自给生产收入占财政收入的61.4%；而“取之于民”的成分逐年减少，边区1943年征收救国公粮18万石，1944年16万石，1945年则下降到12.4万石，从而奠定了雄厚的财政基础，达到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解决了长期困扰边区财政经济发展的“鱼大水小”的矛盾。至1944年，完全消灭了财政赤字，创造了边区财经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二）关于收入与支出的关系

“收入第一，支出第二”，这是陈云提出的财政工作的又一重要方针。他在谈到1945年边区财政预算时说：“财政可以不靠银行发票子，也不靠任何补助，问题在于力争多收少付”，多收即广辟财源，讲厚生财，聚财之道。工商税是组织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方式，边区政府从1940年开始制订并修订

税收条例，并适当扩大征收范围，以增加财政收入。1944年7月又对营业税和货物税两条例进行了修改，使税收基本呈上升趋势。如将历年收入按小米折算比较：1940年为24203石，1941年为50782石，1942年为46158石，1944年为119167石，1945年为109448石，从而充裕了边区财政。少付，即注意节流，讲究用财之道，合理使用，保证重点。陈云提出财政支出“既要解决问题而又不浪费”，这是指导财政资金使用的基本原则，“解决问题”就是保障供给，这是边区财政工作的基本任务。但是保障供给并不是无条件的，必须以“不浪费”为条件。“不浪费就是用钱要节省，要适当。钱要用在刀口上，不要用在刀背上”。即强调财政支出的效果。1943年，边区从组织生产中保障了军民吃饱穿暖，但却出现了铺张浪费的现象。如有的部队每人每月竟吃肉8斤；有的搞起了比赛生活水平的高低等。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注意克服超过丰衣足食一定标准的浪费现象，于1944年和1945年正式提出了“厉行节约，备战备荒”，“积蓄物资，准备反攻”的方针。陈云也强调指出：“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提倡爱护公物的美德”。即将厉行节约看作是实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战略目标的重要措施之一。边区财政部门从节约开支的角度，具体制定了节约的原则和办法，如减少马匹和杂务人员的使用，一切衣着用具交旧领新，减少会议和应酬招待等。同时还调整了办公费的标准，以便减少开支，建立家务。在全边区各单位普遍开展的节约运动中，中共中央机关，特别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革命领袖为全党做出了表率，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由于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上下共同努力，1945年全边区节约共达20亿元，足够公家一年的服装费。“解决问题要有重点”，这是陈三提出的关于财政支出的又一方针。决策节约是最大的节约，决策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如何从实际出发，按经济发展的轻重缓急合理分配使用有限的资金，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决策的战略问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陈三明确提出财政支出结构的重点及顺序是：“保证需要，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同时，他还在开支项目方面按照先生活后建设的原则提出：“伙食、草料最重要，衣服次之”；“其次是治病，办公，文化娱乐”，然后才是投资“协助公私生产”，建国后，陈云关于财政收入与支出方面的理论又有了颇多建树。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三）关于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对于财政管理体制，陈云提出了“力量集中，不要分散”的方针。在此问题上，陕甘宁边区有经验也有教训。1941年边区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方针，发给各部队、机关一部分生产资金，各自经营，解决其经费开支。各部门都以资金的大部分去做能图速利的生意，虽解决了一些资金困难问题，但也出现了为赚钱互相竞争，甚至不顾政策和全局利益，去倒卖“法币”、黄金和敌货，走私漏税，致财政、金融和贸易都呈现混乱的状况。力纠正这种过分分散的现象，1942年边区实行“统筹统支为主，生产自给为辅”财政方针，逐步建立了一套财政制度，使混乱得以整顿，但不久又出现过分集中，统得太死的缺点。为了纠正这种弊端，边区1943年又确定了统一领导，分区统筹的财政方针，使财政体制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保证了边区财政经济的顺利发展。陈云在总结边区财政工作时指出：“要长期打算，把力量集中起来，并且要留有后备，以备救急。”应当指出的是，陈云这里所说的集中，是就陕甘宁边区的范围来说的，一是指必须遵守统一的政策、法令和制

度等，不允许有所破坏；二是指对其财政收入必须实行统筹统支，不得任意分割，这样才能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开展反封锁斗争。但就整个解放区总体来说，陈云则认为：“从抗日战争开始直至1949年的12年间，都是分散经营的。”“这种完全分散经营的政策，是适应当时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的，因此获得了极大成绩。”由此可见，陈云关于财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思想，是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既坚持集中的统一性，又坚持分散的灵活性。建国后，在支持上述思想的基础上，陈云又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状况和特点，提出国民经济的主要经济活动，必须由国了进行统一的计划管理，但计划不可能包揽一切，仍有大量的经济活动必须分散经营，由市场进行调节等，以求在宏观与微观经济上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四）关于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

陈云指出：“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财政，这是大政方针。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这就揭示出财政与金融、贸易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关系。

从金融、贸易为财政方面来考察，金融是支持财政的一大支柱。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迅速对金融工作作出重大抉择，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币”，以支持生产和必要的财政垫支。从1941年至1942年，边区银行整个资金运用甚至连同整个发行在内，均完全服从于财政支付。据统计，至1941年6月底，边区银行货币发行总额为1500万元，而仅有形的财政性借款便达925万元，占61.7%；1942年6月底，货币发行总额为4500万元，而同期仅有形的财政借款便达2200万元，占48.9%。除此尚有大量无形的财政借款，主要是边区银行在保证商品供给方面所承受的损失。大量的财政性借款弥补了财政赤字，保证了财政供给，有利于边区军民克服严重困难，全力发展自给生产。同时，贸易是支持财政的另一大支柱。“争取边区出入口平衡，在边区财政上是有仅次于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的。”

边区的财政收入，除机关部队生产自给外，主要是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边区财政支出浩大，仅靠税收是不敷应付的，还得依靠食盐、皮毛、药材和其他土特产的出口来增加财政收入。1943年以前，边区因生产不能自给，出口的重要物资食盐和土产不能统销，致每年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出现。1944年至1945年，西北财经办事处实行新的贸易方针，即由对外贸易的部分管理逐步做到全面管理，使对外贸易做到出入口平衡以至出超。1944年至1945年，边区对外贸易取得很大胜利。1944年的进口量比1943年的进口量下降1.7%，而出口量却是1943年的3倍，出超19亿；1945年因准备反攻，进口量虽然比1943年增加9.4%，而出口量却是1943年7倍半，出超1.7亿（券币），台边市34亿，连续两年出超，不仅换回足够的物资以供边区军民的需要，而且换回大批法市可供部分财政支用和银行兑换，有利于稳定金融比价和物价。由于金融和贸易能分别从价值形态和物资形态上有力地支持财政，从而促进了财政收支平衡。

另外，再从“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方面来考察。财政固然十分重要，金融与贸易毫无疑问必须支持财政。但金融与贸易自有其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如财政过分拖累金融与贸易，势必造成金融物价的波动与物资的匮乏，而最终导致财政开支拮据和预算失败。拿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来说，1944年以前缺乏统一的规范，边区银行究竟应对财政担负什么责任，怎样垫支，如何周转等，都未确定。到财政危急时，突然要透支，结果使银行措手不及，疲

于应付。财政向银行透支弥补赤字没有明确的数量限制，其他往来也很随便，不尊重银行的企业性质，不能按期还款和按价购物，使银行在资金方面负担日重，其他资金运用无法保证，迫使大量发行。1941年上半年与1943年下半年，边区都因超经济发行而引起金融比价与物价波动。1941年上半年主要是客观上存在严重财政困难而被迫发行，这在当时紧急形势下是难免的，也是十分必要的。1943年则因主观上盲目满足财政开支而大量发行，是有去无回的消费性发行，不能使货币与商品物资结合起来，给边区经济带来严重损失。1944年4月，第二次西北局扩大会议检查了上年财政、金融和贸易工作，认为财政依赖发行边币支持，把银行变成财政发行机关，不但丧失了银行经营业务的独立性，而且也造成了金融物价的动荡。决定确定银行为企业性质，并建立相应的营业基金与交换基金，实行有计划的吞吐发行。规定凡支持财政的透支要由贸易公司保证归还，银行要进一步支持经济建设发展。1945年西北财经办事处又进一步决定银行要建立家务，银行与其他部门的往来是信用往来，银行对财政只是支持周转等。这样就形成了由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统筹财政、金融、贸易三者的全局，实行银行支持贸易，贸易支持财政的合理格局，使货币发行得到了有效的调节和控制，财政信贷也相应得到了平衡，对稳定比价与物价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陈云还亲自领导开展消灭法币黑市的斗争，严格金融法令，有意识压低边、法币比价。加之控制食盐出口，促使食盐涨价，很快增加了边区法币储备，平衡了法币供求关系，消灭了法币黑市。

总之，陈云关于正确处理好财政与金融、贸易关系的理论，是他经济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贡献，建国后，陈云在总结“一五”时期的经验，特别是1956年失误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和坚持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理论，形成了被称为“国力论”和“三大平衡”理论的社会主义财政基本理论。当年陈云在陕甘宁边区领导财经工作期间，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三大平衡”理论，但他关于正确处理财政、金融与贸易关系的论述，实际上已包含了“三大平衡”的基本点，他领导财经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就是运用“三大平衡”理论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过程就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过程的向前推进无非就是以抽象的和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反映历史过程……”。综观陈云经济思想体系形成的经历，可见其每一进程都是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每一观点都是对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经验的总结。在社会主义时期，陈云以其在陕甘宁边区时领导财经工作的经验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密切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既有原则又灵活地解决了中国经济建设中许多复杂问题。陈云的经济思想仅在历史上被公认为是正确和可行的，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仍有许多观点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第32、29页。

《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载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102页。

《陈云文选》第2卷，第69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 卷，第 351 页。

陈云恢复时期经济思想研究

夏兴园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民面临着全新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战时经济向平时经济建设转变的开始，进入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过渡，是国家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个转变决不是恢复到战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上去，而是要进行彻底的经济制度的变革。这种特殊环境和条件下的经济恢复，世界经济史上尚无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模式，主要自己去摸索，其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陈云为我国从战时经济顺利地转向平时经济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恢复理论。陈云在理论上主要贡献是：

一充分准备，改善环境，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由战时经济转向平时经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而伟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进行全面的充分准备。恢复经济，千头万绪，从何着手呢？陈云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国民经济实际进行深刻分析后，认为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要科学分析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国际形势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新中国的经济形势。因此，陈云于1950年6月15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号召广大财经工作者要关心国际国内形势，掌握各种变化了的情况。尤其要分析国际形势会发生何种变化，由此又会引起中国的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应采取什么措施等，都要有清醒的估计。这是作财经工作的基础，是正确确定经济建设方针和计划的重要依据。

二是搞好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对现实情况要经常调查研究，要心中有数。例如，现有的可贵利用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情况，国有资源可供开发利用的程度，工农业的结构比例，工业生产内部结构等，都要努力做到“心中有数”。否则，计划和行动就会是盲目的。

三是夺取斗争胜利，创造安定环境。陈云指出：“我们需要准备的事情多得很。土地改革、剿匪、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这些工作，都是经济建设的准备。”只有夺取了土地改革、剿匪、镇压反革命以及抗美援朝的胜利，才能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国民经济的恢复才会有基础。

四是统筹规划建设，及时供应资金。陈云强调在恢复时期必须做好各种计划准备，统筹安排经济建设。这种准备既包括宏观方面的，也包括微观方面的。在宏观方面，如“两个五年计划要建设什么东西，在国防、工业、农业、水利方面，大概一年投资多少”。在微观方面，如交通“也要有计划，要修多少铁路、公路，要计算出每公里花多少钱”；“每一个工厂都要计算

好，要多少钱，每一笔钱怎么用。先办哪个后办哪个，都要报一个帐，准备迟了不行，”

五是加快培养“国宝”，做好人才准备，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要有大批的专门技术人才，“开一个工厂，就需要工程师、技师、工人、职员；各要多少，应有一定的比例。现在需要很多的熟练工人、职员，更需要技师。”针对我们党内一些同志轻视技术人员的错误认识，陈云还明确指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他还要求全体管理干部，对技术人员要在政治上采取信任的态度，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有必要的保证，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同时，陈云还将文化教育投资放在各项准备工作的第三位，以加快培养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技术人才。

历史证明，我国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后期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统一管理，规范经济，确保社会经济有序运行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战时经济，向平时时期经济建设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为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历史转折点，由落后到进步的历史转折点，由坏情况到好情况的历史转折点”，也是由“分散”或“自由”经济向规模经济的转变，因而，国家发生了许多根本性变化，国民经济的恢复面临着许多新情况。

一是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需要国家负担的军政公教人员等脱产人员大大增加。1949年12月初，脱产人员超过700万人，到1950年1月，“全国脱产人员已突破九百万而增至九百四十二万”人。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财政收入远远赶不上支出的需要，只好靠发货币解决，这种状态需要尽快得到治理。

二是旧中国的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畸形经济，要建设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按比例发展的新型经济，就需要对原有的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改组。

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接收的是国民党扔下的烂摊子，各项建设百废待举。需要从全局通盘考虑，对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全面的大调整。

四是币值下跌不止，物价上涨幅度大，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对几百万军队和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造成很大的损失，需要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

上述新情况的解决，不可能沿用战时经济的许多有效章程和办法。因此，陈云强调“按新章程办事”。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一系列新政策、新制度、新规定，如统一财政经济管理、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统一货币，实行经济改组和棉纱棉布的统购等，适应新的需要相继产生。这样，才使得恢复时期的经济建设有章可循，国民经济开始规范和有序运行，各项建设才可能协调发展。

在规范经济的过程中，陈云身体力行，深入调查研究，作了大量工作，本着中央新的经济政策、制度、规章的制定和颁发，形成了他的规范经济思想。主要有：

一是宏观经济统一管理。战争年代，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互相联系受到

限制，经济管理一直处于分散状态，经济运行不规范。新中国的成立，建立了国家政权，有条件统一经济工作，也需要将有限财力集中，以便统筹规划。“要前进，不能停留。就是说，财经工作要从基本上分散经营，前进到基本上统一管理。”因此，在陈云的精心策划下，从宏观方面统一了财政收支、军费管理、国营资金和物资调拨、现金支付等。陈云还认为：“这些统一在今天已经必不可少；如果国家收入下作统一使用，如果国家支出不按统一制度并遵守节省原则，如果现有资金不加集中使用，则后果心然是浪费财力，加剧通货膨胀。”二是明白清晰利益边界。陈云认为，进行经济建设，宏观方面政府要管住；微观方面，地方政府要负全部责任。他指出：“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绝不是说，公粮、税收归了国库以后，征收、保管、运输工作，以及在各地的中央人民政府各部所属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必或不应过问。相反地，地方政府对粮、税的征收、保管、运输，负有全部责任。”(11)这就清晰地中央、部属企业、地方政府的权、责、利边界确定了下来。实践证明，分清中央与地方以及各级的财力财权，有利于明确各级的权责利，有利于调动多方面积极性。

三是规范经济主体行为。进行经济建设，首先应保障经济有序运行；要使经济有序运行，就必须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因此，在恢复经济建设时期，陈云首先强调的是，各级政府要“按新章办事”，指出，“现在是新的情况，应该按新的章程办事。”(12)与此同时，他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并制定了大量财政经济规章制度，调整了工商业和税收，明确了资金的重点投向，以及金融管理办法，等等。使一切经济活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进而规范了各经济主体的行为，为经济建设的恢复创造了必要条件，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行。

三保障重点，统筹兼顾，科学运筹有限资金

旧中国的经济本来十分落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工业生产的基础非常薄弱，日本帝国主义的八年侵华战争，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多年反人民的战争，使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

1949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全国人均年收入只有27美元。全国解放后，各项建设亟待恢复，财政支出大大增加，但国家掌握的物资十分短缺，形势非常严峻。

针对这种情况，陈三提出了多方考虑，统筹兼顾，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的重点投资原则。陈云曾指出：“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13)“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14)当时战争尚在进行，残敌尚未消灭。陈云所讲的“统筹兼顾，重点投资”，就是“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缓办应该缓办的事项，以便集中财力于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15)

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经济上的重点恢复，首要的是农业的恢复。周恩来特别强调首先恢复农业的极端重要性“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16)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当时

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把恢复和发展农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明确指出，“中国从大清帝国开始，就从外国买棉花、粮食、石油，现在我们如果还把外汇都用来买这些东西，哪里有钱买机器搞工业建设？所以，要先解决棉花，粮食的问题。”（17）只有大力发展农业，才能应付涝旱灾害和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战争和经济封锁，才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基础。

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例如，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减轻农民赋税。发放农业贷款，疏导供销，推广农业技术，鼓励群众兴修水利，等等。国家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水利建设。从1950年到1952年的三年间，全国兴修水利完成的土石方约17亿立方米，相当于23条苏伊士运河。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为战胜洪涝干旱，确保粮棉丰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工业建设投资方面，陈云坚决反对百废俱兴，极力主张重点投资。他认为：首要问题是解决能源问题和铁路问题，并且花大力气抓这方面的投资，也很快见到成效。例如，到1950年，全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通车；到1952年7月1日，新建的成渝铁路通车，康藏公路也开始兴建。

此外，我们党还按照先后缓急，重点投资的原则，恢复和改造了东北等地原有的工业企业，并陆续兴建了一批重点骨干企业，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导致并出现了物价飞涨、市场混乱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这种既成局面尚无好转。那时，新中国尚无统一的税收政策和税收系统，部队作战费和公教人员生活费，很大部分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物价上涨。当时，能否迅速有力地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站住脚，革命的胜利成果能否保住的重大问题。1949年7月，受党的委托，陈云到达上海。亲自组织和指挥“控制物价，稳定市场”的特殊“战役”。陈云之所以去上海，因为上海是资本家力量最雄厚的地方，又是投机倒把的老窝，对全国影响极大。

经深入调查研究，陈云提出了“控制物价，稳定市场”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得力措施。他说，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棉纱，是“控制物价，稳定市场”的主要手段；掌握粮食以稳庄城市，掌握棉纱以稳定农村，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兴风作浪。“控制物价，稳定市场”工作的重点在大城市。首先是解决上海的问题。为了夺取这一“战役”的胜利，陈云采取了以下果断措施：一是统一财政收支，控制货币发行，加强现金管理；二是整顿税收，吸收游资以紧缩通货，发展供销以促进生产、流通；三是统一调度粮食，加强征收公粮管理，集中物资以控制煤、棉等供应；四是统一行动，打击投机倒把分子。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措施，党和政府掌握着主动权，顶住了投机资本的冲击，避免了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到1950年3月，全国市场物价就完全稳住了。

陈云在以主要精力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同时，又提醒大家防止物价猛跌的可能，他指出：“我们估计了金融物价波动的危险，筹备了防备的办法，

同时还必须注视在物价继续平衡之下可能产生的另一方面的情况，即物价猛跌。”(18)这种情形，果然被陈云所言中。当时稳定物价是大好事，但“刹车”过急，又使社会经济发生“后仰”现象。1950年4月起，货币流通大为降低，银行存款巨增，商品滞销严重。在这一紧要关头，陈云当机立断，采取了重点维持生产，开导工业品的销路，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管理，重点举办失业救济，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加工订货措施，迅速扭转了社会经济的“后仰”现象，使社会生产蓬勃发展。

从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建设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所遇到的全新问题，困难重重可想而知。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凭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充分发动和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经过三年努力，我国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健康发展。

陈云恢复时期经济思想，上述四个方面既独立存在，又相互联系，构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经济恢复理论体系。从经济恢复的过程看，可以将它们看成是各个阶段的不同理论。“充分准备”思想，可作为经济恢复过程的第一阶段，战时经济结束，在进入恢复初期当然要作全方位的恢复准备；“规范经济”思想，可作为第二阶段，既然要恢复建设，这个阶段必然要进行建设投资，在经济实力还不强盛时期进行投资，是不能“撒胡椒面”的，必须“保障重点，统筹兼顾”科学而有效地使用有限资金；战时经济转向平时经济建设，社会经济难免带有战争伤痕，其中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是其通病，这使得社会经济运行无序。因此，“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便是经济恢复理论的核心，也是最深层的问题，贯穿于各个阶段。

陈云的经济恢复理论，是我国长期革命实践和经济工作经验的总结，它不仅在当时指导了我国由战时经济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平稳过渡，而且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轨仍有指导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成长向现代成长过渡的起飞时期，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转换时期。这个时期，其转变或过渡的目标仍然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贫穷落后，社会主义优越性也就下存在了。人民生活水平又直接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因此，“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也是我国当前的重要问题。虽然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与恢复时期不同，但陈云在恢复时期“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时所采取的诸种措施，对今后也是适应的。特别是那种控制上要消费品价格，以带动其他消费品价格稳定的做法，应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选择对象。

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在宏观方面强调“统一”和“规范”，使现代经济成为“规范经济”，也应是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努力方向和重要任务。

“保障重点，统筹兼顾”历来就是我国财政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也不例外，甚至更为重要。因为，政府已将“投资”作为一种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在一般情况和环境中，政府通过投资，可以调整和控制经济结构比例，以及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改善经济环境。因此，“保障重点，统筹兼顾”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和前提条件。

总之，陈云的经济恢复思想，对处于经济转轨变型的过渡时期以及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国家来说，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它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

注释

《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第1480页。

(11)(12)(13)(14)(15)(17)(18)《陈云文选》第2卷，第135、135、135、136、46、100、53、70、71、72、26、98、61、65、98、86页。

(1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5页。

陈云指挥治理通胀的“淮海战役”及其物价工作思想

姚会元 邹进文

陈云是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最有权威的经济管理家。1949年5月主持全国经济领导工作时，恶魔般的通货膨胀迎面扑来，呱呱坠地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和考验。陈云以其伟大的气魄、非凡的能力领导了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的斗争，并取得巨大胜利。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了这一胜利，指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他还“借用诸葛亮在《煎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来赞扬陈云同志的理财之能。”军事上的淮海战役是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胜之战，它标志着国民党政权不可挽回的失败；反通胀斗争的“淮海战役”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站稳了脚跟并从此走向“天下大定”。今天，我们重新探索这场经济上的“淮海战役”并研究陈云物价工作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通货膨胀迎面扑来

1949年10月到1950年3、4月间，在已解放的广大区域内发生了严重的物价上涨，并出现两次波峰。第一次波峰大致是1949年10月中旬到1949年11月下旬。在最大城市上海，批发物价指数比10月上旬提高了326.2%，严重时每天涨幅达20—30%；在十余天的时间里，几种最重要最基本的商品价格狂涨，其中棉纱价上涨3.8倍、棉布价上涨3.5倍；米价上涨5倍多。而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8年12月为基数100，则1949年11月的指数已达5376，物价涨势凶猛，经济形势十分险峻。1950年2、3月至4月出现第二次波峰，其时，上海投机势力大肆抢购套购，引发物价暴涨。上海的涨价风很快拉动全国性物价上涨，全国15个大中城市（不含东北地区）25种商品的批发物价指数1950年3月比1950年1月上升了100个百分点。猛烈的物价上涨与战争、自然灾害交相肆虐，恶化了整个经济形势。

建国之初的物价上涨是基于各种因素的人民币超度发行，毫无疑问，这种物价上涨属于通货膨胀。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名义给中央的报告中肯定了当时通货膨胀的性质，报告说：“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目前为止，共发四万一千亿元。……这四万一千亿元钞票，因为贬值，现在只值四十九亿斤小米，即是说，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一百六十五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银洋八亿二千万元。”导致建国之初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原因极为复杂。就其大端主要有：

1. 人民政府力弥补财力不足而增发货币。建国之初，百废待举。一要继续支援前方，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不打倒反动派一切都谈不到；二要迅速恢复各项交通和生产事业；三要救济和扶助广大灾区人民（1949—1950年全国受灾农田约1.28亿亩，灾民4千万人）；四要维持公教人员（1949年为700万，1950年增至942万）的生活，战费和广大公教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是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的”。由于人民政府支大于收，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1949年财政赤字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1950年占预算支出的18.7

%，赤字总额折合小米达 70 亿斤。为弥补不足，政府不得不大量发钞。陈云同志说：“今年十二月和明年一、二两月，三个月支出共需三万一千四百余亿元，同期收入估计六千四百余亿元，赤字二万五千亿元。这一赤字，在此三月中需要而且可能全部用发行弥补之。” 尽管财政性发行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实属无可避免，但从经济规律来看，其后果则必然引起或加剧通货膨胀。

2. 投机势力和不法资本家的破坏。建国之初，一批旧中国滋生的投机之子，利用新中国经济暂时困难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猎取暴利，扩大了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使上海物价在解放初的 13 天内暴涨 2.7 倍。他们还大肆活动搞乱金融，某些商店竟然发展到公开拒用人民币的程度。投机分子猖獗活动释放出来的巨大破坏力加剧了通货膨胀。

3. 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陈云同志针对“封锁”，坚定的表示“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不仅是目前的军舰、飞机、水雷的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帝国主义的封锁并不可怕，但是这种封锁客观上确也加重了新中国之初的经济困难和财政困难。

4. 国家初创，财经工作一下子难以完全转到适应全国统一的形势上来，加之生产没有完全恢复，财政税收制度正在建立和完善、各项税收不能有效地收缴集中，从而限制了对全国财力、物力的集中与调度。敌对势力仍在一定程度上操纵把持市场，起着某些破坏作用。

二陈云领导下对通胀的综合整治措施

能否战胜“通货膨胀”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一场生死考验。国内外敌对势力料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通胀”面前是失败的结局，在他们看来：“共产党搞军事能打 100 分，搞经济只能打零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上的困难必将导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垮台，因此，能否平抑物价，战胜通胀威胁，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既是一场经济斗争，又是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陈云领导了这场斗争，既治标又治本。当时采取的行政和经济的综合措施及对策主要有五点：

第一，实行“三统”“三平”政策。陈云指出：“全国人民经过了十二年战争和通货膨胀之后，生活已极困难，需要我们努力制止通货膨胀。”为了克服困难，争取经济好转，1949 年底，陈云首先提出要“实行财政、税收、公粮、贸易及各主要经济部门管理的基本统一”。这一思想到 1950 年 3 月正式形成了中央“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方案。所谓统一财经，就是变过去的地区分散管理为中央集中管理。明确了统一管理财政收支，统一管理物资，统一管理信贷收支和货币发行的“三统一”原则。所谓“三平”就是财政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求平衡、信贷收支平衡以及三者之间的协调。实现“二统”“三平”的具体做法是：（1）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管理，实现全国财政收支平衡。为了确保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对粮食和各项税收的掌握，规定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以外，统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调度。各省市县政府不得擅自支取公粮，亦不得以公粮拨作经费用。税收方面，严格规定除经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处，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切收入，均归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为建立坚强有力的税收专管队伍，要求各地

各部门选派最强的干部去担任税务局长。在严厉整顿公粮、税收等项财政收入的同时，要求各单位严格编制、节约支出，以集中财力于军事上消灭残敌、于经济上平抑物价、克服通货膨胀。实现全国财政收支的平衡，成为一剂消除巨额财政赤字的“猛药”，起到了良好的作用。（2）统一管理全国各地国营贸易工作，实现全国物资调拨平衡。规定全国各地贸易机构的业务范围及物资调动，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安排。各地贸易机构在执行中不得擅自改变贸易部规定的计划。为保证国家掌握雄厚的物资储备，决定成立中央和各省市各部门的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陈云亲自担任中央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主任，规定“所有库存物资，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便减少今年的财政支出及向国外订货”，（3）统一全国金融，实现全国现金出纳平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该行在“实行现金管理，大力组织存款，经理国库，灵活调拨，扩大和巩固人民币阵地，掌握外汇成为现金中心”，“并很好地组织清算，信贷工作”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现金的出纳集中于国家银行，为实现货币流通计划化，抑制通货膨胀打下了可靠基础。到1950年底，各单位通过人民银行收付的总金额当中，转帐部分已占到90%以上。

“三统”“三平”是建国之初陈云对经济工作实施领导的一大创举，有着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就减少或避免了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发行；实现物资调拨平衡，抑制了供求矛盾扩大化从而避免求过于供的膨胀和物价大幅上涨；实现现金出纳平衡，就防止了现金投放过多情况的发生，并调节货币流通量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三统”“三平”相互联系互相制约，其中的关键是财政收支管理的统一和平衡。”“三统”“三平”的实现稳住了金融、稳定了物价，对抑制一时猖獗的通货膨胀起到了决定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三统”“三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国外也没有先例，它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定情况下的唯一正确选择，它也是陈云天才的贡献。

第二，紧缩银根。发行折实公债，1949年11月5日，陈云领导的中财委决定紧急冻结未入城市流通的人民币，并检查各银行贷款，抽紧银根。11月13日进而决定停止银行贷款的同时，如期收回各项贷款，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在陈云“从全国人民的利益说来，发行公债比之多发钞票要好些”

思想的指导下，中央制定了1950年发行2亿分折实公债的计划。实际上只发行了1亿分，因为在发行了1亿分公债之后，全国的物价形势便渐趋平稳了（1分公债折实物为大米3公斤、面粉0.75公斤、白细布1.3米、煤炭8公斤），发行1亿分公债，“对回笼货币、稳定物价，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大力开办保值的“折实储蓄”、大力吸收定期存款，折实储蓄是一种按照标准折实单位进行的储蓄新品种，即采取一定数量的若干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平均数为计算货币购买力的单位，当时，京津地区是以王米粉0.5公斤、面粉0.5公斤、五福布1/3米的平均价格为一个标准折实单位；上海是以白粳米1升、生油50克、煤球0.5公斤、龙头细布1/3米的平均价格为1个标准折实单位；汉口是以中机米0.5公斤、面粉0.5公斤、龙头细布1/3米的平均价格为一个标准折实单位；其他城市也都有各自的标准折实单位。当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时，每一标准折实单位所能够兑取的储蓄货币额随之增加；而当货币升值物价下跌时，每一标准折实单位所能兑取的储蓄货币额就随之下降。大力开办折实储蓄，保护了货币持有者的经济利益使其少受或避

免损失，从而逐步打消人们抢购实物的心态，陈云还要求努力设法扩大吸收定期存款的比例。他指出：“现时定期存款只占全部存款额七分之一”，人民银行总行要“研究利息和其他方面的办法，以便多吸收两三个月及更长时间的定期存款”。“这种定期存款占了相当的比重”（11），就可减少一部分通胀压力。

实行折实储蓄、大力吸收定期储蓄后，人民银行存款额迅速上升，1950年5月底的存款额比3月底增加210.8%，6月底又增加217.2%。实践证明，折实储蓄的开办、定期储蓄的扩大吸收了社会多余资金，大有利于稳定金融、稳定物价。

第四，国营贸易公司大力组织和抛售商品以平抑物价。为了直接掌握更多的工、农产品，增强对市场的控制力量，党和政府尽最大努力组织各类物资和商品。到1949年底，中央已掌握了商品粮50亿斤和全国70%的煤炭供应量、40%的棉纱和50%的布匹、60%的食盐，同时加强了对亨、津、沪等大城市的物资调拨工作。1949年11月25日到30日每日由东北地区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在很短的时间里，天津从东北调运粮食6000万斤，储备了35万匹棉布和5000件棉纱；上海储备了110万匹棉布，28000件棉纱，1950年春节前调储大米4亿斤；西安储备了40万匹棉布和大量粮食。在做了充分准备后，陈云指示给投机势力以“适当教训”。（12）决定各地联合行动“从稳定物价这个全局出发而抛售”。（13）1949年11月25日全国各大城市一致行动，连续抛售10天后，物价下降30—40%。使蠢蠢欲动的投机分子和不法资本家受到了应得的“教训”。

第五，严厉打击和取缔投机势力。1949年下半年上海市破获了26家地下钱庄，处罚了140家滥开空头支票、膨胀商业信用的行号，包围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首要分子200多名。武汉、广州、北京等地也同时采取行动。

经过上述经济和行政的综合整治，抑制物价和平定通胀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1950年4月以后全国物价逐渐平稳并呈下降趋势，1949年12月，北京、天津、广州、武汉、重庆32种主要商品价格指数为100，1950年4月便降为73.4，5月再降为54.6。陈云总结说，“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是税收、公债、货币回笼。收购四路‘进兵’，一下子把通货膨胀制止了。”（14）

反对通货膨胀斗争的胜利，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极大地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向全世界表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事上能打100分，经济上同样能打100分；它克服了全国经济的混乱局面、稳定了形势、使共产党的“天下大定”；它向全世界提供了物价工作管理的成功经验，西方经济学家因此说：“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中国最有经验，有很成功的经验，我们是向你们学习的”（15）。

三陈云的物价工作思想

建国之初直接指挥战胜通货膨胀“淮海战役”的陈云，在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积累了物价工作的丰富经验，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及升华阐发，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有很强科学体系的物价工作思想。简要地概括，陈云的物价工作思想包涵了以下主要方面：

第一，对通货膨胀有很高的警觉性。

薄一波曾在他的著作中批评过“通货膨胀有益论”，他结合 1988 年以前中国经济实际情况写道，“有人忘记了这个经验，提倡和支持所谓‘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的观点，靠发票子搞基本建设，特别是搞消费性的基本建设，盲目搞加工工业，鼓励超前消费，弄得积累和消费两头膨胀，物价剧烈波动，……最后支持不下去，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其结果是既危害了经济的发展，也干扰了经济改革的进程。”(16)这既是薄一波的经济观点，也体现了陈云的物价思想。陈云对通货膨胀始终有很高的警觉性。当建国初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风波被平抑下去后，陈云仍然指示不能松懈，要“继续稳定金融物价”，严防“物价又可能发生更大的波动”(17)。他看到，“目前货币流通市场虽在扩大，但事实证明流通面积仍是不大的。除国家银行库存以外，实际上市场周转的货币在四万亿元左右”。“这就证明，流通面积的扩大还很有限，人民币主要浮在若干大中城市”。因此，要“预防金融物价发生风潮”，必须“设法扩大货币流通面积”。(18)在 60 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他又指出，“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19)。由此可见，在陈云的物价工作思路中，预防通货膨胀发生的高度警觉性是一贯存在的。

第二，为人民服务，着眼于大多数人利益的原则，时刻将“老百姓关心的”做为最高标准。

陈云在经济工作中，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他常告诫各级干部，“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20)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要为大多数人民服务，搞好经济建设是人民政府的责任。1949 年 8 月 15 日，他在上海主持财经会议时说，“我们究竟是为大多数之民呢，还是为少数之民？当然首先要为大多数之民”(21)。1953 年 8 月，他在《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如果政府不关心各阶层人民的切身利益，这就不是好的政府。1980 年 12 月 16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22)不难看出，从 40 年代至 80 年代，陈云经济工作，物价工作中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基本思想如一根红线贯彻始终。因为贯彻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原则，陈云物价工作思路乃至其整个经济思想便充满了永久生命力。

1949 年下半年，广大解放区面临着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面对着这种情况，“无非是两条：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23)在两者选择方面明显表现出陈云在做经济决策、物价决策时不让人民群众吃亏或少受损失的思想。他向大家分析应选择发行公债，因为“继续多发票子，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吃亏最大的首先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人，其次是军队，以及党政机关的人员。”(24)1950 年下半年时，在研究确定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方针时，对于“战争第一”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和争论，因为不打垮美帝的侵略便一切都谈不到了。但对于“维持市场”及“投资性的经济和文化支出”何者排第二位、何者排第三位却争执甚多。在陈云的主持下，将维持市场、求得金融物价不致太乱排在第二位。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陈云认识到市场、物价与大多数群众切身利益相关，因此不能压，“要把市场列

在第二，而且宁可削减经济和文化的支出以就市场”(25)。“要在照顾第一、第二之后，剩有多少钱，便办多少事”(26)。

第三，稳定市场物价。

陈云认为，在一个统一国家内，市场的稳定与否非常重要。这是财政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他结合1949年、1950年的通货膨胀和平抑物价工作实际，指出物价上涨，会引起抢购风，抢购风一起，便可能引起囤积居奇，推动物价更大幅度的上涨。同时，物价上涨，必然要影响到生产，使其难以顺利进行。而且，随着全国交通的恢复，某地的物价上涨还会很快波及到其他城市，引起全局性物价波动，以至造成全局性的恶性循环。全局性的物价上涨，必定会加重政治和财政困难。

1957年4月，陈云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明确重申“如果我们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不能大体平衡，物价就会乱涨，市场就会混乱，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都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27)。因此，“政府物价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历来就是首先保证人民必需的主要商品价格的稳定”(28)。并预示“今后物价的总趋势，是可以保持稳定的”(29)说，保持物价总趋势的“稳定”，这既是当时政府经济工作的努力目标，也是陈云同志物价工作思想的基本内容。实践中，陈云同志一贯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目的之一也就在于稳定物价。

第四，物价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

陈云认为，稳定物价并不等于冻结物价。建国之初，统一物价管理，平抑物价对于渡过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起了巨大历史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物价工作的管理、层次、品种、时间等方面也出现些失误，存在着“统”的太死、做得过份的问题。对此，陈云曾经明确地提出批评意见。他说：“目前在我国物价政策上存在着一种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就是在出售价格方面，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因此不同品质的产品差价很小，优质得不到优价。这种价格政策，不能鼓励产品质量的提高，只能助长产品质量的下降。”(30)“我们必须看到，不适当的价格政策，必然不利于生产。”(31)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自由采购、自由贩运，而不要害怕价格方面一时的一定程度的上涨”。有时，价格上涨将促进增产，“等到供求平衡以后，它的价格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32)

第五，商业、物价工作要不断“根据过去的经验，找出新的办法”(33)。

陈云认为“这项工作比日常的业务工作更重要。这些问题应该看成是指挥我们商业方面三百万队伍的‘步兵操典’和‘战斗号令’”。“这项工作‘脱销’了，政策就‘脱销’了”(34)。而陈云本人是这一原则的模范实践者。1954年时，正是基于当时市场上商品供求矛盾、批零差价的变化幅度、计划供应商品种类还要增加等情况与“过去的经验”已不相同的新情况，陈云毅然做出重大决策，强调“一九五二年为调整商业所采取的那些办法已经不能适合目前的情况，不能再度采用”(35)。使物价政策不断适应变化着的经济实际。

陈云还反对商业和物价工作人员都成为事务主义者，“经理一天忙得要死，晚上还要算帐到十二点”(36)。在他看来，应该有些“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37)，他们看似优哉游哉，但却能从商业工作、物价工作的“战略性问题”上去思考和研究，把握事业发展方向。

陈云关于经济发展和物价工作的许多分析、论述及指示，是他论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些分析、论述及指示在当时曾起到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薄一波说得好：“即使在现在，建国初期经济工作中积累的反对通货膨胀的经验也还是不能忘记；什么时候忘记了，到头来终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的。”(38)

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改革已不同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党的工作的转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难在形式上也不完全同于建国之初。时空的变化，给我们提出了时代的更高要求，我们的工作方针，政策路线必将随实际的变化而进行科学的调整 and 变化。因此，我们不能照搬建国之初陈云的措施对策来对付当前的通货膨胀。从这一角度看，措施及对策是针对某一具体事物的，当具体事物发生变化后措施及对策也就可能过时了。但陈云经济工作的原则以及卜期实践中形成的经济理论思想却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在今天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们仍应努力研究和发 展陈云经济思想，用以指导经济改革、服务经济改革、深化经济改革。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

注释

(16)(3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 89、93、93 页。

(12)(13)(14)(17)(18)(20)(21)(23)(24)(25)(26)(33)(34)(35)(36)(37)《陈云文选》第 2 卷，第 57、39、2、63、48、64、36、97、31、12、128、84、85、60—61、15、6、6、113、115、340、340、249、334—335、334 页。

(11)《银行月刊》1950 年第 12 期、1949 年第 4 期。

(15)《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1991 年第 3 期，第 79 页。

(19)(22)(27)(28)(29)(30)(31)(32)《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196、280、59、60、63、10、10、11 页。

陈云与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

朱佳木

实现工业化是自 1840 年以后，中国所有仁人志士的共同梦想和追求。但在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当权的时代，这些美好的梦“一概幻灭了”。只是到了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国家工业化的理想才变成了切实可行的计划，并且只经过了 1953 年至 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就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中国工业化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解决了在工业化起步时遇到的方向、战略，布局、资金、人才、规模、速度等一系列工业化的基本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并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主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了解和研究陈云的这些作用和主张，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工业化的特点和意义，全面认识建国后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由来和实质，认真总结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深入探索和努力掌握其中的客观规律，都是十分有益的。

一 “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与新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布局 and 方向问题

“一五”计划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就是我国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从 1951 年开始酝酿，到 1955 年公布，先后编制过五次。这五次之中，除了第四次以外，都是由陈云主持的。由于他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所以，组织这一计划实施的重任，也主要落在了他的肩上。“一五”计划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就工业化来说，首先是发展战略、布局 and 方向问题。在这几个重大问题上，陈云都通过主持编制 and 组织实施“一五”计划，使党中央的意图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落实。

（一）关于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问题

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的奋斗目标。但采取哪种战略来实现这个目标，那时并不明确。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很快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摆在人们面前可供选择的战略有两种：一种是较早工业化国家的，即先发展轻工业，待积累了大量资本后，再发展重工业；一种是前苏联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国家迅速工业化，迎头赶上工业强国。由于这两种战略各有利弊，党内外对此曾有过不同意见。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党中央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

为什么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单纯向前苏联学习的结果，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作出的冷静选择？对这个问题，陈云在 1955 年 3 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题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曾经作过回答。他说，我国的农业是落后的，铁路和其他交通设备也不足，都需要发展和扩建。但是，能够使用于五年计划建设的财力有限，如果平均使用，百废俱兴，

必然一事无成。而且，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大量供应化肥、农业机械、柴油、水利工程设备，就不可能大量修建铁路，供应铁路车辆、汽车、飞机、轮船、燃料和各种运输设备。另外，要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必须扩大轻工业。但现实的情况是，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因就是既缺少来自农业的，也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再者，我们还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不能不优先发展重工业。

对于这一发展战略，“一五”计划从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和发展速度上都给予了充分保证。那些限额以上的项目（重点是前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或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或大大提高了原有工业的水平，形成了我国现代工业的体系和骨干。五年下来，工业新增固定资产214亿元，比旧中国100年积累的总和翻了近一番。五年里，平均每年工业发展速度为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力254%；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比重由30%上升为43%，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由35.5%上升为45%。大大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落后的局面。

在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陈云对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一直十分重视。“一五”计划规定，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原有轻纺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力。事实上，轻工业在“一五”期间的发展并不慢，产值的年增长率达到了14.3%，税利增长2.8倍，不仅基本满足了人民需要，而且为国家建设提供了100多亿元的积累。陈云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心须在发展工业的同时，用各种方法来增加农业的产量，使农业能够尽量适应或至少不落后于工业的发展。他认为，用大规模开荒和修水利来解决粮食问题的条件在“一五”时期都不具备，而根据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15—30%（以后核定为10—20%），是花钱少见效快的办法。为此，“一五”计划除了拿出占基本建设总支出7.6%（加上地方水利投资、军垦费、农村救济费、黄河治理费、长期农贷等，则为15%）的资金用于对农业投资外，还在财力上尽可能支持了农业合作化。到了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700亿斤，比1952年增产600亿斤，增幅为19.8%。

在“一五”计划的执行即将结束的时候，陈云又根据前一段工作暴露出的矛盾和工业化已有初步基础的实际情况，按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方针，及时提出调整重、轻、农投资比例，以及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投资的意见，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二）关于工业化的布局问题

旧中国的工业不仅底子薄，而且布局极不合理，沿海地区（主要是几个大城市）只占国土10%，却集中了全国80%左右的工业设施，究竟如何布局好，对这个问题，陈云早在1950年研究苏联援建项目时就开始思考。他指出，“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选择地点要注意资源条件，摆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慎重。”以后，“一五”计划将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中的大部分，分布在了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到了1957年，内地的基建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52年的39.3%上升为49.7%，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29.2%上升为32.1%，初步改变了工业过分偏重于沿海的状况。这对于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节约和地区间的合理发展，以及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国防安全都是十分有利的。

对于在进行工业布局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对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作

用注意不够和片面理解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含义，急于在一些行政区和省的范围内安排门类齐全的工业项目，陈云都及时提出了纠正意见。他在 1955 年就批评了那种只顾本地发展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说这在工业中是个内地与沿海的关系问题，内地要发展，但沿海城市的生产能力有余，因此，要根据原料、生产、销售和运输情况，进行综合研究。他还指出：“建立工业体系只能首先从全国范围开始，然后才是各个协作区，再后才是许多省、自治区。”“在一个省、自治区以内，企图建立完整无缺、样样都有、万事不求人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不切实际的。”以后的实践证明，陈云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

（三）关于工业化的方向问题

“一五”计划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制定的。这条总路线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说，中国工业化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此，陈云在 1954 年 6 月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五年计划的主要内容和意见的报告》时指出：“一五”计划的目标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农业合作化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业，是在建国初期由没收官僚资本转化而来的，1949 年，固定资产约有 80 多亿元，而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34.7%。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工业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首先必须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优先发展全民所有制工业，提高它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1950 年，陈云在谈到发展轻工业问题时说：“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五种经济同时存在，但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要使私人经济跟着走，有一个条件，就是国营经济有相当的力量。你有力量它就跟着你走，你没有力量它就不听你指挥。”为此，“一五”计划将建设资金主要投向了国营工业，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1957 年，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达到 272 亿元，比建国时增加了 3 倍，产值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53.8%。

保证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另一方面，便是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工作，在党中央领导人的分工中，也是由陈云主管的。早在建国初期，对私营工业就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即由国家收购其产品，逐步发展为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直至公私合营。“一五”计划规定，五年之内，将私营工业中将近一半的大型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同时，对私营工业的生产采取全行业安排的方法。但到了 1955 年下半年，不少地方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情况。这种情况，陈云认为“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因为，既然要对私营工业进行全行业的生产安排，就会碰到所有权私人占有的障碍，这个问题下解决、就难以进行企业的合并、改组、淘汰。另外，即使生产安排好了的私营企业，如果不实行公私合营，而是长期停留在加工订货的办法上，资本家也会由于利润按照成本计算而不愿意降低成本，节约原料。为了减轻公私合营中的阻力，陈云不仅赞成对资本家采取赎买政策，而且主张推广定息的办法。据估计，那时全国私营资本，工业方面有 25 亿元，商业方面有 8 亿元，定息 5%，一年不过 1.6 亿元。他说：“用这点钱，便把中国的资本家统统包下来了。”“企业的私有制向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的工商业寻如此兴高采烈地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例的。”

在私营工业实行公私合营的高潮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许多地方要求过急，工厂不该合并的合并了，可以合并的也合并得太大了。国务院于1956年2月8日作出了关于合营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半年不动的决定，停止了这种盲目合并的趋势。陈云在同年3月30日召开的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指出：企业改组并不是都要并厂并店，并错了的，要分开来，退回去。6月18日，他又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半年期满后，也不是说各行各业就都能进行改组。再如，有些企业出现比合营前质量降低、品种减少，管理马虎的情况，陈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没有了企业间的竞争，二是没有了利润刺激。为此，他提出对一些商品不再由国家统购包销、对商品设计建立奖励制度、优质优价、由经理人员负责质量等措施。又如，合营后，对部分资方人员的安排不适当。对这个问题，陈云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把资方人员安排在原企业当经理，这是政府的政策。”“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政府安排资本家并不是对资本家特别好，而是因为这对国家人民都有好处。”针对一些同志怕搞不赢资本家的顾虑，陈云说：“在工厂管理中，可以实行竞赛，只要我们不犯大错误，不是糊里糊涂，那末，社会主义方法是一定可以战胜资本主义方法的”。当然，尽管做了纠偏工作，在这场改变所有制的伟大变革中，还是存在过急过快等缺点的。但任何缺点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调动了广大私营企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起到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作用。

二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新中国工业化的资金和人才问题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陈云作为东北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就率先在东北解放区领导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工作。全国解放后，他又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参与领导了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创立。建立这一体制固然同当时向苏联学习有很大关系，但在建国初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为了适应我国一方面要迅速实现工业化，一方面国家底子又很薄，特别是资金少、人才缺的实际情况。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事实表明，这一论断完全正确。

（一）关于工业化的资金问题

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更多，但中国由于在近代受尽帝国主义的欺负，能够作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钱财，几被搜括殆尽。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又从大陆劫走了大量财富。因此，摆在新中国面前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缺的恰恰就是资金。能否向外国借钱呢？当时，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实行封锁、禁运政策，怎么可能借钱给我们发展工业？前苏联是肯借钱的，也确实以优惠条件给了我们总共17亿卢布的贷款。但这点贷款仅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3%多一点，而且，他们也正面临战后的恢复，不可能借更多的钱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只有靠我们自己内部积累。

新中国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由于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因此完全有可能靠内部积累来解决工业化

资金的来源问题。但是，有这些资金来源。并不等于工业化的资金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一五”计划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427.4亿元，相当17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当年苏联和印度“一五”计划的投资额，如果稍有不慎，财政就可能收不上来这么多，投资计划就会失去保证。而且，中国遭受了长期战争的破坏，当时还在进行抗美援朝，人民政府既要恢复经济，又要进行新的建设，既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能减少国防开支，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由中央集中掌握和使用财政收入，由国家有计划地合理配置资金，才能免于资金的分散与浪费，工业化建设资金来源的可能性才能成为现实性。

对于财政收入由中央统一掌握、集中使用与节约资金、保证重点的关系，陈云曾作过大量论述。他在建国初期就说过：“目前国家的财政收支不但不富裕，而且有赤字，可以机动使用的现金和物资本来就很少。这微小的机动力量，如果下放在中央人民政府手里，而分散给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其后果必然是把这微小的机动力量丧失无余，必然是全局不机动，大家不机动。这正像作战一样，把机动兵力分散了，不是大吃败仗，就是难获全胜。”(10)当时，中财委对基建项目的审批权限作了严格的规定，其中包括各地凡属举办价值50万元以上的新工厂，均须呈报党中央。陈云说：这些规定之所以必要，“不仅为了使国家在现金运用的迟早上，力求合理，更主要的是为了减少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浪费。”(11)

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的资金，陈云还特别重视防止通货膨胀，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因为，通货膨胀，物价不稳，不仅影响人民生活，而且影响财政收入。而在影响财政收入的诸种因素中，粮食的价格在当时是最关键的。1952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由于城市人口和农村吃商品粮人口的增加，以及农民自身粮食消费的增加，供销矛盾反而加剧了。那时，国家需要的粮食，除了公粮（农业税）有保证以外，其余要从粮食市场上购买。因为粮食供不应求，因此，粮贩子大肆收购，囤积居奇；农民待价而沽，不肯出售。能否任凭粮价上涨呢？陈云说：“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12)这样一来，工业投资就失去了保证。能否进口粮食呢？陈云说，如果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13)。经过反复研究，他向党中央提出了对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的建议，并由党中央作出了决定。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稳定了市场，避免了由于粮价上涨或进口粮食而增加财政预算和外汇的开支，而且大大增强了农副产品出口和工业设备进口的能力。

统购统销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为迅速实现工业化而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这一政策完全不同于前苏联在工业化建设初期所实行的那种近乎无偿占有农民粮食的余粮征集制。正如陈云所说：“国家规定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牌价，是充分照顾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的，是完全公道的。”而且，“在国家卖出粮食的总数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卖给缺粮农民的。”(14)当然，粮食等农副产品的统购价格与工业品价格之间存在剪刀差。对此，陈云一方面肯定它的必要性，反对过早地取消它；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要任意扩大它，并要根据情况逐步缩小它。他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

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但是，也决不能不照顾农业，把占国民经济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农业放下来不管，专门去搞工业。”(15)他说：“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就可以做到。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提高工资，这三条应该说都是好事，都应该做，但是，都不能做得太早，要极其慎重，要量力而行。”(16)然而，当一位搞财政工作的领导同志主张通过提高工农产品比价，从农民那里多拿点钱，用于扩大基本建设时，他又召集有关同志辩论了三天，最后使那位同志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由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一五”时期尽管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11.3%的高速度增长，但物价指数的年均上涨幅度却只有1.1%。这不仅大大有利于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和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实现，而且大大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期间，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年均提高不到7%，但由于物价稳定，这种提高是实实在在的，对大多数人是公平的，是人民所满意的。

对统销政策，陈云早在开始实行时就说过，这只是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17)对统购政策，陈云虽然从我国国情出发，主张长期实行，但也认为应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加以调整，不能一成不变。

（二）关于工业化的人才问题

要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就必须有足够的具有现代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的人才。据当初计算，“一五”期间，仅工业、交通运输两项就需增加技术人员近40万人。但是，旧中国1928年至1947年累计培养的大学生只有18.5万人；1927年至1947年，在高等工科学学校毕业的只有3万人；学地质的，总共不过200多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一五”计划把建立和扩大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作为重要任务，计划在五年里从高等学校中毕业28.3万人。能否等到这些人才培养出来之后再继续进行工业化建设呢？陈云指出，这是不行的。因为，“全国解放了，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如果还不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则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没有保障的。”(18)能否让人才自由流动，或者由各部门据为己有呢？陈云认为也是不行的。他指出：必须“集中使用全国有限的技术人才”，“要在全同范围内统一调度，按国家的需要合理分配。”“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统一行动，发挥力量。”(19)事实说明，正是由于对关键性岗位的技术人才、教学人才采取了集中统一调度和分配的办法，再加上有计划地兴建新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举办各种训练班和培训班、聘请外国专家，才使我国工业化建设初期人才不足的难题得到了解决。

陈云主张对人才由国家统一培养和使用，这只是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一项对策，而不是他解决这一问题的出发点。他的出发点是，搞工业化，必须有人才。从这一点出发，他主张对旧社会培养的分子要积教育，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不能搞关门主义。他指出：“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20)他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时还说过：“资本家有本领，应该说是财富。

在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文化程度高，知识分子多的一个阶级。如果解放后资产阶级的工程师都不干了，我们就会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混乱。”(21)还是从这点出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针对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问题，建议中央拿出一些钱来“抢救”他们，并指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应该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22)他还指出，“必须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23)今天，建设人才多了，完全由国家统一培养和使用的必要性已逐渐减弱了，但是，陈云这种把人才问题和工业化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思路，对我们研究解决教育经费不足、人才外流等新出现的人才问题，仍然是有启迪意义的。

搞计划经济，绝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凭主观意志瞎指挥。陈云反复告诫做经济工作的同志，要搞经济，不要搞“政治经济”。他曾说过，货物从上海出厂，转到天津、北京再到保定，然后再到石家庄，这个路线不是按经济原则，是按着政治系统。这样做买卖，就要赔钱。他还说：“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外行办事总是要吃亏的。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必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帐，力求省一点。要计算成本，出一个成品要多少工，市场上是什么价格，等等，都要计算好。”(24)

对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病，如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缺少竞争，活力不足等，陈云也发现得比较早，并且在“一五”计划尚未结束时就提出了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以改革的设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进一步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的思想，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以后，他又赞成计划经济下等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的提法，认为这种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如果现在再照搬五十年代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25)这些论述，为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思想的提出与新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问题

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这是陈云在“一五”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来源于他对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的长期探索和深入思考。中国经济落后，所以需要通过迅速工业化赶上去。同时，也正因为落后，所以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建设的规模搞得再大一些，把发展的速度搞得再快一些，陈云认为，规模搞多大，速度搞多快，并不取决于人们的良好愿望，而取决于国民经济各个方面是否做到了综合平衡，各个部门之间是否合乎比例。就是说，国民经济在总量上和结构上是否是平衡的。“一

五”时期，工业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之所以解决得比较好，与这个指导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关于工业化的建设规模问题

所谓建设规模，首先是指基本建设项目和资金安排的多少。这个问题，从“一五”计划开始编制时就碰到了。尽管计划安排的项目有近万个，基建投资占了经济和文教事业总支出的55.8%，但各方面要求上项目，加投资的呼声仍然很高。针对这种要求，陈云在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中指出：“建设规模能否扩大，不单要根据需要，还必须根据是否可能。这就是说，必须根据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力量，能否供应设备。”（26）

“一五”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也发生过曲折。这主要是1955年农业丰收之后，出现了要求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都再适当扩大和加快的冒进倾向。在这一倾向的影响下，1956年的基建投资比1955年增长62%，大大超过当年国家预算收入和钢材、水泥、木材等资源的增长速度。结果，财政收支发生赤字，生产资料供应出现缺口，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不相适应。为此，陈云同周恩来一起进行了纠偏工作，并使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数比1956年的实际完成数减少了20.6%，遏制了急躁冒进的倾向。

经过总结经验教训，陈云在1957年1月18日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以及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制约方法。从他的这篇讲话和此后的一些讲话、文章中看，这些制约方法主要是：一看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应、外汇收支是否平衡，二看农业能否承受，三是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有保证。他说过，在50年代，他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27）他还指出，“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28）“‘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29）农业和市场问题，是关系人民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30）

陈云主张要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进行基本建设，绝不是说只顾生活提高，不顾基本建设。相反，他历来倡导，为了实现工业化，必须艰苦奋斗。早在1955年他就说过：“必须在进行建设的同时，尽可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最高的目的。但是又必须看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是一种稳步渐进的提高。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原来的生产水平很低，只有经过六万万人民自己克勤克俭的劳动，进行几个五年计划，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才有可能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31）后来，他把正确处理人民生活与基本建设关系的方针形象地概括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八个字。在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讲到四化目标能否实现时还说过：不能把人民生活现代化和四化搞到一起。“当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在人民生活上必有提高，而且提高的程度不会小，但还不能与美、英、法、德、日等国相比，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其中大部分是农民，那样比是办不到的。现代比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32）

（二）关于工业化的发展速度问题

对速度问题，陈云在编制“一五”计划时就反复强调，必须遵守按比例平衡发展的法则。就早说，制定工业发展速度，不能只考虑工业本身的情况，还要考虑工业与农业，工业与交通运输，工业与科技教育，以及工业内部的重工业与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的冶金，煤炭、电力、化工等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他指出：“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艰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33)1954年6月，他在各大区财经负责人会议上讲到中国工业化的特点时说，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的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是长期的，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是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我们说按比例发展，是队长期间来算的，从短期看，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脱节不要太远而已。在他看来，“一五”计划所规定的速度和各项生产指标虽然是比较高的，但可以过得去，各种比例没有脱节太远，平衡不至于破裂。

然而，由于1956年的冒进，在编制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时，制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导致了平衡的破裂。经过1957年巨冒进，被打破的平衡虽然得到了恢复，但1958年又发生了反“反冒进”，出现了要求更高速度和更高指标的“大跃进”，尤其是全民大炼钢铁，导致国民经济更严重的比例失调，使“二五”时期的社会总产值变成了负增长。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陈云深刻指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34)

怎样才能做到按比例呢？陈云在参与编制“一五”计划时曾提出，要做到按比例，就要认真研究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而这种研究，“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35)依照这一思想，他提出了关于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钢铁、机械工业和能源、运输部门，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大厂和小厂、技术先进和落后，以及基本建设中“骨头”和“肉”等关系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由于接踵而来的反“反冒进”、“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而长期未被采纳，但在我们党纠正了“左”的错误后，终于被人们所重视。1979年夏天，他在同当时上海市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语重心长他说：综合平衡，就要研究比例关系。比例，是客观存在，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自觉地去研究、认识。要承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缺少本领，要不断地钻。

陈云之所以反对单凭主观愿望去制定高指标，追求高速度，还出于两个考虑，即防止被动和折腾，防止忽视质量和效益。他说：计划指标必须可靠，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36)针对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里出现的“洋跃进”，他又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

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下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37)不按比例稳于前进，将“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38)他早在公私合营时就一再提醒工业部门，不要只追求数量，忽视质量，要鼓励和保护名牌货。1962年，他针对钢铁工业过于突出的问题指出：“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39)

在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指导下，“一五”时期的建设规模大，但比较适切；发展速度快，但比较稳妥；整个计划不仅提前一年完成，而且与以后的几个五年计划相比，可以说是发展最正常，效益最好的。四十多年的实践反复说明，按照这个思想做，经济发展就顺利；否则，经济就会大起大落。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和国际环境与“一五”时期都有很大不同，但由于这一思想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因此，它并未过时，也不会过时。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的，我们在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同时，仍然“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不要一讲加快发展，就一哄而起，走到过去那种忽视效益，片面追求产值，争相攀比，盲目上新项目，一味扩大基建规模的老路上去。”

《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对建国初期进行评价时指出：这一时期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须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邓小平在对这个决议的起草发表意见时也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40)这些评价客观公正，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陈云曾经在1956年说过，“我们要有志气，要同心协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以至第五个五年计划、第十个五年计划，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41)现在，尽管我国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然而，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早已突破了70%，钢、煤炭、水泥、化肥、发电运、机床等主要工业品的年产量均已跃居世界第一或名列前茅，原子能、航天、电子等一批现代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个基本上独立完整、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但不应当妄自菲薄；我们应当继续借鉴国外的一切好经验，但更应当借鉴自己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包括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经验。只要我们善于把自己的、别人的经验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吸收消化，我们就一定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第1080页。

(11)(12)(13)(14)(15)(16)(17)(18)(19)(20)(21)(24)(33)(41)《陈云文选》第2卷，第98、136、286、289、309—310、302—303、288、73、122、207、211、260、97、194—195和245、260、183、45和184、46、335、132、241—242、308页。

《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载《红旗》1959年第5期。

(22)(23)(25)(27)(28)(29)(30)(32)(36)(37)(38)(39)《陈云文选》第3卷，第312、281、337、214、251、246—247、210、262、251、56、212、268、351、213页。

(26)(31)《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节选），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4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

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

王磊

统购统销是我国政府自 1953 年起实行的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与供应的强制管制措施，持续时间长达 32 年，对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建国初我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陈云作为我国当时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倡议者和组织领导者，他在实行统购统销时所阐发的一些思想观点，所采取的领导方法及所表现出来的决策艺术，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总结。

一统购统销的理论基础——“粮食定，天下定”

重视粮食问题是陈云经济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他有一句名言：“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陈云的这一观点是他 50 年代初不顾重重困难和压力，毅然决定以统购统销解决粮食问题的理论基础。

“民以食为天”。当今世界各国无不重视粮食问题，而在中国，粮食问题更有其特殊性。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消费量也最大，但人均耕地面积却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1/2。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先天对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构成了巨大压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种压力显得特别沉重，其一，经过 12 年战争之后，农田产量下降了，在粮食亩产量平均仅有 94 公斤；其二，长期战乱之后，水利失修，灾荒频仍，除 1952 年外的，其余几年，“老天爷”不帮忙，南有水灾，北有旱灾，东北还有水灾和冻灾，农村大约有 1 亿灾民需要赈济；其三，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有限的资金只能重点投放在工业上，农村资金匮乏，生产资料残缺不全，粮食总产量难有大的提高；其四，建国之后，政治形势稳定，人口急剧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即使是大丰收的 1952 年也仅有 543 斤，远低于旧中国 1936 年人均 660 斤的最高水平。基于上述原因，我国的粮食危机接连不断，建国初几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风潮，都是因粮食供应不足引起的。在陈云的领导下，国家花了很大的代价从东北、西南紧急调运了大批粮食到上海、天津等中心城市，才将涨价风潮压下去。

“当家自知柴米贵”。严重的粮食形势使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比别人更早、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粮食的重要性。在 50 年代初，他多次谈论粮食问题，说：“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为了把市场维持得好，必须密切注意粮食的供应。”“粮食、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之大小。”“物资充足，物价稳定，一个是指纱布，一个是指粮食。纱布和粮食相比较，粮食更重要。粮食波动就要影响物价。”陈云还认为，粮食对工业建设和国防有着极端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奇怪得很，这个农业国过去还进口棉花和粮食。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那就会卖出去的是猪鬃、桐油，买进来的是粮食而不是机器。如果棉花和粮食能够自给，买进来的就会是机器。”陈云还指出：“粮食是战略物资，我们经常控制着一百亿斤粮食，什么杜鲁门、李鲁门，统统不怕。假如碰到荒年，全国有几千万人口没有粮食吃，统统需要国家供给，也可渡过。”

陈云关于必须重视粮食问题的论述，是他基于对中国国情特别深刻的认识而形成的一以贯之的思想。他认为：“我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半自给的经济，生产力水平不高，商品率很低”，因此，粮食供应不足，将是长期性的。陈云的这一思想是他决定实行和长期坚持统购统销政策的思想认识基础。

二工业优先的经济战略与 “两种炸药”的选择

建国后前三年，我国的粮食供应虽一直偏紧，但并没有采取全面的粮食管制措施，一直实行粮食的自由购销制度，粮食市场是受限制的自由市场。统购统销这一非常措施的出台，是1953年夏秋粮食产需、供求矛盾极端尖锐的产物，陈云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领导大家实行统购统销的。

1953年是我国正式开始“一五计划”建设的头一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我国工矿业就业人数急剧增加。和1948年对比，1953年全国职工人数增长5.7倍。职工人数的激增导致商品粮需求量直线上升，在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的粮食年度内，国家连征加购共收粮食547亿斤，但粮食销售量却高达587亿斤。更为严重的是，粮食购销倒挂形势在夏收后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更趋恶化。据陈云调查，在1953年7、8、9三个月，粮食购销赤字有增无减，又形成了26亿斤赤字。由于小麦受灾，减产70亿斤，加上农民困灾产生的惜售心理，预计年底前公粮的征收和粮食的收购都将大力减少，全国粮食问题前景黯淡，形势严峻。

从1953年粮食危机的起因看，当时的粮食恐慌虽在表面上反映的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的不足与匮乏，但其实质却表明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大目标与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当时我国的经济过于落后，可供选择的余地是很小的。在1953年6月14日开始举行的中共中央财经会议上，与会的粮食组代表集中讨论了粮食的购销形势，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在这种困难形势下，毛主席要求中财委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其时，陈云因病在外休养，中财委和粮食部在薄一波主持下，提出了余粮认购、合同收购及保本计息储粮三种应急办法交中央讨论。7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经过认真思考，认为上述办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便立即将主要精力投入了对这一难题的研究。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陈云更加认识到此次粮食危机的严重性。当时，全国不少地方的粮食市场已经发生混乱，北京、天津面粉不够供应，依陈云估计，如下采取有力措施，1954年夏粮上市前粮食供需差额将达117亿斤。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任其发展，很快将会出现蔓延全国的粮荒，引发强烈的社会经济震荡，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营，影响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粮食问题亟待采取果断措施。

经过全面分析和认真研究，陈云认为当时可供选择的应急办法只有四种：1.大力削减粮食支出；2.大量进口粮食；3.提价收购；4.平价征购。表面看来，这四种办法似乎皆无不可，然而若根据当时我国的国情细加分析则可看出，前三种办法根本行不通，只有最后一种办法可行。首先，当时我国的粮食支出本身控制很紧，难再压缩。陈云曾深有感触地说，“减少支出的

途径我都一个一个地想过了，都不行。”其次，就当时的国力而言，欲依靠大量进口粮食应付国内严重的粮食危机也不现实。陈三指出：“中国从大清帝国开始，就从外国买棉花、粮食、石油，现在我们如果还把外汇用来买这些东西，哪里有钱买机器搞工业建设？”（11）再次，提价竟购并无现实可能性。一方面，国家的资金主要投在了工业建设上，财政没钱，当时的财政部长邓小平针对有的同志关于可以提高粮价的说法说，“我这个财政部长可是一个铜板也没有，由此要加大的国家支出，还得找你们要钱。”（12）另一方面，在粮食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如国家提价，私商也会抬价抢购，私商出价总会高于国家牌价，提价不但不能多购粮食，反会刺激粮食投机，助长农民不肯卖粮的情绪，形成更大规模的粮食危机。

基于以上分析，陈云认为剩下的唯一的办法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依靠党经过革命和土改在农村建立的威信、依靠工业化美好前景的感召力，强制性地从农村平价征购粮食。陈云关于必须实行征购的建议向中央提出后，立即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和毛泽东的赞成。在1953年10月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0月10日的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受命作了主报告，将自己的决策过程和想法向大会作了汇报，并做说服工作。

当时，对于应否实行征购，党内意见并不统一，民主党派中也有人有不同看法。因为前此的日伪和蒋介石政权都曾实行过这个办法，老百姓对其印象很坏，从事农村工作的基层、中层乃至高层干部都有畏难情绪，社会上阻力很大。而且，实行征购确实部分限制了农民的权益，“农民的粮食下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13）但是，陈云认为，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建设不成，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我们当时面临的实际是一个两难抉择，如果不实行征购，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将要被破坏；如果实行，农村又可能出小乱子甚或大乱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陈云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只能以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为重，忍痛做出全面实行征购的抉择。当时有人提出，强制实行征购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陈云解释说，“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他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15）

中国共产党是以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夺取全国政权的，农民的利益亦即自己的利益。但是以辩证法为理论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建设富强的现代化的新中国，为达此目的，即使暂时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也在所不惜。因为，只有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根本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没有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农民自身利益也难保证。这是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50年代，中国工业化建设刚刚起步，国家财力薄弱，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不可能很高，国家不得不以征购的办法筹粮，否则，继续采用自由购买的方式，“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16）恰如陈云所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

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17)50年代的特殊国情是我们当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离开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离开我们当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难以理解陈云当初选择征购的动机和原因的。

三科学领导方法的集中体现—— 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陈云很善于领导经济工作，他在进行经济决策、制定经济政策和设计具体实施方案时，慎思熟虑，多谋善断，有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这在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第一，谨慎稳妥，充分估计困难。陈云在处理各种问题时，总是充分估计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做最坏的打算。在经过充分调查论证，决定实行征购之后，陈云告诫大家：“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二十六万个乡，一百万个自然村。如果十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那就是十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生产情绪，不仅要给他们钞票，还要供应他们物资。”陈云多次强调，“征购是一项很艰巨、很麻烦的工作，这比对付资本家难得多。”“过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加上时间急迫，工作中出一点毛病是不可避免的。不仅第一年要出，第二年第三年也可能出。”(18)由于困难估计得足，我们在征购过程中干取了多种应急办法，粮价定得较为公道，实施步骤较为稳妥，对征购的依靠力量也有切实的动员和布置。后来实际的征购工作，从总的方面说，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第二，尽可能提出多种方案，科学比较决策。陈云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从不从直觉出发，简单地下结论，而是尽可能地提出多种方案，反复比较，权衡利弊得失，于对比中鉴别优劣，以求决策更加全面，周到、切实可行。陈云比较决策的方法论在统购统销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他在酝酿解决粮食问题的政策时，并不满足于仅在农村实行征购这一种方案，而是尽其所想，汇总列举了8种可供选择的方案：1.只征不配，农村征购，城市不配售，结果边征边漏，农民卖粮后又到城市将粮买回；2.只配不征，城市配售，农村不征购，阻力虽小，但搞不到足够的粮食；3.“原封不动”仍是自由市场，买进卖出，不受干预，困难日增，结果必乱；4.“临渴掘井”，先自由买卖，维持不下去时再到产粮区征购，最无远见，不可行；5.动员认购，强迫而不命令。工作难度很大；6.合同预购，产前订合同，产后依合同收购，虽是好办法，但在缺粮情况下，合同难兑现；7.各行其是，不搞统一办法，各地自定政策，缺点是各地易于相互影响，中央不好把握全局；8.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售，购配结合，双管齐下，虽涉及面广且难处理与农民的关系，但却是最有实效的选择。这样，经过逐一筛选对比，运用比较决策的办法，陈云不仅很容易地鉴别了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得出了正确结论，而且彻底说服了党内不同意见者，使大家无不心悦诚服。薄一波对此曾有很高评价，他说：统购统销“从决策方法上说，不仅提出了8种方案和办法，而且逐一条分缕析，反复论证，反复比较，论证可行性，比较得与失，最后确定统购统销为可行政策之后，还要陈述利弊，指明利是什么，弊在哪里，让大家思想上早作准备。确实是既唯物又辩证。这种民主的决策程序和科学的决策方法，我以为至今仍值得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项决策工作

中，认真加以效法和发扬的。” (19)

第三，瞻前顾后，统筹兼顾。陈云认为，我们看问题、制定政策一定要准确、全面，要对问题进行周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分清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考虑到多种因素，照顾到前后左右，因地制宜，留有余地。在制定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他首先抓住重点，全面地分析了粮食问题的所有主要矛盾，他说：“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 (20)有了这种全面、系统、准确的综合分析，陈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整套首尾兼顾、前后呼应，有所侧重的购销政策，其主要内容有：1.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即计划收购，也称统购，这是最难的工作，要全力以赴；2.在城市定量配给，也称计划供应，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台称统购统销；3.严格管制私商，粮食由国家专营，私人一律不得经营粮食；4.加强中央统一管理，调整内部关系，粮食的证购及调剂、粮价的高与低由中央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调度。上述4项政策是互相关联、互相配套、缺一不可的整体，“只实行计划收购，不实行计划供应，就不能控制市场的销量；只实行计划供应，不实行计划收购，就无法取得足够的商品粮食。而如果不由国家严格地控制市场，和由中央实行统一的管理，就不可能对付自由市场和投机商人，且将由于人为的粮食山头的相互对立，给投机商人以更多的捣乱机会，结果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亦将无法实现。” (21)陈云在领导统购统销的过程中，不仅善于把握全局，在大政方针问题上想得周全，而且叮一些工作中的具体细节问题，诸如征购的时间和数量，征购的标准与价格、用于征购的筹码和物资的供应等等，都有细密周到的考虑和安排。为求万全之策，陈云还尽其所能，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予以充分考虑、制定相应政策、灵活处理。例如，他估计“实行配给以后，黑市的出现是免不掉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不够吃，有的人吃不完；南方人要吃大米，北方人要吃面粉。这样就会出现买卖。我们要允许有一个地点作为交易场所，在我们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进行交易。”关于在城市实行粮食配给的时间，陈云在要求迅速推行的同时，也指出某些地方可以稍作推迟，他说：“有些地方，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情况很复杂，准备工作要较长的时间，那只能迟一点。” (22)

第四，善于总结经验，使工作更上一层楼。善于总结经验和吸取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教训，是陈云经济工作主法论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没有总结就不可能有提高，他说：“总结经验就可以把过去做对了的和做错了的加以分析，使我们头脑清醒，把工作提高一步。不总结没有交代，做了若干年的工作者是糊里糊涂，死了也不好见马克思，后代的人也要责怪我们。” (23)在1953年7月至1954年6月的粮食年度内，由于“全党动员，全力以赴”，我们超额完成了1953年10月布置的粮食征购任务，购销相抵，库存有很大增加，粮食形势缓和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正如陈云事先所估计的那样，由于我们没有经验，统购统销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一方面，统购中有毛病。有些农民余粮较多，但国家没有购足；而更多的则是购“过头”了，出现了强迫命令、搜家和批判余粮户的现象。1954年江淮流域发生特大水灾，国家在非灾区多购了几十亿斤粮，结果使征购量占到总产量的30.6%，许多农民心有不满，说“统购无底，增产无益”。另一方面，统销中也有不少毛病。有的该供应而没有供应，或供应不及时，也有的不该

供应的供应了，该少供应的多供应了，农村偏紧，而城市则较松，不少人抱怨“统购统销没个规程”。由于连续两年购了“过头粮”。1955年春，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家家谈粮食，户户要统销”的现象，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温州等地区甚至发生了骚乱。为了消除农民的不满，在陈云的参与和建议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5年3月3日发布了《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不仅将1955年至1956年粮食年度的征购量减为900亿斤，而且还将购销办法改为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措施，“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上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于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24)1955年7月21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陈云专门就如何改进粮食购销工作做了题为《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发言，对“三定”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提出了5条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25)根据陈云讲话精神，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农村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办法》，以法令的形式对“三定”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26)“三定”政策是统购统销在执行过程中的一大进步，随着这一措施的出台，统购统销进入了制度化、稳定化阶段。

回顾陈云领导实行统购统销的历程，可以看出，统购统销是在我国农业极端落后、工业化刚刚起步、粮食供应混乱形势有增无减的困难情况下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当时唯一可取、且又行之有效的正确选择。它的实行，有效地保障了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保障了广大人民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消除了私人资本主义经营的无政府状态和贱买贵卖、囤积居奇等种种弊端，也有利于保持物价的稳定。(27)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尽管当时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可是经过陈云认真负责、殚精竭虑、富于创造性的思考，使统购统销政策真正达到了稳妥的程度，虽在以后的具体工作中，由于缺少经验，出现了一些纰漏，但也尽在陈云意料之中。陈云那种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细致、慎之又慎的工作态度和比较决策的科学领导方法，不仅在当时为我们解决了一大经济难题，而且在今天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学习与借鉴的典范。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注释

《陈云文选》第3卷，第125页。

转引自《中国粮食之研究》，第12页。

(11)(13)(15)(16)(17)(18)(20)(22))23((25)《陈云文选》第2卷，第119、59、207、130、205、205、98、210、208、208、97、213—214、207、214—215、341、277—278页。

戴谟安：《粮食生产经济》，第65页。

(12)(14)(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256、270、263、267页。

(2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第479页。

(2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第77—78页。

(2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115—133页。

(2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20页。

陈云与国民经济的两次调整

徐棣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45 年的经济发展中,有两次挽救危局的国民经济大调整。主持这两次大调整的主要负责人都是陈云。本文拟就陈云在两次大调整中听遵循的指导思想、采取的对策及取得的成功经验,作一初步探讨。

一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和专家。新中国一成立,他就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组成领导了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迅速根除了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脱缰野马般的通货膨胀,恢复发展了经济,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具体组织领导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一五”计划的制定和经济建设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陈云领导经济工作一贯主张经济发展要认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循序渐进。他认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下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为了保证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他提出要注意以下几个环节的平衡。即: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保持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按照先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的次序排队使用;人民购买力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他还指出必须研究和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包括农轻重,工业内部能源,原料与制造业,民用工业与军用工业,大中小企业以及基本建设中的“骨头”与“肉”的关系。特别要注意农业的状况,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也很难发展,农业生产与财政收入有很大关系,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是很大的。1956年,他与周恩来一起对克服和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作了很大努力。根据反冒进总结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思想,被中共八大一次会议所接受,确定为经济建设的方针。但是,随着“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发展,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指导思想迅速膨胀起来,周恩来、陈云实事求是平衡发展的思想不断受到批判,陈云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实际上被排斥。

1958年的“大跃进”,原设想通过政治挂帅(即战争时期政治动员的方法),大搞以钢为纲的群众运动,大办农村人民公社,促进工业以致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提前赶上甚至超过英国。但它脱离了我国国情,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欲速不达。1960年起,工农业生产连续大幅下降,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财政经济极度困难。特别是农村,在高指标、共产风影响下,生产力受到很

大破坏，加上自然灾害，饥荒已在全国蔓延。1961年初，全国被迫进行调整，但由于始终对困难估计不足，没有下决心把过高的工业生产建设指标降下来，经济下滑仍难制止。因而，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一致推荐，请陈云挑起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重任。

在这次国民经济调整中，为挽救危局，陈云以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充分估计国民经济中的困难，按照站稳脚跟、稳扎稳打的原则，提出了一整套明确具体的调整方针和政策，广大干部由于吸取了三年困难的教训，上上下下对调整措施的认识比较一致，执行起来卓有成效，因而使国民经济逐步止跌回升，于1965年转入正常发展。但这次为纠正“大跃进”错误而进行的经济调整，只当作非常时期的措施，对“大跃进”本身指导思想的错误没有触动，因而当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时，急于求成的经济建设思想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刚刚呈现协调发展好势头的国民经济，又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所打断。在调整中建立了卓著功勋的陈云，再次被迫检讨，并完全离开了经济领导工作岗位。

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方面虽没有提出像“大跃进”时那样高的指标，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及“以钢为纲”的方针却依然如故；共产风、瞎指挥更加盛行，甚至把商品交换、按劳分配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经济体制更加僵化；加上政治动乱的严重干扰，整个国民经济长期陷入恶性循环。1976年粉碎“四人帮”，制止了政治动乱，但急于求成的经济指导思想仍延续了下来，在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刚刚有所恢复的情况下，1978年就企图组织新的全面跃进。形势要求再一次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彻底清算过去长达20年的“左”的错误，重新确立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这项任务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以后一系列会议完成了。在陈云与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动下，党中央的领导班子分析了现实经济中的矛盾与困难，揭露了指导方针存在的缺点与错误，制定了以调整为中心内容的新“八字”方针，一条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也初具雏型。陈云在大家拥护下，再次主持财经委员会工作，挑起了组织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重任。

第二次调整历时3年，不但协调了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等基本比例关系，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和信贷的平衡，而且在调整中注意克服经济建设中“左”的指导思想，真正从国情出发，按照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循序发展的建设方针办事，积极改革不适应发展的经济体制。所以，尽管后来经济仍有不少起伏，但总的看，我国经济建设从此走上了比较健康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轨道。

陈云两次主持调整的曲折史实，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工作中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的消长。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在长达20多年中，国民经济发展经常伴随着结构畸形，经济效益低下，波动频繁，甚至大起大落，不得不一再进行后退和调整；坚持实事求是平衡发展的陈三，经常不能处于主导地位，其经济思想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当国民经济被迫大调整时，“国乱思良将”，陈云才被起用。而陈云在两次调整中都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正确的思想方针和周密的部署，使垂危的经济重新获得蓬勃生机。这一正一反的事实，充分反映了陈云所一贯坚持的经济思想的正确性和魅力。当然，两次调整也有不同，前一次是“左”的指导思想初遇挫折，虽然觔斗跌得很重，但广大干部和群众还

对其缺乏认识，还有不少迷信，因而陈云在调整期间所采取的措施能够被接受，但其基本经济思想得不到党内多数同志的认同，甚至最终受到不应有的批判。而第二次调整时，由于中央的群体已经从长达 20 年的挫折中开始觉醒，开始比较自觉地清算“左”的经济指导思想，因此，由陈云领导的这次调整，不仅理顺了比例关系，使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而且成为探索新的建设道路一次成功的实践，为在正确的战略下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

陈云主持两次国民经济调整，遵循的是其一贯坚持的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循序前进的基本指导思想。正如 1979 年他与李先念写给中央的信中所说：“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型’”。“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针对调整时期面临的特殊情况，他采取了以下对策和措施：

（一）鼓励讲真话和发表不同意见。

毛泽东常说，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但怎样才能情况明呢？深入调查研究是一种有效方法，但关键还在于各级干部敢讲真话，领导者能够倾听不同意见。“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由于动辄以右倾这顶帽子压人，反映一些真实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断受到批判，因而多数同志不敢讲真话，不敢揭露矛盾，更不敢坚持与领导不同的意见。有的人则投领导所好，虚报产量和成绩，掩盖错误和问题。因而尽管矛盾已堆积如山，却总认为处处莺歌燕舞。在这种虚夸不实的基础上作决策，是这两个时期经济工作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因而要实行正确的调整，首先必须鼓励各级干部讲真话，敢于揭露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领导必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这样才能比较全面深刻地认清形势，采取比较正确的调整措施。陈云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提倡讲真话。为了推进调整工作，1962 年的扩大工作会议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应该讲真话，有问题就提出，有意见就发表，认真地进行讨论。”“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这样“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

由于陈云在主持调整时一开始就注意纠正虚夸作风，在调整过程中又反复强调，对形势、方针、措施，以及工作重点摆在哪里有两派意见是好事，鼓励各个部门揭露矛盾发表不同意见。因而，尽管调整时期矛盾错综复杂，但总的说能从全局出发，实事求是处理各种问题，避免了片面性，保证了调整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正确分析经济形势和弄清基本国情，统一干部思想。

60 年代调整初期，许多调整措施所以落实不下去，关键在于对经济形势特别是对农业的严重困难认识不清，正如陈云所说：“对于存在着困难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当时，不少同志有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认为只要农业有个好收成就可以万事大吉，所以等待观望，下肯收摊减人；七千人大会上主流意见也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事实上，从 1958 年起连年的赤字一直被掩盖着，直到 1962 年西楼会议才暴露。要搞

好调整，必须从统一干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入手。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深入揭露了当时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困难，通过实事求是的算帐，首先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农业困难究竟有多大和恢复农业究竟需要多长时间这两个问题。他指出，由于目前农业的综合条件可能还不如“一五”时期，特别是粮食不够吃，农民还不愿多种经济作物，因而整个农业的恢复大约要3—5年。同时，通过摆事实说明，不是农业灾害扯了工业的后腿，而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如果工业不适当后退，通货膨胀和人民生活下降的趋势就难于扭转。这样有根有据全盘托出的分析，有力地提高了广大干部对经济形势严重性的认识，工业基本建设必须大幅后退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调整工作也就势如破竹了。

80年代调整之前，由于经过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经济恢复，现实经济状况不像60年代初那样困难，普遍存在的急于跃进的思想是十分自然的。脱离我国国情是经济大起大落被迫调整的根源。为此，陈云除深入讲明当时的困难外，还进一步反复引导大家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他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由于陈云在提出调整方针时，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总的经济指导方针上统一了大家认识，使80年代初调整过程中遇到的思想阻力比60年代大大减少，保证了各项调整措施顺利推进。

（三）把调整作为一个阶段，避免又要下马，又想发展，举棋不定。

调整就是适当后退或部分后退，就是要放慢速度甚至原地踏步，目的是为了退到可靠的阵地，站稳以后再前进。这必然与正常的发展有矛盾。我国国民经济两次大调整，都是在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进行的，经济恢复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而需要有一个以调整为中心的阶段，便于统筹安排各方面工作。针对60年代初对工业下马决心不大的情况，陈云明确指出：“现在无论农业或者工业，都需要有一个恢复时期。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二年到五年。工业在这三五年内，也只能放慢速度，只能是调整和恢复。”他建议把调整作为一个阶段纳入十年规划，即十年规划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恢复，在这个阶段中，某些方面可能有若干发展，但主要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恢复是为了发展。农业恢复了，工业内部被破坏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了，就为第二阶段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由于对调整和发展从阶段上作了这样明确的划分，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指标先下后上，任务比较明确，使各部门部署财经工作时，较好地解决了原来既要下马、又想发展，既要减人，又想扩大规模的矛盾心理，集中力量抓好调整工作。当然，确定了调整阶段，还必须真正把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使其他工作服从或服务于这个中心。80年代初调整时，陈云、李先念建议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被大家接受了。但开始，有的调整措施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如占基本建设大头的22个引进项目，始终舍不得暂时下马，该退的没有退够；有的改革措施对调整任务形成了冲击，如扩大地方和企业财权后，地方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又盲目上了

一批重复建设项目，加上用于改善城乡人民生活的开支增幅过大，因此，在农业轻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财政连年出现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为此，1981年强调基本建设要退够，各项改革要服从调整，使调整真正成为这个阶段的中心，原定的任务才基本实现。

调整阶段的时间究竟多长比较合适，主要应根据恢复农业或改变工农业夫调所需时间来定。陈云再三强调要争取快，准备慢，即：只要有利于农业增产的措施，都要全力以赴去实现，但必须考虑到，经济作物和大牲畜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一自然的过程，工业基本建设的安排，只有着眼于农业恢复发展可能慢的基础上，才能稳扎稳打，给整个调整工作的安排留有余地，取得主动。60年代调整时，虽然1962年工业和基本建设已经退够，但考虑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水平，工业交通运输能力也需要填平补齐和维修更新，决定再调整三年。这样做看起来似乎影响经济发展，实际上为第三十五年计划工农业加速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四）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集中力量理顺农轻重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由于长期以来对国民经济的指导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高速增长，违反了农轻重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所以，两次比例失调，主要是重工业超越了农业和轻工业的承受能力，积累率过高，建设规模过大，挤了人民生活，市场供应严重短缺。陈云说：“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而要协调比例关系，关键在于缩小建设规模，从降低重工业生产建设速度和加强农业和轻工业两个方面来进行调整。

“大跃进”时期的生产建设是根据生产粮7000亿斤，棉7000万担，钢5000—6000万吨的设想来部署的，而实际产量不及原估计的一半。显然，已经摆开的生产建设规模大大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可能。所以，60年代初调整时，解决比例失调的主要出路只能是工业和基本建设大步后退，作“伤筋动骨”的调整。在大幅度压缩建设规模和工业企业关停并转时，陈云十分重视减少城市人口，认为这是一项关系全局的根本性措施。因为当时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全国性饥荒，在城市粮食库存已基本挖空，农业恢复不能很快取得成效，进口粮食又没有那么多外汇的情况下，只有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对农村粮食征购，才能使农业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后来的事实证明，正由于工业生产建设大幅度后退，动员了2000万城市人口下乡，才稳定了国民经济全局，使调整工作迅速取得成效。但调整比例关系，即使是60年代初，仅仅依靠压缩工业和基本建设规模也是不够的，必须同时积极支持农业和轻工业增产。陈云认为，“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是“根本大计”。要求各级政府把农业增产和安排好市场作为当时第一位问题，材料分配要先满足恢复农业的需要，其次满足市场的需要（主要是日用工业品生产的需要），然后再考虑其他。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在有限的财力下，适当进口化肥支持商品粮主产区；适当增加经济作物区的粮食供应，促进经济作物增产；拨出部分钢铁、木材，制造当时急需的中小农具等。由于这些措施和安排切合实际，在扭转比例失调方面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80年代初的调整，也有一个基本建设适当后退和下决心关停一批经济效益低的工业企业问题。当时，除停止执行高指标的十年规划，适当削减基建规模，降低工业速度，强调钢的发展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外，

陈云还针对企图依靠外债来扩大建设规模的新情况，特别指出，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配套投资能力，做到循序渐进。这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后如何合理把握建设规模，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但这次调整，重点放在了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适当提高城乡人民收入水平上。因为，当时农业情况比 60 年代初好得多，工业基础也雄厚得多，总的经济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只要薄弱部门或环节能得到加强，生产建设可以在调整中稳步前进。农业和轻工业的加强，除了得益于财力物力上的倾斜外，有利于调整的改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80 年代初，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普遍推行，是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促进农业增产的主要因素。

（五）力争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

如前所述，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总量严重失衡，财政信贷出现巨额赤字。50 年代“大跃进”时，三年财政虚收实支，虚盈实亏，赤字分别占当年财政支出的 5.3%、11.9% 和 12.5%；在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后，银行连续透支弥补财政赤字，投入大于回笼，1960 年末货币流通量增加了 81.7%。70 年代末基建摊子铺开过大，使财政信贷十分困难，1978 年签订的 78 亿美元的引进项目合同，全部都要用现汇支付，给外汇收支平衡造成很大压力。所以，两次调整都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只是这种通货膨胀是隐形的，在当时国家严格控制物价的情况下，集中表现为市场商品严重短缺，甚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的粮食、棉布、食油以及日用品也不能保证需要，黑市盛行，投机倒把相当严重，人民生活下降，社会不稳定。

陈云历来主张财政、信贷、外汇收支平衡，物资要留有余地。在两次调整中，他十分重视通货膨胀问题，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制止，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制止通货膨胀的根本措施当然是发展生产，增加市场急需的工农业产品的供给，压缩投资，降低工业生产指标，减少市场需求。但是通过结构调整来平衡供求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农业的恢复发展一时很难满足市场的需要。所以，必须精心安排好市场，安定人民生活；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减少通货对商品的压力，在 60 年代初的艰难岁月中，陈云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神，尽力保证城市人口的最低生活。除了定量供应粮食、食油、棉布外，千方百计力争每人每月供应三斤豆子、半斤鱼，干部适当供应些糖、肉和蛋以保证必要的营养；努力增产化纤产品，以缓解棉花不足的困难。同时采取一切措施回笼货币，以缓解通胀压力，如严格现金管理，节约现金支出，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恢复手工业生产，增加商品流通渠道，开放集市贸易等。特别是陈云提出的在尽力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对少量消费品的供应实行高价政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较好地利用了价格杠杆调节市场的作用，成为当时克服困难的一项创举。随着高价商品的供应对象由城市扩大到农村，既调剂了人民需要，平衡了市场，又大量回笼了货币，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有力抑制了城乡投机倒把的发展。

三

自从在陈云主持下完成 80 年代初调整以来，我国经济在清理过去“左”的错误后，调整了发展战略和实行了改革开放，总的看，发展比较平稳。但

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原有的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弊端，一时还不能完全清除；在城乡居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产业结构如何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适应不断提高的消费需求，更是国民经济前进中潜在的深层次矛盾。这些矛盾一旦积累，往往以通货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再次要求对国民经济进行全局性的调整。

新时期的调整，由于国民经济实力大大加强，并处于温饱型经济向小康型经济加速转变和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速转变的过程中，总量和结构失调的成因与过去有不同，调整的对策也不能照搬过去的老办法。但是陈云在两次调整中所阐发的基本思想并没有过时，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陈云关于在正确分析经济形势、认清基本国情基础上统一对调整认识的观点，关于调整时间长短主要应考虑农业情况，并把基点应放在“争取快、准备慢”的观点，对于治理当前的通货膨胀就切中要害。

最近这次从1993年汗始的通货膨胀所以持续居高不下，主要是不少干部对我国人口多、农民仍然占很大比例、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很低这一基本国情缺乏认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对比较利益低的农业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和保护；在工农业发展速比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不断拉大的情况下，继续追求扩大建设规模，对经济是否过热，长时间认识不一。1993年6月中央及时实施调整是正确的，措施比较得力，效果也比较好。但至第四季度，经济发展速度刚有较大回落，物价正处于上涨阶段，在多方压力下，就急于大幅度放松银根，接着改革措施大批出台，1994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计划安排也比1993年计划还高出一个百分点，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没有像陈云当年那样妥善处理。结果，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而且还有继续上件的趋势，1995年只好再度将治理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切实加强农业这个基础。由此可见，深入学习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结合新时期的特点广泛宣传陈云经济思想，使广大干部领会其精神实质，对推动我同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国家计划委员会）

注释

《陈云文选》第3卷，第52、248、187、199、188—189、250、200、253页。

陈云的再生产思想与我国 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

沙全一

陈云的再生产思想是陈云经济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

陈云的再生产思想，同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体系相联贯，是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它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如下：“一能吃饭，二能建设”；“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

“一能吃饭，二能建设”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中论述再生产的两大部类相互关系时说：“就像第一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二部类提供追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二部类也要在这个意义上为第一部类提供追加的可变资本。就可变资本来说，当第二部类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它的总产品的大部分，特别是它的剩余产品的大部分时，它就既为第一部类又为它自己进行积累了。”马克思接着又说，“在以资本的增加为基础的生产中， $(v + M)$ 必须= C 加上再并入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加上第一部类扩大生产所必需的下变资本的追加部分；而第二部类扩大生产的最低限度，就是第二部类本身进行实际积累，即实际扩大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这就突出他说明，生产资料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仅紧相关联，不能脱节；而且在追加生产资料时，必须同时追加生活资料。这还不够。马克思在接着谈到两大部类相互相应增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时，甚至强调，“这种增加——像第一部类剩余产品 m 直接并入资本 c 一样——是以第一部类的再生产已经具有进一步资本化的趋势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第二部类再生产包含着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剩余产品的增加为前提的。”这就告诫我们，在经济建设中，不仅不能使生产资料的生产离开生活资料的生产去孤立发展，一定要使生活资料的生产随着生产资料生产的增加而相应地增加；甚至还应当使生产资料在增加生产时，一定要以生活资料剩余产品的增加为前提。

陈云早在1957年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时就依此精神强调指出：“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这种排队的必要，主要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遗憾的是这些符合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我国实际的正确主张未及付诸实施，就遭到严重冲击。以致使我国一度走上了重工业片面发展，形成重型结构，造成两大部类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既延缓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也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和实行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后，陈云多次重申并发展了他的关于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主张。

1981年12月22日，他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经济工作的大方针，一是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的一部分。二是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时过一月，他于1982年元月25日再次强调：“还是那句话：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在于通过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首先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下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如果我们只注意搞工业，不注意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搞了工业以后，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再回头来搞农业那就晚了。究竟回头搞好，还是先搞好？当然是先搞好。”陈云所以如此强调发展农业以解决吃饭问题，甚至多次反复告诫，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正视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其基本点就在于“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一方面。

另一片面，可以说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必须把握一个正确的度。陈云强调“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但国家只有那么多钱，这里摆多少，那里摆多少，都要有一个计划。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可以改善，但改善的幅度要很好研究。”这个正确的度，就是前面已经引述过的；以国家的希望，即建设的需要为标准：饭不能吃得太好，不能吃光用光没有剩余，无法建设；饭也不能吃得太差，该分不分，勒紧裤带，无法生活，从而无法建设。

一能吃饭，二能建设；饭不能吃得太差。也不能吃得太好。科学具体他说明了生活与建设的辩证关系；通俗形象地描述了社会再生产的前提条件。陈云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再生产仍然具有极力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一，关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这是党和国家历来十分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实践中卓有成效地创立的一个显著功绩。仅以农民收入增长情况论，已从1978年人均年收入134元增至1994年的1220元，增长910%，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5年来已翻了两番以上。至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更是无庸置言。尽管如此，人民生活还是存在着问题的。一是收入增长极不平衡，分配不公严重；二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严重。

第二，关于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问题。这是党和国家一直列为首位的根本问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致力解决的突出问题，甚至将农业与农村、农民三位一体地综合发展。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047亿公斤增至1994年的4445亿公斤（最高年份1993年为4565亿公斤），15年来增长146%。但是，农业方面的问题还是非常突出和尖锐的，诸如农业基础脆弱，抗灾能力不强，不能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一些地区忽视农业，投入不足，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仅1994年就减少耕地600万亩）。粮食产量减少（1994年比1993年减少120亿公斤）。以致农产品供应偏紧；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发展滞后，影响农业经济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等等。

因此，应当根据陈云“一能吃饭，二能建设”的思想，把农业放在首位，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我国社会再生产奠定牢固基础，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 先生产，后基建 ”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揭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过程中，同时指出：“首先要研究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此后又提出：“正是为了要清楚他说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在这里，这种再生产只是指用较大的投资来进行的生产）与产品的绝对量无关，也正是为了要清楚他说明，对一定量商品来说，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前提是，既定产品的各种要素已经有了不同的组合，或不同的职能规定，因此，按价值量来说，这种再生产首先只是简单再生产。所改变的，不是简单再生产的各种既定要素的数量，而是它们的质的规定，并且这种改变是以后随着发生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前提”。(11)在这里，马克思明白地揭示：社会再生产有简单再生产（原有规模的、或规模不变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之分。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或者说是基础，是出发点；而扩大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的继续，或者说是发展，甚至可以说，扩大再生产总是包含着简单再生产。

陈云在指导我国社会再生产运行中，将上述马克思关于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简明扼要地概括为：“先生产，后基建”。除了在1957年《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中强调“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外，他1978年在：《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中的第四点意见指出，“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他说：“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12)。此后不久，1979年他又突出地指出：“基建投资超过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状况，自一九七〇年以来或多或少就存在了。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这是一个老问题。”(13)“根据30年来的经验，找出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这一条杠杠，是必要的，这样才是实事求是。”(14)这些都是重申要“先生产，后基建”。

“先生产，后基建”即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形成这样一个程序，既是规律要求，也是条件使然。国力允许，能够理想地扩大再生产，固然很好，然而，国力能否允许，却是一个不容主观决定的客观存在。因此，陈云曾经讲：“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生产必须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应该看到，基本建设搞多少，不决定于钞票有多少，而决定于原材料有多少。关于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我之所以说应该保证它们对原材料最低限度的需要，是因为今年的生产指标不可能在去年已经很高的基数上再增加多少。去年农业歉收，今年像棉纺织这样的轻工业生产不能不受到限制。还必须看到，今天把原材料的供应限于最低限度的生产的需要，挤出一点力量用于基本建设，正是为了将来生产的发展。”(15)可见，“先生产，后基建”不独是再生产的程序，而且是再生产的实质——连续不断的运动，并在运动中不断发展——的形象表述。

“先生产，后基建”的关键在国力，因此，要害是控制基建投资规模，陈云强调：“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

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16)

基本建设投资问题。亦即现在所说的固定资产投资问题，确如陈云所说，是一个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直到去年才使固定资产投资过猛的势头有所遏制，并进而改善了投资结构促进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但是，从根本上讲，这个老问题尚未得到根治。几年来的货币过量发行，根源之一就是连续几年来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而货币过量发行，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又往往是与经济增长率上升幅度较大相紧密联系，形成经济增长的波动。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固定资本更新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基础，并根据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的大约周期时限，将危机周期的间隔时间定为十年左右。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不会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但因固定资产的更新投资及不同时间形成不同的投资量而出现经济增长的波动，还是必然的。所以说，我们还应探索规律，找出固定资产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求得投资量稳定增长比例，弱化波动，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中说：“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因此。它们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17)在第二十一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中论述追加的可变资本中又说：“一定量的资本、没有积累，还是能够在一定界限之内扩大它的生产规模。但是，这里要讲的是特定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因此，生产的扩大，要取决于剩余价值到追加资本的转化，也就是要取决于作为生产基础的资本的扩大。”(18)正是基于这样的论述，马克思在区分了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并认为简单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只是一种抽象之后，在集中分析扩大再生产中，又分为在外延上的扩大和在内涵上的扩大这两种形式。外延扩大再生产是指规模扩大的——追加资本、扩大生产基础——再生产；内含扩大再生产是指规模不扩大、通过提高劳动生产资料的效率，实现增值的再生产。

根据马克思所揭示的扩大再生产的两种形式，陈云概括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19)以挖潜、革新、改造来实现内含扩大再生产。以新建实现外延扩大再生产，并且是先内含扩大再生产，后外延扩大再生产，他还强调，“我认为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20)1982年12月陈云又讲：“‘六五’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我看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过去一说要增加多少产量，就是新建多少厂，这个办法不一定好，现有企业要提高折旧率，加快设备更新，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这在多数情况下，比建新厂效益高。……办法就是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他尖锐地批评“我们有些地方是大少爷办企业，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利润概念。……搞经济工作，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利润概念，是不行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就是速度”。

(21)这就告诫我们：第一，要走以内含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第二，要注重经济效益，讲究时间，讲究利润。

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走以发展内含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以来，我国工业生产持续增长，仅以钢产量计，已由 1978 年的 3178 万吨增至 1994 年的 9153 万吨，15 年来增长率达 288%。以国有大中型企业论，截至 1993 年底，全国 1.44 万个国有大中型企业，仅占全部工业企业的 4%，而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部工业企业的 44%、62%和 50%。这充分说明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起着骨干的和主导的作用。但是，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着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较差，相互拖欠资金比较严重，影响经济正常循环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有赖于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创造良好条件；另一方面，则需从生产力方面着手，应当致力于“挖潜、革新、改造”。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邓小平“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改造技术”的精神，企业从“挖潜、革新、改造”发展到了“开发、引进、改造”，它的中心是技术改造没有变化。所以；在当前，应当在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转轨建制的同时，把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当作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项战略任务，认真贯彻执行。

“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2 卷中考察论证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和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考察论证再生产的平衡、按比例运行问题，这也正是研究再生产所应得到的结论。马克思说：“无论对于第 Ⅰ部类还是第 Ⅱ部类，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都是随便假定的。这个比例在第 Ⅰ部类和第 Ⅱ部类以及它们的分部类之间相同，也是随便假定的。只是为了简单起见，这里假定比例相同。即使假定比例不同，对问题的条件和它的解决方法，也绝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必然会得出以下结论：1. 年劳动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创造的新价值产品（分成 $v + M$ ），等于年劳动的另一部分生产的产品价值所包含的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的不变资本价值 C 。假如前者小于 C ，第 Ⅰ部类的不变资本就不能全部得到补偿；假如前者大于 C ，余额就不能利用，在这两个场合，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都会被违反。”(22)他还说：“因此，这样一种平衡，好像就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的规律了”；换句话说，因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 Ⅰ部类一方面要提供第 Ⅱ部类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提供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所以，劳动在第 Ⅰ部类的分配比例必须保持不变。”(23)此后，在分析扩大再生产中，马克思的结论依然是比例平衡必须保持不变，这恰是再生产运动规律的必然。

陈云的再生产思想，通过从保证吃饭到扩大再生产的系列论证，集中地反映在关于综合平衡的论述中。在总命题上，他高度概括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24)强调“搞经济下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24)。

综合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陈云提出的著名的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应三大平衡。早在 1954 年 6 月，陈云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

点说明》中，对这一思想就作了阐述，在这份汇报提纲中，提出了农业与工业、轻重工业之间、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以及技术力量需要与供给之间诸方面的比例关系，强调“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25），并且集中地专题论述了财政收支和保持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问题，1957年在《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中，重申并发展了上述思想，指出，“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26）1979年3月，他在《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的讲话中，强调“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27），并根据发展需要，为三大平衡增加了外汇收支平衡构成四大平衡。这对国民经济影响极大，具有重大意义。

综合平衡及具体化的四大平衡，与我们今天所惯称的总量平衡（即总需求量与总供给量的平衡）是一致的。党的十三大报告曾指出：“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稳定发展，必须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适当控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使之与国力相适应；合理掌握生活消费增长的幅度，使之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做到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各自平衡和相互之间的基本平衡”。（28）近些年来的实践证明，经济总量的平衡不是机械的、静止的，而是有弹性的和动态的，必须置于发展过程中审时度势，自觉地及时地调节经济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不平衡。1994年的经济，一方面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志，已达到43800亿元，为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却由于连续几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增长过快，导致货币发行过量，从需求拉动和成本上升两方面推动物价上涨。形成了特别突出的通货膨胀，涨幅竟至高达21.7%，同时，财政在中央支出大于收入，赤字668.14亿元。仅此一例，已深刻地显示出总量平衡中的严重问题。而这个总量失衡恰恰是具体反映为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应等三个重要方面。从货币发行过量拉动物价上涨，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直到中央财政赤字，又无一不是从社会再生产中的投资基金与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而诱发的。投资基金与消费基金，说到底，是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是经济建设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这两者之间必须把握一个正确的度的问题。所以，还是陈云说得正确，要从国力出发，要研究幅度，牢牢地把握住按比例，实现综合平衡。

（作者单位：中共宁夏区委党校）

注释

（11）（17）（18）（22）（23）《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卷，第584—585、586、436、438、571、190—191、565、453、521页。

（12）（13）（14）（15）（16）（19）（20）（21）（24）（26）（27）《陈云文选》第3卷，第53、305—306、309、85—86、280、309、237、264、264、5354、264、268、267，319—320、211，52—53、251—254页。

（25）《陈云文选》第2卷，第241页。

（28）《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8页。

浅谈陈云再生产理论 的现实意义

高鹤龄

陈云在长期领导国民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点的经济思想。当前，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陈云的经济思想特别是再生产理论，对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

陈云的这一思想，始终是他领导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包含着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即社会再生产的进行必须按比例、扩大再生产必须与国力相协调的理论。按比例，即综合平衡，是由相互制约、相互交错的单个资本运动构成的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基本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表现在物质形态上是第一、第二两大部类和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表现在价值形态上是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这些比例关系，直接关系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社会扩大再生产，是国力的施展，两者之间有一个相适应的问题。适应不适应是经济稳定不稳定的关键。“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陈云的这些观点，对代国目的经济建设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以年均 9% 的速度发展。但是，与经济快速发展相伴而生的通货膨胀，其实质则是经济总量的失控和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这是因为，经济总量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一旦超过国力承受的能力，信贷规模就会急剧膨胀，从而导致货币投放失控，进而引发通货膨胀。我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落后，一旦经济增长超过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农产品、原材料、能源价格必然上扬。这种需求推动进而转化为成本推动加工业产品价格上扬，必然导致全社会商品价格指数上升。

通货膨胀及其压力的不断增大，表明我国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因此，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建设规模与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的原则。因为它是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这一经济总量比例关系的主要内容，是产业结构协调、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提高之源头。当前，要保持基本建设与国家财力、物力的平衡，一方面，要采取有力措施控制投资规模膨胀，特别是对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高消费的楼堂馆所要予以坚决制止或控制；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要由粗放式的扩大再生产向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转换。只有这样，才能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

二 “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

陈云的这一论述，揭示了社会再生产中积累与消费的正确关系。积累与消费，是关系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改善协调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比例关系。在积累与消费的问题上，我国目前是积累与消费双膨胀。一方面，积累由于高投资率挤占了消费，据统计，1992、1993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分别为 32.2% 和 37.7%，1994 年也在 36% 以上，加上流动资金投资率，总投资率超过 40%。即使扣除物价因素，其增长速度也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6—10 个百分点。由此导致消费不断下降，由 1990 年的 63% 下降到 1992 年的 61.8% 和 1993 年的 56.2%，形成积累与消费比例不协调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工资外收入的增长和不正当消费的增多，使消费基金不断膨胀。“八五”前三年，全国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年均增长 17.4%，其中 1992 年和 1993 年分别增长 18.5% 和 21.1%，大大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3% 的水平。不仅如此，职工非工资收入增长更快，1993 年比上年增长 36.3%。在职工收入中，非工资收入比重 1992 年为 29%，1993 年上升到 31.1%。此外，诸如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等不正当消费的普遍化，也助长了消费基金的膨胀。

而积累与消费双膨胀、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远不及因物价上涨给生产和生活造成的疲软、混乱等消极作用大。因此，积累与消费之间必须保持一个正确的比例关系，坚持“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的原则。积累与消费的增长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积累与消费要保证在国民收入的范围内进行分配、克服超国民收入的非正常分配。同时，应放弃通过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以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另外，对公款吃喝等非正当消费应通过反腐倡廉、严明法纪制度予以坚决制止。

近年来，伴随着积累、消费基金的膨胀，却出现了市场消费需求的不足，城镇居民储蓄年均增长 29.2% 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农村，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市场也不旺。消费的不足，一方面使得生产消费品的加工工业产品积压、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停工停产；另一方面又加速了消费基金向积累基金的转化，使得加工工业的重复建设有了资金来源。故此，我们坚持“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的原则，应充分注意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通过引导消费增加消费需求，扩大市场容量。同时，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投资建设要寻找新的消费热点，向满足新的消费需求的行业发展。这是实现积累与消费相互促进、良性循环，企业摆脱困境，提高效益的必由之路。

三 “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

陈云这一对农业在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论述，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农业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强化。首先，实现社会供给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有赖于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增加。只有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才能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满足社会需求，保持社会稳定。其次，经济建设规模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只有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才能逐步改变农业发展滞后的状况，为二、三产业提供充足的原料、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所需的农副产品，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再

次，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依赖于农村市场需求的扩张。在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市场需求的扩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国有 12 亿人口，其中 80% 在农村，国内市场的扩张主要是农村市场的扩张。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二、三产业在农村才能找到广阔的市场。第口，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依赖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上，农业和农村犹如一个“蓄水池”，起着其他产业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特别是随着农业综合开发和乡镇企业的加速发展，将进一步扩大对劳动力、科技、信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吸纳量，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首先把农业的问题解决好。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农业生产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是思想上的重视程度不够。一些地方热衷于搞开发区，搞基本建设，攀比增长速度，造成耕地面积连年递减。近两年，减少耕地近千万亩。其次是国家对农业的宏观调控不力。近年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可以说是在无序的状况下进行的。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地向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和城市转移，使得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经营萎缩、退化。再次是投入严重不足。国有单位完成投资中，农业投资所占比重近年来一直在 2—3% 的低水平上徘徊，1994 年 1—8 月进一步下降到 1.5%；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也明显慢于其余各项支出，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投入很少甚至呈下降趋势；农民由于收入增长缓慢，生产资料价格涨幅高，种植业比较利益低，也不愿意增加投入。

作为 12 亿人口的大国，农业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国策”。根据陈云的这一思想，针对目前我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农业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合理制定并实施保护和加强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要强化对农业的重视，保护意识。农业下仅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而且比较利益差。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总是处于弱质地位，必须受到保护。我国 12 亿人口对农业的巨大需求，更决定了农业必须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强有力的保护。二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建立以国家为主，国家、集体、农户、其它投资相结合的多元农业投资结构。三要建立健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调节基金，从财政、付会和生产者等多方面积聚财力，作为政府调控农产品市场的资金依托。四要严格控制农用工业品价格，尤其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五要积极推了“农村”种、养，加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发展路子，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不断发展。

四“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

陈云的这一观点，包含着再生产所需的资源要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的道理。资源配置问题是现代经济的最基本问题。在我国国力还不强、基础性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要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协调，就要合理配置资源特别是一些紧俏物资。陈云同志这方面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即在配置资源时，首先要保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之后，再安排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根据这一原理和原则，在处理生产与建设的关系上，就应当注意先安排当前生产，后安排基本建设；在基本建设中就应当注意先安排原有企业的更新改造，后安排新建、扩建等

等，只有这样扩大再生产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和切实的保证。

目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靠过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的。而且在投资结构上，新建项目投资比重不断上升，改、扩建项目投资比重不断下降。致使现有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产品陈旧、效益低下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状况如下尽快改变，必将严重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应当严格遵循“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的原则，正确处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把主要精力放在现有生产能力的发挥上，搞好、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推动经济发展。

第二，“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陈云的这一思想，体现了经济工作的辩证法。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如果不保证重点，那么就难以解决主要矛盾，改善薄弱环节，经济发展势必受到严重制约。同时，如果不照顾一般，那么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坚实的基础，重点本身的发展也难以得到可靠的保证，整个国民经济也就不能协调快速地向前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农业、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电力、邮电通讯及部分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这些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制约和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度增加，但仍然不能适应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需要。要解决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一“瓶颈”问题，必须继续保证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增加对这些部门和行业的投资，确保重点项目的建设，并且力求能源、原材料的发展向节能、节材的高附加值产品的方向转变。

在保证重点的同时，对一般的生产和建设也不能忽视。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我们一要积极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比较好的企业，让它们吃饱喝足，加快发展二要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够扭亏为盈的企业，满足它们的生产需要，帮助它们走出困境。三要加大技术改造投资，使一般加工工业向深加工、高技术含量的加工工业转变。

第三，“集中力量，分期建设。”陈云的这一有计划、分步骤、合理有效分配使用资源的理论，是医治我国目前基本建设全面铺开、仓促上马状况的良药。长期以来，我国有些基本建设项目或者缺乏有根据的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或者不配套建设，形不成综合发展能力；或者资源、财力、物力不落实就急于建设，结果造成在建工程占用率高、建设周期长，投资效益差、大量资金困滞等问题，在今后的基本建设中，我们应当严格遵循“集中力量，分期建设”的原则，搞好建设规划，安排好不同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和速度。根据需要与可能，分别轻重缓急，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急需的项目上。

五“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

陈云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陈云所主张的这一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观点，对于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靠增加投入、上项目的粗放经营，向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的集约经营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投资热”，而且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热”。1978—1992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每年都以14.8%的速度增长，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左右。199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仍然占68%，技术改造投资仅占32%。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初期，以外延力主的扩大再生产作用比较显著。而当工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就必然开始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道路。目前，我国现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已达2万多亿元，工业生产能力尤其是加工工业生产能力已十分庞大甚至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再生产就应该转向以内涵为主的发展路子。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道路的重要性、紧迫性，还在于我国现有工业资产的技术含量很低，设备新度系数低下，无法生产出适应当前市场需要的高质量产品。据调查，目前我国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达到80年代国际水平的只有20%，属于国内先进水平的仅占21.8%，大多数只处于60、70年代的水平，还有15%以上的设备超期服役。因此，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充分挖掘现有生产潜力，是国民经济逐步走上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外延式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过多增加，势必诱发需求拉动中间投入品价格的暴涨，并引起物价总水平攀升，进而导致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失控。而依靠生产技术进步、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一方面，因所投资金远远小于基建投资，所以诱发的需求增加额甚少，一般下会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又使经济增长有了可靠的实力，从而对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意义重大。此外，由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还可以防止重复建设，避免资源浪费，缓解当前资金紧张的局面，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创造条件。

六商业“担负着调节主产和需要、组织供需平衡的责任”（11）

陈云强调商业有调节、平衡社会总资本运动责任的用意，在于强调国有商业“既要考虑周转快，又要考虑社会的必要储备。”（12）在经济运行中，对供求的调节平衡是国有商业主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而调节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重要商品和专项基金的储备。重要商品在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时，通过抛售储备商品或用储备基金收购商品，能够有效地发挥国有商业稳定市场、平抑物价、调节供求、推动生产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等方面的主导作用。

但是，我国的商品流通长期受重生产、轻流通思想的影响，发展滞后。其体制和长期养成的“官商”作风使国有商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时处于被动，加之又受国家总体宏观调控不力的影响，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变化比较大的市场，不能有力地发挥主导作用。对稳定市场、平抑物价、调节供求显得软弱无力。因此，我们应当从陈云关于商业重要作用的论述中受到启发，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充分发挥商业调节生产和消费，平衡供需矛盾的作目。为此，首先要加强对重要商品的收购和储备，加快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和主要副食品的价格调节基金，掌握市场调控的主动权。其次是要抓好商业企业改革，积极探索公司制改革的有效途径。重组商品批发体系，逐步建立社会化、现代化、多元化的批发经营网络，更好地发挥整体效益。

从陈云关于商业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具有流通、调节、平衡重要作用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不仅在于两大部类之间和每一部类的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而且还在于包括商业在内的服务性第三产业的完善和发达。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是以流通过程的顺畅为条件的。社会总产品要想在价值上得到实现，在实物上得到补偿，都离不开第三产业的发展，其中

商业关系着消费资料供给；物资业关系着生产资料供给；运输业关系着资金周转的快慢和生产资金的增加；金融业关系着生产和再生产资金的筹措；房地产业关系生产所用房地产要素的配置；劳动就业服务关系着劳动力的流动和培训；科技教育业关系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信息、咨询服务业和广告业关系着生产经营的决策和产品的促销，等等。所有这些处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服务性第三产业，从不同角度进行产前产后服务，没有它们或它们下足都会影响社会生产。不仅如此，今后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会日益发展、扩大，会越来越成为经济总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证和先行的意义。故此，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除了比例协调的实现条件外，还应高度重视服务性的第三产业的完善和发达。

综合所述，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益的良好结合，在于处理好各方面的重大比例关系。在经济建设的规模上，要注意与国力相协调；在国民收入分配上，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比率；在经济发展的重点上，要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在经济建设的途径上狠抓重点项目建设，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在经济建设的方法上，在统筹规划的前提下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社会总资本的运行中，要重视商业和整个第三产业的作用。只有这些比例关系处理得当，经济发展的速度才是稳定、过硬、有后劲的速度，才是有效益的速度。陈云的再生产理论所谈及的这些比例关系问题，对我们今天所寻求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甘肃省兰州市委党校）

注释

(11)(12)《陈云文选》第3卷，第52、52、309、251、210、53、53、137、151、267、29、29页。

试论陈云的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思想

钟契夫

陈云建国后的论著中经济论著最为丰富，而其中又以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宏观调控等的论述最多。看来不是偶然的，这表明宏观经济运行及其决策，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领导需要经常关注和妥善处理的问题。本文拟就陈云这方面的经济思想，谈点个人的学习领会和不尽全面的认识。

一 “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

陈云从 50 年代以来就多次提出和始终强调：“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等等。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从各个方面论证过按比例发展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及其条件。毫无疑问，陈云是接受和肯定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的。但是，他不是仅仅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出发，而是以我国经济建设中客观存在的有关事实为依据，得出上述的结论和观点的。

在现代化生产的条件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陈云指出：“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按照国内和国外的经验，生产一百万吨钢，就要相应地有近五万吨的有色金属；在有色金属中，铜、铝、铅、锌又有一定的比例，缺一样都不行，数量少了也不行”。针对“大跃进”的“以钢为纲”的错误，他语重心长他说：“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朴素的语言，朴素的真理。当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的情况和紧密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国家的宏观管理，只能抓一些大的、主要的比例关系，而不能包罗万象，更不能越俎代庖。但是，这只能更加证明社会化生产要求按比例发展这一基本事实的存在，表明必须更加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国民经济内在的各种联系和结构的不同情况，自觉地采取恰当的不同调节方式予以安排，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协调发展。

按比例发展似乎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但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严重比例失调的现象，有时甚至闹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境地。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条是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而不顾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客观要求。在当时条件下，陈云在这个问题上曾多次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早在 1956 年当我国首次出现较大的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现象时，他就指出：“商品供应紧张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全国财政贸易和经济建设情况的反映”，并认为，不能年年如此，“如果年年如此，那问题就大了，就不仅是商业工作的问题，也不只是当年经济工作的问题，就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建设方针是否妥当。”他从财政收支、建设投资、就业增加等方面分析了市场供应紧张的原因，提出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要兼顾的观点，始终坚持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

在陈云的论著中，“按比例发展”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同义的。

这不仅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认为，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社会能自觉地保持合理的比例和结构发展。经常自觉地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是有计划发展的实质，也是现代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中应有之义。就这个意义上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概念是不错的。无庸讳言，经过反复的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今天我们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认识，已经突破了原来把它局限于社会主义制度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的框框。

二根据国情抓主要的比例关系

陈云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根据基本国情对各个时期的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都作过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早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他就提出并分析了农业和工业、轻重工业之间、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和铁路运输之间、技术力量的供需之间等六大比例。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根据当时已显露的矛盾，特别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适应的问题，并认为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1957年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提出要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他认为，工业建设的速度虽然一时看起来似乎慢了，但实际上不会慢。他及时指出，煤、电、运输等先行部门已暴露出投资不够的问题，先行成为落后，告诫说，“这种状况要很快加以改变，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很不利。”1959年，他对当时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的落实，不仅对钢铁生产内部各个环节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平衡核算工作，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提出降低钢铁生产指标的建议；而且指出，不能仅就钢铁论钢铁，因为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铁指标是否确当，必须就它与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以后才能看得更清楚。否则，不仅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就是钢铁这个重点也难以得到保证，1962年，他提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针对当时存在的以扩大再生产挤简单再生产的现象，他提出在物资分配上应先生产后基建、先维修后制造。在陈云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在计划安排和物力、财力的分配使用方面，又具体发展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先采掘（原料）后加工，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种后数量等一系列较系统的处理生产和建设、固定资产再生产结构、工业内部比例、机械工业内部比例的原则。

陈云在以上诸多的比例关系中，无论何种情况下，始终关注和重视的是：农业和工业的比例与建设规模和现有国力的关系。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陈云同志指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正是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他重视农业的负担能力与工业发展速度 and 建设规模的关系，防止在经济发展顺利时特别是经济过热时忘了农业、挤了农业。同时，他也重视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国家对农业的必要投入。他曾指出，“一五”时期投资重点在工业和交通，对农业的投资相对较少，发展农业主要放在合作化方面。当时只能这样。但要看到，合作化只是给发展农业创造了条件，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业的增产要靠化肥和水利建设，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他提醒说，如果在

“二五”时期不注意农业的发展，到第三十五年计划再来注意，那就晚了，今后15年就会处于紧张状态。错过了5年就要耽误15年。瞻前顾后，正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所要求的，根据统计，从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间，农业的年增长率仅为2.7%，工业的年增长率却为11.4%，二者之比力1:4.2，除众所周知的原因外，也和我们对中国农业基础的脆弱性、发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有关。1979年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首先在农村进行体制改革，贯彻执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出现了超常增长，1980—1985年期间工农业年平均增长率对比，竟然是农业略高于工业，为1:0.9。但就在这时，由于我们对农业的估计过分乐观，对新形势下农业发展会出现的新矛盾和问题认识不足，在指导思想和决策上出现了某些失误，致使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在随后的几年中又出现了徘徊现象，近几年又由于耕地锐减和基数庞大的人口增加，再度使我国农业的形势严峻起来。在1985年，陈云就及时指出：“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农民做工，经商收入多，种粮收入少，就是养猪、种菜，也看不上眼”；指出：除“无工不富”外，还应提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这个警钟敲得及时。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强，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并存，生产要素具有相对固定性，投资效益低于二、三产业，这些特点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使农业的弱质性更加突出。即使在发达国家和农业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几无例外的都实行保护和扶持的政策。何况像中国这样的落后的农业大国，更不应有丝毫的放松。否则，它还会反过来拖工业发展的后腿，迫使国民经济压低发展速度。

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也是大家所熟悉的陈云根据同情抓主要比例关系的一个重要思想。与此有关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等原则，以及在当时体制下提出的防止建设规模过大的措施和有关的论述，也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所以，这里只就陈云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观点：“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一些”，谈一点个人的认识。我认为这是他从长期处理我国建设问题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争经验，反映了固定资产再生产的特点，因而是符合实际的。这里所说的“保守”，是限于建设规模这类经济领域内的，是相对于冒进而言的。为什么说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容易些呢？陈云说：“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这个道理简单易明，在我国的多次调整中也反复得到了验证。固定资产再生产的特点是存在时滞，周期较长。马克思指出，它在这期间不断取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下提供有效用的产品。各类不同的固定资产建设项目在时滞上又有很大差别，特别是固定资产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是不一致的。这些特点本身对社会再生产的运行就有足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注意从宏观上对全社会的投资规模及其结构进行政策控制或科学的计划指导和安排，而是人为地时而大上，继之以被迫的大下，所造成的经济混乱和浪费就可想而知了。为了消除固定资产再生产的不均衡性所带来的影响，马克思认为，物资方面比当年储备的直接需要要多一些的那种生产过剩，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有利的，它只对资本主义是祸害。因此，财政收支平衡要略有结余、物资要有储备、计划要留有余地等观点，当然不是保守的观点。虽然我国现实的经济运行至今仍然处在一种紧运行的状态中，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宏观调控经验日益成熟，

我相信那种比较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状况终究会成为现实。

三按比例发展与综合平衡

陈云认为，研究比例关系，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因为比例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各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所以，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11)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并不否定在一定条件下，比例关系的变动也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寻的。数量形式的比例，只是各种比例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外在表现，无论是工农业比例、工业内部的比例、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等等，90年代与50年代比较都是不同的，而且变动程度不尽一致。陈云认为，只有通过综合平衡的方法才能判断和确定合理的比例大系。

综合平衡的内涵已超出了平衡的具体方法的范围。党和国家的领导，视其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工作方针的体现，有时也作为按比例发展的同义词使用。总之，是处理宏观经济问题的工作方针和基本方法。毛泽东1959年曾指出：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实际上，对社会再生产过程在总体上的平衡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进行并受到重视。有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人力、物力、财力综合平衡等问题，本文下拟涉及。这里只谈谈陈云综合平衡思想中的两个主要观点。

第一，平衡是紧张的，但不能紧张到破裂的程度。

陈云认为：“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12)1956年时又说，“我们的耕地只有这么些，但人口多，吃的、穿的都靠它。如果不搞建设，失业半失业照旧，社会购买力很低，商品供应当然一时可以不紧张，但不搞建设更不行。搞建设，增加就业，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会购买力就要提高，商品供应就会紧张。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而应是紧张的平衡。”(13)什么是紧张的平衡？他回答：“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这种来自实际的分析是极其透彻的和辩证的，既揭示了由经济落后和基础薄弱所决定的，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面临在紧张的平衡态；又指出了紧张的界限——不能破裂。这里还揭示了所谓相对的平衡，经济平衡两种基本形态——紧张的平衡和宽裕的平衡。紧张的平衡，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内的现象，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称之为“短缺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已经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紧张的平衡将向宽裕的平衡转化。平衡分析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方法，也是必要的。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产中，生产与需要、供给与需求、收入与支出绝对平衡（相等）的现象，即使存在也是一种特例，即在特殊条件下极其暂时的、可视为偶然的現象，常见的却是一种基本平衡态，也就是陈云所揭示的紧张的平衡。（略有不足）

和宽裕的平衡（略有剩余）。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把平衡看成是相对的，是在运动中的平衡，是一种趋势的平衡，或者是一种平均数的存在，如商品价值的形成和生产价格的形成。

陈云的这个观点给我们以很大的启迪，也给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任务，这就是怎样来确定和度量基本平衡态和失衡？目前我国已开始经济预警和景气预测的研究和应用，进一步研究和应用有可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第二，要按照短线平衡。

按短线平衡，是陈云综合平衡思想中的另一个别具特色的观点，也是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正确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再生产的各个要素，在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长、有短、有强、有弱，在总体上不会是各个局部的简单加总，而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不是通过自发的相互适应就是通过社会自觉的调整来实现。究竟是从长线出发还是从短线出发来考虑综合平衡？在我国建设史上曾有过争论。“大跃进”期间以及以后的一些年份中，曾流行过把“留缺口的平衡”视为积极平衡，而把“不留缺口的平衡”视为消极平衡的观点。陈云力排众议，把出了要按短线综合平衡的观点。他指出：“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他以当时钢铁生产的过高指标为例，算了一笔帐，令人信服他说明，只有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经济才可以协调，避免浪费。对于长线怎么处理，他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在当时条件下切实可行的办法。再次体现了务实的精神。按短线综合平衡的决策方法和思路，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不能和所谓消极平衡混为一谈。按长线平衡，实际上是根本行不通。实际的经济运行，在长短不齐的条件下，最终只能在短线的制约下实现。“短线”，就是“瓶颈”、“薄弱环节”。“短线”可以拉长，但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条件，当今两方经济学中出现了菲瓦拉斯均衡分析理论，认为供求关系的实现总是落在量少的一边，提出了所谓短边规则，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根据同样的道理，陈云还主张，在考察企业的生产能力时，应以综合设备能力为依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注释

(12)《陈云文选》第2卷，第241、242页。

(11)(13)(14)《陈云文选》第3卷，第56、211、212、27、56、210、246、350、52、242、242、211页。

略论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

吴微 苟大金

陈云是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卓有成效的领导人。他的综合平衡理论，是他经济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就在中央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面对国家统一和发展经济的新情况，他提出：“现在我们不但要应付国内，还要在国际经济中周旋。……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这里虽然还没有形成“综合平衡”的概念，但已经揭示了它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工作指导原则的政策背景和理论轮廓。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使陈云逐步丰富和形成了他对综合平衡问题的全面认识。正如他本人所说的“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从陈云的论著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综合平衡的论述，十年“文革”除外，都是在我国经济工作面临新局面、新形势的关键时刻提出来的。综合平衡的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在历次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调整中被验证，它是国家计划工作和宏观经济管理的主题。

一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

陈云指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内在联系的客观要求。关于这个问题，他多次阐明了以下看法：第一，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第二，按比例才能协调地前进，这样的前进才是可靠的，经济是稳定的。第三，按比例才能配套，配套才能提高经济效益。第四，按比例还包括时间上的衔接，要为今后比较快的发展创造条件。“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是否按比例，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而“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自觉地保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在理论与方法上就是综合平衡。因此，国家计划工作与宏观经济管理必须抓住这个主题。

经济计划中的平衡关系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首先是单项的资源与需要的平衡，然后是整个生产领域内资源配置的平衡，进而是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最后是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全面的平衡。在我国原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初重视的主要是单项的或局部的平衡，例如粮食、棉花、煤炭、石油等资源的生产和需要的平衡；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平衡；以至一个部门、一个建设项目所需要的资金、物资、劳动力与供给能力的平衡等，保持它们之间的一定的比例。这些单项的、局部的平衡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只有单项平衡和局部平衡并不能保证国民经济在整体上合乎按比例的要求，不能保证国民经济全局的平衡关系。只有将单项的、局部的平衡再深入一步。使国民经济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之间，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也符合按比例的要求，才能使国民经济协调地发展。所以，综合平衡是在单项平衡、局部平

衡基础上的有机结合，是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是国民经济全局范围内高层次的平衡。

宏观经济中，综合平衡所要协调的比例关系，概括起来主要有：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生产与运输的比例，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比例，经济建设与人口之间的比例，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之间的比例，地区之间的比例以及各部门、各领域内部的比例等。保持这些重要比例关系的本身协调和总体协调，也就是基本上保证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在综合平衡的具体做法上，主要是通过对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配置来实现的。社会资源在各部门、各领域之间的不同配置状况，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调整的必要条件。因此，综合平衡实际上就是对劳动力、资金、物资的投向和使用的谋划，而全社会的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外汇收支平衡以及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之间的平衡，就是综合平衡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手段，并成为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四大支柱。

在我国实践中，对综合平衡有很多争论。其中，有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我国可能具有什么状态的综合平衡？这里是指如何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陈云认为，“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多年的经验教训说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投资或消费超越了国力的可能，都会出现经济混乱。投资不足或消费不足，也都会妨碍了应有的速度。所以，在现阶段，只能是紧张的平衡，宽裕的平衡还不是现实的。对这一点，应该有精神准备。后来，他又多次强调“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

第二，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有人主张在国民经济出现某些重大矛盾以后再去搞平衡。陈云认为，“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要从现在的经济水平出发，看能够达到什么水平，即“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他说，“按比例，不仅要看当年，还要看五年、十年、有的甚至要看二三十年。”(11)这就是说，综合平衡原则应贯彻在经济规划和运行的全过程，是政府自觉的、有计划的行为，而不是经济运行出现问题以后的弥补和干预。为此，要强调用各种手段保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而下是“先放后管”，任凭盲目性的泛滥，然后再对偏差进行纠正。

第三，是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由于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一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不协调，表现在部门、行业的供给与需要之间的经常现象是“过剩”或“不足”，也即“长线”与“短线”，陈云认为：按长线平衡“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行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12)

总之，我国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经济建设，客观上资金、物资、技术与人才有限，但主观上想要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急于改变国家贫困的面貌，因而，资源需要与供给有限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在处理这一矛盾时，往往容易忽视资源供给有限的客观事实，人为地贪大求快，造成资源需要与供给间的缺口，导致经济比例失调，增长受挫。在这样的条件下，陈云

确立了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国情论、国力论与重点论。

1. 国情论

陈云“国情论”的基本观点是，综合平衡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他反复指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 80%，人口多、耕地少。一方面，我们还很穷，一方面，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因此，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13），并认为“‘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14）。在贫穷的基础上搞建设，不能忽视人民生活。农民是大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15）“要先把农民这一头稳定下来”（16），“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17）在农业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上，陈云尤其强调以农业的规模和可能，来规划安排工业，并进而规划安排整个国民经济。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以前还要进口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现在虽然比过去好多了，但是，发展农业仍然是头等大事。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18）“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19）“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20）因此，陈云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并主张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发展计划。这是陈云“国情论”思想的主要体现，也是综合平衡的基本出发点。他说：“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21）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进行综合平衡，他还提出了下列重要的观点：第一，合理的比例关系，“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22）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外国的结论。第二，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搞现代化，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但集中不能过分，必须考虑各地情况不一样这个事实。“体制改变以后，地方更可以因地制宜地办事，但是，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23）第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平衡，是比较紧张的平衡，这一条应该有精神准备。第四，从中国国情出发，兼顾各方面关系，“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24）

在改革开放早期，有人提出，别的国家 8 年、10 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陈云认为，“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25）

从国情出发做综合平衡工作，要求我们必须提高深刻认识国情的自觉性，减少在国情认识上的盲目性，提高综合平衡的科学性。

2. 国力论

在《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这篇著名的论文中，陈云集中地阐述了根据国力的可能性进行综合平衡的思想。什么是国力呢？所谓国力，就是本国财力与物力的总称。为了增进国力，必须进行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则反映了国力水平的提高。但是，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首先要立足于现有的国力基础，如果建设和生活的需要超越了国力的可能，首先是损害了现有的国力，也难以通过经济建设进一步增强国力，必将导致经济混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所以，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

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26)

陈云根据当时的经济基础与经济体制，从社会资金使用与物资供求结合的角度，研究提出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综合平衡的矛盾与处理原则。他认为：第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第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第三，人民的购买力要逐步地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第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之间的平衡，不仅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第五，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27)

上述5条，其基本要求是：第一，在资金（财政、信贷）平衡中调控国民收入的使用；第二，根据物资的可能与制约，调控对生产资料 and 消费品的购买力，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第三，根据农业的可能，调控工业及其他部门的发展规模与水平。

1979年，在改革开放新的条件下，他重申，“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28)“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29)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30)第一，“很明显，这种买机器设备的外债的使用，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国内有多少财政拨款用于配套。”(31)第二，“其他基建需要的支出也会增加”，例如：交通。城市建设等。(32)第三，“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33)总之，“国力论”的基本精神，就是“量力而行”，也就是根据国力的可能来稳步地进行经济建设与改善人民生活。“国力论”虽然产生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及1956年反“冒进”的经验总结，但其中包含的下列综合平衡的具体准则仍是我们必须遵守的。这就是，在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条件下，第一，综合平衡首先是价值总量平衡，但同时必须与主要产品的实物量平衡结合起来；第二，价值的总量平衡与主要实物量平衡结合的具体形式是“四平”，即财政、信贷、外汇在价值量上的综合平衡并与主要商品平衡相衔接；第三，综合平衡要有动态的观点，平衡不能只看当年，要前后衔接，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第四，价值总量的分配、使用结构要与生产、供给结构协调，因此，价值的总量平衡要同结构平衡相结合。

3. 重点论

结合平衡要有重点，要在突出重点和照顾一般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陈云指出：“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钱和机器只有这么多，一定要选择条件好的，基础好的，从这里开始搞起。分别轻重缓急是非常重要的”(34)。“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35)，“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36)。“全国建设的进度，必须有先有后，有轻有重。”(37)“推平头，大家打七折，这种办法将使我们一事无成，害国害民。”(38)“主动地把一些经济文化投资推迟一年半载，将来则可集中力量搞这方面的建设，三五年后算起总帐来，效果是不会小的。”(39)因此，做综合平衡工作，要“有先有后，有重有轻。哪是重点，哪是轻点；哪些先办，哪些后办”(40)，“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41)

陈云所指的重点，是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内的主导环节。首先，它具有影响大局的地位；其次，它的现状与发展的需要存在较大的差距，重

点是大建设，大建设搞好了，小建设就有了保障。但是，也应当看到，重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客观经济状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要保证重点，就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集中，要“全国一盘棋”(42)。为此，他提出，必须“认识局部服从全局、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43)

总之，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就是要在国情、同力的制约条件下，在全国范围内，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内，在经济建设的时间过程方面，有重有轻，有先有后，相互协调，统筹安排，以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44)

二综合平衡的方法论基础

从陈云综合平衡理论的内容可见，综合平衡是从国民经济整体角度，既照顾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需要，又根据现实条件的可能，实事求是地在现有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根据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争取积极地、主动地实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因此，从方法论基础上说：

1. 综合平衡决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被动反映，恰恰相反，是主体根据现实条件的制约，服务于实现既定目标的积极主动对现实的反映。也就是说，它是在既定的目标要求之下，根据一定的约束条件与“运算规则”求解的一个系统“优化”问题。当然，目标本身的确定也离不开现实条件的制约，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共线性”的关系。

由此可见，综合平衡不仅仅是反映各方面比例关系的协调，它是在既定目标要求之下的各方面比例关系的协调。比例关系，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协调状况，平衡本身可以在不同水平、不同层次上实现。国民经济的不同比例协调状况所实现的国民经济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不一样的。综合平衡所追求的是一种有利于实现系统目标的特定的比例协调状态。

说综合平衡是主体对客体的积极的反映，不仅表现在综合平衡必须在遵循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的主观能动性，它还表现在，第一，从目标的确定来看，目标是现有条件充分利用后的尽可能高的目标，它比起不经过综合平衡，而由经济自身自发运行所能实现的目标要优。第二，从实现目标和制约目标决定的条件来看，不是现实存在的可以即刻利用的条件，而是指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积极性以后，可能创造出来的最优的条件。由此可见，综合平衡决不是指在现有的条件下可以办多大的事的问题，而恰恰是在人们最大可能的积极创造的条件下可以办多大事的问题。进一步说，它是在人们可创造的条件及发挥人对客观经济内在联系与规律的主观能动效应的基础上，可以办多大事的问题。

2. 综合平衡中的“综合”二字，它所包含的内涵，除了以上讲到的积极、主动的含义外，还包括国民经济整体及其内部的各组成部分在时间、空间和层次上的有机关联。这些关联性表现在：

第一，在时间过程上，以现有的条件确定未来经济发展与变化的可能性目标，如经济增长速度。并以人为改变的变化了的未来条件，确定再未来的可能目标，形成“目标”与“条件”的双向动态制约关系。当考虑到未来不可预测的因素后，在动态规划中留有余地及后备，本身也正是积极性、主动性的体现。综合平衡要求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积极追求前后的衔接、连贯

与一致。

第二，从空间来看，综合平衡主要是在优先照顾有利于目标实现的空间部位的同时，根据客观经济本质的、内在的联系，积极、主动地形成各方面合理的比例关系。这些比例关系包括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社会再生产各环节间的联系。

第三，从国民经济大系统来看，综合平衡的综合性不仅在目标上，而且在条件上既包括经济系统，也包括非经济系统，如人口、生态、文化等。因此，综合平衡的积极效应就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而且也体现在自然、经济与社会所组成的更大的综合性系统上。

第四，综合平衡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来理解，这视观察和控制问题的系统大小与层次而定。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综合平衡是一个具有多目标、多层次、多条件的动态的系统控制与优化求解问题。它的方法论同现代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及认识论是一致的。

三综合平衡理论在新体制下的适用性

综合平衡的主要思想产生和形成于 50 年代，它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管理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成为我国计划管理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准则，并在我国经济建设成败得失中得到证明。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体制将同原有的体制根本不同，这就必然产生和提出综合平衡在新体制下的适用性问题。对此，我们仅提出以下三点：

1. 从思想方法来说，综合平衡既然是系统动态优化与控制的系统论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排除国家对经济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目标与经济运行的宏观控制，它只是改变经济社会内部各组成要素间相互联系的形式。所以，作为指导宏观管理的方法论，综合平衡仍然适用。

2. 在传统体制下，综合平衡过程中所探索出来的具体的比例关系的结论，应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与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机制无关的、反映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联系的结论，如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工业内部的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经济与人口的关系等等，这些在新的体制下仍然适用，新体制所改变的只是这些内在联系的实现形式与方式；另一种是与经济运行及经济体制和机制有密切关系的结论，如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货币流通量与实物在数量上的对比关系及其平衡机制等等，这些要根据新的体制重新加以探索。

3. 应当看到，即使与经济体制及经济运行机制无关的、反映经济过程内在本质联系的比例关系的结论，由于新体制改变了这一联系的形式与方式，在新的联系形式与方式下，如何反映和体现经济过程客观内在本质，实现综合平衡，就必须研究综合平衡的实现问题。不仅如此，更应该看到，不仅由于体制的变化，而且由于长期发展所产生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更给综合平衡提出了许多全新的问题。比如，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及国家与国有企业间的关联转换以后，综合平衡在市场运行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的问题；在伴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广泛普及与市场起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体制下，市场运行的目标、规则与综合平衡反映的政府意图的矛盾冲突如何解决问题的；

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由粗放型、速度型、规模型向集约型、效益型、结构型模式转换的过程中，综合平衡可能遇到的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激发活力等要求如何实现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新的基础和条件下，进一步探索，以丰富和发展综合平衡的理论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注释

(18)(22)(34)(35)(36)(39)(43)(44)《陈云文选》第2卷，第18—19、98、143、241—242、25、242、242、120、61、242页。

(12)(13)(14)(15)(16)(17)(19)(20)(21)(23)(24)(25)(26)(27)(28)(29)(30)(31)(32)(33)(37)(38)(40)(41)(42)《陈云文选》第3卷，第310、211、351、278、29、309、211、211、211、251、246、236、236、163、164、251、75、212、252、52、52—56、264、265、277、276、267、248、307、266、310、237、307页。

(11)转引自关梦觉《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第52页。

陈云关于经济建设要平衡发展的思想与宏观经济调控

乔自洁

经济建设要平衡发展，是陈云经济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他一贯的主张。在他主持经济工作期间，曾反复强调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性，阐述了平衡的内容，并提出一整套如何实现平衡的原则和方法。这些思想及陈云的实践活动是在中国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和重要发展，对于当前正在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阵云综合平衡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就提出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是必须保持两大部类内部及两大部类之间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只有实现了这些平衡关系，才能保证社会总产品的顺利实现，保证社会再生产的协调发展。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指总产品的价值得到补偿，物质得到替换，因而这种平衡包括了产品的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两个方面。马克思又在 1868 年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谈到：“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因此，马克思指出：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是各个社会，尤其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都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限于马克思所处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他只提出了两大部类生产的比例关系。但其通过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实现经济平衡发展，以保证社会生产顺利进行的基本理论，并没有随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陈云根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大平衡”理论，即制定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只有保持这些平衡关系，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在他看来，做好综合平衡，就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按比例发展”，“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可以说，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原理的发展。在四大平衡中，财政收支、信贷、外汇作为货币形态是价值的运动，物资是产品的实物形态。综合平衡理论既注重价值的平衡，又注重实物形态的比例协调，这一点正是对马克思社会总产品实现原理的运用。陈云综合平衡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重工业、轻工业及农业的投资比例。提出“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这一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的坚决支持，曾为此作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为“综合平衡”。陈云坚持农轻重比例协调的主张中，无疑也渗透着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比例协调发展的重要理论观点。“‘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当然，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远不止这些，但无一不显示着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这种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注重且善于使之与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学风与工作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二陈云综合平衡思想对现今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指导意义

陈云主持经济工作期间，处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之下，因而在组织实现综合平衡时，一般是通过制定经济计划，采用计划管理的方法，今天，我国经济正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经济体制将从计划为主配置资源过渡到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许多平衡关系要通过市场机制加以实现。但无论方法上有哪些变动，经济发展必须按比例、实现平衡这一总原则是不会变的。正像陈云指出的，“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对经济发展有许多有利的方面。如它可以自发地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按比例配置资源；其竞争机制刺激商品生产者自觉地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由此形成的激励机制带来企业的活力，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等等。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它对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利益分配等宏观经济的调节是失效的。而且，在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调节中，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所以，当今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的都要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调节经济。只是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因而在计划的程度、范围，实现计划的手段上有诸多差异。国家是否对其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被公认为早期市场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区别标志。鉴于此，我们党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实现宏观经济的比例协调与总量平衡，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通过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在研究探讨这一新课题时，学习陈云关于经济建设要按比例、平衡发展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会使我们提高对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重要性的认识，对指导我们具体做好宏观调控不无教益，有助于我们克服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困难，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成果。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分析一下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对现今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指导意义。

（一）“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经济发展中如何处理好速度与比例的关系，始终是困扰我们的一对矛盾。直到现在，理论界也还在讨论在经济起飞中，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这一论题的实质还是速度与比例的问题，按比例发展才能保持经济稳定。是坚持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在稳定中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是追求发展的高速度，忽略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甚至以此作为追求高速度的代价，理论答案似乎不言而喻。但遗憾的是，操作起来恰恰相反。回顾以往走过的道路，我国经济建设遭受的几次挫折中，都是由于超越国力，急于求成，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致使比例关系失调，国民经济时而大起，时而大落，遭到严重破坏，究其原因，从主观指导方面看，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陈云在经济领导工作中，历来坚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重视保持经济的比例关系与

稳定发展。早在 1954 年，陈云就十分重视和强调按比例发展法则。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他提出需注意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及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几个重要的比例关系。而且，“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 1959 年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他根据当时暴露出来的矛盾，又强调“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1979 年，中央决定对过热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指出：“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 1985 年，陈云针对国民经济中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难以支撑过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的状况，再次强调“‘按比例’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11)从以上不同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出，陈云同志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比例对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制约关系，破坏了比例关系的速度是难以持久的。他认为按比例的观点“来之于马克思。”(12)因而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坚持这一原则，改革时期又反复强调这一原则。

今天，我们有必要再次学习陈云的这一思想。在经历了连续几年较高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之后，我们又面临着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不得不降低预期速度来调整经济结构。当前，加工工业膨胀，生产能力过剩。而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发展滞后，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经济发展日益市场化，资源流动便受利润驱使，追求周期短、见效快的产业，使原有产业结构比例失调问题更加严重和突出。陈云说过：“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13)因而，我们一方面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还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造成产业结构比例失调的新原因。在下一步改革举措里，国家既要运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经济结构，还要通过独资、控股、参股等不同投资形式直接参与结构调整，促进恢复基本的经济比例关系。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像陈云那样，能始终坚持按比例发展法则，减少国民经济发展的起伏大落。

（二）“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4)

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平衡，或者说积累与消费的平衡，是陈云综合平衡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陈云始终把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摆在重要的位置。这不仅反映了他坚持按比例、综合平衡的经济思想特征，更显示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利益的关注。陈云深情地指出：“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15)这一思想，大量地反映在他的文选及革命实践中。他一贯主张，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坚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主张经济工作的一个大方针是：“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16)由此出发，他非常关心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在安排

国民经济比例时，首先想到农业。在物资的分配上，首先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提出“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17)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和其它产业的关系，他指出：“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国家收入与农业有很大的关系。”(18)“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我们前进的后腿。”(19)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好的大问题。陈云提醒我们“无农不稳”，“无粮则乱，”(20)“粮食工作极为重要，它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今后全党还必须把粮食放在重要的位置上。”(21)

今天重温这些思想仍然感到它的现实性。当前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价格逐步开始引导投资者的行为。农业生产由于比较效益低，受到剧烈的市场冲击，使其投入减少，出现滑坡。农产品供应不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耕地缩小，粮食问题突出，已经影响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陈云所说的农业扯后腿的局面。为此，江泽民强调指出：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22)农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产业，它为工业提供原料、市场，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但又是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弱质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必须由国家从宏观调控角度给以保护和扶持。我们要牢记“粮食工作是一项关系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的工作”的教导(23)，从关心人民的物质利益，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高度重视农业问题。积极探索，寻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把农业搞上去的途径和办法。

(三) “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24)

从关心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陈云历来重视市场物价问题，他的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的思想，就是力求从根本上保持物价的稳定，从而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

建国初，我们遇到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投机资本趁机冲击市场，造成四次物价波动。陈云受党中央委托，调查研究，组织领导了反击投机资本家哄抬市场物价的斗争；很快平抑了物价，避免了通货的恶性膨胀。而后，他又领导实施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使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这是我们党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第一次大“战役”的胜利，为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提供了基础，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陈云仍把物价问题当作人民的利益问题而极为关注。1957年《就市场物价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一文中，陈云谈到，“如果我们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不能大体平衡，物价就会乱涨，市场就会混乱，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都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所以，“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这对保障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是必要的。”(25)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总结了改革带来的很好的经济形势后又指出，“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面。除了若干种国家规定不准涨价的商品以外，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26)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是产品的总需求大大超过了总供给以及货币的超量发行。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由于投资体制等多种原因，我们经济建设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投资过热，基建规模过大。对此陈云多次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

适应”，人民的购买力“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27）要求从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角度，实现物价的稳定。在货币发行量上，陈云反对脱离物资基础搞超量发行，因为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其流通是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1957年初陈云讲“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按物资的数量来说，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五年是增加了，但是却发生了供应紧张的现象，原因就在于财政和信贷多支付了近三十亿元。”（28）由于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是货币发行的总闸门，因而陈云告诫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29）“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30）不仅如此，作为价值运动形式的外汇平衡也是影响物价的一个重要因素。去年，我国实行了汇率并轨，由于国家作了周密的安排和准备，使这一改革较为成功，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外汇市场稳定。到了1994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上升到前所未有的516亿美元。1995年前三个月，贸易顺差决定外汇市场上继续保持供大于需局势，使外汇储备高达580亿美元。外汇体制改革后，我国实行了结售汇制，出口企业要把所创外汇全部卖给中央银行指定的外汇银行，后者必须买进所有外汇。外汇储备激增就使人民币外汇占款增加，广义货币M2的供应量由此扩大约1万亿元，加重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四大平衡中的外汇平衡，现在仍是影响综合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陈云在改革初就提醒我们，“搞外汇要成为一个大题目。”（31）“利用外资来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32）总之，保持了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综合平衡，就从根本上为稳定物价创造了条件，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

199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抑制通货膨胀列为1995年经济工作的一件大事与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连续两年较高的物价上涨率已经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极消极的影响，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此时，重读陈云同志有关物价问题的论述会对我们有许多启示。物价问题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事关社会稳定。而且，严重的通货膨胀还会搞乱经济关系，扭曲利益格局，影响改革和发展的环境。我们要进一步学好陈云同志的综合平衡理论，认清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彻底摒弃通货膨胀“无害论”和“难免论”。在治理通货膨胀时，首先要抓总量平衡。一方面抑制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增加供给，尤其是发展农业，增加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在市场条件上，培育市场体系，加强物价管理，整顿流通秩序。中央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应更善于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在当前除抑制财政支出外，还要注意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外资、外汇等相关问题，尽量减少外部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力求实现物价的基本稳定。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陈云关于经济建设要平衡发展的思想对我们统一认识，完成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的一些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仍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时时牢记的。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学院）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368页。

《陈云文选》第2卷，第242、241页。

(11)(12)(13)(14)(15)(16)(17)(18)(19)(20)(21)(23)(24)(25)(26)(27)(28)(29)(30)(31)(32)《阵云文选》第3卷,第309、246、211、251、56、251、253、351、244、56、29、210、306、251、55、79、350、73、72、201、59—60、277、52—54、50、203、52、254、265页。

(22)转引自1995年2月28日《光明日报》。

对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考察

汪海波

一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陈云关于发展新中国经济的思想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在许多时期都起了极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点，不仅已经成为国内许多人的共识，而且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赞扬。例如，在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论到 5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时就曾指出：“陈云的政策性建议可以说是 50 年代中国国内提出的最合理化的发展选择”。

在这方面，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居于突出重要的地位，起过特别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而是由建国以后各个时期的历史条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

第一，在全国解放前夕，旧中国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导致旧中国崩溃的重要经济因素。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建立以后，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结束了旧中国那样的通货膨胀。但由于建国初期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无力制止严重通货膨胀的再次出现。这样，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就成为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一个根本前提。

第二，中国革命是在；日中国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只有初步发展条件下取得胜利的。革命后面临的国际形势相当严峻，1950 年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来又长期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这样，高速度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为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但这种战略本身就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战略，自始就包含着经济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难以稳定发展的因素。

第三，新中国建立以后，就开始了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以及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改造的决定性阶段是从 1955 年下半年到 1956 年初不到一年时间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在国民经济这样大的范围和这样短的时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能否同时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就成为一个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四，5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领导工作中，长期发生过“左”的错误。在经济增长方面，这种“左”的错误的突出表现就是盲目追求高速度。这就导致经济周期失衡。这样，要争取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在经济升温阶段，就要解决经济过热问题；在经济过热造成经济严重失衡，不得不步入经济调整阶段时，又要解决经济比例关系失调问题。

第五，在 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走上了市场取向的轨道。但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过渡阶段，在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以及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还没完全形成的条件下，市场机制的积极方面，难以有效发挥，而其消极方面（比如市场经济固有的盲目性）则会得到膨胀；原有经济体制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也不可能得到根除。这样，经

济的周期波动仍不可免，争取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第六，我国人口多，生产力比较落后，经济稳定发展极为重要。

上述各项历史条件表明：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是作为经济增长方面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的对立物而产生的。

也正是上述各项历史条件，使得稳定发展经济成为新中国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重要问题，从而成为新中国经济领导人陈云（建国以后，除了某些时期以外，陈云都是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或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长期关注的极重要问题，在他的发展中国经济思想中居于极重要地位。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是贯穿陈云经济思想的一根最重要的红线，是他的经济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特征。

因此，研究陈云这方面的经济思想，也就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本文只是就我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在这方面作点粗浅探索。

二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

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在建国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

1.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10月—1952年）

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7月即成立了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陈云任主任。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稳定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陈云提出了以下一些重要主张，这些主张就是他在这一时期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

第一，提出并坚持把稳定财政、金融和物价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地位。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军政费用支出浩大。在分散经营的财经管理体制存在和新解放区正迅速扩大、税收一时还难以完全收起来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必然发生巨额赤字。在当时条件下，弥补这种赤字，主要还只能是靠货币发行。这就必然导致通货急剧膨胀，物价巨幅上涨。1949年，全国财政收入为303亿斤粮，支出为567亿斤粮，赤字为264亿斤，占支出的46.6%。自人民币发行以来，1949年7月底达到2800亿元，1950年1月底增加到41000亿元，增加了13.6倍。据石家庄、张家口、北京、郑州、济南、天津、太原、汉口、南昌、青岛、南京、杭州、上海13个城市的统计，其批发物价综合数，在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上升了73.84倍。

按照陈云在1950年2月1日的计算，上述41000亿元钞票，因为贬值，“人民损失了一百六十五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银洋八亿二千五百万元。为时只有一年就损失这么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这样下夫，人民将很难支持”。可见，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不仅关系经济的恢复，而且关系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

这里值得提出：当时陈云就批判了“通货膨胀有益论”的观点。他指出：“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是可以刺激生产的，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物价的被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

这一批判很富现实意义。

按照陈云的观点，“财政金融平稳了，市场物价的平稳便有了基础”。

这就是说，要消除物价上涨，就必须消除财政赤字和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做的、超经济的货币发行。

这样，稳定财政、金融和物价就成为 1950 年头等重要的工作。

在这方面，陈云主张采取的决定性措施，就是 1950 年 3 月开始实行的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由陈云代政务院起草的《关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1950 年 3 月 3 日发布），以及由他写的 1950 年 3 月 10《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他的这一主张。这个决定规定的统一管理的主要内容是统一财政收支，重点又在财政收入，即统一国家的主要收入。这个决定既是适应当时消除通货膨胀、支援解放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而提出的，又是依据 1950 年初全国大陆已经解放，各地交通、物资交流和关内市制等方面已经统一的条件提出的，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完全正确。

由于《关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贯彻执行，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物价趋于稳定。如果以 1949 年 12 月全国大中城市主要商品价格指数为 100，1950 年 3 月上升到 226.3，同年 12 月下降到 193.2。

1950 年底，陈云依据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并在扩大，物价趋于稳定，但基础并不稳固等情况，提出 1951 年财经工作的方针：第一，一门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第二，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第三，对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和文化的支出。必须严格把关。

1952 年初，陈云依据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可能结束，但应准备拖延，市场物价继续稳定，以及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等情况，提出这年“财经工作的重点，应在下放松收入的条件下，转向管理支出；在不放松财政、金融和市场管理的条件下，转向工业、农业、交通等方面。”

由于 1951 年和 1952 年继续坚持了稳定财政、金融物价的方针，并把它放在重要的地位，因而继续保持了物价稳定的局面。如果以 1950 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为 100，1951 年为 112.2，1952 年为 111.8。

这里需指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稳定财政、金融和物价，不仅是稳定经济的首要内容，而且为稳定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一个基本经济前提。

第二，创造性地贯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这里需要着重提到以下三点：

一是妥善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许多大中城市的解放，如何妥善地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就成为当时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其中的难点有两个，即怎样做到接收快而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在这方面，发生过不少教训。但陈云在主持接管沈阳后，于 1948 年 11 月 28 日给中共中央写的题为《接收沈阳的经验》的报告，很好地解决了上述两大难题。陈云报告中提出的具体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以保证接收快而完整。同时要抓紧解决有助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定人心的关键问题。首先要恢复电力供应；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收缴敌警察枪支，计其徒手服务；主要利用报纸，传布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资问题。报告还提出：“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

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中共中央及时批转了这个报告，对妥善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这虽然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事，但对建国以后稳步地、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由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形成的、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是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改组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工商业必然发生多种困难。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年3月物价开始趋于稳定以后，以及1952年上半年“五反”运动以后，这种困难表现得很突出。

由陈云主持的中财委，依据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1950年上半年物价走向稳定以后，就“把工作重心转到调整工商业方面去”；1952年上半年“五反”运动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又一次进行了调整。

按照陈云的观点，所谓调整工商业，“就是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民经济轨道拆毁了之后，应该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轨道来安排工商业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三个基本环节：（一）调整公私关系；（二）调整劳资关系；（三）调整产销关系”。对上述两次调整来说，都是这样。

为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财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就调整公私关系来说，为了做到在国有经济领导下保护和促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首先需要合理确定二者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当时这个问题在商业方面显得比较尖锐。为此，陈云于1952年6月提出：“去年国营贸易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九到二十，今年的比重是百分之二十四到二十五，我们要保持这个比例。”为了合理地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陈云还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合法利润、银行贷款利息率和税收等做了一系列量的规定。工业加工订货“工缴费的合法利润可以百分之十，可以百分之二十，也可以百分之三十”。一般说来，“商业利润不应该高于工业利润”。“现在银行是月利三分，年利百分之三十六”。应该“降低到月利一分，或者一分多一点，年利百分之十到十五”。营业税“一般占营业额的百分之一到三”。

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促进了当时在国民经济还居于重要地位的这种经济的稳步发展。1950年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6.6%，1951年比1950年增加39%，1952年比1951年增加4%。

三是促进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

当时在陈云看来，“提高农业产量的关键，就是在新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兴修水利和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对于发展农业也很重要。但陈云强调了扩大农副产品购销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这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

上述各项措施促进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的稳步恢复和发展。1950年至1952年，每年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7.8%，9.4%，15.2%。

第三，提出并坚持重点建设的方针。

陈云在这个时期提出并坚持的重点建设方针，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从国民经济范围来考察的重点建设。陈云在建国初期说过：1950年和1951年国家经济建设“投资的重点是铁路、水利和重工业”（11）。1952年，由陈云主持的中财委又确定：这年国家经济建设投资的重点：“第一是重工业（包括燃料工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水利”（12）。

二是从工业经济范围来考察的重点建设。1950年6月陈云提出：“现在工业投资只能有重点地进行”（13）。工业方面的重点建设方针包含三方面的内容：1.1950年8月由中财委召开的计划工作会议确定：在工业方面应以现有为主进行调整。与这个方针相适应，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以恢复、改建为主，新建为辅。2.如前所述，工业建设的部门重点是重工业。3.依据中财委的部署，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是东北。

陈云提出的重点建设方针，是依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政经济力量有限，以及各产业部门、各地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现状提出的，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由陈云主持的中财委有力地贯彻了重点建设方针。

1950年至1952年的三年中，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工业分别占38.1%，29.8%和43.3%；农业水利分别占11.5%，11.1%和14.7%；运输邮电分别占30%，26.8%和18.3%。

1950年和1951年，恢复和改建投资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占了大部分，新建投资只占小部分。直到1952年，前者还占到3/4，后者只1/4。

1950年至1952年，重工业的投资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一直占了很大比重。1952年，这方面比重达到了76%，轻工业的投资只占24%。

1950年至1952年，全国累计完成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有一半多投到了东北地区。

重点建设方针的贯彻，就把建设限制在当时国力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并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资源配置效益，成为稳定的，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

1950年至1952年，每年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23.3%，18.9%和21.1%。

可见，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在稳步地、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里有必要提到陈云的下述教导，他在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他一个人的帐上（14）。本文论述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作用，也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2.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1957年）

“一五”期间，陈云依据对建国以后经验的总结，在稳定发展我国经济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带有根本性的理论观点。主要有：

第一，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15）。

第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16）。“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17）。

由陈云主持编制的“一五”计划，就是这种紧张平衡的具体体现。就整

体来说，“一五”计划规定的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是平衡的。但农业、燃料工业和铁路运输等都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18）。

第三，“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是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19）。

陈云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完整的制约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原则界限。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但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

“一五”期间，陈云还在稳定发展经济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带有根本性的政策措施。其集中表现就是力纠正 1956 年经济建设小冒进而采取的政策措施。

按照陈云的说法，“经济建设，一九五三年是小冒，今年（指 1956 年——引者）又是小冒，比五三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20）。这样，纠正 1956 年小冒进，在实现经济稳定发展方面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值得着重叙述。

1955 年 7 月和 11 月，毛泽东分别批判了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12 月初又发起了对生产建设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口号的激励下，各部门、各地区纷纷要求增项目，加投资，以致国家计委提出的 1956 年基本建设投资控制数，1955 年 10 月还只有 112.7 亿元，但到 1956 年初就上升到 200 多亿元。经过周恩来和陈云等领导人的努力工作，终于在 1956 年 6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把这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控制数降到了 140 亿元。

在周恩来和陈云等领导人反冒进的艰苦努力下，1956 年的生产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冒进来势甚猛，所以它只是得到了基本遏止，以致这年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仍然发生了局部性的冒进错误。其主要表现是：一、在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 30 亿元。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紧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陈云提出了以下主要的政策措施：一、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二、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三、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

经过周恩来和陈云在反冒进方面的继续努力，把 1957 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控制数又降到了 110 亿元。这样，不仅避免了 1956 年可能发生的 1958 年“大跃进”那样严重的灾难，而且使得 1957 年经济得到了稳定的发展。

在论述“一五”期间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及其所起的重要指导作用时，还需提到以下两点：

第一，提出并坚持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

“一五”期间，我国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是在小农经济在农业中占主要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必然发生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但这是一个关系稳定市场、从而关系稳定发展经济建设的大问题。正如陈云指出的：“过去我们说物资充足，物价稳定，一个是指纱布，一个是指粮食。纱布和

粮食相比较，粮食更重要。粮食波动就要影响物价”（21）。

陈云依据对当时情况的分析和各种方案的比较，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办法，“在农村中采取征购粮食的办法，在城镇中采取配售粮食的办法，名称可以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22）。

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这一政策的实施，以及随后实行的棉花、食油和纱布的统购统销，对于稳定物价乃至稳定地发展“一五”时期的经济都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第二，推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由陈云直接主持的。从1954年开始，陈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一方面。

1955年底和1956年初出现的公私合营的高潮，是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阶段。在公私合营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陈云在1955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提出：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前进一步。为了前进一步，陈云提出了6点原则性指导意见：一是为了克服当前私营工商业面临的困难，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二是要进行统筹安排，各个行业内部必须有或大或小的改组；三是按整个行业安排生产，实行改组，就要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四是公私合营以后，应该推广定息的办法；五是为了实现上述一、二、三项的目的，就需要组织专业公司；六是要全面规划（包括生产规划和改造规划），加强领导。规划应该分期分批，不要一声号令，就立刻全面铺开。

但可惜的是，规划还没有做好，就立刻全面铺开了，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差不多在1956年1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就在全中国大中城市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了3月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样，就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暴露了许多问题。诸如工厂和商店盲目合并，生产经营集中过多，对许多独立经营的小商贩也同样实行公私合营等。由此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经济效益下滑和人民生活不便。

针对上述问题，陈云及时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意见：

（一）现在各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并不是已经结束了。因为实现公私合营，需要清产核资，安排生产，改组企业，安排人员，组织专业公司，而这些工作还没有做。

（二）企业改组要有利生产和方便生活。不论工业商业，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原来好的品种和质量，并要高质量和产量，增加品种，要适合老百姓的生活需要。

为此，企业改组要大部分不变，小部要调整。这不是短期的，在10年以至10多年中，这种局面要维持下去。

企业改组还必须经过充分准备。为此，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有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半年不动；企业原有的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也继续保持。

在企业改组过程中，对原来独立经营的小商贩，还要继续采取经销、代销方式，要在长时间里保持这种单独经营方式。

（三）要合理安排资方人员的工作。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绝大多数是懂

技术的，有业务经验的。他们的技术和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用的。为此，还要合理安排资方人员的工资。

上述陈云的指导性意见的贯彻执行，较好地解决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出现的问题。这样，尽管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改造速度过快、改造时间过短、改造的面过宽等缺陷，但毕竟在这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其中包括原来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稳定发展）！

1953年至1957年，这5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比上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4.4%，9.5%，6.6%，16.5%和7.9%。可见，“一五”期间，尽管发生了两次小冒进，但总的说来，工农业生产获得了稳步、持续、高速的增长。在这方面，陈云提出上述的稳步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3.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年）

如前所述，1956年的冒进只是由于周恩来和陈云等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反冒进措施，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当时，毛泽东对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这样，到了1957年下半年，在国内外形势变得有利的时候，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又膨胀起来。于是，从1957年9、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起，开始了对反冒进的批判。其后又在多次中央工作会上批判反冒进。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政治问题，甚至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就反冒进问题做了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和陈云都受到了批判。这样，陈云再也不可能像纠正1956年冒进那样来纠正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这样全局性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了。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从1961年起，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这时“左”的错误路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批判右倾保守和批判反冒进还有严重影响，对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也认识不足。这样，在1961年大部分时间里，调整处于徘徊状态。为此，党中央在1962年一、二月间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统一党的干部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接着，在2月下旬又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陈云首先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5点困难：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陈云在分析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之后，提出了克服困难的6点主要办法：一、把10年经济规划（指1963年至1972年的十年国民经济计划——引者）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大体上要5年。这样做、对我们妥善部署财经各部门的工作有好处。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10年规划，又想发展，不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而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三、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

量用于农业增产。这一条是根本大计。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接着，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现在的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23)

“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5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6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我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4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24)

为了统一党内干部的思想，陈云在做了上述分析之后，还针对当时存在的思想分歧，就综合平衡这个理论问题做了分析。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陈云的回答是：“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

“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二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陈云指出：“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25)

陈云的上述思想成为当时由他主持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指导方针，从而成为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决策的最重要依据。这就使得调整工作在1962年进入了决定性阶段，并在1963年至1965年继续得到了全面调整，推动经济在经历了1961—1962年必经的下降阶段之后，从1963年起又迈入了上升阶段。1961年至1965年，每年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30.9%，10.1%，9.5%，17.5%和20.4%。

4.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8—）

在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被迫离开了经济领导工作岗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重新走上经济领导工作岗位。在这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走上了市场取向的道路。但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期间，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周期波动的局面。这样，争取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陈云正是依据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实践，坚持并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

就《陈云文选》所包括的文章来看，这些思想的重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提出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就是1978年和1984年我国又发生了两次经济过热，以及由此造成经济严重失衡。1979年3月，陈云指出：“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26)针对这一

严重情况，他尖锐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27)“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28)1985年9月，陈云又提出：“一九八四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29)

陈云针对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而忽视比例协调的错误思想，强调了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重大经济、政治意义。他反复指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30)“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31)经济不能按比例发展，“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32)

但是，陈云强调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并不否定速度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33)可见，陈云只是要求经济在按比例发展条件下追求较快的速度。

第二，为了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促进经济稳定发展，陈云提出“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他要求“我们的基本建设，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34)他还要求“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35)。

在这里，陈云批判了靠发票子来弥补基本建设投资赤字的做法。他认为，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36)

为了做到基本建设投资没有赤字，陈云还结合1979年以后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环境，对于借外债和工业引进项目提出了原则性意见。他指出：“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37)据此，他批评了那种认为利用外国资金时可以不考虑国内配套投资能力的观点。工业引进项目，也“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38)

为了做到基本建设投资没有赤字，陈云还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39)“我看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40)

为了做到基本建设投资没有赤字，并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两方面的需要，陈云还多次提出经济工作一大方针：“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保证吃饭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41)

第三，为了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陈云从农业在我国的极重要地位出发，提出“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42)陈云还特别强调了发展粮食生产的重大经济、政治意义。他说：“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43)

为了坚持按比例调整国民经济，陈云还批评了当时冶金部单纯突出别的错误做法。他指出：“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突出一点，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44)因此，冶金部“提出不拖别人的后腿，实际上不可能。”(45)陈云还指出，“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46)

第四，为了坚持按比例调整经济，促使经济稳定发展，陈云还结合 1978 年以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环境，就处理改革与调整的关系提出原则意见。他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47)这个原则既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理论，也符合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处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

上述分析说明：1978 年以后，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主要是围绕按比例调整国民经济这一中心展开的。

陈云提出的这些思想，对于党中央和国务院 1979 年提出执行并在“六五”计划期间（1981—1985 年）继续贯彻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于促进经济比较稳定的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这样，尽管 1978 年和 1984 年发生了两次经济过热，但并没有出现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的那样大的经济波动。1978 年至 1986 年这九年，每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11.7%，7.6%，7.9%，4.5%，8.5%，10.2%，14.5%，12.9% 和 8.5%。

三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深远意义

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不仅在已往的各个历史时期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诚然，陈云这些思想的基本点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只有一部分形成于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因而，这些思想均具有深厚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但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的。这些思想的许多方面也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共同的客观规律。这许多方面的思想不仅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而且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也适用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乃至将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

这许多方面的思想，举其要者有：第一，在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第二，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够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第三，是否按比例，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只有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是否平衡，不但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第四，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求和消费品供求都必须平衡。靠发票子弥补基本建设投资赤字的做法和“通货膨胀有益论”都是错误的。第五，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第六，钢和工业的发展速度对基础产业存在客观的依存关系。第七，一要

吃饭，二要建设，是经济工作的一大方针。第八，要使经济改革有利于经济调整。从一般意义上说，也就是要使经济改革有利于经济发展。第九，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第十，必须注意主要防止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

上述各点，是陈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所做的重大贡献。

不言而喻，就当前说，运用陈云上述思想需要结合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实际；就将来说，需结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但这并不说明陈云上述思想没有深远指导意义。因为运用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都是必须结合实际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注释

(13)(15)(17)(18)(21)(22)《陈云文选》第2卷，第57、58、114、157、79、176、172—173和177—178、140、96、241—242、242、242、207、217页。

《陈云文选》第1卷，第379页。

《新华月报》1950年10月号，第1320—1321页。

(11)、(12)《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产和建筑业卷》，第246、248页。

(14)《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328页。

(16)(19)(20)(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陈云文选》第3卷，第29、52、28、208、210、211、253、248、253、351、248、351、278、268、264、237、265、248—249、237、267、319、306、251、350、251、252、251、279页。

陈云关于经济稳定思想初探

阮银甫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保持经济稳定，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济建设的杰出领导人陈云的一个重要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认真研究这一重要思想，有利于我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经济稳定是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础

稳定包含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政治、经济稳定了，社会才能稳定，人心才能安定。早在建国初期，陈云就指出“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几年的稳定，大家必定好好生产，国家收入肯定会增加。”他说明了政治、经济稳定是民富国强的前提和必备条件。而在政治、经济稳定中，经济稳定又是更重要的稳定，后者是前者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所以，“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陈云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一贯强调：“一是政治，一是经济，两者需要很好配合”，决不能把经济工作看成是单纯的经济工作。

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针对当时物价上涨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生活的问题明确指出：“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就是说，经济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绝非仅仅是经济问题，必然成为社会和政治问题，要实现政治形势的稳定，必须保证经济形势的稳定。这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基本关系决定了经济稳定在全局稳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以，陈云反复叮嘱：“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他在论述经济形势稳定的重要性时，总是把它提到关乎全局稳定的高度加以强调，提醒全党切不可掉以轻心。1959年4月，他在给中央财经小组的信中谈到粮食问题时，并不仅仅强调它对缓和 market 紧张状态所起的重要作用，而是进一步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指出：“粮食定，天下定”。1978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谈到经济工作必须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时，也特别强调说：“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经济定，天下定，这就是陈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积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之经验，保持经济稳定应作为不容忽视的长期的方针。

二经济稳定的前提是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和根本任务是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用于加快建设的财力物力有限，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比较突出。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才能做到既加快发展又保持经济稳定？陈云从对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经验教训的深刻分析中作出的明确回答是，量力而行，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

1957年1月，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时，陈云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他说：“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这里所说的国家的财力物力，当然不是指整个国民收入，而是指“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之后的剩余部分，即“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

经济建设量力而行，是陈云的一贯思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就强调不可盲目建设，经济工作要量力而行，指出“我们国家大，一不小心就会盲目发展。”(1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国力论”。他在《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的讲话中说：“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这是一个老问题。”指出，“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12)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陈云再次叮嘱经济发展速度要从国力出发，基建规模要适度。

为了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陈云指出，必须严格遵守按比例发展的法则。“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当然，“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13)在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又说：“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14)

如何才能实现按比例的发展？“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陈云说：“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15)这就是说，第一，经济发展要求综合平衡，否则难以实现协调稳定。第二，这种平衡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紧张的，不是宽裕的。换言之，由紧张平衡求得的协调稳定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为了实现经济运行中的综合平衡，以求得经济稳定的实现，陈云提出了著名的财政、信贷和物资三大平衡的观点。指出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16)在财政上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冒进，即将财政收入全部分出去，搞到中途预算破裂。一种是保守，即有钱不用，妨碍建设。他特别指出：“把必要的信贷资金和流动资金拿来搞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就要出现缺口，这是不行的，是有危险的。”(17)陈云的这一理论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63年春，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到一位同志和陈云关于是否要提三大平衡的争论，指出，实践证明陈云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

目前，在全国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发展

的形势下，还要不要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回答无疑是肯定的，量力而行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并不矛盾。能快则快正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结果，不量力而行，盲目追求高速度，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加快发展。量力而行的原则并未过时，它是保持经济快速而又稳定发展的唯一正确原则。

三经济稳定的核心是市场物价稳定

经济稳定是经济系统的一种相对协调、可控的状态。经济稳定的实现是经济运行中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财政稳定、货币稳定、投资稳定、物价稳定等。其中，市场物价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核心，因为物价上涨过大，往往是财政收支失衡、货币供应过量，投资规模过大、发展速度过高的综合反映。陈云在其经济稳定的一系列论述中，始终把市场物价稳定作为关注和处置的重点。从建国初陈云领导稳定物价的斗争开始，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他都坚持既要完成好建设任务，又要保证市场稳定，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他认为，创造一个低通胀率，较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形势，应当是基本要求。

（一）物价稳定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

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出现一定幅度的物价上涨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全面的、持续的、大幅度的物价上涨，则必然是经济发展不稳定的表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得力措施，尽快扭转通货膨胀恶化的趋势，则经济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因为，“市场的稳定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前提。”(18)

物价不稳定不仅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而且影响人心稳定和社会安定。建国初期陈云就指出，“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19)1957年夏，针对蔬菜涨价对人民生活影响较大问题，他在专门召开的13个省、市蔬菜会议上尖锐地指出：“我们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也能搞，如果连蔬菜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成什么样子！”(20)把解决物价稳定问题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联系起来，足见陈云对稳定物价的政治意义的高度重视。

（二）正确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

要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首先必须正确地分析病因。在陈云看来，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货币原因和经济原因。1962年2月，他在《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中，在分析了通货膨胀的若干表现之后，明确指出：“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首先是货币原因，“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21)1957年1月，陈云分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紧张的原因时指出：“按物资的数量来说，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五年是增加了，但是却发生了供应紧张的现象，原因就在于财政和信贷多支付了近三十亿元。”(22)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我们不仅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加剧了通货膨胀。总之，包括钞票和银行信贷的货币过量投放，超过经济实质增长率，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非正常上涨。

其次是经济原因，主要是经济总量失衡。由于投资的过度膨胀，扩大了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导致总需求增长过快，经济总量失衡。“各

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23)结果是农业这一基础产业的地位更加脆弱，出现部分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偏紧的趋向，导致农产品价格持续、大幅度上升。粮价一价带百价，一涨带百涨，整个市场物价必然上涨。“粮食紧，市场紧”(24)，出现通货膨胀是必然的。

(三) 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力争市场物价稳定。

平抑市场物价，坚决抑制通货膨胀，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为了把物价上涨的幅度控制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通货膨胀被控制在较低水平，陈云提出过许多符合我国国情的精辟主张，就其要者大致有以下6个方面：

第一，纠正物价上涨有利于生产的观点。近年来，理论界有人把凯恩斯的建立在有效需求不足基础上的通货膨胀有益论搬到国内来。其实，早在40多年前，陈云就明确反对和批评过类似的观点。他在1950年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是可以刺激生产的，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物价的波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25)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段话的基本精神仍未过时。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通货膨胀性的物价上涨，即使是“温和的”，从长远看只能对经济发展有害，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以需求膨胀为主要宏观经济困难的国家来说，更无疑是雪上加霜。

第二，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防止基建投资继续膨胀，是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的必然举措。陈云说，他在财经委员会时，对基建投资膨胀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重申：“基建的项目，应该由计委这样的权威机关来确定。”“不能推平头，不能来一个大家打七折，因为其结果将不能改变基建战线太长的现状。”(26)这种办法将使我们一事无成，害国害民。

第三，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加强租收。陈云指出：“财政金融平稳了，市场物价的平稳便有了基础。”“所以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物价被动中的金融因素，也就是力求在财政概算上，尽量多收，尽量少用，使其没有赤字。”(27)“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28)否则市场供应就不能稳定，甚至造成通货膨胀。陈云指出，“税收是国家的主要收入”，“假如税收发生了问题，整个国家的财政就要发生动摇。”(29)针对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价稳的意见，他说，这办不到。路子只有两条。少收必得多发，想少发必得多收。少发行多收税，物价平衡，经济发展，是一种前进的办法。

第四，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下决心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消费需求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消费需求增长过快，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又是诱发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陈三指出：“我们的消费水平在目前不能无限制的提高，只能是逐步的提高。”(30)一方面，政府要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另一方面，这种平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又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因此，“我们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31)

第五，加强农业，下大力增加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我国人口多，耕地不足，农业生产率不高，有效地解决全国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始终是经

济发展中的最大问题，始终是稳定市场物价的基础性问题。陈云指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32)为了农业，其他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加强农业，主要是抓好粮食、棉花和蔬菜的生产。他认为，讲市场稳定，主要是指粮食局势和粮食价格的稳定。我国的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今后全党还必须把粮食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关于蔬菜，他说，蔬菜的涨价对人民生活影响很大，一定要千方百计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33)

第六，加强对市场物价的管理、干预和监督，防止流通秩序混乱。加强市场物价管理，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稳定物价不等于冻结物价。冻结物价固然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但它不能真实地反映供求关系，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陈云指出：不能“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34)他说：“我们不能讲物价绝对不涨，因为物价涨落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生产的多少，需求的状况，运输的条件，以及时局的、心理的因素等等。”(35)二是该管的一定要管好。在物价因非正常因素上涨时，特别是乱涨价、哄抬物价以及一些垄断性行业任意提价时，政府部门就必须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宏观管理，规范市场行为，整顿市场秩序，平抑市场物价。1956年11月，陈云针对自由市场开放以后管理跟不上的情况，明确指出：“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并不是一点管理也不要了，还需要有管理。要组织集镇上的市场管理委员会。当然不是像从前管得那么死。不该管的完全不管，该管的还是要管。”(36)1962年2月，他又强调“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把自由市场管起来。”(37)这一精神同样适用价格已放开的今天。为了不断解决价格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政府需要有比计划经济时期更有力的物价管理机构，更高的管理水平，更周密的调控手段和更高的调控艺术。

四经济稳定的目的是为了 更好更快的发展

实现经济稳定本身并非目的，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才是目标和目的。陈云指出：“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38)这可视作陈云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精辟概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努力克服形而上学，防止两种片面性。

其一，片面强调目的，只重视经济速度和规模，忽视甚至无视经济稳定。结果是经济发展必然受挫，必遭折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曾于三年困难时期、1967—1968年、1976年三次出现经济负增长，即是例证。“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39)实践表明，经济稳定虽然不是目的，但它是经济顺利发展的关键，是实现加快发展这一既定目标的内在要求。

其二，片面强调经济稳定，忽视或忘却了经济稳定的目的。陈云强调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发展。“站稳的目的，是为了前进。”(40)搞经济工作要有时间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就

是速度。”(41)“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42)因此，经济稳定不是被动、保守、缓慢发展的同义语。陈云的经济稳定观，是发展中的动态的积极的经济稳定观。只有准确理解陈云经济稳定观的实质，才能实现这一思想的实践价值。

五积极、稳妥地推进发展和改革是实现经济稳定的根本大计和首要问题

第一，根本大计是努力增产。

发展是经济稳定的目的，也是实现经济稳定的最根本因素。缺乏发展势头的经济稳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也不可能是持久的可靠的经济稳定。怎样才能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有效抑制通货膨胀？陈云明确指出：“增加生产是解决供不应求问题的根本办法。”(43)“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这一条是根本大计。”(44)农业和有销路的副业产品，应该大大增产；有原料、有销路的工业和手工业产品，也应该尽量生产。大力开展增产节约和争取农业大丰收，是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的主要办法。只有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才能得到缓解，“只要生产增加了，达到了供求平衡，价格自然就会平稳的。”(45)因此，没有一定的适度的发展速度，要实现经济稳定特别是物价稳定是不可能的。陈云说：“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46)也就是说，发展才是根本。

第二，首要问题是深化改革。

经济稳定离不开发展，更离不开改革。陈云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对经济形势的改善、对经济的顺利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工商业及财政、计划等方面的改革，也经过了几年的酝酿、试点和实践，取得了不少成效和经验。”(47)其意义不下于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48)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顺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比较快。因此，“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49)就是说，只有坚持改革，“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50)，才能有利于消除现行体制中存在的弊端，转换机制，调整结构，提高效益，推动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走向既快速又稳定的增长之路。

第三，发展和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

陈云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心须既积极又稳重。”(51)又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52)既积极又稳妥，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辩证法。发展急于求成必然导致经济不稳定，改革急于求成同样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因为并不是单凭有改革的良好愿望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使经济运行自然趋于稳定。改革是件全新的事业，涉及范围相当广，问题复杂，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而且在前进中还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要这样做了，这次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53)就一定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真正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黄冈地委党校)

注释

(11)(15)(18)(19)(25)(27)(29)(30)(35)(43)(46)《陈云文选》第2卷,第96、10、266、242、246、60—61、58、114、179、262、119、259、1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卷,第82页;第1卷32页。

(12)(13)(14)(16)(17))20((21)(22)(23)(24)(26))28((31)(32)(33)(34)(36)(37)(38)(39)(40)(41)(42)(44)(45)(47)(48)(49)(50)(51)(52)(53)《陈云文选》第3卷,第278、52、125、236、52、210、264、56、351、52—53、214、64、196、50、237、125、266、50、62、210、64、10、26、202、269、282、136、320、52、204、61、336、278、336、320、235、279、338页。

学习陈云“国力论” 的发展思想

李贤沛

学习和研究陈云一贯倡导的“国力论”思想，在当前很有现实意义。这有利于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一 “国力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对它的检验

“一五”时期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在中间也曾出现了1953年和1956年的两次“小冒进”。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了可贵的实践经验。

早在1957年初，在总结1956年的财政经济工作情况时，陈云就明确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他具体分析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他根据自己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指出：“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当时提出这一指导思想是根据那几年的经济建设经验作出的科学总结。

然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内部却存在着严重分歧，“实际上存在着冒进和反对冒进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

5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们党刚开始从革命战争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对经济建设、特别是对像我国这样一个原来经济极为落后的大国的经济建设来说，基本上毫无自己的经验。因此，在建设初期的探索中，有时冒一点，有时保守一点，应该说是难免的，关键是要通过民主的方式，谨慎地、全面地及时总结经验，并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出现的偏差。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不一致或不尽一致，这也不足为怪。但是，毕竟要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并且要注意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遗憾的是，尽管这个问题在党的“八大”前后一段时间内较好地得到解决，并使“八大”形成了正确的决策，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这个问题又重新被提出来，并将1956年的反冒进作为一种所谓“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由于对反冒进的批判，终至造成了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所谓“大跃进”运动。

历史已经给“大跃进”运动作出了客观的结论，这是一次灾难性的失败。它曾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一教训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不忘。

“大跃进”运动是在经济发展上的“左”的指导思想的直接产物，并引发了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也是造成后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后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从实际工作上予以纠正，在60年代

初进行了经济大调整，提出和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取得了好的效果，但当时并未从根本指导思想上对这一错误的“左”的实质进行彻底清理和批评。这也是造成后来在经济发展上的再次折腾的重要原因，是比“大跃进”本身更重要的一个历史教训。

“大跃进”及其所反映的“左”的发展指导思想的失败，可以说是从反面证明了“国力论”的科学性，是历史实践对“国力论”的一次大检验。

当然，“我们研究历史，从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来说，既要注意把握今天与昨天、现在与过去的历史的内在联系，并注意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到应有的经验、教训、启示和借鉴，同时又要注意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防止形而上学式的简单的类比和生搬硬套。我们一定要学会掌握‘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是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讲的一段话，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

联系到当前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情况来说，就是不要把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形而上学地与过去的“大跃进”运动作简单的类比。这里应该明确的是：第一，过去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并未取得经济上的跃进，而是造成了一次灾难性的大倒退。而这十多年的经济建设却是实实在在的取得了迅猛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第二，之所以造成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主要因为：一是客观的历史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二是我们积累了经验，更加成熟，自觉纠正了过去的错误，适应新的变化采取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主要是制定和实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三，在从总体上充分肯定这一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要认真总结在这一阶段前进过程中的正反经验，注意到某些方面的不足和教训。第四，由于历史上“我国经济建设一再出现急于求成实即急躁冒进的错误，直到现在也不能说急于求成的思想认识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因此，在总结分析当前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时，注意和过去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作比较，在比较中坚持“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不生搬硬套，但一定要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这对于继续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我们要按照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提出学习和研究“国力论”的思想正是为这一要求服务的。

二要从实质上和发展上来把握 “国力论”的科学内涵

“国力论”的一般表述就是“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但是，如果不是仅从文字上而是从精神实质上来理解，那么就可将“国力论”的基本思想概括为：经济建设要和一定时期的客观条件相适应，即要和在这一时期我们能够动员起来并加以利用的各个方面的客观条件相适应。在具体解释这一基本思想时要注意到以下三点：

一是，所谓客观条件既包括我国内部的客观条件，也包括我们可以利用的外部的客观条件。

二是，要看到客观条件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要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来考察，要善于发现和抓住历史机遇。

三是，所谓“相适应”是指既要充分和有效的利用这些客观条件，不要人为地限制经济建设的发展，以致使其落后于本来可以积极争取达到的发展速度；又要避免盲目地超越客观条件，提出在现阶段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从而使经济建设遭到挫折和折腾，欲速而不达。

总之，我们要从精神实质上 and 动态发展上来把握“国力论”的科学内涵。限于篇幅，本文拟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 “国力论”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

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一般来说，也不会有人公然宣称自己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即使当年在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中，双方都是认为自己是实际出发的。看来，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确实很不容易。正如陈云所指出的：“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他批评，“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去弄清楚全面情况，弄清楚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作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他强调：“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11)“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12)1962年，他系统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的认识和决策的方法。要求要“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要“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国外的作比较”：“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13)等等。这里，发扬民主，鼓励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十分重要的。

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这是“国力论”的方法论基础。

2. “国力论”的核心是自觉利用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搞好综合平衡。

要使经济建设与客观条件相适应，这就要进行综合平衡。陈云指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14)“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15)“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16)通过综合平衡，自觉利用按比例发展规律，这是“国力论”思想的核心内容。

按比例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是从生产社会化，这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衍生出来的。在社会化的大生产系统中，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和各个环节的联系，必须经常保持合理的比例，保持必要的协调和平衡。只有这样，这个大系统才能存在、运行和发展。首先，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要互相平衡。不平衡就可能从两个方面造成问题，或者是社会物资短缺，从而造成经济生活的全面紧张；或者是社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从而引起生产的全面下降。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造成国民经济的大混乱、大损失。其次，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在结构上还要互相适应，如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要分别与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互相适应，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内部的各种产品也要有一定的比例。第三，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各个顺序的生产部门之间，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如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就要成比例。从大

的方面来说，就是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之间，以及第一、二、三次产业之间，要保持一定的比例。此外，在国民经济的价值运动方面、在国内经济活动与对外经济活动方面也都要有合理的比例，等等。尽管这些比例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要随着经济、技术、文化以及国内与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并且它也会在经济运动的进程中遭到暂时的、局部性的突破，但是从总体和长远来看，它总是要求在客观上保持一个一定的合理的比例，否则经济发展就不能持续进行，并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甚至造成严重破坏。总之，搞社会化大生产，国民经济就必须按比例地发展，这是已被近几百年的历史实践所一再证明了的一条普遍的客观规律。

陈云当初提出“国力论”，中心思想就是强调在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中，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自觉利用按比例规律来发展经济。他一贯强调“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17），把这作为经济领导工作，特别是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对如何研究比例关系，陈云也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他指出：“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18）这个意见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3. 不能依靠搞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

“国力论”的发展思想是和“通货膨胀有益论”尖锐对立的。陈云一贯反对搞通货膨胀。他强调“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19）“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不可能，而且决不能这样做。”（20）“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21）他多次指出：“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22）“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23）“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24）我认为，所有这些论点，都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在今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情况下，也是基本适用的。陈云反对搞通货膨胀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建国初期，他就主持过与当时的严重通货膨胀的斗争，打垮了猖狂一时的投机势力，在较短时间取得卓越成效。还在那时他就对通货膨胀的危害性、破坏性了解十分透彻。在以后的经济领导工作的实践中，他总是十分关注防止通货膨胀问题，出现苗头，他就及时制止，当年的反冒进，最初也是从这个问题上引起的。“大跃进”失败后，在60年代初，他临危受命主持经济调整工作，解决通货膨胀也是其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面临解决十年文革和后来的两年“洋跃进”造成的通货膨胀问题。

陈云坚持反对通货膨胀，主要不是来自什么“本本”，而是从他几十年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实践中所得到的结论。他不仅搞过多年的计划经济，也有过在计划经济形成以前的那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作的经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参与领导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因而经验是比较全面的，对通货膨胀在经济生活中的破坏作用观察十分深刻。依靠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迄今在世界上还没有那一个国家最终取得了成功。如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吃过长期“滞胀”的苦头后，无一不是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目标。当前，党中央已明确作出了必须坚决抑制通货膨胀的重大决策，这是十分正确的。

4. “国力论”绝非主张闭关自守，而是要求在不断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积极搞好对外开放。

前面已经讲了，“国力论”的精神实质是要使我国经济建设的进展和我们所能利用的各方面的客观条件相适应，这里面就包括了外部条件。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5)但是，这决不是说要搞闭关自守，恰巧相反，他总是强调我们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部条件来发展自己。建国以来，我们曾处于被孤、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这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搞闭关自守，唯有一度横行的“四人帮”才愚蠢到要乎取这样的极“左”方针。多年以来我们都在捕捉机会，打破别人对我们的孤立、封锁和制裁。随着生产社会化的更高度的发展，现代经济已愈来愈走向国际化，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就需要与世界经济接轨，力争与世界各国进行多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曾多次指出：“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26)“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27)“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28)“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加工订货都可以搞”(29)，“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30)。为了切实搞好对外开放，他还提出了不少具体建议。如：“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31)“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循序进行”(32)，等等。他提醒大家，在对外开放方面我们经验还不多，要头脑清醒，注意总结经验，以便把对外开放工作搞得更好，使其对我国经济发展能产生更多更好的积极作用，尽力防止可能的负面影响。

以上4个问题仅是从“国力论”的几个基本方面所作的概略探讨，并不全面。特别是如何从对“国力论”的基本思想的研究中，探索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问题，即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问题，本文尚未及。实际上，在“国力论”的发展思想中已提出和包括了这一重大问题。

三正确理解“国力论”和“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内在统一性

“国力论”和“发展才是硬道理”都是依据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从我国国情出发，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指导思想从理论上所作的一种概括。我理解，二者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在所使用的文字提法上有所不同。由于文字提法不同，给人感觉似乎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者更多的是强调了发展经济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从小平同志具体讲这句话的前后文来看，还包括了在经济发展中的一定范围内的灵活性、机动性和跳跃性；

而前者则是着重于从长远和总体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了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途径。但深入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两个侧重点本来是互相结合的，二者的基本思想都是力求争取可能最好、最快的发展速度。邓小平讲道，“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33)陈云也曾讲道：“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

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34)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两段话：前者说“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后者说“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前者说“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后者说“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我们能从这两段不同的话中得出结论说二者的基本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吗？我看不能。这两段话都体现出了实事求是和辩证的思维方法。真正的难点是在把这两段话运用到具体工作上时，如何从实际出发，恰到好处地掌握住有关的“度”，而这是要“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的，并涉及到实践中的领导艺术。

值得注意的倒是，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千万不要只从局部和小局出发，不顾全局和全局，随意套用党中央领导人的话，为我所需地拿来为狭隘的本位利益辩护。我们应该是从思想体系上，而不是断章取义地来理解“国力论”和“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两个文字上不同的提法，这样我们就能够把握二者在根本上的内在统一性。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以此来求得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联系到当前的情况，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全国各地都要从思想体系上全面地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精神实质，真正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切实处理好小局和全局、局部和全局，以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认真落实中央坚决抑制通货膨胀，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要求，使各地和全国的发展确实是“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要懂得，作为硬道理所要求的发展应该是“硬发展”，也即是真发展、持续的发展，是邓小平所说的“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而不是大起大落，硬一阵就垮下来的所谓“发展”，也不是“不切实际的高速度。”(35)

我以为，学习和研究“国力论”的基本思想，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指南”，肯定会有很大帮助的。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

注释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6)(27)(28)(29)(30)(31)(32)《陈云文选》第3卷，第52、52、52、46、46、46、34、188—189、211、211、211、56、56、264、265、265、52、52、54、276、332、254、254、252、236、248—249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521、657—658、521页。

(25)(33)(3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8、375、3、377、375页。

(34)《陈云文选》第2卷，第242页。

**实事求是对待经济建设
速度问题的典范
——陈云在我国建设速度问
题上的见解与实践探析**

张启华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陈云说过：“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怎样做到实事求是？这是陈云反复考虑的问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后来为陈云终生恪守，成为他从事领导工作包括领导我国经济工作的最鲜明特点。这里，仅以陈云 50、60 年代对我国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见解和实践为例，谈点体会。

我国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人民都迫切希望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尽快摆脱“一穷二白”的状况。这不但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必需的，更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首先要求。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以迫切的心情提出了加快建设速度的问题。总的来说，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我们用十几年的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建设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也都有了迅猛的发展，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然而，也正是在建设速度问题上，我们多次犯错误，甚至严重错误，致使国民经济遭到挫折。错误的关键是，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高速度以及怎样才能达到高速度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主观能动性必须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基础有所忽视。这在 1958 年“大跃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时候，人们的头脑比较普遍地发热，认为不如此倒是保守和右倾。

就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却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正确观点和意见，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实践。对此予以总结，于今于后，都是非常有益的。这里只就几点略加说明。

首先，指标要定在客观条件许可的高度，才是真正的、能实现的高速度。

从我国这方面的成功经验看，“一五”计划比较实事求是，考虑到了当时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同时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计划比较可靠，因而进展顺利，并提前一年完成。但我们在后来没能坚持这样做下去。1958 年“大跃进”开始后，就一个劲地搞起高指标来。

在大跃进搞得如火如荼之际，钢、煤、粮、棉 4 大指标层层加码。特别是钢产量指标，曾在 1958 年 6 月这一个月內翻了几番。此后，中央对“左”的错误有所觉察，开始纠正。在 1958 年 12 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即将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制定的 1959 年钢产量指标 2700 万—3000 万吨，降为 1800 万—2000 万吨。但陈云认为这个指标仍太高，提议不要公布当时确定的 1959 年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1959 年 1 月上旬，陈云再次提出，四大

指标是难以完成的。但这些正确意见当时未被重视，造成工作上很大的被动。后来，毛泽东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 195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肯定了陈云的意见，表示赞成调整生产指标。这次会上决定，钢产量指标由 1800 万吨改为“要好钢 1650 万吨”，但对外仍公布 1800 万吨。其实这个指标仍然是有问题的。实际情况是 1—4 月，在各方面紧张努力的情况下，只完成钢产量 336 万吨，钢材产量 227 万吨。由于钢材生产上不去，钢材分配不能兑现，影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实现，并带来计划的一再变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书记处责成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今年钢铁生产的可靠指标和争取指标，并按照本年度确实能够生产的可靠数字进行钢材分配。于是，七中全会以后，陈云便领导中央财经小组，开展了落实钢铁指标的工作。

陈云以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和上作方法，做任何决定前，都要进行大量认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正如他常说的，我们做工作，要用 90% 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 10% 的时间决定政策。因此，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这次自然也是这样。他带领中央财经小组的成员们，先对工业生产情况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然后于 5 月 3—9 日连续 7 天在国家计委召开会议，认真分析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轧钢和运输等方面的生产能力和条件，最后才初步确定，钢材的可靠指标为 900 万吨，钢的生产指标为 1300 万吨，至于争取的数字，暂不议，待弄清煤炭、机械、铁道等部门的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后再研究。在此过程中，充分显示出陈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5 月 11 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财经小组关于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他认为，总的精神应该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陈云这里讲的“稳住阵地再前进”，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指标要可靠，有根据；二是并不保守，要经过努力才能完成；三是以此为出发点，目的是为了前进。他针对一些同志害怕降低指标会使群众泄气的想法，反复说明退到可靠的阵地，站稳以后才能再前进这个退与进的辩证法；并要求各级干部做工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站稳以后的前进是更踏实的前进，不致因此而泄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意了陈云的建议，并对钢、钢材、生铁、煤炭、发电量、木材、机床、原油等工业生产指标作了全面降低，使 1959 年的生产计划放在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基础上。

陈云还认为，实事求是确定指标，包括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他在 1962 年指出，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这样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长期计划的指标，更要注意留有余地。这是由于，在经济发展中，会有许多意外情况发生，如果制定计划不留余地，一旦意外情况发生，计划就变成不可靠的，实际经济工作定会遭到损失。

总之，符合客观实际又留有余地的计划指标，才是能达到真正的高指标，也才能更好地鼓舞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相反，不切实际又不留余地的计划指标，超出了客观实际可能，不仅是一纸空文，而且由于实现不了又拼命蛮干，必定极大地伤害群众的建设热情。

第二，最优化的比例是最适宜的速度，按比例发展才能实现最快的速度。

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是经济

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不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生产的各要素之间，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以及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都存在一定的数量上的比例关系。保持这种比例，社会生产才能正常进行。正如马克思所说：“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所以，只有自觉地遵循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普遍规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这个比例，才能最充分最有效地利用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最少的消耗取得最高的经济效果，真正的高速度才能实现。

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陈云就明确提出：“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应该说，“一五”时期，我们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合理安排比较注意。例如，当时搞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为使各环节按比例发展，都经仔细调查，一个个落实。所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陈云要求计划工作的水平有所提高。他说：“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首先着眼于新的基建项目搞多少，只求新的建设和财力的平衡。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已经建成的和正在建设的项目已经大大增加了，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而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陈云这里说的“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一是指当时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项目大量增加，二是指这种情况加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结束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国家计划的范围扩大了。面对这种新情况，如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混乱状态。他从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矛盾着眼，提出要研究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以及煤、电、运输等先行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之间，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之间，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之间，大厂和小厂之间，经济建设中“骨头”和“肉”之间等一系列的比例关系。他所提出的按比例发展经济的原则，既是对“一五”计划经验的总结，也是编制“二五”计划的指导方针，更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后来，在1959年落实钢铁指标的过程中，陈云又为调整钢铁工业同其他部门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从长远看，按比例，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任何一个部门脱离其他部门而孤立地得到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搞“以钢为纲”，问题不在于这个口号对错与否，而在于当时在实际上没处理好钢铁工业同其他工业之间、钢铁工业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致使不但影响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钢铁工业本身也没能得到应有的发展。所以陈云在1959年5月11日代表中央财经小组向中央汇报落实钢铁指标问题时就指出：“仅仅就钢铁论钢铁来规定钢和钢材的生产指标，还不可能完全确当。因为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铁指标定得是否确当，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看得更清楚。”他希望政治局给他一些时间，“全面研究一下钢铁生产同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并提出

需注意，“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否则，不仅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而且重点本身的发展也难以得到可靠的保证。总之，我们必须依据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办事。” 1962年3月，他又说：“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

遗憾的是，在以后的经济工作中，没能很好贯彻陈云提出的按比例发展经济这正确的指导原则。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其中关键是调整。所谓调整，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使国民经济能够按比例地协调地发展。按比例，归根到底是个实事求是的问题；轻视或反对甚至人为地破坏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客观存在着的比例关系，是经济工作中不实事求是作风的重要表现。所以，首先，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复杂的、多序列、多层次的比例关系；其次，是制定出符合这种比例关系实际的经济发展规划，才能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

第三，切实搞好综合平衡才能高速度，这是整个经济工作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按比例，从经济工作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从综合的、全局的观点来考虑平衡问题。综合平衡，是使国民经济能够按比例发展的基本方法。

综合平衡是相对于局部平衡来说的，所谓局部平衡，就是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以至各个项目，必须实现自身内部的平衡，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这种平衡是完全必要的。但仅此不够，还必须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即国民经济全局的、总体的平衡，也即各生产部门之间，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各自内部及相互之间都实现平衡。这样，整个国民经济这个复杂的有机整体才能得到协调发展。对此，陈云在1962年形象地指出：“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所以，“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首先，陈云认为，搞综合平衡，一定要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比如，分配这一环节里所包括的积累、消费两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国家建设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问题。正确处理二者关系，不仅要确定合理的积累率，而且要实现价值形态的平衡（即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总和同国民收入的平衡）和实物形态的平衡（即积累基金同生产资料生产的平衡，消费基金同消费资料生产的平衡）。1956年，我国财经工作的问题之一，就是人民生活所需的许多消费品严重供不应求。这年，毛泽东批评了只顾经济建设不顾人民生活的做法，并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问题，视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六亿人民的大问题。翌年，他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对这事关全局的大问题，陈云也作了深入研究和思考，提出许多卓越的见解。他指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关系就大了。对于这种平衡的具体情况，他在1956年11月关于商业问题的讲话中作了细致分析，认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二者的平衡，在相当长时间内大体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比较困难。我们的耕地只有这么些，但人口多，吃的、穿的都靠它。如果不搞建设，失业半失业照旧，社会购买力很低，商品供应当然一时可以不紧张，但不搞建设更不行。搞建设，

增加就业，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会购买力就要提高，商品供应就会紧张。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而应是紧张的平衡，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后来，陈云又把这概括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具体来讲就是，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这些观点，深刻地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防止损害必要的建设，因而要寻求一个比较符合客观规律的比例，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这一辩证的分析 and 认识，把人民的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把当年生产同基本建设、简单再生产同扩大再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虽然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经验不足未能把二者关系处理得很好，但是总结出经验意义是深远的。

又比如，拟定计划指标，陈云认为，一定要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加以考虑。1959年4月，陈董在写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谈到关于编制1960年计划的方法，应是根据现有企业已经达到的综合设备能力，作为编制明年计划的出发点，拟出明年生产指标的心成数，即：“不仅要计算主要部分的设备能力，还要计算整个企业和行业各个环节的设备能力。比如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不仅要计算高炉、平炉、转炉的设备能力，还要计算采矿、炼焦、耐火材料和轧钢的设备能力。不仅要计算本部门内部的设备能力，而且要计算有关配合部门的设备能力，如计算煤炭、电力、运输等部门的设备能力。总之，要加以综合计算。”这样，既搞好全国的综合平衡，又搞好各行业、各企业内部、外部的平衡，才能定出可靠的计划指标。以往的教训，正是既下认真考虑全国的，又不认真考虑各行业、企业内部的，更不认真考虑外部的综合平衡，所以常常不能避免盲目性。例如钢铁生产，多年来搞“以钢为纲”，对本部门内部的设备能力，以及有关配合部门的设备能力，都缺乏严密的综合计算，因而破坏了综合平衡，其后果之不好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陈云在1957年1月18日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还提出了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的著名观点，即：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且应略有节余，这样，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先保证心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注意农业在相当长时期内对经济建设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为了解决当时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陈云还提出三条切实措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这些措施对1957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忽视和违背了陈云提出的这些正确原则，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受到破坏，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蒙受了严重损失。在此后纠正经济工作中错误的过435程中，陈云又作了大量工作，并进一步发展了上述重要思想。1959年3月1日，陈云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文章《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针对“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指出：“要注意综合平衡，努力消除各方面的薄弱环节，使重点建设和一般建设结合起来，使各个经济部门能够彼此协调地、按比例地向前发展。”(11)

最后，在谈到陈云关于综合平衡的主张时，不能不谈到由批评他的所谓消极平衡论而引起的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的争论。当时，一些同志主张搞积极平衡，指责陈云的主张是消极平衡论。其实，陈云没有讲过要搞消极平衡，他只是主张，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购买力的提高，人民吃穿的需要都增加了，但农产品的增长速度比较慢，所以在国家大规模建设中，要照顾人民生活的需要，做到商品供应和物资分配这两方面的平衡是不容易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使这种紧张的平衡不至于破裂。而一些同志主张的所谓积极平衡，就是按长线来平衡，即把最高产量的某种产品作为标准，其他的都向这标准看齐。针对这种争论，陈云在 1962 年 3 月 7 日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的讲话中，专门讲了他对综合平衡的理解。他明确主张不同意按长线而主张按短线平衡，即当年能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平衡，使供求相适应。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陈云说，在这个基础上搞，才是可靠的平衡；相反，如果按长线，即生产出来的东西本年度或近期内用不上，要存在库里，以此为出发点搞出来的平衡，实际上是一个假定的不可能实现的虚数，是一种虚假的平衡，隐藏着严重的不平衡。那么，按短线进行综合平衡、制定计划指标以后，长线怎么办？陈云说，今年用不了，但明后年需要的，可以安排生产，生产出来暂时存在库里；或者，现在不需要的，或不急需的，可以停下来，生产更急需的东西。尽管陈云的上述说法在当时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但他仍坚持了这个实事求是的正确观点。

以上这些陈云关于搞经济建设一定要注意综合平衡、只有搞好综合平衡才能达到真正的高速度的观点，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我国当时的经济工作，特别是 60 年代初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经济调整，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再高的速度也必须稳定增长，而不能不受限制和大起大落。

陈云反复强调，前进的步子要稳，必须避免反复和大的马鞍形，“年度计划要摆平，就必须瞻前顾后，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12）。

当然，由于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所以每个年度的经济不可能以相等的速度增长，而呈波浪式前进的状态，但这种波动有一定限度，不能出现大的起伏。“大落”，固然在和平时期，即使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也属罕见；而“大起”，则除非在特定的客观条件下，例如科技革命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或某些国家在一定时期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才能发生，一般情况下很难出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视这一规律，必定受到惩罚。

我们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比较稳定。那时，虽然各年度经济发展的速度有快有慢，但没出现过生产下降的情况。所以，人民生活得到了比较多的改善，国家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其经验，就是周恩来在八大会上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所总结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验：“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但可惜，我们在后来没有把这种正确的做法坚持下去，而是相反，从 1958 年开始搞起了批评“反冒进”，批判“右倾保守”，直至“大跃进”，钢、煤、粮、棉产量指标不断“翻番”，动辄要求“赶超”、“快上”。如此急躁冒进的结果，不但没

能把经济搞上去，反而使工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这才真正是“欲速则不达”。我们应记取以往教训，按客观规律办事，使我国的经济稳定地、健康地发展，稳定增长的速度，才是真正的高速度。

第五，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的办法，而不是拚人力物力财力的办法，才能取得真正的高速度。

陈云在 1959 年 3 月就明确提出，要“用尽可能少的投资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果”（13）。

经济效果，包括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两方面。经济效率，是指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劳动耗费和劳动占用同劳动成果的比率。劳动耗费，包括活劳动耗费和物化劳动耗费，即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劳动占用指物化劳动的占用，如厂房、机器设备等。提高经济效率，就是要以较少的劳动耗费和劳动占用取得较大的劳动成果。提高经济效益，除了提高效率以外，还包括生产出的商品符合社会需要，从而商品能够销售出去，价值能够实现，而且能够以高于该种商品价值的价格实现。总之，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就是要求用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尽量多的同时又符合社会需要的商品，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

长期以来，我们在这方面注意不够，在经济建设和生产中，存在着片面追求速度、产值、产量，却不惜工本、不计消耗、拚体力、拚设备、高消耗、低质量等不顾经济效率和效益的现象。表面看来速度不低，实际结果不但社会财富并没相应增加，人民得到实惠不多，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损失。如此高速度，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陈云非常反对这种做法。过去有的部门主张先把数量搞上去，有了数量以后再来搞质量，陈云认为这是错误的，质量问题一开始就不能忽视。许多实践经验都证明，增长速度并不是一切，更不是唯一的目的，提高质量、效率和效益，相对来说，比高速度更重要。忽视质量、效率、效益去追求的高速度不能实现，即使一时实现了也绝不能持久。

由此可见，速度和效率效益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只有在提高经济效率效益的前提下求速度，才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速度。当然，同样的道理，如果不讲速度，速度太低甚或没有速度，也是谈不到经济效率和效益的。

陈云历来十分注意速度和效率效益之间的关系。他在 1959 年 3 月写的《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文中，即单列了《速度和质量》一节。他说：多快好省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这个方针既要求争取速度，又要求保证质量，速度和质量，这两方面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在基本建设工作中，无论工业布局、建设项目排队、企业设计和施工管理，都必须全面地执行这个方针，使我们能够加快建设的进度，同时使一切建设起来的工程都能够有良好的质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效果。他特别强调，基本建设是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大计，我们固然要争取速度，但是在质量方面绝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因为工程质量不好，有的就要返工，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有的会造成生产上的长期不合理，或者影响到产品的正常生产，而这些正是我们在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经常注意避免的。忽视质量，不仅不利于而且有害于争取速度。而合理保证质量，则有利于争取速度。我们现在着重地提出注意质量的问题，同要求建设的高速度发展，是完全一致的。此外，陈云还提出了如何做的问题，指出，要在设计和施工中，合理保证建筑结构、

建筑材料和设备安装的质量，同时要培养技术力量，加强技术管理。他并就这几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陈云这些正确观点和意见，在当时的经济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78年12月，陈云在一次讲话中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¹⁴⁾仅就陈云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中关于建设速度这个方面的见解和实践来看，他自己就正是在为我国的现代化而奋斗的伟大进军中，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既积极又稳重”的一代典范。他为我们树立的这种风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

注释

(12)(14)《陈云文选》第3卷，第371、130、56、56、136—137、212、211、128、55、23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368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769页。

(11)(13)《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第78、74页。

陈云的反通货膨胀理论及对策

潘石

陈云不仅是杰出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他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不断地探索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客观规律，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经济思想体系。毫无疑问，陈云的独具特色的经济思想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陈云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反通货膨胀的理论及实践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建国以后，陈云长期担任我国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亲自领导了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的治理工作，为恢复我国国民经济，建立新中国的财经制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对 60 年代发生的通货膨胀，陈云更有深入系统研究，他提出的反通货膨胀理论及治理对策，在实践中产生了十分神奇的功效，改革开放以后，陈云仍始终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运行的态势和规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提出一套防治通货膨胀的理论及治理对策。陈云的反通货膨胀理论及治理对策，是马克思主义反通货膨胀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和国家反通货膨胀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在当今形势下认真学习和研究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财政及信贷平衡：防止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础

陈云以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运行规律的熟练驾驭，对经济发展趋势及目标的科学把握，坚定个渝地主张，中国经济一定要实现按比例，稳定地持续增长。他在 1957 年就十分强调地讲：“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这不仅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的科学运用。

1962 年初，面对陷入严重困境的中国财政经济，作为国家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成员，陈云斩钉截铁地说：“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必须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不能今年丁动手，等到明年再去制止。”这里，他不仅论述了制止通货膨胀的重要性、迫切性，而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即财政信贷收支平衡与防止通货膨胀的关系问题。

社会生产要实现稳定增长，最关键的基础与条件就是坚持“四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及外汇收支平衡，其中，主要是财政收支平衡和信贷收支平衡。陈云明确地讲：“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1950 年到 1955 年财政收支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的状况，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1956 年，由于财政上有了赤字。物资供应就不平衡，又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财政收支状况是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稳定与否的综合表现。财政收入取决于国民经济是否有效增长，而财政支出又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财政收支失衡，出现财政赤字，就引发通货膨胀，扰乱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秩序。

有的同志否认财政赤字同通货膨胀的直接因果关系，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在实践中也是难以找到根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说：“来源于修正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制度的预算赤字给经济秩序注入了一种通货膨胀倾向。从直观上看，赤字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它也是人们广泛议论的问题。”“将通货膨胀视为预算赤字的一个结果，因而间接地把它视为凯恩斯变革的一个结果。也是有道理的。”从我国的实际来讲，这种判断也是正确的。“文革”前的情况，包括五、六十年代的正反两方面情况，前引陈云的论述已说得十分清楚，勿须赘述。认真审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经济实践，也可一目了然。从1979—1989年只有1985年财政略有盈余，其余年份均存在巨额赤字。由于多年财政赤字的累积，对社会需求形成巨大的刺激和拉动，推动市场物价连年攀升。1986年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增长6%，1987年则达7%，1988年迅速提高到18.5%，迫使国家不得不花费一定时间进行治理整顿。

进入90年代，我国财政赤字猛增，1990年为139.6亿元。1991年达2111亿元，1992年升到238亿元，若按西方口径计算，软赤字（含银行财政性占款、证券及外来资本）则达739亿元，1993年预计为205亿元，实际结果远远超出这个数字。这些还仅是中央的财政赤字，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地方财政包干以后，省、地、县的地方财政赤字更逐年增加。据估计，全国2000多个县中，有1/2以上的县有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实际做起来，就是没有收入的支出。财政收入是基础和前提。有“人”才可能“出”，无“入”缘何支出？弥补办法有三：一是动用结余；二是增收减支；三是信贷抵支，即通过发行公债和向银行进行透支。我国已经连续十几年财政赤字，何谈“财政结余？”所以第一个办法已无指望。我国这些年经济效益一直下降，企业大面积亏损，增收余地不大，即或强行增税，那更是“竭泽而渔”，因为它增加了企业负担，现在企业已不堪重负，眼下增加点收入，长远看收入源会枯竭。再说，节支的结果是直接紧缩需求，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但又可能带来市场疲软，产品实现困难，这又会减少收入。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借债。改革开放15年来，我国举借内债上千亿元，加上外债折合人民币总共有上万亿元的债务，现我国已进入偿债高峰期，每年的纯收入恐怕也有上千亿人民币偿还内外债及其利息。进行经济建设，一点债也不借是不行的。但决不是债务越多越好，并且借债也不是防止通货膨胀的良策。长久地举借新债还旧债，债务累积越来越多，无异于把一个恶劣的经济环境留给子孙，使子孙后代也深受通货膨胀之苦。

银行信贷收支能否保持平衡。对通货膨胀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如前所述，银行与财政有着密切的联系，财政一旦发生赤字就逼迫银行发票子，引发通货膨胀。实际上还不仅如此，银行信贷收支如果发生严重失衡，出现信用膨胀，会直接刺激投资需求急剧扩张，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拉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由于基本建设投资中有近1/3左右的资金要直接转化为消费基金，所以投资膨胀又会带动消费需求的膨胀。投资膨胀与消费膨胀同时并发，互相交织、互相作用，必然要推动生产资料市场与消费资料市场的物价全面上扬，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几次通货膨胀，无一不同银行信贷收支失衡有直接关系。

从上可见，陈云提出的坚持财政与信贷平衡原则是正确的、科学的，是有效防止通货膨胀，保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则

与重要指导方针，但是，直到目前，有些人对这个问题仍没有清醒、足够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坚持财政与信贷收支平衡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物，是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主张摒弃它，而推行赤字财政和信用扩张政策，这是很不可取的。现在，就连西方国家都已普遍认识到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的危害，明确提出“应该将凯恩斯的破坏预算平衡的理论颠倒过来，通过明确地重新确立财政帐户收支双方的平衡原则来有效地控制公共开支。”我们力何还去重蹈他们已被实践证明失败的复辙呢？

二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防止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则

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这是陈云提出的防止通货膨胀，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快速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则，也是陈云反通货膨胀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陈云明确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他创造性地应用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平衡发展的理论，总是力图使国民经济在克服各种不平衡因素的运动中求得平衡稳定的发展。平衡稳定的发展，看起来似乎慢一些，但事实上它要比那种大起大落，今年突然跃上“波峰”，明年忽又跌入“低谷”的状况要好得多，快得多。因为“大冒进”必然“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这个经验教训，今天仍要牢牢记取。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模式的争论，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很好解决。两种模式：一是稳定增长的模式；二是快速增长模式。在改革开放前，陈云倡导的稳定增长模式被视为“右倾”、“保守”加以排斥、批判和否定，而快速增长模式则被贯彻执行。结果怎么样呢？每一次推行快速增长模式，都直接引发了通货膨胀。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高速度、高指标，往往脱离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制约，盲目扩大建设的规模。建设规模的扩大，直接扩大了投资需求，如果没有相应的物资供应作保障，必然产生通货膨胀，1958年的“大跃进”和1978年的“洋跃进”，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两次“跃进”，都是快速增长模式的具体实践，结果不仅没有实现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而带来国民经济的严重后退与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巨大损失和浪费，严重的通货膨胀给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实践证明，陈云倡导的稳定增长模式是一个防止通货膨胀的增长模式，能够使国民经济扎扎实实地实现高效益的增长，在中国是切实可行的，因而应认真研究，大胆坚持。

陈云倡导的稳定增长模式，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一，我国必须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陈云讲：“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这个“大方针”，是陈云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就是说，首先要保证人民的生活，在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的基础上，再安排建设。在积累增加的基础上，再扩大建设的规模。这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前提，严重的通货膨胀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影响人民生活及社会的安定，还谈什么经济增长？

其二，搞建设必须讲究按比例。这些年来，理论界和经济部门，只讲速

度，不讲按比例，这是不对的，也是很危险的。50年代末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是造成我国60年代初严重财政经济困难的一个主要因素。陈云在总结这段工作经验教训时，特别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上强调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还说，“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在党的十二大以后，他更强调按比例才有速度，指出：“最快的速度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从宏观角度保持国民经济的大体综合平衡，更为必要。那种把综合平衡归咎于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物而加以否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二战后，日本、法国等国家在推进市场经济高速运行与发展过程中，都相当成功地运用了综合平衡的方法。

其三，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与作用，增加农业生产。陈云历来十分重视农业，亲自到农村去调查，小到地如何种、猪是公养还是私养问题，大到农作物安排，农业产业结构、农业发展方针，无不认真研究、指导。60年代初，我国由于天灾人祸，农业严重减产，农产品有效供给极度短缺，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曾一度被斥之为“右倾”“保守”的陈云被请出来收拾濒临崩溃的经济局面。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后明确指出：“我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11)在陈云的指导下，从1963年起，国民经济很快走出困境，并得到恢复与发展。今天，我国的情况虽然与60年代大有不同，比那时不知要好多少倍，但生活中的通货膨胀依然十分严重，并且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严重忽视农业，农业基础地位遭到严重削弱与破坏的结果。这再一次证明了陈云思想的正确，即：要制止通货膨胀，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必须不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与作用，真正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

综上所述，陈云倡导的稳定增长模式，是建立在一个有效防止通货膨胀的根本理论原则基础上的，这就是“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这个论断，可以说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精髓，也是陈云反通货膨胀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

回顾我国40多年建设的历史，不难看到：哪个时期盲目追求高速度，违背“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哪个时期就出现高通货膨胀率，经济运行秩序就混乱，社会生活就严重震荡，难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反过来，哪个时期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力争适当的增长速度，坚持实行“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哪个时期物价就比较平稳，既或出现通货膨胀也是很轻微的，一般来说在人们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经济运行正常有序，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真正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及健康、稳定、快速增长。这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条根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或放弃这个原则，在开放度和自由度很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如此。

三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对策

在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陈云不仅形成了一套社会主义经济防止通货膨胀的理论，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治理通货膨胀的具体对策与措施，这些对策与措施，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而且具有很大的可操作

性与适用性。

第一，严格现金管理，节约现金支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其基本涵义，就是货币发行过多，市场物价水平持续上涨。银行是管理货币的金融机构，它是货币流向市场的“总闸门”，管好这个“闸门”，是控制市场货币流通量的关键环节。用西方经济学家的术语说是“控制住钱”，“管住货币”，不让其任意从“闸门”中流出。陈云讲，“银行要把钞票管理好，能不用的钱一定不用。”(12)这个办法，对抑制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也是适用的。因为货币发行过多仍是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流通中的货币，1978年仅有212亿元，1990年达2644.4亿元，增长15倍。这其中固然有合理增长部分，但确实增长过快过猛，在这原本货币量就已过多的基础上，1991年又增发533.4亿，比上年增长20.2%；1992年又增发货币1100亿元，比1991年又增长35%左右，大量缺乏必要商品作保证的货币涌向市场，又怎么会不促进市场物价总水平的全面攀升呢？所以，要制止通货膨胀必须管住货币，节约现金支出。

第二，尽可能增产人民生活需要的用品，全力组织货币回笼。既然通货膨胀是由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引起的，因而千方百计地组织货币回笼就成为缓解通货膨胀的有效之策。组织货币回笼的根本办法是增加市场消费品尤其是人民生活必需品的有效供给，不仅要增加总量，而且还要注意品种、质量及供给结构，这样可以减轻消费品市场需求的压力，促使消费品市场商品价格的回落。其次要组织好生产资料生产，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通货膨胀不仅仅表现为消费品物价的上涨，同时也表现为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攀升。并且，消费品市场价格的持续上涨往往是由投资膨胀进而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上涨引起或带动的。因此，增加适销对路的生产资料，是稳定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根本途径和手段。这就需要各产业部门下力气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压长线，拉短线”。产品结构适应了市场需求结构，就能够有效地回笼货币，把市场价格降下来。

第三，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这是陈云结合我国实际的一大创造。对实行高价的少数商品要严格控制，精心选择。它必须是人民生活的非必需品，不影响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它又比较短缺，市场供应很紧张的，对象是少数较富裕的阶层和人群。陈云指出：“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要多。不要星星点点地搞，这也高价，那也高价，所得不多，弄得名誉不好。应该是不搞则已，一搞就要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还说，“卖高价商品，实际上是货币贬值，群众会有些不满意。但是，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13)所以，采用这种方法一定要慎重。要在充分市场调查基础上，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之后再作决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价格基本放开，对大多数商品国家不再直接掌握价格决定权和调配权，更应从严掌握。

第四，同各种非法寻租，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一般地说，通货膨胀一来，经济生活秩序必乱，这不仅是非法寻租、投机倒把兴风作浪的结果，同时也为非法寻租，投机倒把活动的猖獗提供了机会与条件。所以陈云主张，在反通货膨胀过程中，必须“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14)改革开放以来，在两种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体制的摩擦、碰撞，存在许多法律与体制上的漏洞和空隙，非法寻租和投机倒把活动十分猖獗。据有的学者计算，仅1988年由价差、利差和汇差三项租金合计约为3569亿元，约占当

年的国民收入 30%以上，若加上其它杂项租金，估计总额在 4000 多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 40%左右。1992 年租金总额约 6243.7 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 32.3%，与 1988 年比较，绝对额增加 2343.7 亿元，占国民收入之比低了约 7 个百分点。巨额租金的存在，诱使人们疯狂追寻。据估计，目前全国有 1000 多亿元投机资本在炒股票和证券，还有 2000 多亿元在炒房地产，大约还有 1000 亿元资本在从事期货与外汇的投机交易。这 4000 多亿投机资本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掀起重重“泡沫”。不可否认，这其中有一些是合法交易者，但相当大的数量属于非法寻租和投机倒把活动。投机倒把活动愈演愈烈，将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和剧烈。所以，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严肃法纪，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第五，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提高投资效益。在中国，几乎每次通货膨胀都是由于投资过度膨胀，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所引起的。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任务和内容就是控制与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陈云主张基本建设必须脚踏实地，不能留缺口，搞赤字。1979 年 9 月，他针对我国 1970 年以来一直存在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的问題，明确指出：“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15)他主张国家计委必须严格管起基建项目，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没有财力的项目必须下，不能推平头，大家打 7 折，“不下决心这样做，我们说要缩短基建战线就是一句空话。推平头，大家打 7 折，这种办法将使我们一事无成，害国害民”。(16)

第六，尽力保证城乡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目前我国仍有 8000 多万人口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处在贫困状态。这主要是那些落后的乡村人口。实际上，我国城镇中也存在一部分贫困人口，并且，随着近些年来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有 2/3 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城镇贫困人口也在增加。低工资阶层和离退休人员，也有相当数量陷入贫困状态，通货膨胀一来，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这些贫困人口，因为他们收入很低，甚至没有收入，日益提高的物价水平，使得他们无法维持生存。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国家要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动员和集中一部分扶贫资金，加大扶贫的力度，保证社会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保证城乡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可以说，这是治理通货膨胀最起码的要求，也是体现社会上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措施之一。

上述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都是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对治理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应根据每次通货膨胀的具体生成机理灵活运用。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注释

(11)(12)(13)(14)(15)(16)《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52、203、52、53、52、351、309、211、320、205、201、202、202、265、266 页。

布坎南、瓦格纳：《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7—58、178 页。

计划与市场在经济 发展中的关系 ——对陈云“鸟”与“笼子”比喻的体会

高鸿业

陈云指出：“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

陈云在我国政治上的威信，特别是他多年领导我国经济工作的经验，使他的“鸟”与“笼子”的比喻在世界上受到重视，外电曾多次加以报道，即使在报道他去世的消息时，有的外电也特别提到这一比喻。

按照笔者的体会，陈云“鸟”与“笼子”的比喻主要在于说明：在引入市场机制来搞活我国经济时，防止“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换言之，计划与市场都是搞活经济的手段，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本文的目的首先在于提供理由来对陈云提出的上述原则加以论证。然后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根据我们所提的理由来说明上述原则对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一为什么市场必须和计划结合在一起

为什么市场在我国必须和计划结合在一起？根本的原因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如果脱离了计划的指导，我国的市场机制便不能正常运行，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下列3点：

第一，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正常运行的硬件。这些硬件包括通讯设备。交通工具、港口码头、市场设施等基本建设项目。这些主要属于基本建设项目的硬件是为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所必需的。

为什么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需要这些硬件？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市场机制依靠价值规律来发生作用。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低于其价值时，商品的供给大于其需求；这时，生产该商品的企业得不到平均利润，甚至蒙受亏损。于是，竞争会迫使一部分资源流出该部门，从而减少它的供给量。最终，该部门的供求趋于相等，价格和价值趋于一致，当某种商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时，需求大于其供给；这时，该部门的企业便会得到大于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于是，竞争迫使一部分资源流入该部门，从而增加该部门的供给量。最终，该部门的供求又趋于相等，价格和价值趋于一致。可以看到，通过价格和价值的一致和背离，价值规律可以按照社会需要来调节资源在各个部门中的分配比例，使各个部门的供求相等，从而使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能以有秩序的方式进行。可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取决于它是否能对价格信号作出迅速的反应，而对价格信号能否作出迅速反应又依赖于是否具备足够的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等属于基建项目的设施。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属于基本建设项目的设施是相对欠缺的。例如，

我国和美国的国土疆域大致相似，然而，横贯东西边境的铁路干线，我国仅有一条，而美国却有 5 条之多。

由于基本建设项目往往要求巨额的资金和冗长资金回收期限，所以一般私人很少有兴建的意图，从而必须纳入于国家的建设计划之中，由国家建造，即使崇尚私人经营的西方学者也承认，基本设施属于“公共物品”，只有国家才有兴建的动机。正是出于基本设施相对缺乏的考虑，我国的市场机制的引入必须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才能正常进行；否则就会出现不良的后果。例如，在最近一段期间，我国流通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的现象、其部分原因就在于交通和通讯设施等基建项目的不足。

第二，由于我国在过去的长时期中实施集中的计划经济，所以我国目前也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正常运行的软件；这些软件包括商务法律、企业管制条例、行业的成规、群众的市场意识等与上层建筑有关的事物，而这些事物的欠缺又使市场机制难以正常运行。

上层建筑必须为其经济基础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我们所引入的作为部分经济基础的市场机制必须有相应的上层建筑为之服务。在市场机制中，经济活动主要依靠当事人之间的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而契约的缔结和履行的成功与否又取决于是否存在着完备的监督、管理和强制执行契约的法律条例规定，由于法律条文规定不可能照顾到涉及契约缔结和履行的所有方面的一切细枝末节，所以除了法律条例规定之外，还需行业成规和群众的市场意识作为补充。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长期实施集中计划的我国几乎不存在这种与上层建筑有关的事物，而在引入市场机制以后，由于意识落后于存在、这些事物不可能立即出现，必须假以时日才能逐渐形成。因此，在必要的软件具备之前，市场机制无法正常运行。例如，“欠债要还”是市场机制赖以正常运行的最基本的法律条文规定和市场意识，然而，缺乏这种最起码的软件却给我国带来了“三角债”的问题，以致给我国的经济运行造成困难，甚至由国家出面也难以解决。这一事例所表明的软件的必要性，已经在世界上为经济学者所承认。可以看到，在市场机制应有的软件得以具备以前，计划经济必须发挥指导的作用。

第三，除了缺乏足够的硬件和软件以外，作为我国独特情况的人口压力也使我国的市场经济只能在计划所容许的范围内运行。

我国的人口居于世界各国的首位，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frac{1}{4}$ 到 $\frac{1}{5}$ 。虽然我国资源丰富，但庞大的人口数量却使人均占有额相对贫乏。由于人口众多和人均资源的贫乏，个人经济行为的轻微变动加在一起便会对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而市场机制只能通过供求的调节来解决比较轻微的经济波动；巨大的冲击，它是无能为力的，当经济风暴到来时，西方金融市场以暂停营业的方式等待风暴的平息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以我国的事态为例，春节期间的客流量猛增，几乎给我国的交通运输行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国家只有事先作出计划安排，甚至动用行政命令手段各方疏导，才能缓解这一问题。然而，相对于整个国家人口的数量而言，我国春节客流量的比例却低于西方国家在圣诞节期间的同一数字。虽然西方客流量的比例较高，然而，由于西方国家人口的绝对数量远低于我国，它们在圣诞节期间的交通运输的拥挤情况并不严重，完全可以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调整来加以解决。

春运的事例固然可以显示计划指导在我国的重要性，但还不足以表明需要计划指导的迫切程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举一个有关粮食的例子。世

界粮食的总储备量约可供全世界人口两个月之用。以我国占全世界人口 1/4 来计算，世界储备粮可以维持我国 8 个月的消费。由于美国人口约为我国人口的 1/5，所以同一粮食储备可以维持美国 40 个月之久。为了说明问题，假使我国和美国都遭受颗粒无收的灾荒，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全世界愿意而且能够运用储备粮来予以帮助，那末，世界储备粮仍然解决不了我国的灾荒问题，但却可以使美国渡过难关。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约为一年，而全部世界储备粮却仅够我国 8 个月之用。这样，我国仍然会面临 4 个月的饥荒，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对美国而言，足以维持 40 个月的世界储备粮却可以使它渡过饥荒，绰绰有余。这个例子表明：人口压力使得计划指导在我国不但必要，而且还达到非常迫切的必要程度。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我国在过去长期实施集中计划，以及由于我国所具有的人口压力这一特殊国情，所以我国不但充分具备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进行的硬件和软件，而且还会面临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的经济冲击问题。基于这些原因，我国的市场机制只有在计划指导下运行、即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根据笔者的体会，陈云“鸟”与“笼子”的比喻的含义即在于此。

二对目前我国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如果笔者在上文中对陈云“鸟”与“笼子”比喻的含义理解正确，那末，这一比喻的含义对我国目前的体制改革无疑就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指导意义在于下列 4 点：

首先，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决不能一蹴而成。既然我国尚不具备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足够的硬件和软件，那末，引入市场机制的规模必须和现有的硬、软件的条件相适应，并随着硬件和软件的建造而逐步扩大市场的规模。我国体制改革之所以进行比较顺利，原因之一是采用了渐进的方式。否则，放松计划而市场又因硬、软的缺乏不能正常运行，其后果必然是经济混乱和政治动荡。然而，硬、软件的建造需要时间。即使通讯和交通设施等硬件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法律条例和契约监督机构这些软件的建立也需要较长的时间，特别是人们的市场意识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东欧和前苏联不顾客观条件限制而急于求成的灾难性后果可为殷鉴。当然，我国与东欧、苏联的体制改革战略、方式有着原则性的差异，然而，仅就引入市场机制而论，仍有共同之处。一篇比较客观地评价我国体制改革的发表于西方的文章写道：“尽管存在着缺点，中国所采用的渐进的方式避免了‘休克疗法’的高额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其次，计划方法的改善和市场机制的引入都是深化体制改革的措施，二者都不应予以偏废。邓小平明确指出，市场与计划都是管理经济的手段。陈云的“鸟”与“笼子”的比喻也意味着这一点，这一论断已经为全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所证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数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宣告独立。这些在过去长期受到资本主义制度掠夺之苦的新近独立的国家理所当然地对市场经济持有怀疑的态度。总的说来，它们选择了以计划为主的发展道路。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之后，由于缺乏动力的管理体制、因循苟且的官僚主义等原因，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赤字庞大、外债难于偿还等

困难局面。这些困难，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使得这些国家从 80 年代开始纷纷走上偏向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然而，又经历了数年的市场经济之后，它们的发展情况总的说来仍然不振。一本总结发展经验的西方著作写道：“在世界空前的范围中转向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策略的五十个左右的国家中，许多国家迄今的结果是使人失望的。市场并没有像教科书宣传的那样发挥良好的作用”。因此，计划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性似乎又有回升的征兆。事实上，除了少数的例外，计划经济手段在不同的程度上几乎为一切国家所普遍使用。即使以市场经济相标榜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使用计划的手段。它们通过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交易来稳定外汇比价便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既然计划与市场都是管理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手段，那末，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进行，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固然是深化改革的一个办法；与此同时，改善计划方法也应是深化改革的另一种办法。上面引用过的那本西方著作写道：“改善动力机制、制裁贪污和分散管理”都是改善计划的办法。究竟采用二者中的哪一种，当然需要看具体情况而定，由此可见，陈云的“鸟”与“笼子”的比喻向我们表明：在体制改革的进行中，使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并不意味着倒退到体改前的状态，而要看何种情况下使用什么样的计划手段。

再次，计划手段不但是管理我国经济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计划在我国比重还应大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计划比重之所以应该大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已经上面加以论述。一方面，硬件和软件的不足使我们的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生作用，另一方面，众多的人口对经济运行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往往超越了市场机制所能调节的限度，不论就哪一方面而论，市场机制都不能使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从而，必须由计划手段加以弥补。这些弥补的手段，对硬软件充沛又无人口压力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仅具有较少的必要性，而我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我国计划比重应该较大的原因即在于此。例如，“三角债”的存在迫使我国人为地疏通资金流通的渠道；收购棉花的弄虚作假使我们不得不施加行政干预；农村的商品交易环节的混乱导致了农村供销社上作的加强；为了稳定粮价，我国实施了由国营粮店发挥主渠道作用来向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我国人民提供口粮的办法。由于硬、软件和人口压力问题都不会在近期内得以解决，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计划手段在我国比重势必大于西方。计划手段不但在过去对我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在将来还会在不同的程度上起着完善市场经济的作用。

最后，“鸟”与“笼子”的比喻还告诉我们，“鸟”与“笼子”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正如陈云所说，没有“笼子”，“鸟”会飞走；把“鸟”捏在手中，“鸟”会死亡。比喻所指的市场和计划的关系也是如此。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实行了典型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其后果是列宁所指出的垄断集团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形成，并且由此而导致 1929 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这次危机几乎造成资本主义的覆灭。另一方面，长期实施过度束缚市场作用的高度集中的时划模式又使前苏联的经济缺乏活力，从而构成促使它解体的原因之一。历史的教训表明，只有把相辅相成的市场和计划结合在一起，才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最优的选择。

既然相辅相成的市场和计划的结合是最优的选择，那末，我国体制改革

的思路便应沿着这一方向前进。事实上，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已经出现了这一方向的事例并且取得了成效。例如，“菜篮子工程”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并不完全依靠市场，因为，它由市长挂帅，而不是市场挂帅，它也并不使用强制性的计划手段，因为，它考虑到菜农的利益动机和消费者的承受能力。目前开始推行的“米袋子工程”也带有类似的性质，总之，市场机制的引入并不意味着计划手段的退让，而应是计划手段相应的改善明智的选择是使二者结合在一起，产生最优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注释

《陈云文选》第3卷，第320、320、320页。

奈尔、瑞德：《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对市场机制的评价》（艾尔加出版社、美国布鲁克菲尔德城出版，1992年），第233页。

克立特札德：《按照现实进行调整》（国家经济发展中心出版社，旧金山，1991年），第XV⁰、14页。

陈云计划经济思想简论

李震中

陈云的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陈云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一特点在他的计划思想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下面谈谈我学习陈云计划思想的一些体会。

一社会主义社会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陈云认为：“一九一七年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同时指出：“《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心然与生产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计划经济，首先应当弄清它的含义是什么。计划经济这个概念是列宁在1906年提出来的。他说：“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交给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1922年，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时又指出，这种制度将实行计划经济。从此以后，人们普遍采用了计划经济这个概念。然而对它的含义的理解和表述却很不一致，甚至还有许多误解。陈云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是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陈云早在建国初期就曾指出：“过去社会上的生产是无计划的，我们来一个有计划……这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我认为陈云对计划经济的解释是准确的，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思想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整生产，而在公有制下，这种调整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进行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所有这些，都是讲的计划经济。可见，所谓计划经济，简单地说，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与它相对应的，乃是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具有客观必然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是在共同生产基础上的首要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经济，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的那天起，都实行了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到底对还是不对？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靠打笔墨官司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众所周知，前苏联是第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70年的社会

主义建设使得国民收入上百倍地增长，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其经济地位从欧洲的第4位、世界的第5位一跃而力欧洲的第1位、世界的第2位，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1913年苏联疆域内工业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6.9%，而1985年则达到美国的80%，应当指出的是，苏联在此期间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分别下降了36%和23%，不得不用很长的时间来恢复经济。而美国在此期间，不仅没有遭受战争破坏，反而在战争中发了财。至于说到我国的情况，大家就更为熟知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仅相当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一半左右，到1952年，仅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1953年开始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1988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同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相比：钢为64倍，原煤16倍，原油为428倍，发电量为91倍，水泥为92倍，纱力10.5倍，布为67倍。一些重要产品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例如，钢由1949年占世界的第26位上升到第4位，原油由第27位上升到第5位，发电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4位，原煤由第9位上升到第1位，水泥、粮食、棉花、布、肉类等也都居于世界首位。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以1952年为100，1988年分别达到2105.3和1095.1。这样快的发展速度，不仅旧中国无法比拟，就连当代众多的国家也望尘莫及，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这4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遭受了两次大的挫折，一次是3年“大跃进”。另一次是十年动乱。这两次挫折不仅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而且至少丧失了15年的建设时间只要尊重事实，就不难看出，这两次挫折都不是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恰恰相反，都是违背了计划经济原则。“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59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没有综合平衡；又说，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十年动乱期间连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都难以维持，根本谈不上有计划发展问题。显然，如果没有这两次挫折，我国的经济的发展肯定会更快一些。

无论中国还是苏联的历史表明，计划经济并没有“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而是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证明了，陈云关于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这样做是完全对的”这个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应当看到，实行计划经济即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乃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类历史的一次重大转变，恩格斯说：“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

所以，对于实行计划经济，应当从人类发展史的高度来认识其深刻的意义。既然人类历史已经开始了这样一次重大转变，就应当以脱离了动物界的人来观察和思考问题，而不应当去贬低自觉性，推崇自发性。

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道理无疑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如何实现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这是一个实践问题。有计划发展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完全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因为它是史无前例的。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实践并且是反复实践，通过成功与失败的比较，才能逐步解决。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不足为怪的。不能因为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对有计划发展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二实行计划经济还必须有市场调节

1979年，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主张在社会主义时期。既要有“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又要有“市场调节部分（即不按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并使两者结合起来。陈云的这一精辟论述，不仅是对计划经济实践的科学总结，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计划理论的重大发展。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便在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计划管理制度，初创时期，虽然也借鉴了外国经验，但比较注重从中国国情出发，按照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计划管理。例如，中财委《关于加强计划工作大纲》指出：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国营经济一般已取得了领导地位，但还须巩固加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对国民经济的情况了解还很不够，统计工作还很弱。因此，目前计划工作的方针应该是，区别不同的经济成分，区别各个不同地区，区别主要部门与次要部门，区别主要产品与次要产品，抓紧重点，分别缓急，进行计划。在计划管理上采取三种形式，即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估算性计划。间接计划和估算性计划的实现，主要通过国家的价格、税收、信贷等政策以及加工订货、收购等措施，国营经济虽然实行直接计划，但也有区别对待，允许一部分产品由生产企业按照原料和市场情况进行生产，一部分经济活动，由基层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自行安排。正如一位当时在中财委工作的同志所说的那样：“由中财委主持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于计划经济模式并没有照搬苏联的。毛主席也说过，陈云同志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

由于经济工作方面“左”的指导思想和照搬外国的教条主义。在经济管理体制中逐渐形成了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病，并且日益突出起来。对此虽然也进行过几次改革，但这些改革主要是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而对于体制中的核心问题，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因而改革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为什么长期以来计划工作制度中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而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陈云认为，这是由于“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是说，没有把马克思的原理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生产有计划地发展是有特定条件的，即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 and 商品生产已经消亡。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已占主体地位，但是其中集体所有制还占有很大比重；还存在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商品货币关系还广泛存在，商品经济还须要极大的发展。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已经取得了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但是，还不可能做到计划一切，因为还存在着许多不受计划控制和计划无法控制的因素。还必须借助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过去由于未能认识到这一点，故而导致“计划大死，包括的东西大多”，“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经济缺乏活力。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从本本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出发，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陈云所说的市场调节，是有特定含义的。“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11)这种市场调节是在总体上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条件下起作用的，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作用的，因而它不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陈云是最早主张搞活经济，利用市场机制的党中央领导人，他在 1956 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集中地体现了适时改革、搞活经济、利用市场的思想。1979 年 3 月，陈云又明确提出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是我国文献上最早出现的市场调节这个新概念。市场调节这个同，1923 年，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里曾出现过。当时苏联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特别重视市场作用。《决议》中谈到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时指出：“如果企图通过有计划的干预来强使经济发展，企图以行政措施代替市场调节作用，……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我们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看到过的那种局部的或全面的特殊经济危机（如‘停滞’、‘阻塞’等）。”(12)当时苏联虽然提出并重视市场调节，但是没把它作为经济体制固定下来，而只是作为临时性措施，事实上，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他们再也不提市场调节了，故而也就形成了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的弊病。可见，陈云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必须实行市场调节其意义是巨大的，可以说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计划理论。

陈云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市场调节问题，而且科学地阐明了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在计划与市场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两种倾向：一是以计划排斥市场；二是以市场排斥计划，对于前者，陈云反复阐述了市场调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由于市场调节搞活经济所取得的可喜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13)当人们重视了市场调节之后，又出现了忽视计划、排斥计划的倾向。对此，陈云又及时地强调指出了计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82 年 1 月，他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现在计划不受欢迎啊！所以今天大年初一，我就找计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来谈一谈这件事。”“去年十二月我讲了那四点，主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14)他特别指出，“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15)可见，陈云既不赞成以计划排斥市场，更不赞成以市场排斥计划，而是主张两者要结合起来。

实践证明，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果认识上发生偏差而又处理失当，势必出现像陈云所说的“该严的（必须按比例）不严”，“该宽的不宽”的情况。该严的不严，就会造成宏观失控，总量和结构失衡，经济不稳。该宽的不宽，就会抑制人们的积极性、失去经济活力，最终导致按比例破坏。所以，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和处理不可有任何偏废，否则，都必将延缓经济发展的速度。

三按部就班就快，急于求成就慢

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端重要而又十分尖锐的问题。这是由其内部和外部的条件所决定的。列宁早在

1917年9月就曾指出：“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他又说：“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6)斯大林也有一句名言：“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17)可见，速度问题，乃是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速度问题，对我国来说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快速发展国民经济，不仅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也是客观形势的要求。所以，我们只能采取加快发展的方针。

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快速发展，因为人们都想尽快地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问题在于怎样实现快速发展。对此，陈云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这就是：“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18)历史证明，陈三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的发展曾遭受过多次挫折，其原因撇开政治因素不谈，主要是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造成的，这种“左”的错误一个重要表现是，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确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切实际、急于求成，人们称之为折腾。这种折腾在历史上曾发生多次，有大有小，最大的一次是1958年的“大跃进”。这次折腾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3年“大跃进”，不得不用5年的时间进行调整，这是欲速则不达的最典型的事例。此后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像“大跃进”那样的急于求成，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粉碎“四人帮”后，又提出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把已经超过国力的基本建设规模又进一步扩大，加剧了比例关系失调，加重了财政经济的困难。1980年又被迫进行大调整，1984年开始的经济过热，由于“软着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导致了1988年的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高达18.5%，引起人们的恐慌，掀起了抢购和挤兑的风潮，结果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经过治理整顿，经济运行刚刚进入正常轨道，1992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经济过热。党中央及时发现后，于1993年下半年果断地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即使如此，1994年依然爆发了高通货膨胀，零售物价上涨了21.7%，创造了建国以来历史最高记录。几十年来，总是在折腾、调整，调整，折腾的怪圈里打转。有人说这是中国的经济周期。其实，这种周期并不具有必然性，是可以避免的。

“左”的错误，带来了折腾，这个教训是深刻的。陈云根据历史经验，谆谆告诫人们，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稳步前进，不要急于求成，1979年3月，他在写给中央的信中说：“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19)同年9月，又进一步强调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20)1985年，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1984年过快的速度指出，“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21)

为了避免折腾，为了持续快速发展，就应当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因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够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22)按比例发展，就是要保持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协调。这些重大比例包括工业与农业的比例，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工农业生产与能源、交通运输的比例，以及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等。为了实现按比例发展，陈云特别重视基本建设规模问题和农业发展问题。

基本建设规模直接关系到比例关系的协调与否和发展速度的快慢。如何掌握基本建设规模？对此，陈云早在1957年所写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文中作过全面的论述。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他认为，“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23)为了防止出现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他还提出了5条制约的措施。在基本建设投资这个问题上，陈云历来主张要脚踏实地，反对用发票子的办法搞建设。基建投资“心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24)所谓“爆炸”，我的理解，就是爆发通货膨胀。比例失调和经济不稳，过去的多次折腾，无不是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多过猛、超过了国力所造成的。所以，陈云提出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对于防止折腾、保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快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在经济工作中是必须遵守的。

农业问题，农民问题，这也是陈云一直高度重视的问题。早在1951年，他就讲过：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25)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亲自研究和解决农业发展方针问题和农产品的流通问题。1961年，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亲自到农村作调查研究，写了著名的《青浦农村调查》。1962年，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2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提出首先要把农民一头安稳下来，采取进口粮食的措施。他说：“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并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27)1985年，陈云针对忽视农业，忽视粮食生产的情况，又指出：“对于粮食生产，我们还是要抓紧抓好。”“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28)

陈云对农业问题的论述，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了一个极端重要的而又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道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在口头上人们似乎都是承认的，但在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回事，前几年出现的这个热，那个热。就是农业不热，农业发展滞后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党和国家的极大关注。陈云早就说过：“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29)很显然，如果农业落后，成为短腿，不按比例，哪里来的高速度？只有农业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才有可能达到最快的速度。

由上可见，在如何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上，有两种做法：一是，急于求

成，不顾经济规律。不顾实际可能而盲目冒进，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二是，脚踏实地，按部就班，按比例地发展，其结果则是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加快发展我国的经济，我们只能实行后一种做法，摒弃前一种做法。要记取历史经验和教训，避免折腾尤其是大的折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的高速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注释

《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220页。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7页。

(25)《陈云文选》第2卷，第93、14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441、319、458页。

(11)(13)(14)(15)(18)(19)(20)(21)(22)(23)(24)(25)(26)(27)(28)(29)
《陈云文选》第3卷，第244、244—245、244、245、245、320、309—311、320、311、248、268、351、248、52、264—265、210、236、349—350、251页。

宋劭文：《陈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与实践》，载《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11页。

(12)《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第378页。

(16)《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69页。

(17)《斯大林选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页。

论陈云的计划思想

刘日新

陈云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和国家第一代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杰出领导人，对发展我国经济所作的丰功伟绩彪炳史册。邓小平曾经高度评价陈云经济思想。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重要讲话，从基本国情到改革开放，从历史经验教训到当前的具体经济政策，从按经济规律办事到进行国家干预，一共讲了14条，可以说是陈云积数十年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深切体会，对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在那次会上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

陈云在我国历史上几个关键时期担负领导经济工作的重任。如陈云自己说的，“我是老北京，一开国就在中央工作”。建国初期，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负责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经过艰巨努力，稳定了市场物价，消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仅用3年多的时间，就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使我国进入了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时期。与此同时，陈云从1951年起即为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运筹规划，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50年代的“大跃进”，加上天灾和苏联的背信弃义，使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了困境。在1961年开始的调整时期，陈云所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认真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他在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时发表重要讲话，所阐述的基本思想、观点和办法，实际上被中央接受并成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指导方针。由于措施得当和贯彻有力，到1965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为“三五”计划的实施准备了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在这前后，陈云发表几次重要讲话，强调克服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提出用3年时间调整，克服比例失调，1979年3月，国务院成立以陈云为主任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这是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对调整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使我国的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

陈云的计划思想，是陈云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云计划思想的渊源是马克思主义。他说过“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论点来之于马克思。”前几年我国理论界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有计划按比例。我认为，陈云讲的“来之于马克思”是有根据的。的确，马克思没有写过专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的著作，但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首先是《资本论》中，对比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例如，《资本论》第一章从分析商品开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种种矛盾，然后掉转笔头说：“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

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物。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由此可见，马克思十分明确的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马克思还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才能揭穿商品拜物教。他说：“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时，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还可见之于其它许多著作。如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指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以上这些引证说明，陈云所说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来之于马克思”，是准确无误的。

陈云正确的计划思想，还来之于我国的实践。他结合长期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体会，总结了苏联和中国计划工作的经验，指出两国“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陈云在这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在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同时，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其实，只要我们追溯陈云过去的著作就可发现，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只不过以前没有提得这么高、这么鲜明罢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总的趋势，是逐步缩小经济中的计划调节部分，扩大市场调节部分，这与陈云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的论断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当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理论界有人以为，陈云是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现在已经过时了。其实，仔细琢磨就会看到，陈云的思想与十四大的提法虽然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为：

第一，十四大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的这种作用，也就是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这正是陈云所特别强调的。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只有计划经济部分，还必须有市场调节，就是要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由价值规律来调节。

第二，十四大认为，市场既有对各种经济信号反映比较灵敏的优点，有利于促进产需协调；但市场也有其弱点和消极方面，因此需要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那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陈云也指出过，市场调节即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是“无

政府”的、“盲目”性的调节。“因此，在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1982年，陈云把市场调节和国家计划比作“鸟”和“笼子”的关系，就是强调国民经济要在宏观控制下把微观搞活。1985年，陈云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宏观控制的问题。他说：“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

第三，十四大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在宏观调控上，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陈云也曾指出：“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

(11)1985年，他在党代会上甚至进一步明确和强调：“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2)

第四，十四大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陈云也曾经指出：“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指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引者）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还说：“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和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13)

总之，十四大精神与陈云思想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二

陈云的计划思想在总体上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一系列重要观点上至今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对当前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建设要重视国情的問題

我国理论界有的同志认为，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照搬苏联的模式，现在搞市场经济，可以模仿美国的模式，或者亚洲“四小龙”的模式。而陈云一贯主张，我国的经济建设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外国经验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原则。50年代学苏联，“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14)80年代，陈云再次明确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重视我国的国情，他特别强调我国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15)他又说：“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还下很多。”(16)

（二）关于综合平衡的问题

我国理论界有的同志以为我们过去搞计划工作，从体制到方法都是照搬苏联的一套。其实，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的。过去我们在学苏联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创造。例如，“综合平衡”一词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是“俄国人的本本”所没有的。在陈云的著作中，综合平衡有着丰富的内容。

首先，“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17)这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列宁说过，“经常的、自觉地保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18)毛主席也说过：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由于“大跃进”造成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过5年调整，才重新建立被打破了的平衡。

陈云所说的综合平衡，不是指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平衡，而是指全国总体的平衡。他在1957年《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扩大地方的职权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因为经济单位是分散的，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19)后来他又提出“全国一盘棋”的著名观点，说：“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20)

陈云在1957年就提出了“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21)的要求。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很多，通常应当抓住哪几个主要比例呢？首先要抓住消费和积累的比例。用陈云的话说，就是吃饭和建设的比例。“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只要把握住这一条就好。”(22)

另一个重要比例是农业和工业的比例。陈云曾经指出：“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许多办工业。办商业的同志不大考虑这个问题。(23)他以对我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和敏锐的观察力，在“一五”期间就多次指出：“农业已经成为建设中的弱点”(24)，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同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相比，即使完成计划，也是很紧张的。”(25)农业问题中最重要的是粮食供不应求，这是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同落后的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的反应。因此，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经过反复考虑，向中央提出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的建议，并由中央作了决策。这一决策加上随后的花纱布和食油的统购统销，对稳定市场物价，保证“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农业经济的再生产与自然的再生产交错在一起，因此，农业和工业按比例发展，与其说取决于工业，不如说取决于农业。陈云深刻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发展农业仍然是头等大事。”“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26)陈云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发展农业的许多具体政策措施，有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特别是陈云高度评价毛主席在1959年提出的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避免工农业比例失调，认为“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27)

与比例关系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速度问题。陈云一贯主张，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反对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他在1982年春节对国家计委的负责同志说：“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28)他还在1985年党代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29)

怎样才能搞好综合平衡，陈云有许多经验之谈。他指出，中长期计划必须从当前的年度计划、从起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再说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按：指“大跃进”时期），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30)

陈云还指出，搞好综合平衡，在思想方法上，“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否则，不仅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而且重点本身的发展也难以得到可靠的保证。”搞好综合平衡，还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这就是年度计划“既要照顾明年又要照顾长远。当前的生产和建设是重要的，决不能忽视。但是，也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31)“总之，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32)

（三）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问题

陈云早在1957年就深刻地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规模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是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33)

怎样才能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呢？陈云指出，一是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并略有结余；二是物资要合理分配，贯彻执行先生产、后建设的原则；三是人民的购买力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是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指投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四个方面）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五是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往往上年农业歉收，下年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建投资都下降。

1979年，陈云又提出：“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34)

陈云计划思想的重要观点，除以上所述外，还有计划机关要考虑大问题、考虑战略性问题，经济计划体制要改革，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才能促进经济顺利发展，等等。陈云的计划思想丰富而深刻，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贵理论财富。认真学习和掌握陈云的这些重要理论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

（作者单位：国家计划委员会研究中心）

注释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4页。

(11)(12)(13)(14)(15)(16)(17)(19)(20)(21)(22)(23)(24)(27)(28)(29)(30)(31)(32)(33)(34)《陈云文选》第3卷，第308、244、244、244和245、278、350、347、350、245—247、337、250、281、211、75、307、56、309、251，78、246、311、351、211、137、212、52、264—265页。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95—96、9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454页。

(18)《列宁金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6页。

(25)(26)《陈云文选》第2卷，第237、140—143页。

陈云关于计划和市场思想

陈其人 陈冬村

陈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就是他说的“交换、比较、反复”和“下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指导他长期主管的全国财经工作和计划工作，并加以总结。他从中揭示的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不仅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更具有理论意义。

一

先谈国民经济的最宏观计划即发展方针。

陈云从我国实际出发，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大方针是：要使10亿人民有饭吃，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

为了确定这个原则界限，就要总结多年来国民收入划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以何者为度最为适宜。对于这种划分，薄一波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有所论述。对此，陈云十分重视，说：“我很同意他的研究。他所提出的比例数字可能会略有出入，但寻找这些比例关系，是完全必要的。”这个由我国经济工作大方针所决定的比例，以及根据它将国民收入分解而成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就构成我国最宏观的计划。这是因为：积累基金中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部分，决定生产资料在原有基础上增长的总价值额；用于增加就业的部分加上消费基金，决定消费资料生产的总价值额，它和前期消费资料总价值之差，就是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的总价值额。这样，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的增长规模，就有所规划。当然，这两者规模的决定，并不能像现在所说的那样简单。

二

再谈由发展方针直接决定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规模，及其内部比例。

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可以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我国两大部类的增长规模既然有所规划，这增长规模连同其基础一起，就等于社会物质生产两大部类的规模也都是由宏观的计划控制的。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转不能空洞地依据这个宏观计划。因为由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再生产的实现规律表明，两大部类之间、每部类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的。换言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中，不同的使用价值量要符合比例，它互相结成一个复杂的比例网。因此，必须用某些手段使它们的生产符合比例，并要决定构成这个比例网的基础是哪一种使用价值或生产部门，其它生产部门的规模，是由它直接、间接按比例决定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陈云从实际工作中回答了这个问题。1962年，当时是三年困难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后的恢复时期，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

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陈云说到这里，周恩来插话说：据此，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这里谈的虽是恢复时期的比例应如何恢复或建立，但其中包含的规律显然具有普遍意义。

因为，提供吃穿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有多少剩余生产产品提供给轻工业，就从物质亦即原材料方面决定轻工业的规模，而工业和农业对生产工具和动力的需要，又决定重工业的规模。当然，这只是国民经济比例网赖以建立的荦荦大端，它还有其它因素，也就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条件下，要综合平衡。

这里先谈一谈陈云关于用哪一种方法建立平衡的看法。他说，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材料和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例如，生产一定数量的钢，需要一定数量的有色金属，就要认真地计算这些有色金属当年能生产多少，能动用库存多少，能从国外进口多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平衡，确定钢的生产指标。”

这里说的是，在两大物质生产部类生产规模已有所规划的条件下，生产其中一种产品，其数量要同有关产品的数量符合比例。因为每一种产品的生产都有这个问题，就构成综合平衡。

这样就产生像钢铁、木材等原材料的供应，应当有个分配顺序的问题。对此，陈云的看法是：在原材料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部分用于基本建设。这当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决定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由这分配顺序所决定的分配到各生产部门的物质资料的多寡，会影响国民收入划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

在参照这一因素修订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后，为了在宏观上防止这些基金被突破，陈云认为：“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总的说来，这就是货币流通量要和商品流通的总价值相适应或平衡。

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国营企业基本建设的资金都来自财政拨款；集体企业如农业生产合作社部分基本建设的资金亦然。这样，只要财政收支平衡，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和物资，就全部或大体来说是会平衡的。如果发生赤字，就意味着积累基金突破限额，它和物资供应就不平衡。这赤字，如用发行公债的办法来弥补，就等于将既定的消费基金部分地转变为积累基金，这样按既定消费基金而生产的消费资料，就有一部分缺少相应的购买力。这赤字，如用向国家银行透支的办法，亦即由中央银行增发纸币来弥补，由于基本建设周期长，在生产出产品之前，货币流通量就超过商品的总价值量，在实行固定的计划价格的条件下，商品不能自行涨价以吸收更多的货币，就发生有货币却买不到商品的现象。

同样道理，银行信贷平衡也是保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不突破所必需的界限。但要指出的是，银行并不是只能根据它的存款来决定它的贷款；如果

是那样，银行信贷自然是平衡的。银行能产生信用，即贷款额可以适量地超过存款额。在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银行短期贷款用于满足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要，长期贷款用于满足集体企业对部分基本建设的需要。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要由中央金融机关按照全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全国的信贷计划，对各银行下达数额。这样，货币金融才能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如果全国银行台起来突破贷款总额，就必发生物资供应紧张问题。

陈云在总结 1956 年的财经工作时说，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缺点。缺点是：在财政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 30 多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多用了 15 亿元以上，工资多支出了 6—7 亿元，农贷和其它贷款多开支了 5 亿多元。结果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紧张。基本建设和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如钢材、木材、竹子、煤炭等，人民生活需要的许多消费品，都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其中的规律是：“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按物资的数量来说，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五年是增加了，但是却发生了供应紧张的现象，原因就在于财政和信贷多支付了近三十亿元。”如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固定的计划价格，这就导致物价水平上涨。

三

现在谈由最宏观的计划或发展方针所决定的结成比例的各具体生产部门，应如何运转才能保持比例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陈云认为应该既有层次不同的计划生产，又有市场自发调节的生产。

他指出，无论是苏联还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都将宏观计划控制下各具体生产部门的生产，不加区分地以微观计划来决定，这是有缺点的。他说：1917 年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1949 年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缺点。这就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由于这样，就致使“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据此，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

前面提到，陈云认为实行计划经济，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办事的。这个新说法是否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呢？符合的。这是发展了的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说：“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上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

对于和各种不同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已经认识了的，就用自觉的方法分配劳动量去获取，这就是计划经济；尚未认识到的，就让自发的方法分配劳

动量去获取，这就是市场调节。这在不同社会的社会化生产条件下，都是存在的，同所有制形式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资本主义的垄断经济，是用自觉的办法分配劳动量进行生产的，它是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

在上述基础上，陈云进一步明确指出：问题是要弄清楚它们在不同部门中占有不同的比例。这就是说，在确定了国民收入划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从而确定了物质生产两大部类规模之后，各生产部门，如下面将论述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各部门，都可以分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样两部分，各自所占的比例如何，那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研究，才能弄清楚的。

他很重视这两部分经济所占比例的变化，说：“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这看法是很有预见性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调节的比例无疑地是扩大了。

对于这部分的发展趋势，陈云也有所论述。他说：“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应该怎样理解这一点呢？我的初步看法是：在不是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正常发展时期，计划经济部分是愈增加的，因为我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将随着实践增加而愈深，就愈能用自觉的办法分配社会劳动，去生产我们所需要的符合比例的各种使用价值量，这其实就是人类逐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在经济工作中的反映。在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时，市场经济部分的绝对额其所以不缩小，而可能是相应地增加，这是因为全部生产量扩大了，在生产量扩大幅度远远大于市场经济比例缩小（其原因是计划经济比例扩大）的幅度时，市场经济的绝对数额就增大。

四

对于各个具体生产部门的市场调节，陈云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看法，这就是：它只能在国家制定的计划范围内活动。

对此，他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国家计划是“笼子”，市场调节是“笼子”里的“鸟”。他说：“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这是个基本原则。在这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这就是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将经济活动，划分为若干领域，每一领域都是国家计划控制的，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从上述可以看出，国民收入之划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就是大“笼子”。市场调节如果冲出这“笼子”，经济生活就必然发生混乱。

五

与国民收入划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相应，生产资料生产部类

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的规模，或者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规模，直接间接都是由具有一定高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亦即由农业劳动者除了满足自己的消费外，有多少食品以养活非农业人口、有多少原料以供应工业生产来决定。这就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含义。这就决定了生产农、食的农业更需要计划经济。

陈云对我国农业的基础作用，即制约工业的作用，或农业和工业的比例，以及农业生产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都有论述。

1962年2月，那是经济困难、比例严重失调时期，陈云针对具体情况提出克服困难、调整比例的办法，当然具有特殊性，但特殊中却含有一般意义。他说：对农业生产首先是对于粮食生产恢复快慢的估计不同，我们财政经济工作所采取的步骤就会有很大不同。比如：“每年能够征购多少粮食？要不要进口粮食？经济作物和猪的恢复速度有多快？今后几年每年能够投资多少，基本建设的规模多大？城市人口要不要减，减多少？这些问题都要根据农业首先是粮食增产的速度来决定。拿基本建设来说，增加投资，除了增加生产资料以外，还必须相应地增加粮食和其它各种生活消费品。农业生产恢复的快慢，也直接关系到工业生产恢复的快慢。”(11)这里已将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对我国城市人口、重工业、经济作物、轻工业的制约作用，即农业是各种结成比例关系的生产部门的基础，说得很明确了。这又会反过来修正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等等的比例。从以上可以看到，粮食生产是国民经济基础中的基础。陈云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当棉粮比价波动而有利于棉的时候，“农业部就开农业会议，提出来扩种棉花……我说。那就不得了，粮食会不够吃。”(12)因此，粮食耕种面积不能缩小；经济作物只能提高革产和利用不种粮食的土地。

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说：“社会上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13)

由于这种生产食物的劳动从社会看是非有不可的，陈云就认为要由国家规定。粮食生产是这样；此外，“养猪要规定任务”。“郊区必须种菜，不种不行”，这些都是计划。“市场调节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灵活灵活。不这样做，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说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这是农民与国家两利的大政方针。”(14)

六

一提到一个生产部门须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部分，人们就会说这必然使一种商品有两种价格，从而产生很大的弊端。应该说这是发生过的。

问题是前苏联和我国的计划价格不是平均利润引起的。前苏联长期主管计划经济工作的苏共政治局委员沃兹涅辛斯基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要商品的总价值等于总价格，有的商品其价格可以远远高于其价值，有的则可以远远低于其价值，甚至低于成本，它们的盈亏由财政调节，以为这样经济发展就能符合计划要求。结果，除了导致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外，还

造成经济工作人员对于利润观念的阙如。对此，陈云批评说：“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15)

这就是说，计划经济应重视利润，各生产部门应存在平均利润率。我们讨论过社会主义应有平均利润，问题在于以什么来计算（制定计划）平均利润率。市场调节部分的产生和发展，只要真正做到陈云所说的那样，平均利润率就会形成。各生产部门中计划经济的平均利润，就可以参照它来制定。这样，某生产部门的市场调节部分，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行生产时，这市场价格的变化就会导致一个同计划价格利润率大体相等的利润率，产生两种价格的经济体制的条件就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部分，其运转要以这两者为手段；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以及社会生产两大部类规模的确定，是最宏观的计划；农业是决定国民经济各部门所结成的比例网的基础；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计划经济占的比重大些；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市场调节的比重大些。至于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这两部分的比重如何，则是要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注释

(11)(12)(14)(15)《陈云文选》第3卷，第306、52、210、211、52—53、50、245、247、320、194、305、305—306、24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16页。

试述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思想

智效和

—

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的思想是他的全部经济思想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则是陈云这一思想的中心命题。

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想形成于1956年。在那一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并基本完成。对资改造中出现的进度过快、盲目合并小企业，过分强调集中经营等缺点，以及几年来实行统购包销中暴露出来的计划不当，商品品种减少、货不对路、质量下降等弊病，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包括经济运行体制呢？这也是陈云作为当时我国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必须回答的问题。

1956年中共八大之前，陈云针对对资改造和统购包销中的问题，已经提出了“在计划经济许可范围内的自由市场”的观点，强调“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在同年9月的中共八大会议上，陈云第一次系统地概括了他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想，这就是可称之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体制。陈云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这个构想中，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所有这些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想的具体化。

陈云在50年代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上述构想，突破了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束缚。其远见卓识已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然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陈云的这一构想并未能得到应有的实践。进入改革年代后，陈云进一步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在1979年写的一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著名提纲中，陈云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有益的补充”。他还认为，苏联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

条，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由此也导致计划制度本身的诸多弊病。同八大时提出的构想相比较。1979 年的这份提纲既坚持了八大时的思想，又有所发展：“提纲”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更加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思维更加理论化，并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明确地扩展到了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陈云在“整个”二字下面还特别打了着重号）。此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用语，就成了陈云有关思想的规范表述。

在 80 年代的著述中，陈云针对放松和忽视计划领导的倾向，比较多地强调计划调节，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一直没有变。他一方面指出我国的经济规模比 50 年代大得多，复杂得多，原来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倡导“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强调，“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

从公开的陈云论著来看，可以认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是陈云自 50 年代中以来的一贯思想。

二

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有两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首先是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理论。马恩的这个理论，后来被列宁概括为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

在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理论被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普遍承认为社会主义公理的时代，陈云是其中的一个身体力行者。进入改革年代，陈云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践进行了反思，在指出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有诸多弊端的同时，仍然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苏联和中国在革命胜利后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实行计划经济“是完全对的”。在陈云看来，社会主义不能离开计划经济，只是有一个搞什么样的计划经济的问题。这从陈云 1979 年以后的著述中看得很清楚。他在 1985 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他以此为题目，并在这个题目下，紧接着又讲了两句话：“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上述三句联在一起的话中不难看出，陈云是坚持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同共产党搞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认识的，并且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规范了包括计划经济体制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

虽然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是陈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想的最一般的理论基础，但是，陈云又认为，应当“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陈云强调要“发展”，还在这两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并且认为，由于没有发展，导致以往计划经济中出现了种种缺点。

这种发展，从理论上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陈云讲“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因此，陈云不仅

很早就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市场调节，在别人只讲计划经济的时候他强调还要有市场调节，而且对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我国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和具体构想给予了肯定。显然，陈云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是他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想的又一重要理论依据。

由此也可以认为，陈云主张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就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概括的那样一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是互相否定的，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方面，两种属性。

三

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实际上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的理论抽象和概括，这一思想的内涵是多方面的。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作为经济运行的体制，是以整个经济体制中的所有制体制为依托的。前述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涉及所有制、生产和流通诸方面，而后两个方面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以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陈云计划经济思想贯穿的逻辑是：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就没有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又是公有制关系在社会再生产各个领域的具体实现，是公有制关系运行的基本特点。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涵盖整个国民经济，它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不是分别对应的关系，不是说公有制经济实行计划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市场调节。公有制经济不排斥市场调节，非公有制经济也要纳入国家的计划管理。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提出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一部分企业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指的都是公有（公私合营）企业实行“在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市场”（11）。在1979年写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提纲中，陈云把生产不能达到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单调以及“大少爷办经济”、“该宽的不宽”等现象归因于没有或忽视市场调节，也都是针对公有制经济来说的。对于非公有经济或非公有经营，陈云认为也应实行计划领导。50年代，他多次指出，搞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国营部分，不把私营部分也计划在里头，无计划的私营部分就会冲垮国营部分的计划，全国的经济计划就无法进行。80年代在农业生产实行责任制（实际多为土地公有基础上的个体经营）后，陈云多次强调农业生产仍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不能让“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冲垮国家计划”（12）。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运行体制。综观陈云1956年以来的有关论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似可以概括为下述4个方面：

一是关于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概念的区分。陈云经常使用“市场调节”这个词，指的是国家“不按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13）。在这个概念中，陈云不是突出市场规律是否起调节作用，而是突出市场规律自发的、盲目的调节作用；不是把有市场规律在其中发生作用的调节都称作市场调节，而是只把市场规律自发地因而也是盲目地发生作用的调节称作市场调节。注意到这一点，对于理解陈云的“计划

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十分重要。对于“计划调节”，陈云似乎没有直接使用过这个词，但实行计划调节的思想无疑是明确的。从陈云的有关论述来看，计划调节至少包括国家计划和国家干预政策两个方面。国家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14）。国家干预政策是多方面的，既可涉及各种经济活动和领域，又可表现在对各种经济参数，如价格、利率、税率等的调节上。陈云举粮价补贴、房租补贴、低工资、冻结物价等例子，指出：“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15）

二是关于计划调节同市场、同价值规律的关系。在陈云看来，无论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不能脱离市场需要，都需要尊重客观规律，包括价值规律。认为计划是单纯主观意志，不利用客观规律，不考虑或不服务于市场，这不是陈云的思想。陈云十分关心产品的销路，关心生产与市场的协调，关心市场的稳定，把解决市场问题视为重要的国策，视为共产党真正为人民谋利，不使革命成果丧失的大问题。陈云也十分讲求利用客观规律。他多次讲把一斤皮棉定为八斤米价，结果棉花大发展的例子；批评“大少爷办经济”，头脑中没有利润概念的现象，目的都在于引起人们重视利用价值规律。不过，陈云并不只讲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中还有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起作用），他更注重“从大的方面”、“从最后的经济结果”看是否合理，是否“按经济规律办事”，而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一切围着市场转，注重市场的“短平快”效应，“小的方面合理，大的方面不合理”。在陈云看来，国家计划、国家干预政策以及各种调节手段的运用，都要自觉地利用市场规律；自觉地、有计划地利用市场规律的调节作用不是“市场调节”，而是计划调节，如“指导性计划并不等于市场调节。”（16）

三是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同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陈云认为，市场只限于国家不作计划的那一部分微观经济活动，并且这一部分活动也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计划调节则更多地着眼于宏观、全局，是为全部经济活动编织“鸟笼子”。陈云指出：“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笼子就是国家计划。”（17）又说：“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18）陈云在这里阐述的国家计划、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辩证关系，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没有宏观控制的微观搞活，不是真正的搞活微观；第二，离开了国家计划，宏观控制就没有方向，前者是后者的主要依据。

四是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搭配。前已述及，陈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另一部分是由市场调节的（按照陈云的定义，这是由市场盲目调节的部分）。他认为，重要的是应当研究这两部分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19），并且认为，计划经济为主并不是要使市场调节部分越来越少，随着改革和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分别就其绝对量来看，“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20）这是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一种搭配，通常称之为“板块论”。但是，陈云的思想并不止于“板块论”。如前所述，市场调节又是在国家计划这个“笼子”中进行的。因此，计划调节是覆盖全部经济的，它对计划经济部分

起直接的调节（包括指导性调节）作用，对市场调节部分也起制约的作用，此外，计划调节也要自觉利用市场规律。一般论者将自觉利用市场规律的调节也概括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虽与陈云给出的“市场调节”的定义不相符，但陈云实际上也同意这种说法的实质。

以上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4个方面的内容，同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既然市场调节只是市场规律自发地、盲目地进行调节，这一部分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可能是主要的部分；既然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属于计划调节范畴，既然社会主义需要通过计划调节从宏观上把大的方面管住管好，那么，这也就是要求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了。这就是陈云一以贯之的逻辑。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运行体制要求全国一盘棋，要求统筹兼顾，要求适当集中，要求从全局出发，对此，陈云作过许多论述。但是，这种体制与所谓“中央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是不同的。中央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并不是计划经济本身，至多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实践和尝试。陈云1956年提出的经济体制构想不是中央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尽管从现在看仍需进一步完善），他还在1957年亲自主持了扩大地方、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倡导改革，高度评价改革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体制，认为其意义“不下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21）。在陈云看来，改革不过是为了建立、发展和完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运行体制。这是一种从中国国情出发，既尊重一般的市场规律，又尊重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的体制。

四

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要求依据中国的实际，尊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以及其他经济规律，把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原则，正确处理国民经济中各种比例关系，陈云在50年代和60年代时断时续地主持我国经济工作时，对此有大量论述。鉴于这个问题属于计划工作的专门问题，这里仅从原则的角度罗列一下题目：

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以农轻重为顺序安排计划。50年代陈云强调注意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60年代，陈云提出要把解决农业问题作为“重要的国策”；70年代，陈云把毛泽东提出的“以农轻重为序”的思想总结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指出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80年代，陈云强调农业生产在实行责任制后仍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批评“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无粮则乱”，都是为了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及其政治意义。

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安排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问题上，坚持“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的原则。

正确处理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在安排当前生产与基本建设时，坚持“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的顺序原则。

正确处理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在对待新建与扩建、改造，利用现有基础的问题上，强调把现有工业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把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作为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正确安排产业结构，处理基础建设与工业建设，原材料、能源工业与加工工业，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军工产品生产与民用产品生产，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骨头”与“肉”）等关系，以及与产业结构相关的地区发展，认为在经济有了一定规模后，“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合理的比例关系，否则“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

正确处理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的平衡关系，外汇收支的平衡关系，财力与物力的平衡关系，从价值平衡和实物平衡的统一上，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能从高指标出发搞缺口平衡，并且要瞻前顾后，从动态上保持平衡。

所有这些，体现了陈云在我国经济建设上的指导思想，其核心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发展，统筹兼顾，坚持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在稳定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在陈云看来，“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22），“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23）陈云讲求经济发展的质量。不按比例的高速度造成重复建设。生产能力和资源严重浪费，不仅速度上反复出现大的“马鞍形”，而且钢无好钢（如1958年），缺乏应有的发展质量，“一定搞不好”。陈云认为，应当吸收多年来片面追求高速度的经验教训。

陈云以上关于计划制度的论述，内含了一个极重要的前提，即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单位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因而国有经济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又有集中经营的一面，并通过国家计划调节实现对非国有经济的领导；此外，价格应得到有计划的管理。如果这个前提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无疑会在相应程度上改变计划制度和计划工作方法，陈云指出50年代的很多做法现已不适用，其意只在于强调根据新的形势，通过改进和加强计划工作，提高计划工作质量。

五

本文的宗旨乃“试述”陈云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试述”不是“试论”。笔者在本文中所做的工作，只是按照自己对陈云思想的学习和理解，从理论的角度对陈云的有关论述加以整理。这些整理是否在主要的方面反映了陈云的思想，尚需得到专家们的指正。至于陈云的有关思想应当怎样评价，怎样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补充乃至修正，更有待通过百家争鸣式的深入讨论来解决。笔者期望将来能有机会参与这样的讨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注释

（11）《陈云文选》第2卷，第327、335、327页。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陈云文选》第3卷，第13、245、336、350、244、350、244、12、306、245、350、278、350、320、350、245、247、337、248、311页。

陈云关于经济运行与调控 统一性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闻潜 张耀辉

—

建国初期，战争刚刚结束，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之间、各老解放区之间的财政、货币和其它方面的经济政策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地方政权有较大的调控经济运行的能力，相对而言，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显得比较薄弱。这不仅是因为经验不足，还因为统一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利益冲突。陈云作为我党和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主要开创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断根据经济工作实践提出适合当时条件下的经济对策，并使之成为我党经济工作的长期指导方针。

宏观调控着眼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又注重协调经济运行。陈云针对当时统一经济运行的要求，在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构成陈云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精髓。其中主要是：

一、财政与货币的统一

“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的发行库。”这是有钱地区支援无钱地区，后方支援前方的一个办法。汇兑畅通后就发生钱票管理问题，因此必须建立统一的发行库。为了照顾新区财政情况，可以给与一定的机动数，使用时可“先斩后奏”，但税目和税率要统一管理。“上述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和收支机关脱节的现象，如不速求克服，则不但一九五〇年的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而已由此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将大大增加全国人民的困难。”“因此，必须强调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宁愿忍受若干较小的困难，以避免发生更大的困难。”“适应这种情况，财经工作统一的范围和程度也随之增加。首先是货币的统一”

二、全国各地区经济的统一

“个别地方采取‘自卫’办法，即用提高价格来限制物资外流的办法，是用不得的。只有让物资自由流通，物价保持平稳才行。在财政上，一定时期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实行财政税收等统一，在工作上是带有跃进性的，但从客观情况看，如不作基本统一，则困难程度更大，为害亦更大。只要我们反复说明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并保证下级的开支，那么就能说服各地既交出权力，又勇于负责，以此精神共渡难局。

三、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地方首先要积极同中央配合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心须要清楚，如果不把机动权放在中央人民政府手里，而分散给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其后果必然是把微小的机动力量丧失无余，必然晃全局不机动，大家不机动。我们的标准不仅是不贪污，而且是不浪费，就是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到好处，要把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要解决好。实行内部自由贸易，封锁“无论对农民。对城市的劳动人民，还是对国家经济建设，都是有害的，而仅仅对禁粮出卖区域之内的中小城市的居民有利”，“由于粮价高涨，城市工业生产不能维持，结果对国家也不利。”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问题是，对地方财政统得太多太死。”“应在一定范围内给地方以灵活调剂的权力。”“只要对全国的经济没有多大危害，税率可以降低一点。小的局部的调整，无害于全国的收入，也无害于全国商品的流通，这样的调整应该有，并把这个权力让给地方。”

经济运行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规律，陈云在建国初期统一财经工作的观点正是对这种规律性认识的运用。就是在当前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统一经济运行是社会再生产的要求。经济运行过程即是社会再生产过程，而社会再生产过程则是由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环节组成的，每个环节都无法离开这个整体而独立存在；同时，离开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全部的经济运行就会受阻，乃至停止。第二，统一经济运行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要求。无论哪种经济体制都必须考虑全社会的资源总体配置效率问题。当时，中国选择计划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是历史的必然。即使在今天，国民经济计划在指导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而计划的实现需要统一的经济体系作为基础，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计划形式、也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调节手段，没有统一经济体系作为前提，宏观的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就不可能得到实现。第三，统一经济是政治统一的标志和基础。建国初期，各解放区政权已经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之下、但与政治经济的彻底统一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不在经济上做到全国政令致，就很难保证克服由于战争给人民和政府带来的种种困难，也很难在政治上得到巩固。同样，不统一的经济也会给稳定的政治带来不稳定的影响，长期的不统一，不是导致分裂就是导致动乱。

经济统一的实质是经济运行与经济调控的统一。经济运行固然有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性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自发的产生作用，超出这一限度，规律性的作用就可能要发生质变。受各种外存因素（如个人利益等）的影响，经济运行的各个局部也可能与整体不相协调。当这种不协调超出一定限度时，就可能破坏经济运行自身发展规律，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严重的则要使整体解体。经济调控的任务就是要保证经济运行不超出这一限度，或者在超出限度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限制，这里所说的规律性，正如陈云所指出的那样，主要是指经济运行的内在统一性，是经济运行与经济调控相一致、相统一的基础，也是经济调控的目标和基准。另一方面，经济运行规律必须为经济调控所遵守，即经济运行的统一性决定经济调控过程与方式的统一性。这是因为，经济运行是统一的整体，而经济调控则是为了保证这一整体更有效地运转而实施的手段，如果手段在作用方式和作用效果上是下一致的，其作用的总体效果保持一致就是不可能的，从而也就难以实现保证经济运行统一的目的。因此，经济调控手段体系本身也必须具有统一性。

建国初期的经济调控实践证明，适时的、强有力的、统一的调控对于加强经济运行的统一是十分有益的。任经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来建立统一的经济体系，时间长、效率低，甚至不可能实现；而不适时机、不适强度的调控也可能产生拔苗助长的恶劣后果。须知，不统一的、错位的苦干经济调控效果的迭加所产生的总效果，不仅不能带来经济的统一，相反还可能带来经济运行的低效、混乱，甚至经济体系的崩溃。

当前，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企业实体的利益得到了保证和充实，地方的自主权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大；行业管理明显淡化，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职权有了较大的加强。这是本着增强企业活力、改善经济调控方式的基本思路所进行的改革。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背后，潜伏着中央调控能力弱化的因素和影响，如果不加以警惕，就可能造成新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经济上资源配置的劣化。

中央政府调控能力的弱化，目前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一、调控出现真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原来比较完善的计划调控体系逐渐失效，而新的调控体系尚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使得政令难以到位、调控方针难以实现。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明显缩短，振幅则有所增强，反映了经济的不稳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效益长期偏低、而且存在越来越下降的趋势，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央直接调控能力，如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启动在不断减弱，这不能不说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滞后、错位、失误有关。不注意这种调控能力上的真空现象，不注意尽快使新的调控体系完善运行，就可能带来新的更大的损失。

二、大地方小中央的倾向明显增强。由于税制的多次改革，中央财政的活动能力在不断下降，由中央财政拨款直接投资的比重在不断降低，地方对中央的依赖在不断减少而财政调动权力在不断扩大。同时，金融的宏观调控地位大大增强。这种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的基本方向是必须肯定的。但是，金融地方化倾向又是强化地方弱化中央的另一因素。受人事、生活等一系列因素影响，金融行业并没有发挥出对整体宏观调控应有的责任来，相反却时时在为地方的保护主义提供方便条件。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不负责任地贷款，或出据担保、或强迫银行进行有利于地方的金融业务，使得中央调控的政令无法得到实施，经济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难免受到干扰。

三、中央财力下降。财政收入增长率一直较低并有递减的趋势。财政收入在 GNP 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该比重 1978 年为 31.2%，1992 年为 17%，1993 年则为 16.2%。这些指标与发展中国家同时期对比，表明中国的财政收支是十分分散的，而且存在不断恶化的趋势。

四、出现对新形式的宏观经济调控的不正常、不适应心理。上述的宏观调控错位、弱化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观望、抵触和破坏的心理，并成为某些地方政府和相当一批企业的行为方式，所谓“见着红灯绕着走、见着黄灯闯着走”。这种心理对统一经济极有破坏作用，它使中央的许多政策、办法都无法奏效，也为进一步改革设置了障碍。

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弱化对经济和政治都会产生相当大的破坏作用。在经济上，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正常的经济秩序要受到影响，经济发展计划性无法得到保证；地方壁垒加强、物资和其它所有要素资源的流动存在更大的阻碍，使资源配置劣化；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增长速度难以保持，其它的政府目标也很难实现。在政治上，经济秩序经常出现混乱，必然造成人民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可能强化地方对中央的对抗，甚至形成强化的地方政权；引起地方间的矛盾增加，最终导致政治动荡。

尽管有些后果尚未完全表象化，但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表明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读陈云的文章有助于我们清醒和警惕起来，以尽快消除这些隐患。

三

陈云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关于统一经济运行观点，对我们当前警惕中央政府经济调控能力弱化，增强中央统一调控作用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统一经济是政治统一和稳定的基础。统一经济，在解放初期是为了巩固新的政权，现在则是为了顺利地进行改革开放；

解放初期是从乱到治的统一，现在则是从一种调控体制向另一种新的调控体制过渡时避免出现新的不统一；解放初期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今天则是为了民族的兴旺发达。

其次，统一经济运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从陈云的思想当中可以看到，统一财政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使经济尽快地进入到正常发展的轨道。正如陈云指出的，地方首先要积极同中央配合统一经济财政工作，如果不把机动权放在中央政府手里，而分散给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其后果必然是把微小的机动力量丧失无余，必然是全局不机动，大家不机动。这一思想使建国初期的分散经济纳入到统一的国民经济发展之中，而今天，统一经济则是为了避免资源的分散和低效率地使用，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从而进一步实现富国强民的目标；是为了真正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

第三，统一经济也是为了充分发挥各方面的自主权和积极性。没有政治的统一，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经济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没有经济的统一，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特别是基础设施等建设，各方面想发挥自主权也会因为资源被分割使用而没有多少可以调动的余地。因此说，统一经济是各自发挥自主权与积极性的前提条件。陈云强调如不作基本统一，则困难程度（金融、物价风潮）会更大。只要我们反复说明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并保证下级的开支，那么就可说服各地同志既交出权利，又勇于负责，以此精神共度难局。在这一经济思想当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统一仅是发挥自主权的前提，而不是全部。发挥自主权还要放权，要建立一定的体制和制度使各自的利益得到充分保证。从总体来说，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种体制。

根据陈云的经济思想和结合目前中央调控能力弱化的现实，可以得出如下强化中央国家能力的基本思路：以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为首层目标，加强改革力度，尽快让新的调控体制代替旧的调控体制；同时适当调整经济发展速度，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改革环境。在新的调控体制建立过程中，应根据当前出现的中央政府能力弱化的情况，及时调整目标模式的内涵。具体地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速改革，使新的调控体制尽快地完善。当务之急是加速改革，避免分散的进一步扩大，减少由此产生的经济政治不稳定的隐患，以及避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心理下降的进一步强化。新的调控体制代替旧的调控体制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基本目标，同时也要考虑我国的国情。这里所说国情，是指民族文化特征和人们的基本心理以及可以接受调控影响的程度，它是我国建立新调控体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离开这一基础，重新建立一套新体制，带来的损失和风险会更大。

二、加强法制建设，以法制税，强化中央调控能力。中央的经济调控能

力与财政体制是分不开的，要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除了发展经济增加税源这一基本方针、更重要的是依法治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视法律为儿戏，法律的建设不仅包括法律文件的形成，更重要的工作是法律的执行，这应该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重点。没有这一项做保证，一切强化中央能力的措施都是空话。

三、重新设计计划，财政与金融调控格局。计划、财政与金融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三个基本范畴是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有机体。计划往往与行政手段相联系，单独使用会导致企业自主权的丧失。但是，计划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观规定，反映了人们驾驭资源所追求的目标。现代社会无论何种体制，计划在经济运行中的中心指导作用都是其它调控手段所不能取代的。相比较而言，财政和金融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层次，是依据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和计划目标进行调控的工具。同时，财政和金融是两种相互联系的独立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两者必须要配合使用。过去重财政、轻金融，使金融工具没有充分发挥作用，造成调控力度的弱化。现在轻财政、重金融的调控观念与方式，也同样存在调控能力弱化的倾向。因此，目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相互配合，使之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唯有如此，它们才能成为计划指导下的宏观经济有力的调节器。

（作者单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注释

《陈云文选》第2卷，第13、62—68、69、5、14—15、201、134页。

陈云在开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可贵探索

张寿春

进入 90 年代以来，改革的大潮已经遍及神州大地。可是，水有源，树有根。在改革取得丰硕成果的时候，我们重温陈云早在 30 年前提出的关于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许多精辟见解，深深感到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当前深化改革仍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及时指出经济体制必须与发展了的形势相适应

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否恰当，对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参照苏联的模式，加上吸取解放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逐步形成了大集中小分散、大统一小自由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包括以下 5 个组成部分，一是国有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二是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相结合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三是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配、现金管理的统一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相结合的财政管理体制；四是专业系统和地方商业行政部门双重领导的流通管理体制；五是以中央集中统一为主的劳动工资管理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起过积极的作用。它对于统一国家财政和稳定市场物价，对于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对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和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都是重要的保证。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发生了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偏差，经济体制也出现了所有制结构趋于单一、中央集权过多和国家对企业管理过死等弊病。

对于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缺陷和弊病，党中央在 1956 年初就有所觉察。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和若干重要原则。到同年 9 月，陈云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进一步提出要防止改造走过了头，把经济统得过死，使生产不能符合市场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明确指出对已经过时的办法和已经发生的“左”的错误必须及时改变和进行纠正，并且主张采取 5 个结合的新措施：

第一，在工商业购销关系方面，实行统购包销与选购、自销、代销相结合。即对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商品，继续实行统购包销；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逐步停上统购包销，改用选购的办法。凡属选购的商品，商业部门有权优先选购；没有选购和选剩的商品，可以由工厂自销或委托商业部门代销。除某些供不应求的原料由国家分配以外，其它原料由工厂自行选购。

第二，在生产经营形式方面，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即努力纠正认为必须扩大企业规模才能提高产量的片面观点，以及由此引起的盲目地集中生产和集中经营的现象，除了一部分应该合并和集中生产的以外，大部分仍然应当实行分散生产和分散经营；应当允许一部分小工厂、小作坊、小商小贩和农村家庭副业长期存在，并且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把许多手工业合作

社划小、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

第三，在市场管理方面，实行统购统销与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相结合。即必须取消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一些办法，除了对粮食、经济作物和重要农副产品继续由国家或委托供销社统一收购以外，对于一部分小土产等，应该允许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社自由收购，自由贩运，以便货畅其流。

第四，在价格政策方面，实行稳定物价与自行议价相结合。即工农业产品在市场出售的价格要大体上稳定，但又下应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必须“统一物价”或“冻结物价”，要结合市场管理中的议价办法，鼓励优质优价，其目的是要使价格政策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

第五，在计划管理方面，实行指令性计划指标与参考性计划指标相结合。即必须适当变更对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对于生产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的单位，要把纳入国家计划的产值，以及降低成本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利润上缴额等指令性计划指标，都改为参考指标，同时按照市场的需要，自定指标进行生产，并根据年终的实绩缴纳利润。

陈云强调，采取以上5项新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适应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形势，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从而把我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一步“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陈云的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是切合实际的，而且事实上已经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规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最先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总体构想

陈云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还从我国国情和人民需要出发，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总方向，主张建立“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的上述主张，从所有制结构、生产和流通三个重要方面，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了富有创见的构想。这一构想符合我国生产力的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典范。

这种构想要求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必须从国情出发，创造同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局面，陈云主张在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作为主体的同时，允许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必要的补充，就是遵循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的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求突破照搬苏联模

式的束缚，探索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不可能囊括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且在三人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个体经济，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私有经济，它所经营的范围、方式、规模，以及原材料来源和价格、税收等方面，都是在公有制经济领导和国家管理下进行的，因此已经成为附属于社会主义的小商品经济。在当前，个体经营仍然具有产销灵活、方便群众、有利于安排劳动就业等特点和积极作用。

同所有制结构相配套，企业的生产和流通理所当然也要作相应的调整。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与“三个补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只是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针对三大改造后期单一计划管理已经暴露的弊病提出来的。1956年6月30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就曾指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虽然对保证生产，稳定市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管理生产的方法，这只能是一种过渡的暂时的办法。”而实行产销挂钩的自由购销，使生产与需要直接见面，就更有利于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节中产，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并且，计划生产与自由中产两种形式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存在，是同我国多层次的生产力、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和不同的经济利益相适应的。这种构想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体制的一大特色。

一个正确的主张往往不可能一下子被人们所接受。陈云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总体构想，在当时没有被付诸实施，但在历史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以后，实践却以最高权威宣告了它的正确性，从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终于得到了实现，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初步拟定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些方案

根据党的八大前后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则，1957年具体研究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经过反复酝酿，当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基本上通过了陈云为国务院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的规定（草案）》。并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把文件交中央政治局修改，然后经过适当程序公布施行。11月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1次会议通过了这三个文件。又于11月14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84次会议原则批准，15日正式下达执行。

这三个文件是我国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所进行的最早的尝试。总的精神是要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商业、财政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厂矿企业，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计划。这个精神主要反映在以下6个方面：

第一，调整现有企业的隶属关系。要求分别不同情况，把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的一部分工业和商业企业，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

第二，扩大省、市在物资分配方面的权限。各省、市对当地的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和地方商业机构分配到的物资，在保证各企业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

下、有权根据当地情况和需要的缓急，在各企业间进行数量、品种和使用时间方面的调整。

第三，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财权。规定地方财政从过去“以支定收，一年一定”改为“以收定支，五年不变”，即划给地方较大收入，多收可以多支。地方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收入超过支出，地方可以自行安排使用，年终结余，全部留给地方下年度使用。国家和企业实行利润全额分成，凡下放地方管理的企业，以及仍由中央部管的某些企业（粮食、外贸的外销部分除外），所得利润由地方与中央二八分成，三年下变，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规定，为了鼓励地方积极完成国家的出口计划，中央将所得外汇分给地方一定比例的提成。

第四，扩大地方和企业计划管理的权限。为了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计划管理的职权，决定将国家下达给工业企业的指令性指标，由原来的 12 项减为 4 项。即保留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等 4 项，去掉了总产值、新产品试制、重要的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额、年底工人达到数、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等 8 项。关于商业企业的指标，国家只下达收购额、销售额、职工总数和利润等 4 项。同时允许地方在执行商业收购计划和销售计划时有占总数 5% 上下的机动幅度；利润指标不再下达到各个基层企业，以免基层商店为了勉强完成利润指标而搞违反商业政策的活动。

第五，商业价格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规定三类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以及次要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均由省、市、自治区根据中央各商业部门确定的订价原则自行订价。

第六，扩大地方和企业的人事管理权限。凡是属于中央各部下放给地方管理的企业，在人事管理方面，都按照地方企业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对仍旧归中央各部管理的企业的所有干部，在不削弱主要企业领导力量的条件下，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除企业主管人员（厂长、副厂长、经理、副经理等）和主要技术人员以外，其它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企业有权在不增加职工总数的条件下，自行调整机构和人员。

这三个文件关于适当扩大地方权限的规定，是完全必要的。其目的和好处，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提出的，在于有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利于加强各种企业和事业的领导，有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时也不致于损害统一领导和重点建设。

这三十文件在扩大地方权限的同时，也注意了对地方权限作必要的限制。在财政体制方面，规定“地方由于改进财政体制而多得的收入，应该有一个限度，它的原则是使地方可以有适当数量的机动财力，同时又能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资金的需要”；并且提出，改进财政体制后地方多得的财政收入，三年累计一般不得超过 20 亿元。在物资管理和商业流通方面，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的企业的生产物资和部管物资，如果生产数量超过了国家计划规定数量，超过计划的部分，当地政府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提成，自行支配使用，但是原定的品种计划不能改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求中央各部所属机械制造企业超额生产时，为了避免盲目增产，其超额生产的品种，如果属于国家经济委员会统一分配或者在部管范围内的，需要得到中央各有关机械工业部门的同意。”在人事管理方面，规定“国务院管理范围的干部，地方要求调动的时候，应该报请国务院批准。各主管

工业部门管理范围的干部，地方调动的时候，应该同主管部门协商。在调动干部，尤其是调动高级技术人员的时候，应该注意干部原来的专业，照顾到某些干部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要有一定期间的稳定性。”

陈云除了为国务院拟定了上述三十重要规定外，还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进后应注意的问题。他指出，我国在体制上实行分权，把适宜于交给地方管理的厂矿下放给地方管理，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内，给地方政府和厂矿企业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权力，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因为经济单位是分散的，没有全局和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他还及时提出：“地方要切实掌握资金的投放方向”，把大部分钱投向与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关方面；“必须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以防止和减少贪污、浪费现象的发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成“要有个限度”，分成制度“基本上三年不变；但执行一年以后，如果有不适应的地方，应该有局部的调整”。

由此可见，上述三个文件的制定并颁布执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的重要标志，这个改革，尽管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着眼点主要是放在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对于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等的关系等问题尚未找到切实有效的办法，但它毕竟是开始触及到了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方法为上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合理的，方法步骤也是稳妥的，因而对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勇于支持并建议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

陈云下仅积极倡导工商业和财政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而且还是我国农业改革思想上的先驱者之一。1961年6、7月间，陈云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调查。同去的工作组中有两位同志，于1927年和陈云一起曾在这里做过农民运动、农民信任他们，所以敢于说话，在调查过程中，陈云深入到农民家里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发现农民吃不饱饭，无力插秧，公社领导决定包工到户，很快把秧插下去了。老农民向陈云反映，秧是插下去了，插得不好，难免减产，要不减产，必须联系产量，包产到户。他回到上海后，又听到安徽实行包产到户的消息，十分重视，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共同研究，1962年春，在“责任田”和“包产到户”问题上，中央出现了分歧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深思熟虑下随便讲话的陈云，于7月初毅然向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常委建议，可以采取让农民重新分田（即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提高农业产量。

由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依旧是认为社会主义农业必须坚持“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管理，因此，陈云这种勇于突破传统观念的主张，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再加上他其他切合实际的经济主张也被视为“右倾”，从此受到冷遇，离开了财经工作的领导岗位。但是，历史终于作出公证的结论：由邓子恢、陈云、邓小平等主张推行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实际上是中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

五积极主张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首先，陈云对经济体制改革给以满腔热情的赞扬，并阐述了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指导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巨大成功，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陈云在 1980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予以充分肯定：“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这是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现象。”他还强调指出：“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11），同时说明改革的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要从试点着手，“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12）。这些重要意见，实际上阐明了搞好改革的指导方针。

其次，陈云反复论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辩证关系。

早在 1979 年 3 月，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中就指出，60 年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而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部分是有计划按比例的计划经济，另一部分是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的市场调节。此后，陈云一方面反对指令性计划过多，忽视市场调节作用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反对摆脱国家计划的宏观调控的倾向。他一再说明，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搞活经济是在国家计划的宏观调控下进行的。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他认为，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他的这一观点，为我们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第三，陈云大声疾呼必须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陈云一再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13）。他说：“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14）如果忘记或放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他还指出，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15），一定要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并且坚持把共产主义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与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的错误言行作坚决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

此外，陈云还对财政、价格、政企关系等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指出：“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16），“地方财政结余，要由中央财政借用，财权仍归地方。”（17）“这几年，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顺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比较快，现在进行价格体系的改革，确实是有利的时机。但是，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18）他还认为，“政企职责分开很必要。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比过去大得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可以使各级政府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议大事，看大局，把宏观方面管注管好。”（19）

综上所述，对于怎样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30 多年来，陈云时刻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不断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实践一再证明，他不愧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杰出开拓者。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注释

(11)(12)(13)(14)(15)(16)(17)(18)(19)《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12—13、13、103、89—90、90、91、75、76、278、336、338、338、347、348、237、279、337、337 页。

见《陈云文选》第 2 卷，第 323 页。

略论陈云对外开放的经济思想

张治安

陈云的经济思想极为丰富，其中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尤为可贵。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 8 个方面：

一冲破封锁，利用矛盾，打开通路，尽量与外国做生意

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存在，总要同周围乃全世界各国发生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交往与联系，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建国之初，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经济禁运和封锁，企图把我们的红色政权扼死在摇篮里，陈云当时受命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他卓有成效地组织和领导有关部门冲破封锁，打开通路，加强了我国同国际间的贸易往来，迅速克服了我国当时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建国前夕，他在 1949 年 8 月上海财经会议上，就针对敌人的封锁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说：“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不仅是目前的军舰、飞机、水雷的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当然，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从香港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放后，南边即可有一条通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北方也有通路，天津可以出，大连可以儿满洲里也可以出。有些东西可以让外商代销一下。”他当时认为我们甚至准备暂时赔些钱，也要尽量与外国做生意，以换取我们所必须的物品。他说。“为什么要赔钱呢？因为出口货物的价格决定于国外市场，而不决定于国内的生产成本。”

在他这一思想观点的指导下，新中国的外贸经济迅速开创并发展起来。1952 年进出口总额就达 19.4 亿美元，之后又不断发展。60 年代初，苏联背信弃义，中苏关系恶化，我们同苏联和东欧的外贸又受到一定障碍，加之文化大革命和“左”的思潮影响。我国的外贸经济一度发展缓慢。70 年代初，中美、中日关系打开。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得到恢复，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逐渐频繁。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又加快了外贸经济的飞速发展。1978 年进出口总额已达 206.4 亿美元，1994 年又上升为 2367 亿美元，且出口略大于进口。我国外贸的如此发展，与陈云的有关思想是分不开的。

二扩大品种，提高质量，建立信誉，搞好出口商品基地

国际间的贸易总是互通有无、平等竞争的。解政后。我国的经济技术非常落后，要想发展经济，引进技术设备和购买必要的物资，就必须有相应的物品进行交换和补偿。因此，陈云一再主张扩大品种，提高质量，建立信誉，搞好出口商品基地。他不但在 1954 年底全国公私合营会议上强调过这个问题，而巨在 1961 年 5 月外贸专业会议上又讲：“希望同志们特别注意农产品的生产、收购和出口。我们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打开销路下容易，出口数量有一定限度。农产品则不同，港澳同胞和东南亚

华侨，都爱吃爱用祖国的农副土特产品，销路比较有保证，而且这些产品生产周期短，见效快，可以争取多出口。”他还说，我们的出口商品一定要保证质量，对外国做生意不能出门不认货，要包换包退，建立信用。要树立这样的硬牌子。“过去商人为了创牌子，建立商品信誉，开始赔本也卖……因此对出口的商品，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不合标准的一律不准出口。”同时，他还要求出口商品都应当有生产基地。他说：“为了多出口，就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组织生产，搞好出口商品的基地。”我国对外贸易多年的实践证明，陈云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

三引进技术，填平补齐，成龙配套，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落后，引进国外技术是我国涉外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 50 年代，为了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陈云等同志的组织领导下，我国主要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一些技术设备，以有名的 156 项为中心，共引进 400 多个项目，用汇约 27 亿美元，而且都是成套设备。因为陈云等同志一贯主张成龙配套，填平补齐，以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扩大和增强自己的生产能力。60 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我们又开始寻求从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引进技术设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又大规模开展技术引进工作。仅 1978 年共签订 1230 多个设备技术引进合同，成交额达 78 亿美元。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我国技术设备引进工作又出现了新的局面。1979 年 9 月 18 日陈云在财经汇报会上又强调指出：我们“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所谓填平补齐，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现有生产的技术结构、设备状况和能力水平等，缺什么就补什么，需要什么就引进什么，不要盲目从事。所谓成龙配套，就是要以产品为龙头，将技术引进、技术开发、技术改造一条龙地组织起来，对整机、零部件、原器件、原材料等几个层次配套进行安排，以保证我国消化吸收的整体性，从而改革创新，增强自主开发的能力。

在陈云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近年来我国在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国产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 1986 年，国家组织消化吸收 12 条龙，即选择 12 项量大面广、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引进项目，实行科研开发、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相结合，主机和配套相结合，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工厂相结合，一条龙地组织起来，共同实现国产化。1987 年全国又提出了国家重点支持的消化吸收和国产化的项目 150 项，之后又不断增加。实践结果，成效很大，有力地带动了我国经济的起飞和国内技术的发展。

四一切引进必须有专家参加，择优选用，集体商量，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技术引进是必要的，然而引进技术必须注重其先进性，实用性和高新性，要结合我国的国力和技术结构，合理地确定引进的项目、布局、重点、规模 and 对策，要择优选用，不可盲目从事或重复引进，更不能长官意志，为所欲为，一个人说了算。这是陈云的基本主张。我国在引进项目上曾一度出现过

“洋冒进”，引进规模超越了国力的可能，加上有些项目缺乏科学的论证，使2/3的造价提高，建设周期拖长；不少项目建成后，由于原料、配套项目等原因，设备能力不能充分发挥，经济效益大受影响；又由于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不好，一些项目的原料、备品、备件进口依赖度较大，掣肘着自身的发展。如1978年我国技术引进合同成交总额是78亿美元，其中有31亿美元合同是在12月20日到年底短短十天之内抢签的。这段时间的引进重点集中在上海宝钢、4大化肥厂、5个石油化工项目、3个大化纤、100套综合采煤机组等22个大项目上，其用汇占全国用汇总数的1/4。如此大规模的引进超过了我国国力的承受能力。又如我国纺织工业，仅从1979年到1985年共引进6.4万多台（套）技术设备，而且各地竞相引进，乡镇企业盲目发展，布局混乱，规模也不合理，可是，纺织原料却发展滞后，严重不足。目前我国纺织工业原料中70%是天然纤维，30%是化学纤维。而近几年，一方面棉花产量徘徊不前，羊毛资源短缺，蚕丝、苎麻和亚麻产量不稳定，化纤原料生产也发展缓慢；另一方面，重复引进和盲目发展，致使原料缺口逐年增大，不得不增加进口。仅1988年用于进口纺织原料的外汇就高达35亿美元。即使这样，也因“羊毛大战”、“棉花大战”等，不少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常常开工不足，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其现有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为了防止和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陈云早在1980年12月关于《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中就曾强调过，搞经济建设要量力而行，要注重国家的集中统一和计划性。同时，他还批评了各地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的现象。明确提出：“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与专家共同商量”；又说，“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而且“定案时宁慢勿急。”接着，他又特别指出：“任何一个项目，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必须是一项规定。从公社起直到中央常委，必须照此办理。”陈云的这种思想观点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一定要记取经验教训，做好我国的技术引进工作。

五在自力更生为主的前提下，可惜些 不吃亏的外债，但必须充分 考虑还本付息的能力

积极稳妥地利用国外资金，是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建国以来，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利用外资时断时续，几经沧桑。我们曾是世界上唯一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而且也以此为荣。然而，自力更生并不等于闭关自守。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就明确讲道：“‘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并说，“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现在有些带援助性质的外债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低利自由外汇贷款，将来使用起来可能对我们有利，他接着说，“但是对外债要分析，卖机器设备占绝大多数。能借给我们自内外汇的很少，而巨利息高达15%左右，这是相当高的利息。……这种自由外汇，我们借多了也还不起。”他和李先念在1979年3月《关于

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也特别提到，“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讨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在他和李光念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多年来我国借用国外贷款的规模、结构和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在利用国外贷款时，我们要既考虑建设对资金的需要，又考虑偿还的能力，争取尽可能多的优惠贷款，努力降低资金成本。我们应始终坚持正确的原则，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不是外债借得越多，思想就越解放，就越好。近年来外债的急剧增加不能不令人担忧。据有关资料表明，1985年我国外债余额是158亿美元，1988年则为400亿美元，已成为世界第六大债务国；1990年又超过了500亿美元，1992年却将近700亿美元。加上还本付息，这两年还会更多。若按调剂价计算，目前我国人均欠外债至少在六七百元以上。而且近几年我国一直是赤字财政，又发行了大量的国库券。试想要偿还如此庞大的外债谈何容易？因此，我们不要忘记陈云的告诫，应深思他当初的衷告，“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我们一定要加强对借外债的宏观控制、监督和管理。靠借债过日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六要节省外汇，合理使用，外汇贷款 只能用在最关键的项目上

一个家庭过日子，要善于开源节流，合理安排。特别是比较贫穷的家庭惜了债，更应精打细算，把钱用在最紧要的地方，决不能铺张浪费、胡花乱用。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在新中国多年当家理财的陈云深知此理。他一再强调，对于低息外汇贷款，“将来借到了，也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只能用在最关键性的项目上”；并说，不要用自由外汇来弥补赤字，不能用多发票子来弥补赤字，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到一定时候，就会爆炸。同时他又批评了不注意开源节流的两种错误现象：一种是现在出国考察团太多，有不少是游山玩水团，在无端地浪费外汇；一种是各地方、各部门为了取得外汇，出口的商品自相降价，在人为地减少外汇。显然，陈云的主张和观点是正确的。在他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多年基本上能够正确地掌握外汇贷款的使用方向，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借用的短期外汇贷款，主要用于进口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和见效快的关键设备，以扩大出口商品的生产能力。对于中长期国外贷款，一般也都用于经济文化等建设，特别是用于国内比较薄弱或关键的基础产业项目上。如1979年至1988年10年中，我国外汇贷款用于280个项目的建设上，其中80%是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项目，20%是石化、钢铁、轻工、农业、文教、卫生、科研等项目。这些项目在之后的经济文化建设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不可否认，近年不合理的使用和浪费外汇的现象时有发生，除陈云上面批评的那两种现象继续存在外，不少地方和部门用来之不易的外汇大量地或盲目地购买国外的高级轿车、高档香烟、电冰箱、录像机、空调器、电子琴、自行车、缝纫机、高档皮鞋旅游鞋、高级香水化妆品以至口香糖等奢侈品或日用消费品。我们一定要珍惜外汇，开源节流，把外汇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七对外国资本家欢迎之中要警惕， “肥水不落外人田”

改革开放不久，陈云在 1980 年 12 月 16 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讲：“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有些机器看来似乎利润低，但是同另外一些机器或费用合起来的利润，决不会低于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如果低于平均利润率，他为什么下把钱存在银行里稳拿利息？为什么要搞冒险的投资呢？”他接着说：“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下很清醒的干部。”(11)随后他又说，“总之一句话：“肥水不落外人田’。”(12)这些年的实践证明，陈云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这个警钟也是应该敲的。

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迅速增长，三资企业发展很快，据报导 1993 年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 1227 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 367.7 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 1109 亿美元，实际投资 257.6 亿美元。到 1993 年来，外商投资的三资企业累计达 16.75 万家，工业总产值突破 3000 亿元，占全国总产值的 11%以上。目前，三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吸纳利用外资的主要载体。成为我国引进先进技术的主要窗口，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一支劲旅，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起青很大的作用。我们欢迎外商来华投资，以带来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加速我国四化建设的步伐。可是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外资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本是一把“两刃的刀”，例用它有两种效应.机遇与风险并存.成绩与问题共有。目前国有资产流失、“肥水外流”的现象非常严重，不能不令人高度警惕。有些三资企业、外商运用各种手段低价高报、以次充好、虚亏实盈，转移利润、逃避税收等，大量侵吞中方国有资产。然而我们许多地方和部门只是为了引进而引进，竞相攀比任意优惠、饥不择食、一拥而上，大慷国家之慨，人为地流失或奉送我国资产。据有关调查，中外合资合作上业，中方资产应先评估而未评估的相当普遍，约占 90%左右，仅 1992 年国有资产因未先评估约损失 646.98 亿元。且中外双方资产作价严重不公，将国有资产压低而与外商高价资产合资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某地一家钢管厂账面价值 5000 万元，评估资产 2.1 亿元，地方和企业领导却仍以 5000 万元与外商号资。湘潭一合资企业.外方设备报价 120 万美元。实际价值 90 万美元，技术软件报价 30 万美元。实际价值只有 3 万美元。有些地方引进外资，不是引进我们急需的高新技术，而是把投资少，利润大，赚钱快的金融、商贸、旅游、房地产等行业让外商搞，甚至还想把高速公路卖给外商，也出现把土地高价买上低价送给外国人的怪现象。诸如此类，“肥水落入外人田”。若任其下去，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四化建设极为不利，因此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

八搞特区和利用外资进行建设， 我们经验少，要认真研究

陈云建国后长期从事财政经济的领导工作，亲自组织并指挥过建国初我党在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统一经济，稳定物价；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也是他一手参与搞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初，他虽然首先明确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市场调节”的新观点，但他始终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和主张。他虽然赞同引进外资和搞经济特区。但他一直认为时利用外资和搞经济特区要持慎重态度，要警惕。要总结经验和认真研究。他在1979年9月18日财经汇报会上曾说：“利用外资来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13)之后，他又说。对外国资本了欢迎之中要警惕等。他在1981年12月还说过：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特区；又说：“广东、福建两省的特区各省对外业务要总结经验。现在还没有好好总结。”“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他说，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倒把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1982年大年初一，他找计委的几位主要负责同志谈话，强调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的问题，说“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14)1985年9月24日，他在讲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时又说：对外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他还在其他地方强调过，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别的现代化；我们过去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受别人欺侮；资本家的本性并没有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没有过时等。后来，与他闻知我国特区扩大后办的不错，经济发展的很快，他非常高兴，并表示支持和赞同。但无论如何，他提出的要认真研究、总结经验都是完全有必要的。

应当承认，事实上我们的经验还很少，东欧和前苏联只提供了一些教训，而我们在近年的实践中也碰到了许多新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认真研究、正确解决。我们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才能保证我们真正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胜利前进，才能永远造福于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渭南市委党校）

注释

《陈云文选》第2卷，第2页。

(11)(12)(13)(14)《陈云文选》第3卷，第155—156、158、157—158、267、280、276、248—249、252、277、277、280、265、307页。

陈云独具特色的对外开放思想

王家云

陈云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紧密结合我国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和求实精神，提出了在开放中应坚持的适应性、警惕性、自主性与方向性等富有创见的理论原则，形成了他鲜明的独具特色的对外开放思想。

一适应性原则

所谓适应性原则，即坚持对外开放中资金、项目的引进要与国内的财力物力相适应。

陈云曾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即“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这就是陈云著名的“国力论”。在对外开放中的引进规模问题上，陈云坚持的仍然是“国力论”。

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这是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改革之初，曾出现蜂拥而上盲目引进的现象。对此，陈云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指出：“愿意借外债给我们的国家纷纷到来。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引进有利的技术，也是必要的。但是，这要量力而行。”很明显，这种买机器设备的外债的使用，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国内有多少财政拨款用于“配套”。就是说，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要和国力相适应，亦即和国内的配套投资能力、还本付息能力相适应。

第一，引进要与配套投资能力相适应。国外一套设备的引进，必须有相应的诸如动力、原料、能源、交通运输、通讯等一系列配套设施的建设。这些建设需要国内相应的投资。正因为如此，陈云认为，设备贷款的使用，“我们每年能够使用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我们使用它时，国内力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国内配套投资部分力量如果不大，那末，买方贷款就不可能使用得多。如果国内没有投资力量，硬要进口设备，只能把机器存起来。”而这就违背厂引进的初衷，非但不能促进我们的经济建设，反而增加了困难，延缓我们建谡的进程。所以，我们在确定引进规模时，要“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第二，引进要与还本付息的能力相适应。借外债是要还本付息的，这是个经济常识。因此，“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事实上，就借外债而言，“卖机器设备占绝大多数。能借给我们自由外汇的很少，而且利息高达百分之十五左右，这是相当高的利息……这种自由外汇，我们借多了也还不起。”因此，要把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放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宏观规划之中考虑。如果借外债和国力不相适应，引进的技术设备不能在短期内创造出经济效益，就人为地设置困难，超过还本付息的能力，则可能陷入举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之中，势必增加财政困难。因此，陈云强调，“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陈云不仅强调借外债要考虑还本付息的能力，要慎之又慎，而且强调借

到外债同样要谨慎使用。他说：“将来借到了，也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只能用在最关键性的项目上”，以求更大的经济效益。

总之，对外开放中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不量力而行，不搞好综合平衡，一讲加快发展就一哄而起，争相攀比，盲目扩大引进规模，不会有效益，甚至会反过来影响建设的速度。这个道理，对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有益的。

二警惕性原则

所谓警惕性原则，即在对外开放中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第一，要清醒。在对外开放中，一些外国资本家打着各种友好的旗帜，把自己打扮成慈善家。救世主，掩饰其追逐暴利的真面目。而我们有些干部对此麻木不仁，甚至天真地认为外国资本家慷慨借资，积极提供设备，并非为他们自己获得利润，而是为了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由于头脑不清醒，加上缺乏经验，在同外国资本家打交道时，上当受骗的事时有发生。

对此，陈云尖锐地指出：“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了在欢迎之中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他还说：“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再重复一遍：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

在对外开放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十分重要。且不说对那些惯以“最惠国待遇”作为筹码，施行各种诱压兼施的政策，企图用经济上的优势来逼我们就范的强权政治，我们应保持清醒的意识；就是对一般的外国资本家，也要清醒地看到其追逐利润的本质，不会因为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而有任何的改变。陈云讲：“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有些机器看来似乎利润低，但是同另外一些机器或费用合起来的利润，决不会低于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可见，不求利润的资本家是没的。当然，在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技术设备时，必须让外国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就没有资本家愿意来我国投资。

第二，要稳妥。陈云一贯认为，经济工作“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11)同样，对外开放也应坚持稳妥的原则，即“摸着石头过河”，万万不可操之过急。在对外开放初期，我们不少同志热情较高，希望几年之内把损失的时间全部补回来，不顾实际地盲目引进。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谈到冶金部引进设想一事说：“他们是好心，想要多搞，可以理解。共产党员谁下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12)

针对以往利用外资、引进项目过程中因草率从事而造成严重浪费的现象，陈云要求：“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下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定案时宁慢勿急。任何一个项目，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必须是一项规定。从公社起直到中央常委，必须照此办理。”(13)之后，陈云多次重申，前进的步子要稳，不

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讲到对外开放中创办特区问题，他讲：“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14)遗憾的是，这条经验教训并未形成全党的共识。

第三，要警惕。凡事都有两面性，我们在肯定对外开放的积极的一面的同时，亦要重视带来的消极的一面。陈云指出：“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对外开放时，我们也讲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但现在看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15)陈云反复告诫我们，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对因渗入而直接危害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性要“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16)

总之，既要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又要保持清醒的认识、稳妥的步骤和足够的警觉。陈云的这个思想是独特而深刻的，是对外开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自主性原则

所谓自主性原则，即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当对外开放这一政策刚提出时，不少人受“左”的禁锢较深，对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顾忌较多，担心在搞资本主义。一旦对外开放被普遍接受时，又有人走到另一个极端，忘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基本点，企图靠借外债买一个现代化。

对此，陈云指出，“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17)。这就是强调对外开放中的自主性原则。

第一，对外开放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早在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即明确地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是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18)

本着这个出发点，在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借鉴国外经验时，都要努力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杜绝照抄照搬国外的东西。他明确地指出：“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19)。之后，他多次强调要重视我国人口多、农民比重大、生产力水平低的现状，认为我们是在中国的一系列特殊矛盾中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比如“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20)。

第二，对外开放要立足于我国的现有基础。陈云在讲到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时，坚持要立足于我国现有的基础，即“现有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

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21)“外国专家是要走的，长期聘请的只是极少数。请外国专家来考察，提意见，这一点要做。但是，究竟如何建设，建成以后怎样管理，还得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22)。脱离我国现有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单纯地依靠外国专家，靠借外债，盲目地引进，甚至企望搬来一个现代化，这是荒谬的。不要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就是一般的国家，指望这种办法来实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也是不现实的。我们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和“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实际工作的锻炼”的技术骨干，(23)为什么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呢？

第三，对外开放要立足于扩大自力更生的能力。陈云认为，对外开放中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一定要有分析、有选择。利用和引进都不是我们对外开放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力更生的能力。他指出：“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就引进工作来讲，我认为既要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24)。“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的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25)。积极引进，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目的是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决不能损害民族经济。

四方向性原则

所谓方向性原则，即在对外开放中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

陈云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怀疑社会主义的消极后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敏锐，提醒人们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带来的消极后果，告诫全党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号召全党要努力纠正忽视文明建设的现象，坚持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奋斗方向。

第一，坚持“两手抓”是对外开放的根本方向。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对外开放大潮荡涤着闭关锁国的陈腐观念时，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和作风如同苍蝇蚊子一样亦随之涌进来，污染我国改革开放的环境，甚至想左右我国对外开放的方向。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书面发言中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26)

之所以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奋斗方向，陈云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包含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是不能分离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又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也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27)简言之，搞好两个文明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一旦“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28)“因此，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29)

此后，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的书面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忽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危险性。他说：“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

如果不同步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30）。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足够的警觉。他说：“现在大家致力于物质文明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应当看到，现在确有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而且相当普遍。”（31）他进而语重心长地说：“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值得严重注意的是，目前许多党委和党员干部，对此没有警惕。”（32）应该说，这个忠告和批评是及时的、恳切的。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决定对外开放的性质。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促进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对外开放中的社会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改革开放的实际过程中，“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33）甚至有极少数人主张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统统搬到中国来，陈云尖锐地指出：这些人不懂得，“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34）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准确地看待资本主义，正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他讲：“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35）他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36）尽管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艰难的、曲折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37）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第三，指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措施。陈云指出，首先，要进行经常性的思想教育。“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甚至出现“在同外国人交往中，不顾国格人格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以为教训。”（38）因此，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借以坚定我们的政治方向。其次，要有战胜侵蚀的信心。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有的人从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感到惊慌失措、无所适从。其实，“资本主义思想侵入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对侵蚀保持清醒的认识，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并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不懈的斗争，“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39）

陈云独具特色的对外开放思想是精辟的、一贯的、坚定的，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搞好对外开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阴师范专科学校）

注释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

8)(29)(30)(31)(32)(33)(34)(35)(36)(37)(38)(39) , 《陈云文选》第 3 卷 , 第 52、276、265、248—249、248、276、252、277、277、277、251、280、311、332、355、276、250、252、281、281、262、281、262、267、338—339、354、355、338、347、354、355、332、332、347、347、332—333、352、355 页。

(11) 《陈云文选》第 2 卷 , 第 152 页。

陈云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 论述及其意义

胡代光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在长时期内，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方法，正确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陈云讲道：“一九四二年我养病的时候，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什么是实事求是？陈云作了言简意赅的解释，“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但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陈云再三提出的方法就是“交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大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怎么办？我看可以作点假设，从反而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比较”，就是“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国外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楚情况，把事情办好”。

陈云关于工作方法上要“交换、比较、反复”的以上阐述，真是充满着唯物辩证法。因此，他总是强调，任何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句教言已久为广大干部所熟悉，并由实践证明了它是在面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如何胜利完成我们的工作任务的指针。

当前，我们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我认为，重温陈云关于“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方法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工作原则，对于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如何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从而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阔步前进，将会有所启迪，有所助益。

鉴于1993年10月以后不到两年时间内，中央召开了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再三强调和表明，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现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又已召开，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求“切实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因而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就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各界人士、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和议论的重点和热点。诚如有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感慨他说：“中央对抓农业有诚心，有决心，基层也有信心了”，还有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得好：“关键是落实难，应该彻底与‘口头农业’、‘会议农业’告别”！因此，本文专就陈云关于农业基

基础地位的论述作一些解说，这也是陈云坚持实事求是，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方法于农业领导方面的成功典范之一，所以，陈云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论述，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

二

“食为民天”，这是我国几千年前问世的《神农书》中提出的光辉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也早就论证道，“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一开始就属于农业生产，所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1960年初，在总结1958年开始的我国“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进一步确定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

陈云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期间，对于农业基础地位及其意义进行了全面、系统、具体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4个方面：

一、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

陈云举例说：“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农业歉收，都使第二年的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建投资下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随后，由于粮食供应出现4次比较严重的紧张状态，到60年代初，陈云再次指出：“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因此，陈云作出了“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些科学论断，陈云针对当时基本建设过热病，断然指出：“我们现在这样大的建设规模，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

二、农业的关键是粮食。

陈云对为什么要重视粮食工作作出了精辟分析。第一，粮食同全国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第二，“粮食分配同农业生产有直接的关系。……农民注意生产，同时又注意分配，分配和生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第三，“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的最重要的物资，现在没有任何物资比粮食更为重要的了。”据此，陈云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讲市场是否稳定，主要的是指粮食局势和粮食价格是否稳定。粮食的局势和价格如果不稳定，整个市场物价就不可能稳定，国家建设就无法进行。”(11)“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12)这真是至理名言。

三、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

陈云特别强调，“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这是因为。“老百姓要吃饭穿衣，是生活所必需的，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13)

50年代，陈云提出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有：

首先，要增加农业投资。而且还应增加为了农业的工业（如化肥和化学纤维等）投资；农林牧副渔的投资，都要用在刀刃上。

其次，要进行养猪积肥、治水灾、开荒、改良农具、改良种子、防治病

虫害等来使农业增产；除此而外，陈云着重提出解决农业问题的4个最有效的办法，即是大规模地发展化学肥料，发展化学纤维，治理涝灾，扩大灌溉面积。他认为，尽管推行这四个办法都要花很多钱，但为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这是必要的。

再次，要有效地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陈云明确指出：“用什么办法增加猪的生产呢？除了必须坚持私养为主。公养为辅的方针以外，还必须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负责安排社员养猪的饲料。”“第二，有计划地恢复农村的粉坊、豆腐坊、榨油坊和小集镇的碾米厂。”“第三，适当地提高猪的收购价格。”“第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在各方面帮助养猪社员。”“第五，县级或县级以下应该成立生猪生产指导委员会。”“第六，防治猪病。”(14)1961年，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区进行了农村调查，在他的调查报告中，专门提出无论母猪或者肉猪，私养比公养还有几个好处。(1)私养猪饲料比较充足。(2)私养猪比公养猪长肉多。(3)私养猪比公养猪积肥多。(4)私养猪可以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5)私养猪节约草。至于解决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陈云特别指出，一定要“增加鸡、鸭、鹅，兔子、兔这些不用粮食或者少用粮食的家禽和鱼类的养殖”，而且要注意“调整副食品的季节供应”，多建点冷藏仓库，以便起很重要的调剂作用。(15)陈云50年代末期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时，积极提出：“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必须从生产入手，定出有效办法。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国营、集体、个人三种形式可以同时并行，三条腿走路。”(16)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陈云认为：“城市的蔬菜供应是件大事，我们要千方百计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解决的办法，陈云提出的就是：(1)“大中城市郊区要有足够数量的蔬菜种植面积。”而且，“还必须另有蔬菜生产基地。要以郊区生产为主，外地调剂为辅”(2)“蔬菜种植面积必须有‘安全系数’。这就是说，种植面积要打得宽一些，防备发生自然灾害。”(3)“要合理规定价格，不能‘菜贱伤农’”。(4)认真解决蔬菜的储藏问题，应该分别由农民储藏；机关、部队、学校伙食单位自己储藏；城市商业部门储藏。此外，“在蔬菜旺季腌些菜。也是解决城市蔬菜供应问题的一个办法。”(17)

四、开放自由市场，多办乡镇工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就及时提出，农产品农业副产品不应“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而需要“有另外采购单位（私商）的竞争”，否则“这些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就会减产”。(18)陈云还主张：“许多副业只有放开手让社员分散经营，才能增产各种各样的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增加社员的收入。”(19)陈云认为，对于一部分农产品、农副产品，“我们应该采取自由采购、自由贩运，向不要害怕价格方面一时的一定程度的上涨。我们必须避免那种因为减产而来的暴涨。销售价格必须服从收购价格，只有大量增产，才能保持整个市场价格的稳定。”(20)

所以，陈云是农村开放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农村自由市场开放的好处有三条：(1)“从前因为市场管得太死，农民已经停止生产的东西，现在恢复了生产：过去生产少的，现在增加了生产。”(2)“城乡的物资交流活跃了。”(3)“开放了小土产自由市场，‘将’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军’”。但是，“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并不是一点管理也不要了，还需要有管理。要组织集镇上的市场管理委员会。当然不是像从前管得那么死。

不该管的完全不管，该管的还是要管。”(21)“各地应该加强对自由中场的领导，促使其正常发展。”(22)

同时，陈云还强调：“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原有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如果已经改行，应该让它们‘归队’，恢复生产。”(23)1979年，陈云又特别指出：“农民是大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现在社办工业很多，小城镇工业也很多，办这些工业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原因就是要就业，要提高生活”，(24)1985年，他再次强调“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25)

以上所概括的陈云论农业基础地位及其意义的观点和主张是50—60年代期间提出的，那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而又遭到严重挫折的时期。陈云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况和碰到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提出的重要的观点和切实的主张，对于巩固建国初期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巨大成就，克服当时经济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严重困难，扭转被动局面，起了众所周知的重大作用。

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我们重读陈云的以上论述，深切感到多么中肯，多么重要，仍然具有现实意义。34年前，陈云总结道，“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26)这个论断直到现在，我们也不应忘记，否则，我们要实实在在地实现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从而在跨入21世纪后达到预定的伟大战略目标，将是难以想象的。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16年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而我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1978—1984年。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年产量从3047.7亿公斤增长到4073.1亿公斤，增加1025.4亿公斤，上了一个大台阶。我国大陆可耕地只占世界可耕地的7%，却解决了我国占全球22%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这种情况已为国际社会所瞩目并给予赞扬。

然而，从1985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却出现5年徘徊，到1989年，粮食总产量仍停留在4075.5亿公斤这个水平。1990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89年增长了386.9亿公斤，达到4462.4亿公斤，迈开了一大步。但1991年开始，又是4年徘徊，1994年粮食总产量为4445亿公斤，比上年减产120亿公斤；而1991—1994年这四年中，我国人口增加了5600万，因此，1994年人均占有粮食不过371公斤，比1990年还减少20公斤，更低于80年代上半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400公斤水平。

从总体上看，199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订11.8%，其中农业增加值增长3.5%，工业增加值增长18%。这些增长率之间比例关系是否最适度，有待经济计量学家进一步加以研究。这里，我只转引李鹏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同高速度发展的工业以及城乡居民生活不断提高的需求相比，还很不适应，农业基础脆弱，抗灾能力不强。”

李鹏进而对 1994 年全年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高达 21.7%（其中食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大约有 13 个百分点左右）的原因之一解释为：“农业投入不足，耕地面积减少，一些地方不同程度放松了粮食生产和‘菜篮子’工程，去年又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某些农产品供应偏紧；城乡人民生活改善和城市流动人口增加，又扩大了对农产品的需求；再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导致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这些分析论点很是有说服力的。

历史经验真是值得总结和记取。33 年前，为克服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陈云曾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27）今天，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当然远胜过三十多年前了，目前，12 亿人民的要求不只是吃饱、穿暖。而是还要吃好、穿美。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对当前我们前进中的困难的克服，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大力发展农业，保证农产品稳定增长，是控制物价上涨幅度，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江泽民强调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一定要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这是因为“一方面，农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产业。经济越发展，全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越大，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越高；另一方面，农业又是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弱质产业。因此，经济越发展，工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持。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客观规律。”（28）按照江泽民的这个指示，我们良是需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现在，中央已制定厂加强农业的各项政策措施，提出了明确的任务要求，我们确应狠抓落实，落实，再落实。最近读报纸，欣悉广东省江门市市长已表示，不管怎样改革，江门市都要坚持“三个不牺牲”的原则，即：“发展工业不牺牲农业；发展乡镇企业不牺牲粮食；发展城市乡村建设不牺牲农民利益。”（29）美哉善策！我衷心祝愿全因各省市都来学习江门市的“三个不牺牲”的原则。并认真落实，功德无量啊！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注释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235、188、235、188、189、236、56、163、194—195、73、125、85—86、16—21、22、126、64—67、5、8、11、23—26、61—62、126，250、350、164、205 页。

转引自《人民日报》1995 年 3 月 6 日第 3 版。1995 年 3 月 3 日第 1 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32 页。

（28）转引 1995 年 2 月 28 日《人民日报》。

（29）转引自 1995 年 3 月 10 日《光明日报》。

陈云农业经济思想初探

谢茹

陈云早从 40 年代抗战时期，便开始参与领导我党的经济工作，在以后长达 40 多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逐步形成了内容丰富而独具特色的经济思想体系，农业经济思想是陈云整个经济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极力丰富的理论内涵。本文试图从 9 个方面进行解读，意在抛砖引玉，以引发理论界和有关部门更为深入细致地学习和研讨。

一高度评价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更为突出。对此，陈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论证：（1）农业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肚子里缺少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2）农业对工业有很大的支持和制约作用。“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一方面，农业是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例如，“去年农业歉收，今年像棉纺织品这样的轻工业生产不能不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农村是工业品巨大的销售市场，打开工业品的销路，主要在于“收购农产品来增加农民购买力”。（3）农业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资金来源，“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4）农业状况决定着国家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小。“基本建设的规模多大？……要根据农业首先是粮食生产的速度来决定。”因为，扩大基建规模所需增加的投资，“除了增加生产资料以外，还必须相应地增加粮食和其他各种生活消费品”（5）农产品是出口换汇的主要物资。陈云曾指出：“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能够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农产品。”（6）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总之，陈云认为：农业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约束力。“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我们前进的后腿”。

陈云不仅从经济而且还从政治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农业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他曾多次谈到粮价是百价之基，粮价波动是引发物价全面上涨最终导致社会通胀的直接诱因，而粮棉的有效供给则是稳定政局稳定人心的一剂良方。如抗美援朝开始后，他指出：“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60 年代经济恢复时期。他指出“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11）。此外，他还从中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出发，说明“农民定天下安”的道理。在 1978 年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他特别强调“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了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12）基于农业在我国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基础作用和重要地位，陈云多次强调各级党委以及各级领导部门都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指出：“农业问题是全国的大事……我们都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六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

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13)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仓禀实而民心聚，农村安而天下定。这是一条普遍存在的客观经济规律，也为我国40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证实。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对推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所起的巨大作用功不可没。因此，对于我们这样人口众多，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任何时候都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今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认真学习陈云有关农业基础地位的理论和教诲，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在农业问题上，统一思想首先是要统一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首先要提高党内的认识，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认识。正如陈云反复强调的那样，只有全党行动一致，才有可能切实解决种种不利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新情况、新问题，才有可能动员社会各行各业的力量，采取有力的措施，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农业的基础地位才有可能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二 中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陈云关于中国农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我国农业基础差、底子薄，农民穷的现状，毅然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从而拉开我国走农业社会主义道路的序幕，对于土改，陈云曾经给予积极而充分的肯定。他在1951年说：“现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关键，就是在新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只有进行土地改革。才能大大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才会“尽”一切力量投资到生产里头去”(14)。陈云还进一步说明带来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实现了土地的地主所有制向农民所有制的转变。这一转变客观上成为在我国农业领域保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条件。

土改后，针对分得土地后的农民因拥有生产资料参差不齐而产生合作意愿，毛泽东又亲自领导了引导我国农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通过从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的过渡，初步描绘出社会主义农业的基本蓝图。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陈云一方面指出合作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大量增产粮食的主要办法，提出“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他说：“那个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可以用整个合作社的力量来保证每个农民的正常的粮食需要，农民就会感觉到有不可比拟的雄厚力量作为自己的粮食后备”(15)。另一方面，他针对当时我国粮食供给紧张，粮食市场基本处于无计划状态，投机好商时常从中作乱的实际情况，指出对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保证我国农业通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的有效手段。在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指出，只有对主要农产品采取计划收购的办法，才能保证国家掌握进行有计划建设所必需的粮食，才能“保证我国农民走向富裕生活的道路，不是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而是经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并强调“取消计划收购，等于放纵私商和富农去操纵农产品市场，农村的资本主义就会发展”。因此，他认为“计划收购是一种使全体农民不受人剥削、都能得到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步骤”(16)。客观地讲，统购统销是在我国当时

农业较为落后的条件下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必要措施，它不仅对稳定市场物价，保证“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起到了众所周知的巨大作用，而且为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为我国农业尽快步入社会主义轨道铺平了道路。

三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农业是基础，农业劳动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是否发挥，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状况的好坏。陈云对此有着深刻认识。他曾语重心长地说道：“如果只照顾国家需要而下照顾农民的需要，就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下利于农业生产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7)也就是说，要妥善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为了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曾提出过许多建议。

首先，在农业税收方面，他主张年景不好时要适量少征，不能把农民压得太厉害了；丰收时，为了以丰补歉之需可适当多征，但也“不能购得过多”(18)。相反“丰收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多留一点，农民也应该多吃一点，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此外，“只向主要农产品征税，凡有碍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和牲畜的杂税，概不征收”；“对于农民群众由努力耕作而超过通常产量的部分不应加税”(20)。

其次，他主张农产品购留比例要合理。他曾指示各地方政府做好“定产”工作，“留粮必须留够；不购买农民的全部余粮，使农民在国家统购以后，还能保有一定数量的余粮；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的现象。”(21)再次，他反复强调要重视比价问题，努力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对于比价问题，陈云注意得比较早，研究得也比较多。建国前后，他曾先后指出：“工农产品比价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同农民的关系问题”(22)；“缩小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23)他还指出，只有维持农产品适当价格，才能保护农民的基本利益。他不仅研究了工农产品比价问题，还指出了合理制定农业内部粮食与经济作物比价的重要性，即“经济作物的提价，必须考虑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比价，防止经济作物提价过多而挤了粮食，以至被迫再提高粮价，造成轮番提价，全面提价的危险”。因此，“在这一方面必须十分慎重”(24)。

此外，为了防止丰收后“谷贱伤农”以及农业自然灾害给农民带来的损失，陈云还提出了粮食储备的观点，论述了政府组织粮食在全国范围内的调运和加强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及具体措施。他的上述观点在50年代初期的文献中多次提及，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展述。通过对这些论述的学习，能使我们体会到陈云对维护农民利益，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高度重视。

历史经验表明：我国的农业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农民问题。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之所以带来了农业和农村面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关键就在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各种不合理负担屡禁不止，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拉大，农业比较利益日趋下降等问题已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多的农民弃农从工、弃农经商。对土地则是粗放掠夺式经营，或根本就是任其荒芜。从粮食播种面积看，1994年已突破16.5亿亩的安全警戒线，只有16.4亿亩。

现在，若不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千方百计调动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势必会影响农村改革的深化，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

四协调工农业发展速度，力求 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陈云一方面认识到，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面貌，必须大力发展工业，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农业是工业化的启动条件，忽视农业只会阻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进行。为此，他始终强调要处理好工农业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态度鲜明地反对借工业化之名一味发展工业而丢下农业不管的做法。1957年，他指出，“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否则“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并强调“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25)结合我国的实际，陈云认为第一要研究的还是重工业、轻工业及农业的投资比例问题，而具体操作上应按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办事。因为“‘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26)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陈云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主持我国财经工作期间，不断把这一思想付诸于实践之中。如1962年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他提出：“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的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材料的分配，要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必须尽可能先照顾农业。”(27)改革开放后，陈云对协调好工农业发展比例问题更为重视，反复强调按比例发展才能促进国民经济以最快速度发展的道理。他说：“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28)，“队长朝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29)。对8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的过热发展，陈云深表忧虑，指出：“这样快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30)

农业的发展速度制约着工业的发展速度。无论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都必须保持农业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才能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比较协调地稳定增长。纵观建国后40多年563经济发展的历史，我国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受制于农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可以说，每每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之时，便是国民经济停滞倒退之日。忽视农业一味追求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所带来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正确处理和协调工农业发展的比例关系，据有关部门研究，人均国民收入在300~1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工农两大产业的增产速度之比一般应保持在3:1之间(31)，具体到我国，以3:1至2:1之间为宜。然而，进入90年代后，我国工农两大产业增长速度的比值已连年突破4的水平，1993年甚至超过5。这种不协调的工业热若不及时降温，同时给农业升温，很可能重蹈历史覆辙。如何在宏观决策上寻求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业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工作中最为紧迫的重大课题之一。

五因地制宜安排农业生产，妥善处理粮食与多种经营的关系

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是陈云指导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贯主张。早在 1951 年他便指出：“我们要把各种庄稼分一下类，调整一下，什么地方适于种棉花就种棉花，什么地方适于种粮食就种粮食”；并说“如果我们把各种作物的耕种面积加以调整，农民的收入就会大大增加。”⁽³²⁾1961 年，他通过对青浦农村的实地调查，再度重申了“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的观点，与此同时，陈云又从我国人口众多，粮食必须立足自给的基本国情出发，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提出要妥善处理农业内部发展粮食生产与发展多种经营的矛盾。在两者关系上，陈云认为，粮食是根本，多种经营的发展只有建立在粮食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出路。这一思想在 60 年代经济恢复时期以及农村改革之后的文献中多次得到体现。如 1961 年，他曾提出：“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³³⁾1962 年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一方面论述了经济作物恢复的经济乃至政治意义，指出：“经济作物不恢复，国家就没有商品保证城市和乡村的供应，国家同农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另一方面论述了粮食对发展经济作物的制约作用，并以粮棉关系为例进行论证，指出“要鼓励农民种棉花，就必须保证棉农有足够的口粮”，否则“棉农吃不饱，他们只好把棉田改种粮食，这样下去，棉花不但不能很快增产，而且还可能继续减少。”⁽³⁴⁾

农村改革开放后，我国粮食供给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即便如此，陈云仍念念不忘提醒全党要重视粮食生产，反复强调“无粮则乱”以及粮食是其他各业之基础的道理，并提出了解决发展粮食生产与发展经济作物的争地矛盾的办法。他说：“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再缩小了”，“增产经济作物只能靠提高单产和利用不种粮食的土地”⁽³⁵⁾。千万“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位”⁽³⁶⁾。对于发展乡镇企业与发展粮食生产的关系，陈云同样坚持以粮为主的态度，提醒全党要注意农民对种粮个感兴趣的问题，指出“无工不富”之声不能超过“无粮不稳”。

总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解决占世界 1/5 人口的吃饭问题，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基本自给。从近几年粮食生产状况看，虽然总产量一直处于稳中有升之中，但因人口及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对粮食需求的更快增长，已使我国粮食供求状况逐年趋紧，综合剩余率越来越低，而较长时间内难以逆转的人增地减之势只会加剧这一状况。因此，我们必须牢记陈云关于粮食重要性以及妥善处理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关系的谆谆教导，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粮食播种面积保持在警戒线 16.5 亿亩上。在此前提下，以提高单产为主攻方向，确保粮食生产总量的稳定增长。同时，努力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拓宽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空间，解决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争地的矛盾。此外，结合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由重量到重质的转变，不断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加大优质粮比重，狠抓粮食产品的多层次系列化的深度加工转化，把粮食生产的重心放在提高效益上来。

六切实增加投入，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促进农业增产

从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大以及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出发，陈云指出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必须在提高单产和搞好水利上作文章。关于提高单产，1957年他曾分析对比了苏、美、日、德等国的农业增产主要途径，提出要借鉴日德等同样地少人多国家大量施用化肥来增进农业生产的办法，说“今后，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相对于养猪积肥和其他积肥办法，他更加提倡大量发展化肥，认为化肥“是农业增产的最快、最重要的一条”（37）。对于水利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陈云早有深刻清醒的认识。他曾多次指出，为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有必要做好兴修水利的工作，并强调水利工作“要积极地做治本工作……要长期地来做”（38）。总之，用陈云的话来讲，“一个是化学工业，一个是水利，这两项，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39）。而大量增加农业生产，无疑又更加有利于吃穿这一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问题的解决。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上，陈云认为对水利和化学工业的投资虽很大，“都要花很多钱”，但“这是必要的”。陈云在强调国家加大对这方面投资的必要性的同时，还要求“地方要切实掌握资金的投放方向”，指出：“地方资金投放的主要方向，也就是地方大部分的钱。应该投向与发展农业生产有关的方面，例如化肥工业、兴修水利。可垦荒地的开垦等”（40）。

我们常说，农业是基础，投入是关键，切实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是确保农业基础地位的基本物质保障。然而，当前对农业的投入状况却非常的不尽人意。从农业基建投资在国家基建投资中的比例来看，这些年一直是居下不上。据农业部统计，投资比例最高的1978年为10.3%，此后一直压低，1987年和1988年压到3.3%，1989年回升为4%，而1993年又跌到2.2%。再从金融部门对农业生产的贷款来看，也是有减无增，1993年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对农业生产的贷款减84亿元，减幅达23%。农业投资的减少已造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老化失修、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功能薄弱、农用工业生产每况愈下等严重问题，并已成为农业向深化发展的潜在制约因素。因此，必须坚持国家投入向农业倾斜的政策倾向，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提高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财政预算内资金、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投资对农业的支持作用。至于对农业的投资中应包括农用工业的观点，也是陈云早在50年代中后期便已提出的。

七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必须加强计划管理

陈云所讲的加强对农业的计划管理，主要是指国家站在全局综合平衡的高度对农业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安排。首先，计划部门的注意力不能只放在工业和基本建设上，相反，“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上”（41）。其次，计划指标的订立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广泛调查和反复研究之后制定出来，也就是说“要研究农业的基本情况。计委、经委、农办要扎扎实实地做调查，认真研究农业生产的各种条件，在此基础上拟定农业生产指标。”（42）再次，要学会运用辩证法来安排计划指导生产。陈云曾借用毛泽东提出的“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的辩证思想，指出农业计划方面

也应本着“争取快，准备慢”的思想态度和工作态度，“凡是有利于农业增产的，我们都要尽力去做；但是，也要考虑到，工作都做了还可能不够快，所以要做慢的准备。”(43)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方法正是陈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农业方面的集中体现。

鉴于农业的特殊产业地位，陈云还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农业的计划指导，尤其是在农村因实行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改革而赋予农民很大程度上按市场变化情况自由安排生产的权利之后，更应注意国家对农业生产的统一计划指导。1981年，陈云曾态度鲜明地指出：“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包产到户以后，计划并不是不要了”；“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44)，否则，与国家、与农民都有害而无利。陈云的这一观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值得深思。

由于农业尤其是粮食在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和农业生产本身具有的周期长、风险大、社会比较利益低的弱质产业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不可能完全按市场经济的有关法则办事，任凭市场经济规律来决定农业生产的取舍。要看到，即使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也要履行一定的宏观调控职能，实施对农业的计划指导和政策扶持。世界上没有无政府调控的市场模式，只有不同的政府调控倾向的市场模式。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对转轨时期的中国农业尤其如此。而从实质上讲，政府利用经济手段对本国农业进行宏观调控也是国家加强计划性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在发展农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特别加深认识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学习陈云计划经济思想的最大现实意义之一。

八号召工业要支援农业， 城市要支援农村

陈云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初期的有关文献中。他曾在 1954 年明确提出了全国市场的领导必须统一，城乡市场必须互相支援的基本观点。其中，城市市场对农村市场的支援就表现在“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应尽光供应农村”(45)。次年，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更进一步指出：“国家发展工业生产的计划，将尽可能地照顾到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46)。这些建议和指示标志着陈云关于城市要支援农村，工业要支援农业的思想的初步形成。时至 60 年代，他的这一思想更为成熟也更为明确化了。在具体分析了我国几次粮食供应紧张均因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超过了农业的实际承受负荷而至之后，陈云指出：“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因而“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47)陈云的这一观点实质上正体现了他把马克思关于“农业劳动不仅是农业范围的剩余价值的基础并且是其他一切劳动部门所以能够独立化的自然基础，从而是各个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基础”(48)这一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理论风范，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在此认识基础之上，陈云非常明确地提出“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的口号，提出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要以农村为市场，增加化肥、农业机械等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

陈云早在 60 年代初便已注意到的问题，在 30 多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存在。

据农业部统计资料，1994 年仅 1—9 月份，化肥生产减少 3.8%，农药生产减少 11.5%，农膜生产减少 24.4%。小型拖拉机生产减少 428%。农用工业生产的不景气是造成农用生产资料供应紧张，价格猛涨的恨本所在。再从工农业相互关系来看，这些年农业通过价格“剪刀差”等隐蔽方式继续向工业转移资金的情况并未得到有效抑制。如果说，建国初，为了集中力量建立我国的工业体系，国家采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抽取农业利润来筹措建设资金的做法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工业体系已经建成，工业积累能力远远高于农业的情况下，工业继续靠羸弱的农业来“哺育”，显然有悖常理。要解决农业比较利益低这一制约农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恐怕还必须对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即创造条件，适时地实现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重大战略转变才行。

九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尊重价值规律，发展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陈云农业经济思想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陈云讲计划经济，但并非只讲计划经济，他同时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洞察秋毫。他关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许多精辟论述，独具理论风格的商品经济思想至今闪烁着光辉。在农业经济方面，他早在 1948 年任东北财经委主任时便指出：“在禁止私商囤积的同时，允许粮食自由流通”，这样有利于“缺粮区粮价下跌或趋于平稳，余粮区上涨，全东北形成适当的市场价格”（49），这充分体现了陈云尊重价值规律指导农业经济的思想。建国后，陈云又一再强调，我们“要搞的是经济，不要搞‘政治经济’”（50），必须按真正的经济原则办事，而不是只靠单一的行政手段。对粮食，虽从稳定市场，保证“一五”计划顺利进行之大局出发，提出了统购统销的建议和具体措施，但却再三强调“征购要采取公道的价格”，要严禁收购中的压级压价行为。同时，他还提出了市场建设的初步构想，即在城市配给后，“要允许有一个地点作为交易场所，在我们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进行交易”（51）。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针对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所带来的产品质量差、产销不对路等严重后果，陈云义及时提出“对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应该有适当的变更”，即“全国工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仍是按计划生产，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52）。如在农业方面，诸如小土产之类的农副产品的生产、收购应完全自由放开。他指出这有利于农民按市场变化要求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收入；同时，有利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更为重要的是，陈云认为，放开农村小土产自由市场，有助于暴露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按行政路线经商的弊端。他通过对比商人按经济路线经商而带来的“环节少走直径，所以赚钱多”之后果，深刻地指出：“这不仅暴露了按行政路线经商的弊端，也反映了我们过去那一套机构需要改变，不改变不行了。”（53）

随着农村改革之后的粮食供给状态的实质性改变，陈云又进一步提出了要逐步放开粮食市场的思想观点，他说“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比如对粮食。五十年代如果完全按价值规律办事，那末，四川的大米运到上海，就应该比上海产的大米售价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那样做。现在情况不同了，粮食比过去多了，有的地方还暂时

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在这样情况下，就必须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前提下，把粮食拿到集市上交易、允许集市上有不同价格如果现在再照搬五十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54）。从这段论述中可以发现，陈云发展我国农村商品经济的思想观点和具体措施，同他的其他农业经济思想一样，都是建立在“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立场之上的，充分体现了陈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 * * * *

从上述陈云农业经济思想的9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贯穿其中的两个基本点：第一，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切实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农业发展的力量源泉。第二，基本立足点是发展中国的农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陈云农业经济思想的这两个基本点不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效地指导了当时的农业发展，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毋庸置疑，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前进过程中困难与挫折在所难免。但我们坚信，只要坚持这两个基本点，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11）（12）（13）（17）（19）（24）（25）（26）（27）（28）（29）（30）（33）（34）（35）（36）（37）（39）（40）（41）（42）（43）（44）（47）（52）（53）（54）《陈云文选》第3卷，第192、53、194、79、157、236、194、73、71、54、56、246—247、208、251、248、351、157、204、306、280—281、79—80、79—80、85、76、214、193、305—306、163—164、12—13、24、337页。

（14）（15）（16）（18）（20）（21）（22）（23）（32）（38）（45）（46）（50）（51）《陈云文选》第2卷，第143、90、97、257、118、119、140、277、261、96、108、278、17—18、194、142—143、141、253、279、131、215页。

（31）转引自《农业经济文稿》1989年第9期。

（48）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42页。

（49）《陈云文选》第1卷，第372页。

陈云农村经济思想与发展 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杨大平

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仅就陈云的农村经济思想与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进行一些初步的理论探讨。

一 陈云农村经济思想与我国 农村经济体制变革

陈云农村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同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历程密切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他亲自主持或参与决策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他的农村经济思想和改革主张对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

粮食问题在陈云农村经济思想中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农业国”。“粮食工作是一项关系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的工作”。解放初期，新生政权在经济上就面临着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局面，全国粮食总产量每年估计约为 1000 亿公斤左右，而农民缴纳的地租、受到的高利贷盘剥和其他榨取，折合粮食不下 500 亿公斤。粮食的奇缺为投机资本家哄抬市场物价创造了条件。在国家财政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陈云亲自领导指挥了反击投机资本家哄抬市场物价的斗争，采取的措施就是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掌握粮食以稳注城市，掌握纱布以稳住农村，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的兴风作浪。这一措施迅速扭转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取得了新中国经济战线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1953 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抗美援朝的胜利，我们面临着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陈云全面分析了国内政治经济情况，认为大规模经济建设最关重要的问题是粮食。不妥善解决粮食问题，就不能保障人民生活，稳定市场物价，安定社会秩序，保证计划实现。陈云形象地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经过权衡利弊，陈云向中央建议：一定要采取彻底的办法解决问题，即对农民实行粮食的计划证购，对城镇消费者实行粮食配售，简称“统购统销”。这一重大决策，立即得到中央的赞同，正式决定在全国实行。

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对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不仅对维持整个市场物价的稳定，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顺利实施是最有力的保证，而且对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向计划体制过渡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以前，我国的农村经济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农产品极不稳定，在体制上同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规划是不衔接的。“统购统销”政策，限制了农民个体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并通过一定的价格，保护农民的利益，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

大家知道，农业合作化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由陈云直接主持的。但陈云关于农村经济的思想。对农业合作化的形成与发展也是有直接影响的。1953年10月，陈云指出：“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既包括对农产品的分配关系，也包括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1955年7月，陈云又说：“我们发展农业，大量增产粮食，主要是靠农业的合作化。就是说，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显然，农业合作化是我国农村经济步入计划经济体制的标志。

1958年开始的国民经济“大跃进”，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促使陈云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经济体制集中有余，灵活不足，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集中劳动、集中经营。对此，陈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961年8月，陈云在《青浦农村调查》一文中指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私养比公养好。农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要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让农民自己经营。农村经济体制过分集中的问题事实上反映了计划工作的缺陷，陈云讲：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要研究农业的基本情况，扎扎实实地做调查，认真研究农业生产的各种条件，在此基础上，拟定农业生产指标。这期间，为解决体制过于集中同农业生产的矛盾，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陈云支持并向党中央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建议，这一政策建议为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陈云指出：这场改革的意义，不下于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实质是解放生产力。但同时他又告诫我们：“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包产到户以后，计划并不是不要了。”他特别关心粮食问题。1980年12月，他讲：“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1981年12月，他又说：“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再缩小，再缩小不得了”。1985年9月，他进一步说：“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11)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证明了陈云的上述意见是正确的。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无疑对于我们更深入地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陈云农村经济思想中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

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在陈云农村经济思想中占有突出的重要位置。我国农村经济区域面积大，地区差别明显，农业条件、气候、产品结构等复杂，单纯强调计划与市场那一方面，都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思想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

（一）农业合作化前后，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

农业合作化以前，我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农村多种所有制并存，个体农民占主体地位，市场关系复杂，个体商贩和国营、集体商业争夺农产

品市场。这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市场，培育国营和集体商业组织，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增加农产品产量。因此，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思想的重点是以经济手段控制市场，以行政手段增强计划。早在解放前夕，陈云就反对粮食贸易的地区封锁，认为：“这种封锁，无论对农民，对城市的劳动人民，还是对国家经济建设，都是有害的”（12）。50年代初期由他领导的平抑物价，控制市场的战役，更是利用经济手段控制市场的成功范例。他指出：“粮食、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之大小。”（13）

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包含了陈云农村经济思想中关于计划与市场辩证关系的丰富内容。统购统销无疑是强化了农村经济的计划性，但是这种计划性也要发挥市场的调剂作用。因此，陈云主张在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设立粮食交易场所，在政策监督下进行交易，以满足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价格是统购统销政策的重要方面，合理的价格既是保护农民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自觉运用和修正市场机制调控粮食供求矛盾的重要手段。陈云认为：“征购要采取公道的价格。什么是公道的价格？并不是统统跟着黑市走，而是既对农民合适，也对我们有利。”（14）培育农村国营和集体商业是我国农村经济走向计划经济的必然趋势，但也不能不重视私商在沟通城乡交流方面的作用。陈云指出：“私商难于下乡，合作社……一般土产品和农业副产品也存在着阻塞现象。”（15）可见，即使在我国农村经济逐步走向计划体制的过程中，陈云也是相当重视市场规律作用的。

（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

1956年9月至1962年3月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而又遭到严重挫折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确定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陈云对这一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重要观点。陈云指出：“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16）。这一分析是陈云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一个富有创见的构想。既然有自由市场就存在着竞争，否定竞争的作用不利于农业生产。陈云说：“市场管理办理限制了私商的采购和贩运。这些办法使农产品、农业副产品实际上成为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的竞争。”（17）因此，要放松市场管理，依靠自由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来稳定市场价格，对自由市场不该管的完全不管，该管的还是要管。但随后而来1958年“大跃进”却使陈云的很多正确主张没有得到贯彻。

“大跃进”失败后，国民经济被迫转入调整阶段。陈云认为，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是农业，应当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陈云提出的果断措施概括说就是从计划和市场二方面入手，一方面强化计划性（集中统一），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持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把市场搞活。他指出：“没有相当的工业品供应农村，没有等价交换，单靠政治动员，是难以持久的。在相当范围内

的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是有利的”(18)。“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把自由市场管起来”(19)，打击投机倒把活动。陈云提出的计划和市场双管齐下的措施，对于取得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

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与发展成为经济工作的两大主题。在新形势下，他的计划与市场思想有了新的发展。陈云形象地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20)陈云尖锐地批评了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不要计划的观点。他认为像粮食、蔬菜、养猪等这些关系到10亿人吃饭的重要农产品不能没有计划，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减少。当然在改革开放时期，也要注意提高计划工作的质量，“过去要计委定多高的速度就能定多高，要百分之十就是百分之十，要百分之二十就是百分之二十。这怎么行呢！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21)计划和市场并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机的统一。陈云说：“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指导性计划并不等于市场调节。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22)陈云关于改革开放时期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推进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三陈云农村经济思想对发展 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现实指导意义

陈云农村经济思想是在我们党具体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形成和发展的，其本身就凝聚着在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很多成功的经验和教训。研究陈云农村经济思想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科学地总结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指导今天我们所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认为，陈云农村经济思想对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指导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

把发展农业当做基本国策是陈云一贯的主张。早在1962年2月，陈云就指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23)农村经济体制刚开始改革的1980年12月，陈云又指出：“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24)在他看来，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同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不矛盾，促进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应该成为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遗憾的是，我们在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度过分的重视“无工不富”而忽略了“无农不稳”，对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政策上、体制上没有给予足够的保护，使我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长期处于徘徊状况，至今仍是国民经济中最弱质的产业。学习陈云农村经济思想，就是要把发展农业当做

基本国策来认识，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矛盾。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陈云农村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不管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如何变化，计划与市场的矛盾都是始终存在的。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从整体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还要不要计划，回答仍然是肯定的。当然，在新形势下，必须赋予计划与市场关系以全新的内容。从计划来讲，应该实行更高层次、更权威性的计划，这种计划项目不一定很多，但应有足够的强制措施以保证其实施，对于有些事关全局的农业项目还应该采取法规性质的办法，比如，用法律规定农田保护面积、粮食种植面积等，以保证基础农业的稳定发展。从市场来讲，要建立和完善农业市场体系，包括农产品交易市场、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农产品期货市场等，通过市场调节，逐步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使农业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现代产业。总之，我们要加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研究，提高计划工作水平，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重视保护农民的利益。

保护农民利益同发展农村市场经济是一致的。陈云曾反复强调过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性。建国初期，为解决粮食调运问题，陈云主张宁肯国家多负担运费，也不能就地与农民竟卖，造成谷贱伤农的情况。60年代初国民经济那么困难，陈云仍主张少收购一些农产品，给农民多留一些。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多种经营发展很快，农民收入来源实现了多样化，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但仍然要看到，同非农产业相比，农业的比较利益仍然偏低，城乡收入的“剪刀差”还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仍应重视保护农民的利益。然而，在推进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时常出现像“白条”、农用物资“掺假”等等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这种现象如不制止，将严重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应切实重视保护农民利益，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促进农村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四）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力量。

依靠科技力量发展农业是我国农村中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陈云早在1957年9月就指出：“大规模地发展化学肥料，这是农业增产的最快、最重要的一条。……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不在开荒。”⁽²⁵⁾当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国农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相比之下，我国农业的科技含量一直偏低。目前，我国农业的科技含量在35—40%，比发达国家平均70%以上的比例。差距是很大的。所以，研究陈云农村经济思想，就要把“科技兴农”作为发展农业的首要问题来抓，制定切实可行的农业科技政策，抓好重大农业科技项目的研究，抓好农业科技的普及工作，逐步提高我国农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

（五）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特别注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是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就强调：“农业方面投资，也要用得适当。农林牧副渔的投资，都要甲在刀刃上。”⁽²⁶⁾现在国家正在采取措施，逐步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用于农业的资金投入量是比较大的，如何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就成为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重要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60年代国家支农资金统一由农业银行监督管理，效果就好一些。现在资金来源渠道较多，管理权分散，管理的难度也增大了。所以要很好地研究农业资金的管理问题，以稳定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质量。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

注释

(12)(13)(14)(15)《陈云文选》第2卷，第130、208、207、276—277、14、59、212、248页。

(11)(16)(17)(18)(19)(20)(21)(22)(23)(24)(25)(26)
《陈云文选》第3卷，第72、170、213—214、305、208、306、350、13、5、197、202、320、310—311、350、210、281、79—80、268页。

学习陈云农业经济思想的体会

郭威

陈云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于发展我国农业的问题，紧密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阐述了许多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性意见，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农业问题再次被人们关注的今天，学习陈云的农业经济思想，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落实中央加快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切实解决农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学习陈云农业经济思想，牢固地树立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指导思想

建国以来，陈云虽然不直接分管农业工作，但他站得高、看得远，始终十分重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他对毛泽东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这一重要指导思想的形成和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落实，做出了突出贡献。早在1951年他就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以前还要进口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现在虽然比过去好多了，但是，发展农业仍然是头等大事。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1962年又说：“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要“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指出：“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同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这些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把农业搞上去，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丰富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才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才能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陈云在这里不仅把农业的基础地位，提高到了决定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稳定不稳定的战略高度，而且还提高到国家政治生活会不会乱的政治高度。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为了保证农业的基础地位，陈云在实际工作中特别强调：“‘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他之所以把农业放在发展经济的首位，其一，因为农业是人类生存之本、衣食之源，是社会生产和其他活动的起点。其二，在于农业生产力状况决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速度、规模及其所能达到的水平。其三，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巨人口多，耕地少。”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表明：忽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不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而片面地一味强调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迟早都将面临工业发展停滞，结构失调及农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的问题。它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停滞、振荡、损失，迫使人们去重新认识农业和加强农业。

同“农轻重”协调快速发展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业与农业发展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陈云指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

就是最快的速度。” “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与工业比例失调。” “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 近几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农副产品供给偏紧，物价上涨幅度过高等问题，尽管有多方面原因，但工农业比例的连续失调、资源分配向非农产业的不断倾斜，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可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工农业发展速度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也是一条经济规律。人们违背了它，是要受到惩罚的。

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核心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当时的情况是：农业不但很难向工业提供愈来愈多的原料和积累，甚至连农民的基本需求也难以维持。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在 1978 年指出“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 “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 (11)事实上，农村改革正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的：在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连续多年调减粮食征购基数；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并相应减免贫困地区农民的税收；增加农业投资并严格控制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从此出现了农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迅速增加的可喜局面。农民收入增加以后，不仅通过再投入使农业获得了持续发展，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而且还将部分收入投向非农产业，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非农产业迅速扩张起来，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今天，我们学习陈云农业经济思想，首先要牢固地树立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所谓“牢固”，就不是“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又往往个要；”就不是“说起来重要，一到资金、物资的分配上就被挤掉”；而是要像陈云那样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把发展农业真正当成头等大事来抓，而且一抓到底。其次，要深化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要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就全国总体来说是如此，对各个地方来说也是如此；在农业社会是如此，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也是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了加强，农业的发展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不时地出现忽视农业的情况。特别是近一年来，有些地方削弱了农业的基础地位，部分地区粮食和经济作物减产，农产品有效供给减少，粮食和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拉动了整个国家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说明，解决 12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全党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我们要帮助一些人走出这样一种怪圈：当农业出了问题，经济生活运行不正常、社会不大稳定时，大谈农业基础；当农业形势好，经济生活运行健康、社会较为安定时，渐渐又淡忘了农业。我们要把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农村经济发展如何，农民收入增加多少，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工作成绩的首要内容。总之，落实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尚须多方面的努力。

二学习陈云农业经济思想，走一条

符合中国情况的农业发展道路

早在 1957 年，陈云就明确指出：“在农业生产方面，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型的国家。苏联和美国地多人少。”“中国是地少人多，除去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以外，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只占有全国百分之四十的土地。”“今后，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不在开荒。”(12)这就是说，中国“地少人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走依靠科技来提高单产、增加总产的道路。这同毛泽东曾说的“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和邓小平讲的“农业最终要靠科学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50 年代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还将近 3 亩，到了 90 年代人均耕地已下降到 1.25 亩，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的增产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科技进步。据世界粮农组织分析预测，未来 20 年为满足世界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新增部分的 80% 要依靠科技投入来实现。《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研究》课题组提出，培育良种是我国挖掘单产潜力的主要途径。如果今后每年投资 1.3 亿元进行品种改良，我国粮食单产可大幅度提高，即使粮食面积不增加，粮食总产仍可翻番。

依靠科技进步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必须有各级政府的强力扶持，必须全面增加对农业的投入。陈云曾指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同策。为厂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13)“对于农业方面的投资，也要用得适当。农林牧副渔的投资，都要用在刀刃上。”(14)这不仅是因为只有投入才会有产出，更为重要的是，农业是一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大、自身比较利益低的高风险、基础件的弱质产业。其弱质性主要表现为：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物质，受气候影响特别大；生产经营规模小；土地利用率低，品种规格简单；报酬呈递减趋势；投资回收周期长；需求弹性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局限性大，等等。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效益低的弱质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要参与市场竞争。但在市场竞争中，它又不能被淘汰和削弱。这些特点决定了政府必须给予农业特别的保护和扶持。从长远来说，这种保护和扶持最重要的是增加投入，并且要形成一种投入保障机制。

三学习陈云农业经济思想，在农业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狠抓落实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陈云的全部实践活动和著作中。这也是他的农业经济思想的精髓。为了做到实事求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他认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关键是“弄清楚全面情况”。他说，“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比如，要解决猪肉供应紧张和猪的增产问题，若不管饲料、猪仔的来源，不管价格高低，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饲养，而是临时乱抓办法，那就永远也做不好这一工作。”(15)陈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全面弄清真实情况，他经常亲自深入基层和农户，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例如，1961 年他在青浦农村调查中，不满足于听汇报。

开座谈会，自己去农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他还把在青浦县了解到的情况，同相仿的嘉兴、苏州、萧山无锡等县的情况做了比较。最后，自己亲手写了三个调查报告和一封信，交给了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他在调查报告中通过算帐和大量事实，提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当时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实事求是地解决农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陈云不仅自己亲自到农村调查研究农业问题，还指出：“中央所有部委的负责同志，都来研究一下农业问题，是很必要的。”“不仅农、林、水各部要研究，工、交各部要研究，财、贸各部要研究，而且文教，政法、外事各部也要研究。”(16)“计委、经委、农办要扎扎实实地做调查，认真研究农业生产的各种条件。在此基础上，拟定农业生产指标”(17)。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六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18)今天。重温他的这些教导，倍感亲切。

陈云指出，“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当然，凡是看准了的确实有效的办法，就要集中统一，全力以赴。”(19)当前，我们在中央“统一思想，总揽全局，加强协调，扎实工作”方针指导下，把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落到实处，首先要狠抓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的“八个到位”和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农业的十项措施。要像陈云那样，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狠抓落实工作。对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很紧，要全力以赴。具体说来，第一，要统一认识。增强各级干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据权威部门测算，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农民纯收入至少需保持年增长5.3%以上。可见，时间是十分紧迫的。第二，要创造性地工作，在了解行情，摸清地情和吃透中央方针政策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拿出充分体现当地实际的具体化了的贯彻落实方案。第三，要坚决反对弄虚作假行为。大兴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目前，弄虚作假行为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又有所抬头。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共查出统计违法行为7万多件，其中，虚报、瞒报、伪报、篡改统计数据的达2.03万件，占总违法件数的27.4%。这些弄虚作假行为严重地干扰、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损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危害着我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第四，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普遍建立健全群众性农民组织，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进一步调动和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这是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任务，推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只要做到了这些，农业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就一定能够得到切实解决，党在现阶段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方针政策就一定可以得到贯彻落实。

(作者单位：中共内蒙古区委党校)

注释

(11)(12)(13)(14)(15)(16)(17)(18)(19)《陈云文选》第3卷，第206、205、350、246、246、248、251、246、253、236、79—80、210、268、46、194、213、214、194、206页。

《陈云文选》第2卷，第143页。

陈云的工业布局思想

郑清图

1959年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陈云题为《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文章。陈云在文章中对我国工业布局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也是陈云经济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的“工业区位论”，是工厂选点的理论，虽然有它的科学性，但也是微观的。陈云的工业布局理论，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我国工业布局问题。陈云的论述，除了一些具体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外，其基本精神和原则至今仍是正确的，是必须遵循的。

——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陈云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合理地布置工业生产力，是基本建设中具有长远性质和全面性质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做长期打算、整体部署，只顾眼前方便，零敲碎打，是不可能解决得好的。我们在进行工业布局的时候，必须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使目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使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

这一段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性论述，就是陈云的工业布局思想。

陈云就当时人们最关心的、实际上是有争议的3个问题作了分析，并给出答案。这3个问题是：一、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首先应该从全国范围开始，还是从协作区或者省、自治区开始？二、企业的布点是集中一些好，还是分散一些好？三、新建企业应当是大型的占多数，还是中小型的占多数。陈云认为：建立工业体系只能首先从全国开始，然后才是各个协作区，再后才是一些有条件的省、自治区。在现有大中城市根据可能和需要新建或者扩建一些企业，可以利用现有的基础，有它方便的地方，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多数企业应该适当分散地建设在中小城镇或者有矿产资源的地方。我国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大企业作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可能使我国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为了争取速度，更好地适应我国建设的需要，应该是多建和先建中、小型企业。某些大企业的建设，也要尽可能采取从小到大、分期进行的办法，以便能够及早投入生产，取得建设经验，培养技术力量，并且为今后的发展准备条件。

陈云指出：“根本改变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和地区分布不合理的状况，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努力。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就要求重工业、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各个部门，特别是重工业的各个部门能够互相配合，要求燃料动力工业、原材料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能够保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要求农业能够提供比较充分的剩余产品。这显然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解决的。”

因此，他要求各省、自治区应该从全局观点出发，适应全国和当地工业建设的要求，根据自己的特点，正确规定本省、自治区的建设任务。如果不考虑本地区的条件和经济特点，勉强去办那些难以办到的事情，而不积极去办那些可以办到的和在全国范围内迫切需要办的事情，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现代大工业不能没有分工和协作，因此，他告诫地方和部门，对于企业

的建设不要贪大求全；在一个省、自治区以内，企图建立完整无缺、样样都有、万事不求人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不切实际的。

陈云还指出，企业布点的集中与分散，不仅是工业内部的问题，而且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我们在进行企业布点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的要求。如果能够把新建企业适当地分散在全国广大地区，对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

每年要对建设项目按轻重缓急排队，也是陈云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他说：“如果说工业布局是基本建设的战略部署，那末，每年建设项目的排队，就是实现战略要求的战役部署。”他提出，基本建设项目要进行统一排队，避免盲目增加建设项目，扩大建设规模；安排建设项目，要保证重点，照顾一般，避免片面性；还要注意重中有轻、轻中有重，具体分析，才能安排妥当。“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在进行工业建设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生产的各个环节，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交通运输、商业设施、城市建设、职工住宅、生活服务等等方面的配合，切不可只顾一个方面、忽视其他方面。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对经济建设中的问题都要进行具体分析。”

以上所引述的，就是陈云工业布局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些话虽是 1959 年说的，但在 1995 年的今天，它的基本精神照样切实可行。除了由于实际情况变化，我国已决定不搞行政一级的经济协作区、也不要求省一级搞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问题外，其他方面碰到的问题还是一样的。应该说，这些问题我国至今并没有很好解决。比如，各地争上项目、分散布局、重复建设问题，自“一五”以来已经发生了多次，直到现在也还严重存在着，使许多可以避免的、甚至是重大的损失未避免。这同不认真研究布局问题，没有制订出相应的政策、法规，显然是分不开的。

二陈云和“一五”工业布局

陈云的工业布局思想，是他对我国“一五”时期工业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奠定我国工业化基础所作的精心安排。

我国“一五”计划是在陈云、丰富春主持下制定的，“一五”的工业布局是合理的。以“156 项工程”为中心的 674 个工业项目建设，以及配套项目的建设，使我国的工业布局迅速展开，为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基础。这些项目在地区布局上，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做这样的部署，是费了心思的。当时，着重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1）就资源。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要摆在矿产资源丰富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企业，要摆在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附近。如在建设鞍山钢铁公司的同时，把一大批机械加工企业摆在了东北地区。长春汽车城、沈阳飞机城、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加工基地，就是按上述要求建起来的。（2）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改变面貌。在落后地区上一些大项目，可以带动那里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也便于城镇人口就业。（3）军事上的需要。开始编制计划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蒋介石集团还在妄图反攻大陆，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新建的工业企业布置在后方地区。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除了有些造船厂须摆在

海边外，其他都没有摆在敌人飞机可以轰炸到的沿海地区。

按照上述要求布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重要项目的厂址，要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方案，经过反复踏勘比较后才能确定下来。对此，陈云亲自过问，并下去看过一些厂址。有材料说，当时在开辟兰州西固石油化工区之前，共选了19个厂址，最后进行比较选择才定在西固。为此，当时组织了有关部门的人共同参加。称为“联合定点选址”，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与此相联系的是，1954年6月10日，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城市建设应把力量集中在重点项目所在的城市，如包头、太原、兰州，西安，武汉、洛阳、成都等，要求市政建设把力量集中在工业区和主要工程项目的配合上面。1956年2月22日，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会议，拟定了《关于加强新工业区和新工业城市建设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提出了围绕重点建设开展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的任务，并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下达。

原定的“二五”计划是继续“一五”的建设部署。同时按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的精神，增加了对沿海工业的投资和建设项目。现在回头看，在成功的内地建设中虽然也存在问题，如由于地域广阔和交通不便，配套设施跟不上，企业被迫向“大而全”发展，投资效果比较差等，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正如陈云说过的那样，是先解决有无的问题。这个主要目的是达到了，内地的工业基础逐步建立起来了。“一五”时期的工业布局经验，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陈云工业布局思想的现实意义

陈云的工业布局思想，如上所述，是在50年代形成的，那时是我国打工业化基础的时期。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它的现实指导意义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我国仍需继续进行以工业布局为主的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现在，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在广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工业布局已经展开、趋向合理。但也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地区之间，主要是省、市、自治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直接影响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地区优势的发挥；二是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一般加工工业总规模偏大，企业的组织结构也不合理，技术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低。从总体上看，还是投入大、耗费资源大的粗放型经济。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搞好结构调整和提高国民经济素质，走向集约经营，还是要靠陈云讲的有计划安排、整体部署、长期打算、全国一盘棋；在项目建设中统筹安排、前后衔接、保证重点、协作配套；发展地区经济要因地制宜，地区发挥优势要在全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积极去办那些可以办到的和在全国范围内迫切需要办的事情。因为优势是从比较中显现出来的，不比较就无所谓优势，没有全局的观点、发展的观点，也很难说是优势。

其次，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也需要运用计划手段进行宏观调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机制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去生产经营，在竞争中求生存、

发展，有时会与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发生矛盾。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以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生产力布局属于计划调控的内容，将以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为主要手段。它要求产业政策要有很高的科学性，树立起产业政策的权威。要达到这个要求，更需要加强对生产力布局的宏观调控，而且工作要越做越细，包括全国的宏观总体布局、部门布局和地区布局。要进行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工业区规划，要依法管理，要建立数据资料信息库和动态监测等等。

第三，面向 21 世纪，也要求我们搞好生产力布局的总体研究，做好整体部署的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同世界各地的空间距离缩短了，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将对我国的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国内市场也将逐步与国际市场对接；新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趋势，全球性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都对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生产力布局将面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我们只有把握住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有计划地合理地布置生产力，才能未雨绸缪，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注释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 年）》，第 71、71、77、79—80 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 298—299

陈云的企业管理思想

杨建 行文侠

陈云在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长期实践中，不仅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提出许多伟大的创见，而且在微观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对企业管理的研究和分析，是他思想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认真学习。

陈云关于企业管理的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实现企业管理民主化

陈云指出：“企业管理民主化，就是要发挥大家的智慧，靠全体职工办好工厂。”早在1948年8月，陈云就已明确指出：“工人是企业中最大量、最重要的劳动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力量……在人民企业中，一切劳动者都是企业的主人翁。生产、业务管理的进行，一方面须有企业规则（即厂规，店规），同时主要地依赖工人群众自觉的劳动纪律和维护劳动纪律的舆论。因此，在人民企业中，不应也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压迫的方法来管理，而必须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方法来管理。”以后，他进一步指出，在加强领导的同时，“必须认真执行群众路线。真正做到集中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群众的智慧，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企业管理中，“必须依靠职工群众，必须从职工群众中选拔有经验的优秀分子参加领导工作和其他的管理工作，必须健全和坚决执行企业内部各种民主管理的制度。”

陈云还具体设想，这种民主管理制度应包含3个方面：一是由厂长任主席的，由厂长、技术人员和职工各半人数组成的企业管理委员会，负责企业管理领导工作；二是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及时传达工厂决定，讨论生产计划，总结生产经验，对干部实行监督，以及讨论职工在生产和生活中共同关心的问题。三是发挥生产小组会的作用，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有组织的民主，目的是把工厂管好。”陈云是最早提出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中央领导之一，这个观点对我国的企业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企业必须加强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陈云指出：“搞生产没有规章制度不行。”“为了把工厂办好，需要大家按章程办事，工厂中要有厂规，要有各种个人负责制度。还要有检查，成品好坏。做工好坏，管理好坏，都要有检查，该赏就赏，该罚就罚。不这样，就是鼓励坏作风。纵容落后，对于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在全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50年代，陈云仍然强调：“要把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健全起来，调配比较强的干部来担任各级行政领导职务，加强科室，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同时，他还针对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出现的问题明确指出：“党委要集中精力处理重大问题，把党管好。”“要把党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如包揽行政事务，规章制度破多立少，强调政治挂帅不讲物质

鼓励，强调算所谓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不尊重科学、不尊重技术人员等等，统统去掉。”“群众运动一定要有利于加强企业管理而不能削弱企业管理。”

他认为，“群众发动得越广泛，越需要加强领导，越需要健全管理制度，越需要加强责任制。……我们要根据实际的需要和情况的变化，补充和修改原有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规章制度决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凡是合理的，都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凡是实践证明确实不合理的，应该经过群众讨论、领导批准，加以修改。我们要根据群众实践的经验，使各种规章制度逐步地健全和完善起来。”陈云的这一系列论述，提出了加强制度建设、坚持责任制、处理好党政关系和发动群众与健全制度的关系等基本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要认真学习技术，发挥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作用

陈云指出：“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发展工业，这就需要技术。我们有勇敢战斗的精神，这很好，但还不够，还要掌握科学技术，并且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一切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吸收这些有用的民族遗产是我们的责任，采取否定一切的粗暴态度是错误的。”(11)因此，陈云对技术人员的作用做了高度评价，认为：“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门家，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12)技术人员“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是我们的“国宝”(13)。为了更好地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陈云提出“要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方面，“要使技术人员有职有权”，另一方面，对从旧社会过来的“技术人员的过去和现在、家庭出身和本人表现要有一个恰当的看法，主要是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并且“要采取热情的态度，帮助老知识分子改造和提高”(14)。另外，陈云还强调要认真学习技术和管理知识。他说，“我们解放区的同志只会当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我们干革命是内行，但办工厂是外行，这就需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要重视和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15)他要求，“为适应经济建设及企业发展的需要，除原有生产、业务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必须进行思想和作风的改造及培养提高外，一切经济企业同时必须十分注意提拔优秀的工人、职员，把他们培养成为新的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16)陈云的这些重要指示，对于提高对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的认识，加快技术队伍的培养和提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技术发展要洋土并举

企业发展需要各种先进技术。但是，根据我国底子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情，陈云提出我国的技术发展要走自己的道路，并形象生动地称力“洋上并举”。他指出，我们既需要自动化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技术装备，也要有半机械化和手工劳动相结合的装备，“就是既需要洋的，又需要土的。”(17)洋土并举“是一个普遍的长远的方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不同要求，来确定‘该洋则洋、可上则土’的规

划，同时根据需求和可能，来改进洋的、提高上的，并且使洋的和上的适当地结合起来。”因此，他要求技术人员、设计人员“在工作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发挥创造精神”（18），经常地学习理论，研究科学，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技术水平，以恰当地解决“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需要什么洋的和多少洋的，或者需要什么土的和多少土的，洋的要怎样改进，土的要怎样提高，洋的和土的又怎样适当结合”等问题。（19）陈云关于技术发展“洋土并举”的观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地认识洋、土问题的观点等，对我同企业的技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企业要根据市场状况调整产品策略

陈云十分重视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求企业管理活动中要根据市场变化确定产品数量、品种、结构、价格等策略问题。首先，他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都由政府包下来是不对的，容易使企业“只生产大路货，只管自己生产的方便，不顾消费者的需要”。他指出，企业“不是样样东西都可以多生产，要不要多生产，要看原料够不够，销路有没有，有原料、有销路的才能多生产。”（20）他要求对一些日用工业品取消国家统购包销，靠市场机制来促进企业生产。其次，企业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21）。为此，他提出取消统购包销、发挥中场引导作用、奖励适销对路产品的设计人员、产品实行优质优价、企业专人负责产品品种和质量问题、保证原料供应等具体措施。再次，他主张合理运用价格手段，要求工业产品价格“不违反国家规定，订的价格适应社会购买力”。“有些东西是市场很缺少的，人们也愿意要”（22），应允许价格根据市场需要波动。产品要以质定价，“优质优价。好货好价钱，质量好的价高，不好的价低，”（23）使价格能反映供求关系变化，能促进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另外，他迁主张发展名牌产品，指出：“老百姓要名牌货，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名牌货是我们要提倡”，“应该鼓励。”（24）并对取消名牌货、冒用名牌、不讲信用的一些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陈云关于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发展的论述，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企业管理一定要抓好产品质量

陈云对抓好产品质量十分重视。他指出：“要强调改进质量。钢铁要强调改进质量，设备制造、日用工业品生产、基本建设等等，都要强调提高质量。”（25）陈云关于抓好产品质量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要处理好质量和数量的关系。他指出，企业生产不仅要保证数量，“重要的问题是要保证产品质量。”（26）“数量虽然多，但是如果质量很坏，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真正顶用，不仅不能满足生产、建设和市场的需要，而且要造成极大的浪费。”（27）二是要处理好质量和速度的关系。他说：“我们固然要争取速度，但是在质量方面绝不能有任何的疏忽。”（28）他指出了忽视质量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及产品使用中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忽视质量，不仅不利于而且有害于争取速度。而合理保证质量，则有利于争取速度。我们现在着重地提出注意质量的问题，同要求建设的高速度发展，是完全一致的。”（29）三是要加强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他指出，对各类产品质量问题要进行

分析。”凡是过去质量好而后来降低了的产品，应该尽快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凡是质量一直不好的产品，应该积极采取措施，限期提高” (30)他认为必须靠提高职工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加强技术管理工作来提高产品质量。他指出：“职工的政治觉悟越高，技术水平越高，就越懂得工程质量的重要，越有条件解决工程质量中的问题。”因此，要对职工“进行政治的和技术训练工作，大大地提高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提高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同时还要教育职工，严格遵守有关“质量的规章制度、技术规程和操作规程” (31)。陈云关于加强质量管理的论述，仍是我们今天企业管理工作的指针。

七坚持按劳分配，完善企业的工资制度

陈云指出，“关于工资的规定，要坚持一个原则，即反对平均主义”，“评定工资的标准，主要是按照职务、能力、技术和劳动强度，不得根据其他条件。” (32)他指出：女工、青工等，要一律同工同酬，企业要搞好职工的劳动保护和各项福利事业。陈云还主张按实际情况来确定工资形式。例如，他经过调查，认为“煤矿的采掘工人基本上实行计件工资，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33)，反对名义上计件、实际上计时、把工资拉平了的平均主义倾向。而对于商业企业中的夫妻店，则“不能发固定工资” (34)，应以代销、经销商品的形式取得劳动报酬。陈云的这些论述，提出了企业工资制度的基本原则。

八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

陈云总结了 50 年代工业企业管理的经验教训后指出：“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内，给地方政府和厂矿企业以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权力，是完全必要的。” (35)他明确提出要“适当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权限” (36)。在陈云为国务院起草的《关于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的文件中，具体提出了许多措施，如“在计划管理方面减少指令性的指标” (37)；简化计划编制程序，“国家和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 (38)，以增加企业留利；企业把利润分成的大部分用于生产事业方面，同时适当照顾职工福利方面；取消对企业财务统得过死的一些不合理规定。另外，他要求扩大企业的人事机构管理权。“除企业主管负责人员（厂长、副厂长、经理、副经理等）、主要技术人员以外，其他一切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企业有权在不增加职工总数的条件下，自行调整机构和人员。” (39)在当时的条件下，陈云已经认识到企业管理体制要进行改革，并且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陈云对企业管理的其他方面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如工厂管理经营要“企业化”，要加强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消耗； (40)企业“首先要把生产抓好，特别要抓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41)；企业中要实行集中领导，改进生产组织管理方法，充分利用生产中的“一切空间和时间，减少以至消灭停歇的现象” (42)，加快工作进度，提高劳动效率；发动群众，开展技术革新，改进操作方法，改良生产工具，不断总结经验等等。这些观

点，也都是陈云企业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从上述陈云的企业管理思想中，我认为体现了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鲜明的革命风格。

第一，注重发挥管理职能作用，为加快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局服务。管理是具有二重性的，它一方面是协作劳动的必然要求，具有组织生产力的职能；另一方面又体现着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的要求，具有维护和完善生产关系的职能。陈云就是从管理二重性的理论高度、从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合理组织生产力的全局出发，来观察和处理企业管理的有关问题的。他强调在企业管理中要依靠工人阶级，实现管理民主化；要求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要求处理好党政关系，企业党组织把党的事情管好，维护厂长的行政指挥权；要求企业搞好规章制度建设；要求向一切内行学习企业管理，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培养自己的技术、管理队伍等等，都是要充分发挥管理的职能作用，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调动所有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陈云的企业管理思想，始终贯穿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是围绕着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这个中心而展开的。

第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在陈云关于企业管理的论述中，既没有提到过书本上说如何如何，也很少说外国如何如何，而是完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主要是总结自己的经验。他要求根据群众的实践经验，完善企业规章制度，根据中国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在技术发展上大洋并举；要求企业生产从满足生产建设和消费者的需要出发，根据市场销路安排生产；要求价格要适应社会购买力，通过价格的高低涨落调节企业的产品结构，促进企业提高质量，增加品种等。这些都是陈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表现。

陈云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在 50 年代亲自对钢铁、化肥、煤炭等部门分别做了几个月的调查，才提出有关工业和企业管理的改进意见。煤炭部有两个煤矿搞得很好，煤炭部的同志说是因为实行了计时工资制。而陈三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说这两个煤矿恰好是实行厂计件工资的，因此主张在煤矿中实行计件工资制。陈云身体力行，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上升为管理理论，再指导实践，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第三，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和认识问题，指导处理企业管理中的各种关系。陈云的企业管理思想始终是坚持两点论、坚持辩证法的。例如，在分析产品质量和数量、质量和速度的关系时，始终抓住产品质量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如果没有质量，数量再多也没有用，还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忽视质量不仅不利于而且有害于争取速度，只有保证质量，才能争取速度。在分析技术发展上土与洋的关系中，他认为土与洋既矛盾，又统一，任何时候都会有洋土并举的情况，在一定条件下，洋和土可以互相转化，在这个地区是洋的，在另一个地区可能只算土；现在洋的，如下改进，将来就会变成土的；现在土的，经过改进，将来可能变成洋的。在其他的许多方面，如既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倡创新精神，又要健全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既要坚持企业中的集中统一领导，又要坚持民主管理等等，也都充满了辩证法。可以说，在陈云的企业管理思想中，处处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芒。

*

*

*

陈云的企业管理思想是我们主贵的思想财富，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角度看，这一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首先，陈云的企业管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管理理论的巨大贡献。管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对管理理论做过深刻的论述。陈云在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一方面为创建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作出卓越的贡献，另一方面对企业管理等微观经济活动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企业管理理论进行了艰辛的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思想。陈云的企业管理思想，既全面发展厂马克思主义管理理论，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对我们科学地认识和了解中国个业管理的规律起到了指导作用。

其次，陈云的企业管理思想皇我们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50年代。在陈三扩大企业管理权限思想的指导下，我们迈出了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今天，在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中，陈云关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遵循价值规律的观点，关于企业生产必须从满足消费需求出发、以市场为导向的观点，关于加强企业制度建设、实行严格的责任制的观点，关于严格管理、处理好集中统一领导和发动群众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行民主管理的观点，关于处理好党政工关系的观点，关于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的观点，关于技术发展要洋上并举的观点，以及关于加强经济核算等等观点，都仍然是指导我们行动的理论基础。

第三，陈云的企业管理思想是我国企业管理实践的重要理论指导。陈云的企业管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曾在五六十年代指导过中国工业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对于提高管理效率，加快新型管理体制建设，促进经济增长以及遏制当时已经出现的“左”的思潮的泛滥，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这一思想仍然是指导我们管理实践活动的重要理论。例如，在实行厂长负责制、承包制、股份制等改革试点中，常常出现在强化行政管理权威的同时忽视民主管理的倾向，因而必须按照陈云依靠职工群众，实现集中领导下的民主管理的有关教诲加以纠正。再如，我国国有企业效益不高、亏损严重的状况近几年十分突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管理松懈，解决这一问题也要按照陈云关于加强企业管理的要求，练好内功，加强内部管理，向管理要效益，靠提高管理水平走出困境。又如，我国工业企业产品质量水平近几年呈下滑趋势，产品合格率仅在70%左右，而要提高产品质量，也必须认真领会陈云关于产品质量和数量、质量和速度、质量和市场等有关论述，处理好质量、数量、速度、市场之间的关系，保证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所以，在当前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需要用陈云的企业管理思想指导我们的工作。

第四，陈云企业管理思想中体现了他实事求是、辩证分析的科学态度，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努力探索和掌握客观经济规律的进取们神，以及时刻以满足人民需要、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出发点的全局观念，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困难，仍然需要学习和发挥他的这种精神，认真研究，科学分析，注重实

践，大胆探索，以促进生产力不断增长，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注释

(12)(15)(16)(32)(40)《陈云文选》第1卷，第367、358、367、367、355、367、359、368、366页。

(14)(17)(18)(19)(28)(29)(31)(33)(42)《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第109、183、183、110、182—183、98、100、100、105、105、107—108、181、103页。

(25)(26)(27)(30)(35)(36)(37)(38)(39)《陈云文选》第3卷，第3、137、134、137、137、87、91、91、92、94页。

(11)(13)(20)(21)(22)(23)(24)(34)(41)《陈云文选》第2卷，第46、314—315、45—46、300、300、173、301、174、306、288页。

试论陈云经济效益思想

苗鸿玲

陈云经济效益思想是陈云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好范例。这个理论随着我国经济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研究陈云的经济效益思想对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讲究 经济效益的必要性

陈云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一直强调经济效益。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紧密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马克思曾经指出“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他还指出：“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据此，陈云针对我国当时的实际问题指出：“我们有些地方是大少爷办企业，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利润概念。”他强调，“搞经济工作，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利润概念，是不行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就是速度。”

马克思一再强调的节约劳动时间，实际上是用较少的劳动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陈云也始终把减少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在经济建设事业的重要位置上。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就从宏观上指出经济效益的必要性，强调整个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只有按比例地分配人力和物力资源，才能合理配置社会经济资源，以取得宏观经济效益。他还明确指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为取得宏观效益提供了可能性。

从微观上讲，陈云也充分注意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必要性。他认为企业也要讲究合理利用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讲求经济效益。他曾说：“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道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在“大范围合理”，而在“小范围”是存在下合理现象的，即存在企业对资源使用上的浪费，以及经济效益不高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归资本家私人所有，资本家出于对利润的追逐，在市场竞争下，必须精心组织管理企业，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大的产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是为社会利益而生产的，国家是从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正像陈云所说：“世界上到那里去找补贴农民和消费者的粮食商人？”

但是，也不能忽视企业的经济效益。陈云强调，我们“要搞的是经济，不要搞‘政治经济’。”“七分经济，三分政治。”他针对建国初期的“供给制”，提出企业要实行经济核算制；针对改造后统购统销的弊病，提出选购、竞争。他认为，不讲经济核算，不计成本，不讲利润，经济效益低等情况是一种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弊端，应予改革。例如：他针对商业企业中经营管理不善的现象，指出：“现在大胖子买不到袜子，小孩子买不到皮鞋”，“货不对路”，“市场卡得大死，没有活动余地”。他还指出，

“我们的商业也是要赚钱的。”但他讲的“赚钱”，实际上是与人民利益紧密结合的，因为只有从讲究经济效益出发，才能真正满足人民的需要。

上述观点表明，陈云很早就已经看到，既要注意大范围的宏观经济效益，又应尽力减少“小范围的不合理”，提高微观经济效益。这个道理，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极为现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针对改革开放前，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农、轻、重比例不当的实际情况。从宏观上，他提出了调整方针，强调按比例平衡发展。他指出：“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骨头，搞起来了，‘肉’欠了帐，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或比较按比例地前进。”从微观上讲，他强调要加强企业管理，挖掘现有潜力，改进技术，并引进新技术。他说：“我认为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11）。

陈云的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必要性思想，对促进我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一思想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克服在经济建设指导上缺少经济效益的观念，改革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经济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通过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求得宏观经济效益

在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着经济结构内部的严重失衡，导致了我国较长时期宏观经济效益严重低下的情况。早在1954年陈云就已经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12）他还认为组织经济建设工作，一定要考虑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不仅考虑到工业、农业及物质生产部门，同时也要考虑交通运输、商业设施、城市建设、职工住宅、生活服务等方面的配合，统筹兼顾才能得到好的经济效益。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取得伟大成就时，出现了片面追求高速度的现象。陈云就此清醒地指出，要有宏观经济管理的综合平衡思想，他在1957年提出了三种平衡：一是财政收支平衡，二是外汇收支平衡，三是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就三种平衡而言，其实质或核心是商品物资供求的平衡，即总的有效供给和总的有效需求的平衡。陈云的这一重要思想并没有完全实现，“大跃进”的局面严重地冲击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以后，由于汲取历史教训，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重新强调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才使我国的建设事业走上了比较健康发展的道路。

陈云的这一思想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建设中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实现综合平衡是保证社会总产品合理分配，从而在经济利益上协调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种关系，实现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同时也保证了经济利益在各类利

益分配主体的实现。所以，陈云的通过综合平衡实现宏观经济效益的思想仍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指导思想之一。

陈云还提出抓注重点、抓住关键，合理利用资源，实现宏观经济效益的思想。他认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建设项目有着轻重缓急之分。一般来说，国民经济中那些薄弱的环节，由于相对落后从而牵制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效益，这些部门或环节就应成为建设的重点。

建国初期，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陈云指出，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财力和物力，加以统一使用。只要把力量集中起来，用在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决不应该把眼光放得很小，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13)“在目前情况下，只能有重点地进行工业投资，先解决石油问题，将来还要解决发电问题、铁路问题，等等，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14)因为石油、电力、铁路运输一直是国民经济建设中的短线、薄弱环节，也是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把财力物力集中起来，用于这些重点部门，能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合乎比例，从而实现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

在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发展时期以后，陈云仍坚持上述看法，指出：“为了给后十年比较快的发展创造条件，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金，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技、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是完全心要的。”(15)这些思想被党的十二大所采纳，成为十二大确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重点时的理论依据之一。

过去人们有一个片面的看法，认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的高速度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经常不顾国力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单纯追求所谓“高速度”，速度暂时上去了，但却是以比例的破坏，结构的失衡为代价。对此，陈云认为，控制经济发展的速度就成为我国争取较好的经济效益的措施之一。他一贯主张把速度与比例、效益紧密结合起来。他指出：“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惜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16)所以，他坚决反对不顾一切的盲目蛮干，认为是一种“折腾”，告诫我们“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17)“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18)这里所讲的稳中求快、稳中求比例，归根到底是要在稳中求效益，求实惠。”

陈云还提出生产力合理布局是取得宏观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他指出：“企业的布点，应该接近原料、燃料产地和消费地区，以便能够用尽可能少的投资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果。”(19)“企业的布点既要考虑建设快慢和投资多少，也要考虑到企业投入生产以后的经济效果”。“如果企业过分集中在大中城市，就会脱离原料、燃料产地和消费地区，增加供应和运输的困难，并且会提高产品的成本，在经济上造成长期的不合理。”(20)工业布局合理了，就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经济资源，从而使工业能够“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向前发展”(21)。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就是一种理想的宏观经济效益。工业布局可以说是基立建设的战略部署。部署时在指导思想上要立足于长远、立足于全局，这是实现宏观经济效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通过厉行节约，注重质量，挖潜、革新、改造，求得微观经济效益

陈云在提出要重视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效益的同时，强调指出要注意一个部门、一个企业、一个生产项目、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上的得与失，“也要算小帐”（22），即讲求微观领域的经济效益。他认为，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企业在从事任何一项经济活动时都要进行成本与消耗、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分析。要遵循经济成果最大、资源耗费最小、经济效益最佳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陈云对企业如何设计、施工提出意见，要求“设计必须经过切实的计算，”“尽可能做出几个有比较的方案。”（23）在基本建设上，陈云强调，搞基本建设“必须厉行节约，尽可能地降低造价。”（24）只有这样，才能使经营管理工作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在改革开放初期，陈云提出“进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他认为，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过去一说要增加多少产量，就要新建多少个厂，这个办法下一定好。现有企业要提高折旧率，加快设备更新，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这在多数情况下，比建新厂效益高。”（25）“用上述办法进行基本建设，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技术改造，这是脚踏实地地前进。”（26）陈云强调技术改造、引进新技术，讲求实效，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如果我们在“六五”时就认真贯彻这一思想，则企业微观效益必会大为改观。

陈云还把引进新技术，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做力增加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在谈到外地产品向上海产品挑战时说：“要接受这个挑战，迎上去和它们竞争。办法就是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质量，降低成本。”（27）降低成本意味着单位产品或项目生产上劳动耗费的减少，或者是单位时间产量的增加，从价值上反映出劳动的增值程度，通过利润指标则反映产出上的经济效益。采用上述手段，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会大大提高。

通过提高质量而出经济效益，也是陈云主张的提高经济效益的基本措施之一。首先，陈云要求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应注意质量问题。他说：“速度和质量，这两方面是统一而下可分割的。在基本建设工作中，无论工业布局、建设项目排队、企业设计和施工管理，都必须全面地执行这个方针，使我们能够加快建设的速度，同时使一切建设起来的工程都能够有良好的质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效果”（28）。为了提高质量，陈云进一步指出，在基本建设工程建设过程中，从设计到施工，从建筑材料的选用到设备的安装，从技术力量到管理，从业务到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全面抓。只有在各个环节上把好每个关口，才能保证基本建设工程的质量，质量保证了，宏观经济效益也就可望实现了。其次，陈云批评了在微观经济中只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从而不重视效益的错误倾向。他强调产品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如果忽视质量，生产出来的东西质量很差，甚至是废品，那就说明投入的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设备的磨损、劳动力大多数是无效的。在此种情况下，生产的数量越多，浪费越大，经济效益越糟。相反，如果重视质量，并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就意味着用同样多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来，这样，经济效益当然也就提高了。最后，陈云还十分重视最终产品的质

量，他反复强调，“要强调改进质量。钢铁要强调改进质量，设备制造、日用工业品生产、基本建设等等，都要强调提高质量。有不少出口的东西，过去质量比较好，现在也降低了，在国外名誉很不好。数量虽然多，但是如果质量很坏，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真正顶用，不仅不能满足生产、建设和市场和需要，而且要造成极大的浪费。”(29)

陈云注意到了宏观经济效益、微观经济效益，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强调微观效益要以宏观经济效益为前提。他指出如果从宏观上是合理的，“从微观经济看，这是不合理的，……从最后的经济结果看来，现在的办法，小的方面下合理，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30)相反，如果大的方面不合理，小的方面合理了，“经济上会乱套”(31)。陈云这里强调的是微观经济效益要服从宏观经济效益。宏观经济效益有利于全局的稳定。小的方面下合理，有时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无条件的。尔后，他又指出：“大革命、大建设，是从全局利益出发。当然：地方上的小革命、小建设也要搞，但必须以大革命、大建设为主，这也就是局部服从全局。……只有把国家的大革命、大建设搞好了，各地的小革命、小建设才有切实的保障。”(32)陈云的上述话说明，搞经济建设要从全局出发，保证大局。同时，还提出宏观照顾微观，又对微观起保障作用的思想。

陈云不仅考察经济效益，而且论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一致性。他很早就注意到随着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要对环境质量提出最高的要求。他在1988年就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事情来抓。”(33)并针对我国治理环境滞后的现实指出：“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34)陈云的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它已经被目前某些污染严重的企业或城市的严峻现实所证实了。因此，今后在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必须充分注意环境效益，使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结合起来。

四通过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求得宏观与微观经济效益的统一

“一五”计划完成后，我国开始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最初探索。陈云既看到计划体制在当时所表现出的优越性，也敏锐地看到它的某些弊端。

陈云从我国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特点，尤其是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大胆针砭时弊，反对盲目集中与合并，提出了“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经济格局。他在1956年就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35)在这里，陈云认为二大改造完成之后的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仍然是多样化的，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的传统经济运行格局是不适应中国国情的。这一大胆设想实际上已经萌发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中

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它力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完成这一飞跃提供了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陈云指出，当时已经形成的工业管理体制主要有两个缺点：“一个是有些企业适宜于交给地方管理的，现在还由中央工业部门直接管理；同时，地方行政机关对于工业管理中的物资分配、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职权大小。另一个是企业主管人员对于本企业的管理权限大小，工业行政部门对于企业中的业务管得过多。这两个主要缺点限制了地方行政机关和企业主管人员在工作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36)这就是说，在陈云看来，当时的工业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就在于：传统的计划体制束缚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地方在人、钱、物，企业在产、供、销等方面权限都大小，严重影响了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积极因素这个大政方针的。

陈云基于对旧的管理体制弊病的认识，提出：“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内，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以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权力，是完全必要的。这种国家统一计划范围内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一定程度的机动权力，正是为了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统一计划，这是国家统一计划所必需的。”(37)可以认为，这是当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的核心就是处理好在经济管理权力方面的“统”与“分”的关系。按照陈云的看法，国家的统一计划是必须坚持，必须保证的。但是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国家手中，就不能很好地保证计划的实现。只有给地方和企业一定的机动权力，让他们因地制宜地根据本地区、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贯彻计划的要求，才能真正保证统一计划的实现。所以分权给地方和企业，并不会削弱统一计划，而是统一计划的实现所必需的。

陈云还提出了市场导向的重要见解。他还针对我们商业工作中缺少市场需求观念的现象指出：“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看来，我们的县商店，也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38)陈云在这里不仅仅是关心商业的经营，而更重要的是关心市场的需求，以市场力导向。他认为必须抓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只有商业工作搞好了，产、供、销才能联为一体，供求之间的差距就可以缩小乃至消失，经济效益的最终实现就有了保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产品能否实现，最终要通过市场来检验。只有通过市场。把商品“让渡”出去了，其价值才能实现，生产中的物化劳动和劳动消耗才能得到补偿，从而能实现经济效益。如果完不成由商品向货币的“惊险的跳跃”，摔坏的不是商品，则是商品生产者。这个道理，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同样是适用的，陈云并进一步提出企业的产品要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的思想。他说：“要有若干个大企业，能灵活地搞小批量生产，增加花色品种，使产品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39)

陈云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强调了价格和价格机制的改革，价格要符合价值规律，并要反映供求变化状况，反对冻结物价。他指出：“目前我国物价政策上存在着一种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就是在出售价格方面，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因此不同品质的产品差价很小，优质得不到优价。”(40)这就是说，某些技术比较先进，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生产的优质产品没有在价格方面体现出来，它的经济效益也就很难实现了。因此，要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

陈云十分重视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他在 1979 年讲道：“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41)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经济格局，建立一种新的以市场调节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运行机制。陈云还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的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42)后来，陈云将这些思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43)

陈云说过，“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44)陈云以“鸟”比喻市场，以“笼子”比喻计划，用“鸟”与“笼子”的关系说明了他对计划和市场的看法。这一思想突破了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教条认识。在传统理论下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单一的计划机制，而计划机制的实施又以单一的指令性计划为选择。所以整个运行机制是一个以行政性指令式计划为垂直管理的系统。这一思想也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有原则区别，他强调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必要。这一思想是具有中国特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的伟大设想，它在体制上保证了实现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的统一。陈云在这一设想中所提出的模式，是在国家控制和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模式，这种模式已经接近于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的这一设想，对我们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的具体途径和配套措施，无疑是有启发的。

陈云从始至终都强调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在 1994 年春节，陈云在会见上海市党政负责人时还叮嘱道：“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45)陈云的经济效益思想正在为广大群众所了解，必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北方交通大学)

注释

《马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0、120 页。

(11)(15)(17)(18)(22)(23)(25)(26)(27)(29)(30)(31)(32)(33)(34)(35)(36)(37)(39)(40)(41)(42)(43)(44)(45)《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319—320、45、253、267、318、319、268、351、158、113—114、319、267—268、319、137、278、319、364、254、13、87—88、334—335、319、10、244—245、245、305、320、380 页。

(12)(13)(14)(16)(38)《陈云文选》第 2 卷，第 333、260、131、333、332、241—242、61、98、152、334—335 页。

(19)(20)(21)(24)(28)《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 年)》，第 74、75、70、88、87 页。

陈云战争经济动员思想初探

万东铨

陈云经济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产物，这一思想的丰富性和科学性，不仅表现在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面，而且表现在确保中国革命战争的经济需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的战争经济动员的胜利完成等方面。本文以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经济保障为研究对象，结合陈云的经济工作实践，着重讨论他的战争经济动员思想及其对当前战争经济动员的指导意义。

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战争经济动员是在两种特殊情况下进行的。

其一，在较长的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没有夺得全国政权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动员的。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被敌人分割在若干互不联系的独立的革命根据地之内；在解放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只拥有几个解放区。当时，由于未夺取全国政权，国家经济命脉主要掌握在敌人手中。因此，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战争经济动员是极为困难的。一方面，各革命根据地与后来的解放区，主要处在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国家经济潜力相当衰弱；各根据地又互不相联，各自的经济动员活动有较大的独立性。因此，在经济的组织和动员等方面，无法实行统一的政策和做法，很难动员社会经济于战争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各根据地或解放区与敌占区经济交流受到约束：根据地被敌分割，使得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受到一定约束。这种局势，极大地限制了根据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致使经济潜力不足；同时也抑制了经济潜力向战争经济实力的转化，造成战时经济动员无力。

其二，在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边抗、边稳、边建”的环境中组织和领导战争经济动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新中国刚从战时经济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轨道。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以武力盘踞我台湾岛，并对我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妄图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在这一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科学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明确地提出了“边抗、边稳、边建”的社会主义经济方针。新中国以其十分薄弱的经济实力，既要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需要，又要稳定国内市场、维护革命成果，还要照顾重点建设，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战争经济动员的确是十分困难的。

在这一紧要关头，陈云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呕心沥血，在领导战争经济动员的实践中，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实际，并对今天乃至今后战争经济动员仍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原则，形成了属于陈云经济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陈云战争经济动员思想。

一战争经济动员的基础论：大力发展 社会经济，为革命战争的胜利 奠定物资基础

战争经济动员，就是通过一系列特殊的政策、措施，形成的特殊机制，作用于经济运动，将经济潜力转化为军事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

依赖于强大的经济潜力；而经济潜力又是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的。因此，战争经济动员最直接的目的是将经济潜力转化力军事经济实力，间接的目的则是组织好社会经济运行，大力发展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家经济潜力。

早在 1928 年，毛泽东就反复强调：在革命战争中，“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经过几年的实践，毛泽东科学总结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明确指出：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下是服从革命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在战争经济动员的实践中，陈云是坚决地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的。

在革命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部曾一度产生过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倾向。为纠正这一偏差，1941 年 5 月，陈云曾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及时纠正了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乍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他要求各级党的组织，要加强对经济和技术工作的领导，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努力增强经济潜力，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奠定经济基础。

在革命战争时期组织经济建设，与平时时期组织经济建设是有明显区别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心任务是打仗，经济建设是自接为战争服务的，社会资源的配置，首要的是保障战争需要。陈云曾指出：“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方针上，都不可能又战争又建设，不可能两者并列，两头兼顾。”就是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其财力投入的重点，不可既“战争”又“建设”。陈云还指出，战时的财政工作主要有三项任务：一是保证战争需要，二是稳定金融物价市场，三是搞好经济建设。战时的经济建设，不可能百废俱兴，只能有重点地进行。他说在革命战争时期，“经济建设的投资，要规定这样一条原则：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对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对稳宁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这三者应该予以满足。除此以外，应加以削减和收缩”。

按照这个原则，我国在抗美援朝时期经济建设的投资重点，在工业方面卡要是钢铁。燃料和军工生产，农业方面主要是粮食和棉花生产，在交通方面主要是铁路运输。这样，不仅使我国经济建设得以恢复，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而且有效地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经济需要。

二战争经济动员的原则论： 坚持战争第一原则，一切 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

列宁早就指出，在战争中，“要把一切转入战时状态，使一切工作、一切努力、一切考虑完全服从于战争，而且只限于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提出了在革命根据地内一切为了战争、一切服从于战争的基本原则，并强调指出，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一切应服从战争。可见，在全面性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战争第一，一切为了

革命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动员的基本原则。

在战争经济动员的实践中，陈云继承和发展了“战争第一，一切服从战争”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他明确指出：在革命战争时期，“战争第一，这是无疑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说起”。

什么叫“战争第一”？陈云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对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阐述并有新的发展。他说：“过去在地方系统中做党的工作，做政府工作，主要是在做战争后勤工作。党委书记实际上是后勤部长……战争第一的观点表现在财政上，即是在预算上要尽可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从军事系统做后勤工作的同志来说，战争第一，不能采取有多少用多少的‘包用’办法。如何用，用多用少，用迟用早，要详加审核，而不是‘报销’完事。因此，一方面要做到战争第一，另一方面要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使用，才能满足军事上的要求。”可见，陈云对“战争第一”原则的认识，是从以下3方面理解的：

第一，战争第一，指以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中心，其他一切工作，都应以这个中心为前提条件，服从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无论是做党的工作或政府的工作，无论是做经济工作或其他工作，都要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战争是敌对双方全部力量的较量。只有精心策划，科学组织，将精神的、物质的全部力量有机结合，密切协调起来，形成着统一目标而奋斗的合力，才能夺取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

第二，战争第一，指在资源的配给上，优先并全力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陈云明确提出了战时财政分配原则：“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保证需要，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他反复强调，在支出中，必须优先考虑军队作战的需要，然后才能考虑学校和机关的需要；优先考虑前方的需要，然后考虑后方的需要。诚然，在革命战争时期，前方有困难，军队有困难，地方也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应优先解决哪个方面的困难？陈云十分肯定地指：当然是打仗第一即使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军费也不能减，甚至还要努力增加。这样，后方和群众生活必定遇到更多的困难。陈云解释说，必须忍受这暂时的困难。因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集中力量早一点结束革命战争，才可能把钱省下来用于建设事业。在战争过程中，“钱是一定要花的，战争不完全胜利，一切都谈不止”。

第三，战争第一，指要注重节约，充分发挥有限资源的效益，提高军费的实际保障能力，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动员一切力量，支持革命战争，保障战争胜利需要；另一方面，一定要注意节约，用好有效的军费。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11)陈云也强调：我们的财力不足，为满足革命战争的需求，既要努力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又要严格管理，防止浪费，“钱要用在刀口上，不要用在刀背上。”(12)为此，他还提出了6条必须遵循的原则：收支情况要心中有数；下决心学会财经业务；把钱集中起来花；坚持分配原则注意公平；制定政策按章办事；顾全大局恰当花钱。政府工作人员要这样，军队的同志更要这样，对每一笔军费的使用，都要周密计划，精心计算，把钱用在“战争”最需要的地

方，更好地发挥有限军费的军事和经济效益。

三战争经济动员的前提论：努力稳定市场，改善夺取战争胜利的条件

战时，军费巨增，社会经济运行秩序被打乱，市场规则受到破坏，多种因素冲击市场，使物价上涨。市场不稳定，必然破坏利益“公平”的格局，进而导致人心波动不安。这不仅容易造成政治不稳定，而且还会弱化原有的军事实力。因此，战争经济动员决不能仅仅理解为将资源动员起来，积蓄起来，就算完成动员任务。更重要的是在动员的同时稳定市场，进而稳定人心。这是战争经济动员的前提条件。市场状态，物价变化，均与战争的经济保障能力有着紧密相联的关系。前者对于后者具有直接的影响。要保证较强而稳定的战争经济供给能力，就必须下大力维持市场的相对稳定，保证物价平稳。所以，陈云曾反复强调指出：战争第一，这是无疑的；第二，应该是维护市场，求得金融物价秩序不要乱。

要维持市场稳定，保证物价平稳，首先必须作到财政收支平衡，“以没有赤字为原则”。常规情况下，战时是不允许出现财政赤字的。然而，战争需求又往往使财政人不敷出，这就要采取多种办法，求得收支平衡。例如，可以借外债，发公债，印钞票。但这都不能彻底解决平衡问题，这些办法弄不好反而会引起其他的弊端。“在战争中大量发钞要是很危险的事，其后果在物价上立刻可见。”⁽¹³⁾因此，陈云认为，决定收支平衡最关键的是财政概算平衡，即通过经济动员，在财政概算上用“挤牛奶”的办法尽量多收，用“削萝卜”的办法尽量少用。

战争经济动员中求得市场稳定，物价平衡，务必处理好物资的生产与需要的矛盾，以及物资供应时间迟早的矛盾。陈云指出：这种矛盾在战争时期是很容易发生的，即使财政上取得平衡，如果物资供应不上，或者有物资而运输不畅，市场物价还会发生波动，并对金融产生冲击。当然，如果财政金融稳定了，市场物价平衡就有了基础。若金融和物资供应都有问题，物价的波动程度便会更大，更难控制，因而也就更危险。

陈云在战争经济动员过程中，为了防止金融物价大幅度波动而造成被动局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在全国解放前，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市场混乱的局面。解放之初，这种既成局面尚无好转，同时，新中国尚无统一的税收政策和系统，军队作战费和公教人员生活费，很大部分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物价上涨。当时，能否迅速有力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是关系到新生的政权能否站住脚跟，革命的胜利成果能否保住的重大问题，受党中央的委托，陈云于1949年7月到达上海，亲自组织和指挥稳宁市场、控制物价的重大战役。他采取了果断措施，如努力增加收入，主动紧缩支出，抓好粮食供应，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等。由于采取了上述得力措施，到1950年3月，全国市场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在抗美援朝时期全国性的战争经济动员过程中。金融和物价始终是比较平稳的，避免了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一伟大胜利，成为我国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前奏，为全面开展战争经济动员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四战争经济动员的源泉论：充分发动

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

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4)战争经济动员，归根到底就是对于群众的动员；战争经济动员的广度和深度，最终取决于群众动员的力度。因为，革命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的动员，是直接通过动员群众来实现的；所需财力、物力和交通运输等的动员，也必须通过群众的动员来实现。因此，人民群众是战争经济动员的源泉。

陈云在充分认识这一问题后，指出：“总方针是发动群众、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没有群众支援，单纯拼骨头，打来打去，是会打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来源就会枯竭；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力量的源泉，“有了群众，一切好办，可以有军队，清除土匪，经费供给也有来源”，“没有群众，一定失败，死无葬身之地。”(15)因此，他反复强调：通过战争经济动员，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主要的办法是发动群众，增加我们的力量。”(16)陈云把发动群众，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看作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总方针。自然，也应该是战争经济动员的总方针。

陈云还认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方法是多冲多洋的，其中最“主要的办法是发动群众，”(17)使我们党和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

动员和发动群众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陈云认为，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至少要注意4方面的问题：一是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政治觉悟。要用正确的思想引导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使他们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拥护和支持革命战争，勇于献身于革命事业。二是关心群众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这样，才能使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与群众建立起血肉相联关系。三是明确奋斗目标，统一群众认识。要适时正确地提出斗争口号，发动群众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斗争口号的提出，应既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又是有利于引导群众前进的动力。四是建立武装组织，集中群众力量。“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得要掌握武装，因为地主普遍有枪。从经济斗争到武装斗争，再深入经济斗争，再进一步转入武装斗争。这样农民不仅敢同地主斗，也敢同国民党斗了。”(18)

总之，只要坚决相信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积极组织群众，我们的军队就有坚实的良好的群众基础，战争的经济动员就有了保证，我们的党在革命战争中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陈云上述思想，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争经济动员学科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动员就没有了对象；没有明确的动员目的，动员就失去了方向；没有稳定的

市场，动员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没有不断壮大的人民力量，动员就会失去连续性，动员规模便难于形成，这4个方面构成了战争经济动员的基本内容，缺一不可。

陈云战争经济动员思想，是我国战争年代经济动员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今天乃至今后我国战争经济动员的科学指导。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国战争经济动员处于一个特殊时期，面临着两个转换：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一是由常规战需求向高技术局部战争需求

转换。因此，适应市场经济和高技术局部战争需要，便成为我国战争经济动员准备的基本任务。面对这一现实，我国的战争经济动员准备工作，同样应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深入国防教育，强化全民的国防意识。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企业和个人的商品观念、利益观念等不断增强，人们的国防意识会随经济利益最大化观念的强化而弱化。因此，必须加强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国防教育，增强全体民众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兴旺观念，规范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兴旺为标志的群体行为，自觉做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战争经济动员准备工作。

其次，要加强市场建设，稳定市场物价，净化战争经济动员的社会环境。在无直接控制的情况下，供需规律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规律，自动地调节着市场物价，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物价难免会出现波动。然而，战争经济动员的特殊性决定了动员的准备、实施依赖于行政的、法律的手段硬度。行政的、法律的动员手段的实施，又依靠稳定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取决于市场物价的稳定。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搞好战争经济动员准备，必须稳定市场，平抑物价，为经济动员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

最后，要大力发展经济，为高技术条件下战争动员奠定坚实的物资基础。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是高科技社会。未来战争是高技术战争。高技术战争具有技术要求高、反应速度快、合成程度强、战争消耗大等特点。要适应未来高技术战争经济保障需求，必须有强大的物资基础。因此，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战争动员的准备阶段，首要的问题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为战争经济动员奠定坚实的物资基础。否则，未来高技术战争的经济保障就无力进行，战争的胜利也就没有了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

注释

(1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第53、130、134页。

(13)《陈云文选》第2卷，第116、116、112、115、1、22、114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第442页。

(12)(14)(15)(16)(17)(18)《陈云文选》第1卷，第289、288、136、315、315、315、316页。

